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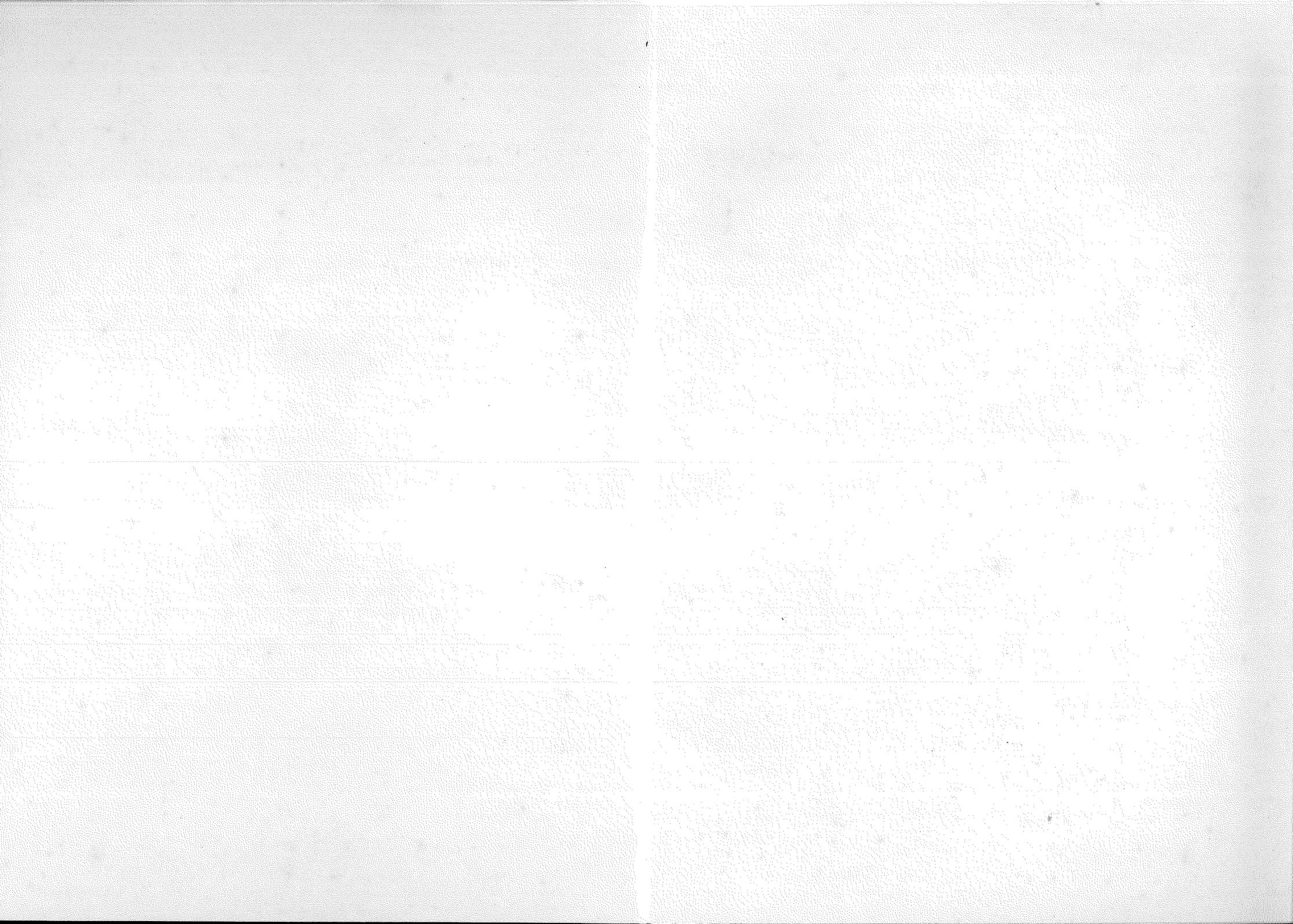
我的黑白青春

我的

黑白



青春



青春之美在于梦
若能重回一趟青春路
我会继续追求
心中那个梦

林清如

自 序

(一)

那年踏出牢门，青春已背我而去。斗转星移，那曾震撼人心的乐章随风远逝；流年似水，不觉已过古稀之年。朋友说，一程山水我走过，如何妥当留存一路景物，成了我必须长久琢磨的作业。

退休后，有个时期常和太太远赴英伦小住。一天家里来了几位新加坡年轻人，发现我们全神贯注于录影连续剧，他们眼神诧异，不无责备的意味：“怎么如此清闲啊？”——这些年轻人正投入历史研究，有自己的理由期待像我们这样的人做些更有意义的事。

次日，我随兴陪他们到位于邱园的大英帝国国家档案馆，埋首于千卷万册曝光的衙门笔墨，屏息倾听历史的呼唤。

信息时代民不可愚，年轻人质疑历史，要解构历史，要追根究底一睹历史真面貌——那些过去，怎么执意不肯过去啊——而我，常令走近身边的年轻人感觉失落。这些年，岁月无歌，像许多历史现场的过来人一样，我早已是失语群体的一员。倘若沉默也算一种姿态，莫非那就是无声的控诉。

后来，在档案馆口述历史人员再三劝说下，我终于答应考虑，看看自己能做、该做些什么。我踏入新加坡档案馆，细心聆听个别人士的访谈录，觉得那确实都是有价值的民间记忆，

它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多样性。与口述历史访员做了首次访谈后，我强迫自己穿越时光隧道，耐心地把记忆的碎片梳理、串联。

既然决定置身历史场景，我想与其口述让别人记录，不如尝试调动自己那只笨拙的手，也许笔触更见真实。于是，本书便有了个催生的理由。

我之前不曾有过书写回忆录的动念，更不用说刻意撰写自传了。我成长的战乱童年，是同代人共同的命运。后来走过的，也是很多人义无反顾所选择的道路，我只是众多人中的一员。本书所述所叙，都定格于我三十而立之前的人生。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多少人长期被剥夺了自由，青春被摧残，家庭被拆散。半个世纪过后，我以平和的语气忆述当年的亲身经历，只希望为一个集体记忆的大画面做点补白。

个人的陈年琐事，不一定能与历史沾上边。在书里，我没有过多的慷慨和激昂，更无意天南地北搬弄大道理。我只追求真实，一知半解的事，不敢信口说雌黄；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我直言不讳。虽然我曾历经惊涛骇浪，与大伙儿以教徒似的热忱为正义奉献青春，但我不曾掉进自怨自怜的怪圈，我不贩卖悲情。

年轻时唱过国际歌，早就听说“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进了牢房面壁苦思，更感悟其中道理。人生的每一回挫败，都是战胜自己、重拾心灵、自我超越的机会。我自认热爱也珍惜生命，庆幸能在困境中时刻保持自信与毅力，在能力范围内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扪心自问，一路走来我“不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然而，人生终究有遗憾。我的遗憾，青春梦，圆不了。青春之美在于梦，若能重回一趟青春路，我会继续追求心中那个梦。

(二)

出版本书的另一缘起，是想发表我珍藏多年的二哥清祥的一份亲笔遗稿。老一辈人都明白，动荡的五十时代，林清祥挺身而出，发动并领导人民群众通过和平与宪制途径，争取国家独立。而新生代所认识的，却是主流论述里常与暴乱形影不离、被影射成暴力化身的林清祥。林清祥的这些文字，为那个动荡的时代，作了最恰当不过的注脚：

“1954年至195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一个转捩点。一个从实施‘紧急状态’转入实行林德宪制改革的转捩点，一个由充满高压的白色恐怖转入极有限度自由、民主开放的转捩点。”

“在这样的历史转换过程中，新兴力量与旧势力、旧习惯、旧传统的斗争往往更为激烈。一些出轨的行动，如不合程序、法规、惯例等的‘骚扰’或‘暴乱’也就必然浮现。渐渐地，当新势力完全战胜或克服了旧事物，新的处事程序、法规、惯例便形成并被接受，社会也自然安稳了。”

历史嘲弄了人们的真诚，斯人已去，沉浸悲情不自拔，于事无补。二哥清祥辞世至今（2014年）已18年，适逢新加坡建国50周年纪念前夕，翻翻手稿，听一听他亲口说几句，希望能还原空气一丁点清新。

书名为何是《我的黑白青春》？且把遐想的空间留给读者。

太太当年与我隔空长相厮守，婚后含辛茹苦为我养育四名儿女，谨以此书献给她，是一份相知相惜而迟来的精神补偿。

写作过程，资深文友在文字方面为我把关、创意盈满的年轻朋友在编排与美术设计方面让书本展现青春活力、书法家林书香为书名题字，我铭感五内。新加坡报业控股、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老同学为本书提供珍贵历史照片，谨此一一致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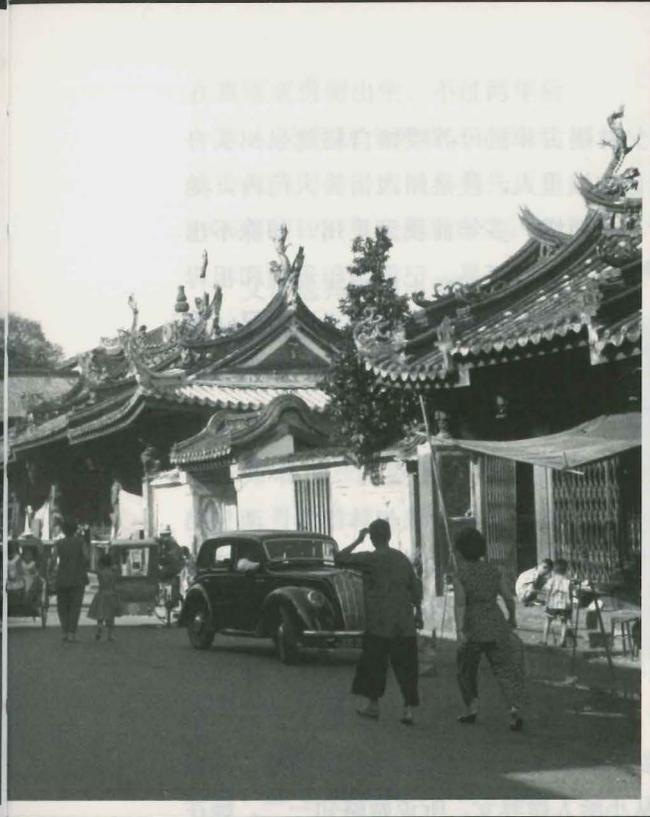
364	附录之二 ■ 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08	战乱童年 ■ 我从甘榜走来
322	附录之一 ■ 林清祥光辉的一生	42	跳跃的心 ■ 赶上沸腾的年代
304	琐事真情 ■ 二哥活在我心中（为纪念二哥逝世18周年而写）	72	中学联 ■ 一个时代的绝响
294	正气凛然 ■ 勇敢的林福寿医生	120	泛星岁月 ■ 我短暂的职工运动生涯
282	温文尔雅 ■ 可敬的陈仰成老师	140	路遥夜漫漫 ■ 我的青春坐了监
266	风雨共一程 ■ 与孙罗文的交情		

战 乱
童 年

我从甘榜走来



公路旁二十来间木屋，
住的都是经营小生意的华人。
甘榜南华，这马来半岛西岸的小乡镇，是我童年的故乡。



辛亥革命前夕，
祖父母自福建泉州买舟南下，落脚星洲直落亚逸的“估里间”。
父亲、叔叔、大哥和二哥都在这里出世。

照片提供：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祖辈的足印

辛亥革命前夕，祖父林赐古和祖母苏暖娘自福建泉州买舟南下，落脚星洲。祖母自称城里人，住泉州西街头大门内，她经常跟我们提起开元寺、东西塔。多年前我到泉州，却探不出究竟，都说城里人流动性大，无根可寻。记得当年母亲和祖母骂架，有时会口出秽语，骂祖母当年南来为的是“讨契兄（闽南语tou khuei hiann，具贬义）”，事实是祖母反抗父母而逃婚，与祖父私奔南洋，和家乡早就断绝音信。

祖父祖母落户星洲直落亚逸街的“估里间”，辛亥革命那年（1911年）生下父亲林廷玉，接着是叔叔林廷贵，两兄弟曾就读当时的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祖父有个妹妹随后也移民南来，和众子孙散居后港一带。

1912年母亲洪柿娘在福建晋江的小村落王厝诞生，随外公外婆南来，定居小笨珍。为什么本来家居新加坡的父亲会和小笨珍的母亲结婚？我们做子女的从没有想到应该打听清楚。六姨（母亲的第六个妹妹）从小给人做养女，听说她略知一二。她在世时我拜访过她，她说那时（大概20年代末期）祖父母一家人从新加坡搬到小笨珍谋生。六姨的养父“做煮炒”，认识外公和祖父，是他做媒撮合了父母亲的婚事。过后六姨随养父搬来新加坡，我父母也随着搬了过来。1931年和1933年大哥和二哥相继

在直落亚逸街出生。不过两年后一家人又搬回小笨珍，在张江水街租房间住，大姐和我先后于1935年和1937年在那里出生。

父母选择搬回小笨珍，大半是因为外公在那里事业有成就。姓洪的晋江人在小笨珍有些势力，外公在市中心开设的“吉祥酒庄”名气很大。大哥名叫清吉、二哥叫清祥，外公或父亲的灵感显然就来自酒庄的名字。把我叫清如、一个日治时期去世的弟弟叫清意，连串起来就是吉祥如意了。毕竟是人无财不足以立世，父亲为后来的四个弟弟取名时，就想到应该要“富、豪、福、财”了！

我们从小笨珍张江水街搬到三英里外、通往龟咯的大路旁的甘榜直洛吉冷，应该是我两三



■ 小笨珍张江水街——原来左边有一排木屋（俗称16间），姐姐和我都在那里出生。

岁的时候。当时一家有十口，即祖父、祖母、父母亲、叔叔、大哥、二哥、大姐、我与二妹，后来三妹也在那里出生。记忆中的家是间锌板屋，就在马路旁，也是间“吉来”（店）兼货仓，屋后有一片胶林果园。左右没有邻居，因此没有玩伴。

我对祖父的印象很模糊，只记得他瘦骨嶙嶙，常年咳嗽。终于有一天，我第一次看到棺材，祖父死了，后来才知道他抽大烟，死于肺癆。我和大家坐上罗里，送祖父到福灵山安葬。后来我每次到吉祥酒庄外公家，看到外公躺在木床上吞云吐雾的快乐神仙模样，才多少知道大烟如何令人陶醉。抽大烟导致肺癆，那个年代肺癆是无药可医的绝症，那一代人，多半五十岁上下就白白丢了命。

至于叔叔，我的印象更模糊。后来从祖母口中得知，他响应了陈嘉庚的号召，回中国当机工以协助抗日活动。往后的日子，我才开始了解祖母一生心灵的创伤。她日夜思念叔叔，时常情不自禁痛哭流泪。与母亲吵架后，她往往会拉着我的手向母亲要胁：“我们来去跳海吧！”有时我们真的来到海边，有时就在半路的胶园里，祖母紧抱着我嚎啕大哭，频呼叔叔的名字。长大后回想，倍感个中辛酸。直至1965年祖母去世为止，她都没见到叔叔。

硝烟童年

童年时期我们没听过童话，也不知道未来的孩子会把飞机大炮当玩具。五岁那年，我就约略感知战争是怎么回事，知道天上隆隆作响的是会投下炸弹的战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炮火连天，大人天天谈着日本军如何残暴的事，我们都清楚什么是真枪真子弹，也明白避不过子弹或军机的轰炸就得应声倒地。

日军已在马来亚东北部登陆，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就向小笨珍逼进，它的凶狠残暴，早就令人毛骨悚然，于是人心惶惶，大家竞相疏散，撤往偏僻乡村回避。我们一家最先搬到邻近的一个马来家庭，可是隔天当父亲回老家搬运东西时，竟然发现店屋已遭人纵火烧毁。日军还未到来，不可能是日军干的。是歹徒劫后放火？还是恶人趁机下毒手？父亲了无头绪。多年成果付诸东流，只好忍痛离开，迁往更深入的乡区。

父亲决定先到朋友廖海清家求助。廖老是个小园主，兄弟四人共住一间相当大的屋子，以种植树胶、果树兼畜养猪与家禽为生。这是个偏僻的小甘榜，距离大路约有两三公里，周边都是务农者。大哥回忆当天逃难时，母亲抱着幼小的三妹，父亲一根扁担挑着两个大篮子，篮子里就是一家人的细软，还有

父亲一部残缺不全的《水浒传》、一部《薛丁山征西》。来到廖老家门前，他当仁不让，收留了我们。

日军很快就会到来，它是否也将在这里残酷施暴？村里所有的妇女们全换上了男装，剪掉头发；男人则日夜轮流防守，打探日军行踪及准备即时发出警号，劝人隐蔽躲藏。粮食供应问题更大，于是大家分工，快手快脚砍掉胶树或黄梨，种起稻米、蕃薯、玉蜀黍，兼养家禽和猪只。父亲也在廖老家附近借来一两亩地，开始种稻米、蕃薯及蔬菜。大哥和二哥成了父母的好帮手，我则多半带着玩的心情，白天或夜里，陪着大人在稻田中的守望台消磨时间，当害鸟或野猪出现时，立即频繁拉动守望台上的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着好几个“土油珍”（装火水的长方形铁桶），在频密的抽拉下发出阵阵声响，让它们惊慌窜逃。

廖老家成员多，婆媳妯娌间人事也多，父亲决定尽早离开。廖家附近有个黄梨园，属新加坡闻人林金殿所有，经理于右卿是父亲的朋友。在于经理的安排下，我们搬迁往黄梨园管工阿彪叔的家居住。在这期间，母亲产下四弟清意，不久他死了。祖母常把死因归咎于阿彪婶，说她常以中指指着弟弟胸部逗他玩，居心不良。根据大哥的回忆，弟弟其实死于破伤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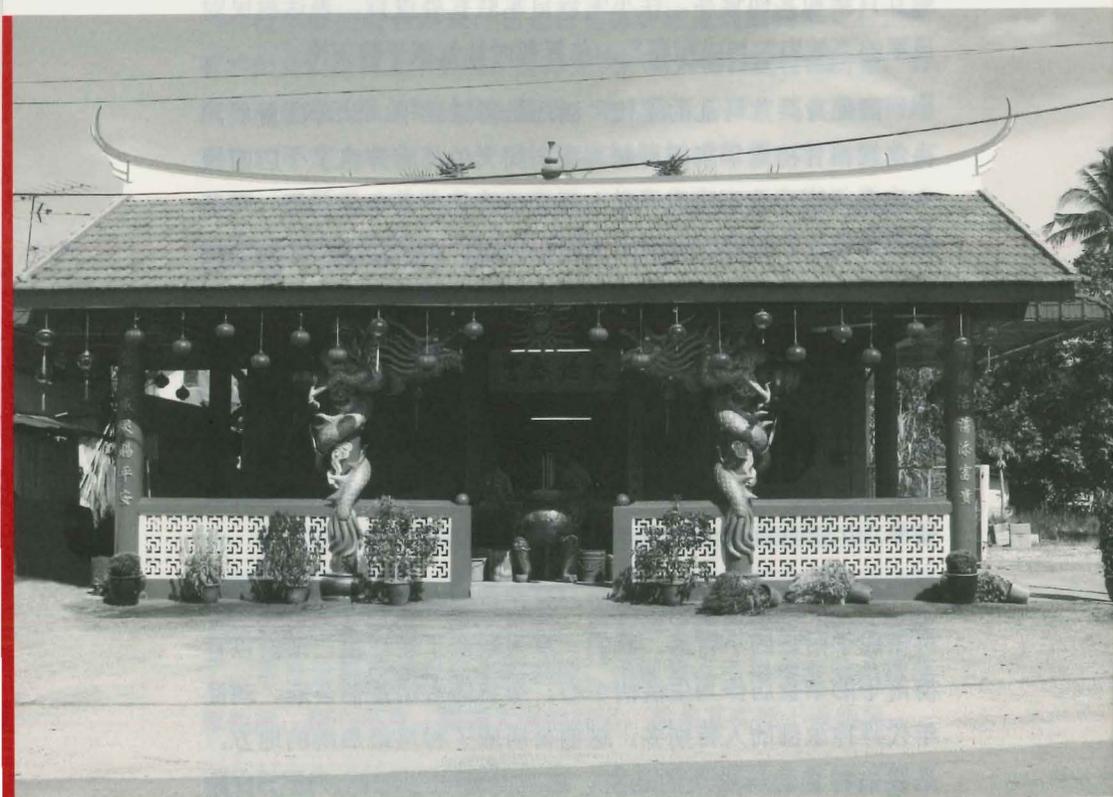
日军终于进驻甘榜南华，一个靠近我们避难之处的村落。除了取走有价值物件，日军也严厉缉查被认为有抗日嫌疑的青

年。一天，日军负责人限期要甘榜南华村民表示“效忠”与“归顺”。父亲、廖老先生与另一两位村民代表，冒险准时挑着几只猪和其他食品，往小笨珍日军驻扎处进贡，表达村民对日军的“效忠”与“归顺”，总算暂时让气氛平静下来。

虽处身兵荒马乱的年代，活还是得继续干。父母商量后，决定就在甘榜南华东山再起，在一间大伯公庙旁租了个店面做小买卖。这一来，我们一家人便分住两处，母亲、二哥、三妹搬去店里住，祖母、父亲、大哥、大姐、我和二妹留住阿彪叔家，方便照顾稻田。

一天深夜，母亲和二哥抱着三妹从店里跑回来找我们。他们说大批日军开抵甘榜南华，包抄搜查，来势汹汹，说是要寻找一名日军的下落。隔天又听父亲说，更早时日军已在小笨珍市中心大开杀戒，父亲的一位朋友全家人全被枪杀。这些乱世情节，在我们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惶恐与不安。

幸好日军不太恋栈小笨珍，只在市中心留驻少许兵员，不再出现于附近的小村落，我们一家人适应了新环境，渐渐以甘榜南华的杂货店作为生活的中心。杂货店右边是伯公庙，动乱年代拜神求佛的人特别多，这伯公庙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是我们村童游玩嬉戏的场所。庙祝是位上了年纪、近于盲瞎的李老先生，村人称他为“李秀才”。我们兄弟一得空，便跑



■ 动乱年代拜神求佛的人特别多，这伯公庙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也是我们村童嬉闹的场所。

去向他请教珠算，他也教我们读读“人之初，性本善”之类的经书。

店屋前方是条大垄沟，它源于北干那那的黄梨芭，深褐色的河水流过“红毛园（洋人拥有的橡胶园）”，经甘榜南华向西入大海。这条大垄沟给我们一群村童增添了无限生活乐趣，一有机会就到此游泳、跳水、捉鱼或划木筏。

过了一段时日，父母亲决定搬出黄梨园，在甘榜南华近海的一边顶了一间亚答屋，养猪种菜。从到河里采集浮萍、将它切碎、搅以米糠煮给猪吃，到每一天为猪冲凉两次，我应付自如。大哥照顾菜园，也帮忙家务。不久母亲又生产了，那是四妹秀闰。日治时期缺乏炼奶和奶粉，住在店里的二哥每天向养牛的印度人家买鲜奶，加上白糖以温火煮成炼奶，需要时冲泡给妹妹喝。

1945年8月底，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日军投降了。然而，就在同一时期，在巴株巴辖与小笨珍间的甘榜新加兰、文律、龙引等处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残忍的排华事件。许多无备的华族同胞被马来族同胞残杀，小笨珍市中心的华人开始纷纷戒备，再度人心惶惶。传说这是日军挑起的，也有人说是日军撤走后抗日军开入这些甘榜，过激的行动引起马来同胞的恐惧与不满而造成，真相如何，还有待考究。

甘榜手足情

我们那间店的屋主陈亚灿是甘榜南华较富有的人家，他是永春籍人士，经营布业。眼见我们的杂货店生意渐渐起色，他与我们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父母亲觉得租用人家店屋并非长久之计，开始储蓄，找个地方盖一间较为像样的屋子，生意既可做大，一家人也能住在一起。

有个放高利贷的印度人，在甘榜南华大路旁有块约6000多平方英尺的地皮打算出售，叫价400元。记得是母亲当机立断，拍板定案，然后筹钱完成买卖。父母亲着手盖了新房子，亚答屋顶，板墙，地面是黄土。屋子的前半部是店面，店号“泉成兴”，后半部是栈房、睡房和厨房。流离失所三年八个月后，兄弟姐妹在新房子里欢聚融融，顾不了未来日子怎么过。

战前大哥和二哥已在小笨珍市中心的培群学校上课，战火停熄他们回校插班，都成了超龄生。1945年我已经八岁，和十岁的姐姐到甘榜南华附近新开办的培华学校从一年级读起，算起来也是超龄生。1946年6月大哥读完小学，到新加坡华侨中学念初中，还是寄宿生。

这一来二哥和我成了在家最大的男孩，上课之余，就当杂货店帮手，也协助祖母和姐姐照顾年幼的弟妹。我们兄弟俩都好动，常结伴到深山丛林捉打架鱼、黑蜘蛛，或设陷阱捉田鸡、



流离失所三年八个月后，兄弟姐妹在新房子里欢聚融融，顾不了未来日子怎么过。

松鼠，有时也到海边捕捉螃蟹和小鱼。我们有各自的玩伴，二哥喜欢打羽毛球，我则喜欢足球和篮球。朋友当中，有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肤色、语言不曾是障碍，言谈之间毫无禁忌，也从没想到，种族关系会成为敏感课题的一天。

有一天父亲从小笨珍带回一个大箱子，说那就是收音机，二哥和我兴奋无比。那箱子有两条尾巴，一长一短，短的接到另一个须要定期充电的电池上，长的是天线。父亲说天线得通由屋顶向外拉，然后在屋子附近栽一支长杆子，把天线高高托起，越高越好。父亲到外头绕了几圈，找到了一根长长的竹杆。他在天线的两头装了两个像是小玻璃瓶的东西，说这样可以避雷，再把天线的一端捆在竹杆上，接着插起竹杆，天线就在高处摇荡了。

这是甘榜南华第一架收音机，父亲故意调高音响，左右邻居都过来看热闹，父亲乐得飘飘然。

二哥和我常在晚间一起收听流行歌曲，有时也各自写信到电台点唱。我们听华语及另外三四种方言的新闻报告，但我们最喜爱周末的《我们的话》节目，节目前那阵短短的笛子过门音乐，我们长忆心中。二哥爱听主持人施祖贤的讲话，写信向他要照片。施祖贤先生有一张面对播音器，写着“林清祥先生存念”的亲笔签名相片，一直摆在我们家中唯一的写字台上。

可是，渐渐地二哥变得很忙碌，放学后没立即回家，有时回来了，晚上也会再出去。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傍晚，我正忙着帮母亲点电光灯，突然见到一位马来邻居扶着二哥从外头进来，二哥右手紧扶着左手，表情极为痛苦。原来二哥骑脚要去笨珍途中，不慎摔了跤，左手受了伤。母亲试图拉开二哥双手，只见二哥频频喊疼。祖母闻风而至，她拿不出主意，只能尽量让二哥在她怀里依偎。

我们家后面住着一位人称“打银伯”的老先生，他是个“通天晓”，懂得用火酒烧热的吹筒修整戒指、项链等首饰，他也靠一本破烂的通书替人家选择良辰吉日。屋里头摆了些药酒，也算行医，母亲一向信任他，叫他看看二哥的手。“打银伯”摸着摸着，说二哥的左手脱白了，说时迟那时快，他强力把二哥的左手连拉几下，二哥唉呀唉地大声痛哭了。“打银伯”倒些药酒药粉搅拌，往二哥左腕关节涂涂抹抹，再用一条白布捆紧二哥的左腕，他安慰二哥：“一两天就好。”

过了几天，二哥左手的伤势并无好转迹象，祖母和母亲决定带二哥到新加坡后港姑妈处，看姑妈可有办法。姑妈是姑婆（祖父的妹妹）的女儿，嫁给林谋盛家族里的人，住在后港四条半石的福安砖窑，她的丈夫在大检证时被日军活活打死。二哥在姑妈处住了一段时期才回来，我不知道到底他如何接受治疗，只知道自从那次意外，他的左臂没治好，始终无法像常人那样伸直。

1948年底二哥小学毕业，那时大哥还在华中念书，家里的经济条件无法让两个孩子同时前往新加坡深造。二哥彷徨失望之际，有间叫顺昌公司的洋土库要请人，老板是父亲的好友，他答应“提拔”二哥。二哥工作期间住在店里，由于继续读书的愿望不能实现，渐渐把不满的情绪转移到老板身上。有一天，他下意识的在一份报纸边缘写了些牢骚话，老板读了吃不消，炒了他的鱿鱼。

1949年6月，大哥初中毕业，有意继续读师范，想到弟弟失学，他决定去做工。他到小笨珍的马华分会当秘书，会所就在二哥工作场所附近，二哥的老板便向大哥告状。大哥过后告诉二哥：“你就别再做工吧！”。大哥跟父亲商量后，终于决定让二哥到新加坡去升学，而不久大哥也远离家人，到老远的登嘉楼中华维新学校教书，帮补家用。

我是调皮小学生

我和大姐就读的培华学校，座落于甘榜直洛吉冷与甘榜南华之间，父亲是创校者之一。这所小学校舍简陋，阿答屋顶，以木板为壁，还好地上铺着洋灰。1945年创校时，只招收一年级学生，共有两班，我和姐姐同班。学校离甘榜南华约一公里远，我们每天徒步上学，那时，我是赤脚大仙。

班上同学是来自甘榜南华和甘榜直洛吉冷一带的人家，年龄参差不齐。学校周围有很多果园，种的大多是榴莲、山竹和鲁古。由于近水楼台，榴莲花开始飘香时，同学们就充满期待，这成了园主们头痛的问题。

培华学校的首任校长余智谦是潮州人，他身兼数职。大女儿胜花和我同班，一家人就住在学校边上的浮脚楼。他家也顺便经营学校的食堂，师母自制的冰淇淋，常令我垂涎。

大概三年级（1947年）那年，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校长洪伟泽到任，他同时带来姓洪的华文老师和姓黄的英文老师。新老师受到当时中国国共内战的影响，思想左倾，经常跟我们谈中国的内战，也鼓励我们读《南侨日报》、办壁报。每星期的周会，是大家上台表现的机会，我们或讲故事，或唱歌，兴致高昂。

班上的同学多调皮，也嗜赌，我不例外。我们甚至把赌带进学校，放学就到学校附近的果子园搏杀。一个下午，洪校长亲自出马突击，大伙儿集体落网。隔天周会，校长不点别人，只把我叫了出去，执起鞭子不停地往我手心和双手抽打，我的双手出血了，他还是咬紧牙根不放手。

有一天，姓洪的华文老师教我们唱《朱大嫂送鸡蛋》，正唱得入神，没注意到提学司来巡视，他就站在我们课室外聆听。这下乱子可大了，当局开始盯住我们学校。果然，就在我

们念完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警察前来包围搜查，校长给带走了，听说被驱逐到中国去。

我怀念洪校长，一直把他送给我的那本《爱的教育》收藏着。那时候我不如两个哥哥爱看书，即便阅读，也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东西。但是《爱的教育》主人翁安利科的日记像磁铁般吸引了我，原来日常生活琐事都可能蕴藏一番大道理，我开始领悟“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含义，由衷感激洪校长。回想那一天洪校长如此严厉处罚我，无非就是“爱之深，责之切”！我的功课好，或许他希望同学以我为榜样，我却令他失望。呜呼，逝者如斯夫！

新的校长符气正来自新加坡，是海南人，笑容可掬。他带来几位新老师，其中一位年轻的林姓老师教英文，这位老师后来成为新加坡鼎鼎有名的经济学者。我毕业后不久，符校长回新加坡，到育英中学任职。

我的同级同学逐年递减，很多同学因为生活问题被迫半途辍学，姐姐也只读到四年级。母亲天天忙着店里的事，弟妹又多，姐姐从小就担当起家务重任，煮饭、洗衣、照顾弟妹，样样都需要她。祖母重男轻女，再加上姐姐有点缺陷，生来只有九个手指，读完四年级那年，母亲附和祖母，姐姐也就停学了。到了1950年举行毕业典礼时，真正毕业的同学，只有六人，包括我。

虽然调皮、爱玩，我可是年年都考第一。我有个要好的同学钟松平，是邻居的孩子。在学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他总斗不过我，最后我们成为死党。有一段时期，晚饭后我们会一起在甘榜南华的街道散步，然后在一支固定的灯柱下空手比武，誓约当晚温习功课不能超越固定的钟点，最后双手合十互道晚安。有几回我们相约天未破晓就起身，到邻居家门前发出怪叫声，一旦人们疑神疑鬼、绘声绘影议论时，我们就得意暗笑。

毕业典礼过后，我和松平一同出来新加坡游玩，那是我第一次自己随朋友出远门。许多年来赤脚出门或上课，这回要远赴新加坡，母亲特地买了一双黑色绒布鞋给我。我们住在惹兰勿刹的金陵酒店（现在还在），决定到大坡的大华戏院看电影，却不懂得如何搭车，两人



■ 历经近80年沧桑的金陵大旅店仍屹立小坡外国——1950年我小学毕业到新加坡旅行的住宿地。

边走边问路，到了大华戏院时，我的双脚后跟都起了泡，疼痛不已。抱着那双鞋看完戏，游玩了几天，再抱着那双鞋回家，母亲见了啼笑皆非！

我的品行得个“丁”

小笨珍培群学校始创于1922年，1951年增设初中一年级甲、乙两班，我成为甲班的学生，钟松平在乙班。学校就在张江水街上，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它离甘榜南华约5公里远。每天，我乘巴士来往于住家与学校，中午便到市中心外公家用餐。外公慈祥，可惜不久就辞世了。外婆好赌，母亲和一两个阿姨，还有几个舅舅都是外婆的同路人。过年过节，外婆家简直就是个小赌馆，老少咸宜。两个最小的舅舅年龄与我相仿，成了我的玩伴，但他们常常作弄与欺负我这个外甥，还是几个阿姨比较好。

我的同学来自小笨珍辖内的30几所华文小学，大家很快就打成一片。同学来自四面八方，除了感觉新鲜，彼此接触也强化了我对不同甘榜的认识，坦白说，有些地名或学校，我从没听过。由于同学们的学业程度参差不齐，我凭着自己的根底，很快就“崭露头角”，老师和同学都对我另眼相待，使我有几分自负。

为了开办初中课程，培群董事部从某中学请来了新校长，由他兼管小学部。校长是客家人，不苟言笑，大肚皮，又姓黄，我们称他大肚黄。我们的数学老师是客家人，华文老师也是客家人，足见客家人颇重乡情。数学老师的客家腔调尤其浓重，在黑板上为我们讲解“鸡兔同笼”，显得毫无把握，一副尴尬样子，从此我们叫他“鸡兔同笼”。

华文老师姓古，我们叫他“老八古”！古先生来自新加坡，男同学觉得他对女同学总是笑眯眯，对男同学却一直板着脸孔。一天，我顺手在自己的大楷练习簿背面涂写几句俏皮句子，拿给同学看，逗得他们大笑。后来忘了把那些字涂掉，糊里糊涂就把大楷作业交了上去。隔天古老师一到课室，大声唱了我的名，我不知闯了祸，施施然慢步上前。古老师翻开我的大楷簿本子，指着涂写的那些句子，狠狠训了我一顿。

年终考试后，我的成绩单“品行”一栏，赫然填写着大大的红色“丁”字，总成绩因此被扣了分，却仍是名列第一。过后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黄校长以浓厚客家口音对我说：“林清如！你的品行不及格，明年你不用来了！”闯了大祸，一时不知如何应付，只好一言不发地走出校门。没有想到失学是如何的痛苦，我把事情收在心里，隔年开学，我没去上课，父母才知道我被开除了。

与母亲搭档的岁月

时值韩战高潮，树胶价格暴涨，带动了各行各业，杂货店的生意跟着好转。这时父亲把杂货店交给母亲管理，自己到小笨珍一间会馆（益友互助社）当座办。我的失学，对母亲来说可是塞翁失马。

甘榜南华的公路两旁约有二十几间木屋，住的都是做小生意的华人。靠海的一边，多是以打鱼、养家禽、种菜为生的华人。马路的另一边有“红毛园（洋人拥有的橡胶园）”和一个黄梨园。黄梨园住的多是以种植为生的华人，福建诏安人居多；“红毛园”的割胶工人几乎清一色是印度人，住在胶园里的宿舍。至于马来同胞，绝大多数是小园主，分散在甘榜四周围。这些各族同胞成了甘榜南华二十几间杂货店竞相招徕的顾客，母亲擅于应对，“泉成兴”生意算是旺的。除了帮忙招呼顾客，我也是她的搬运工，以脚踏车送货到顾客家，或者到小笨珍市区替她办货。

母亲也兼作买卖树胶的生意。甘榜南华的小园主，亲自或雇人割胶，把每天收割的胶汁绞成胶片，定时拿出来卖。把这些胶片收购，再转卖给树胶商，是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甘榜南华的几间杂货店岂能放过。除了胶片，胶丝（俗称“梘屎”）也是抢手货。胶工每天切割树皮取胶汁，收工后遗留于树皮胶

沟的胶汁凝结成薄薄的胶丝，隔天开割前，得先把胶丝剥下来，就是所谓的“梘屎”。

我每天都到树胶园走动，看看哪处人家有货要出售。那时全马正处于紧急状态时期，没执照而买卖树胶是犯法的。甘榜南华很多经营树胶生意的商贩都在暗地里操作，母亲也不例外。我每天出入就得格外小心，不时与衙门的“清丁”（缉私人员）捉迷藏。有一天我推着脚车从离家不远的胶园来到大路，正想把刚收购的胶片运回家，看到不远处一个大家都熟习的“清丁”骑着脚车朝我的方向过来，我即刻掉头一股劲也似地向前冲，然后绕着小径连人带车窜进家后门。没想到那仁兄早已认出我，而且比我先到，在店门前与母亲理论。母亲知道我出了事，花点小钱封了他的口。从此他不时来访，母亲只好每次随机应变，保持“双赢”局面。

有个傍晚，一辆警车在店门口停下，警察把母亲的一名顾客阿金嫂从警车上带下来，母亲迅速把我推向前，对着阿金嫂大声喊：“不是我卖东西给你的呀，你别乱说，是他，是阿如不懂事才卖给你的！”当时实施的紧急法令条例，限制人们在黄昏过后不准携带或买卖白米等必需品，阿金嫂刚向母亲买了白米等杂粮，半路给警察截获。母亲把我这个未成年的孩子推出来作挡箭牌，堪称眼明手快，第一时间制造了与警察老爷讨价还价的有利条件。

替杂货店做账本来是父亲的事，既然我没上学，做账就成了每晚的功课，早些时候向“李秀才”学习的珠算可派上用场了。母亲是甘榜南华有信誉的会头，当会头不必通过竞标便可收足第一期的会钱，她通过这方式免息筹钱来周转。她的责任是每个月安排会脚来投标，过后负责向所有会脚收取应缴的会款，再交给得标的人，倘若有人拖延交款，或是在标了会领取会款后逃之夭夭，作为会头的母亲就得悉数承担。母亲不识字、更不会写字，处理标会纪录、甚至上门向会脚催账等事宜，也都落在我身上。

1952这一年，父母亲已经有了11个孩子（过后再生了最小的弟弟）。父亲当会馆座办、大哥当教师（他因为回避英国殖民当局在马来亚实行的国民服役，而转到新加坡实龙岗路的中国公学教书），两个人的薪水维持不了这个家，母亲硬撑起这沉重的担子。与她日夜相处，我深切了解她的苦心，更钦佩她能干与苦干的精神。可是每天看到弟妹去上学，看到好友钟松平照旧到培群上课，我有了一种离群、孤独的感觉。有时想到大哥、二哥都到了大都市，难免自卑。我舔着失学的苦汁，意志消沉，无心看书，经常与失学的邻居为伍，闲时就在咖啡店聊天，开始打起麻将来。

再续求学缘

黄校长在培群就任两年，第三年（1953年）新校长来了。匡光照本是小笨珍人，曾任培群学校校长，后来女儿到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升学，他跟着到那里任职。这一年大哥也从新加坡回来，在笨珍民众小学执教。他原是匡校长得意门生，便主动去找他，要求让我复学。校长答应了，也答应我直接跳级初中三！母亲感到为难，因为她需要我在店里帮忙。她甚至这么对我说，“别再去读书了，在家里帮忙，有空时想打麻将就去打！”我不忍心让母亲失望，可是想到我其实并没有离开她，还可以下课后早点回来帮忙她，也就抱定决心再去上学。

两年前上初中一，班上共有八十多名同学，到了初中三只剩下二十多名。不过这一年学校规模大了些，因为另有初中一和初中二的班级。校舍也是新盖的，很有气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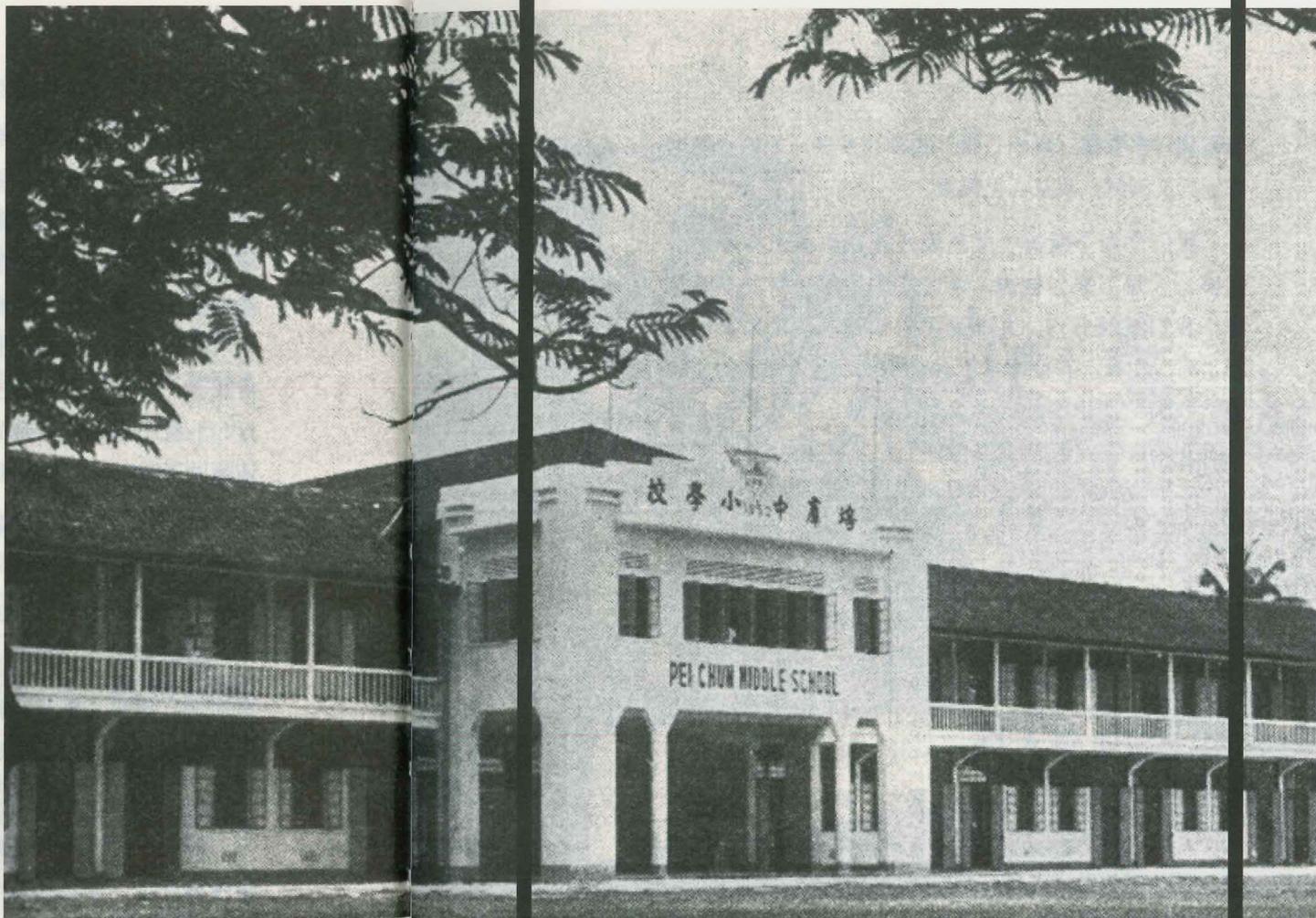
初三是会考年，功课紧，我荒废了一年，现在每一科都需要加油。华文（那时都称为国文）、英文勉强可以应付。就是数学较令我头痛，没学过代数（因初中二失学），面对陌生的几何、三角，简直呼天不应。

班上一两位同学文章写得好，经常见报。我很羡慕，也觉得投稿好玩，竟然和几个同学不断尝试，但多数石沉大海。偶尔文章获得发表，满足感难以言喻。大哥这时住在家里，课余



洪祖秋珍藏

我的母校——小笨珍培群学校原貌。



1953年完成的小笨珍培群中小学校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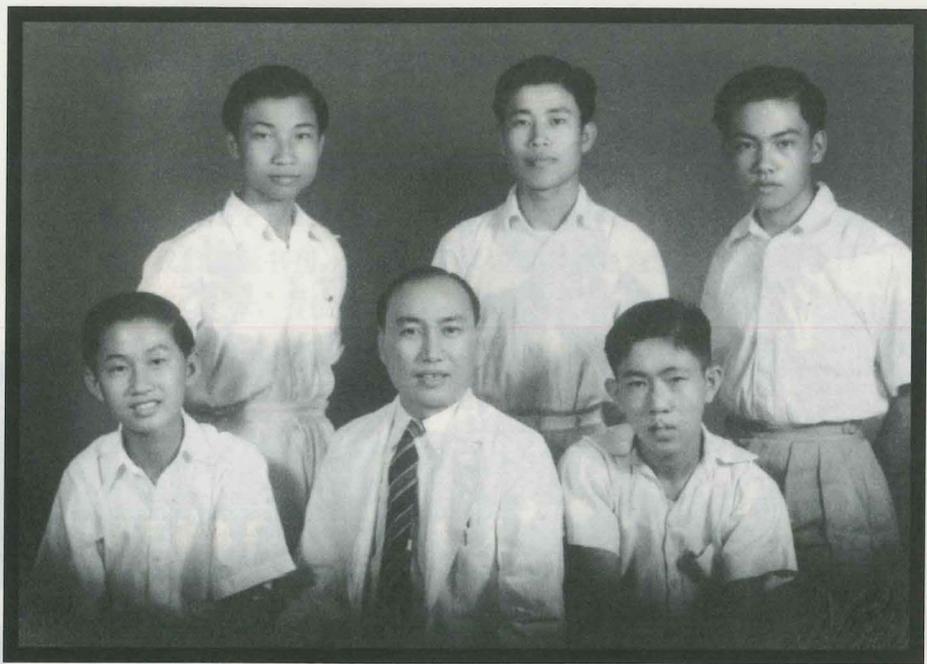
也写稿，多数在《星州日报》的副刊发表。他的文笔老练、行文细腻，我从心里佩服。

我们这几个所谓“文艺爱好者”从不把会考当一回事，天塌下来当被盖，学习态度和作风叫人不敢恭维。我们接触书刊，并非为了求知识，而是为了寻捷径“写”文章，有位同学不幸被揭发，成了知名的文抄公。我们对新中国的诞生、对于韩战、甚至对于本土政治局势都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当年6月英女皇伊利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反而吸引我们。当天笨珍到处张灯结彩，花车游行，《天佑女皇》歌声中我们遥想老远的“祖家”——伦敦。渐渐的我也不再专心于母亲的杂货店，放学后或打篮球，或逛电影院，母亲最后聘用了个小伙计在店里帮忙。

教我们华文的高老师是个好好先生，对我们有求必应，校长因此对他颇有意见。一天，他教我们学写打油诗，兴致正浓时，匡校长经过课室，看见课堂闹哄哄，他走进教室，板起面孔坐下来，大家愣住了。校长这样做，是公开羞辱高老师，我们都为高老师抱不平。我随



■ 1953年英女皇登基，小笨珍也处处张灯结彩，花车游街，《天佑女皇》歌声中，老百姓遥想着老远的“祖家”——伦敦。（当年小笨珍益友互助社的花车，父亲时任该互助社的座办）。



■ 初中毕业时与老师及几位同学合影。
(坐者左起饶柏华、高蕴澈老师、李茂枝。站着左起钟廷钱、倪士声、作者。)

兴写了一首打油诗嘲讽校长，根据四角号码，校长的姓“匡”字上下两角代号各为七，我写的打油诗就以《歌王七七校长》为题。文章在《夜灯报》的学生版刊出，校长当然发现了，咆哮不在话下。我被记了两个大过和两个小过，再多个小过就得滚出校门。

那几年在校虽然有点儿“不务正业”，我的功课还是不落人后。会考成绩揭晓，20多位同学只有七人及格，我是其中一个。匡校长没有直接开除我，或许是有意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我没辜负他。

培群办不了高中课程，我何去何从？有几位同学打算到外地升学，我也开始考虑自己的路。我的第一选择，并非新加坡的华侨中学，而是要到龙引的新文龙中华中学修读师范课程。龙引离小笨珍不远，来回方便，而且师范课程只需两年便完成，毕业后工作有保障。我把有关证件交给一位正要前去报名的同学，托他替我报名。想不到落了空，没被录取，后来才知道竞争激烈，人家根本没有把我的报名表格呈上去。升学之路，我曾想到此为止，因为舍不得远离母亲。最后还是在大哥不断的鼓励下，我才决定开口要求父亲安排到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升学。华中校长郑安仑是父亲的小学同学，我很顺利地踏进华中校门。

跳跃
的心

赶上沸腾的年代

一个绝然不同的学习环境

1953年底的某一天，我从小笨珍搭巴士到了新加坡奎因街。在绿色巴士总站认出二哥，那天他的打扮令我感到意外。他西装长裤，手上提着公事包，有几分神秘。我早听大哥说，二哥已离开华中，就不知道那时他在什么地方读书或工作。

二哥带我到学校办了手续，再带我到学校后面山脚加冕路一带的木屋区，把我交给来自小笨珍的丁水涵同学。丁水涵和一批来自小笨珍及柔佛州各地的同学分别在不同的木屋寄宿，我被分配与一位来自昔加末的高中二学长陈郁国合租一房，月租每人十元。伙食与洗衣服另由一间木屋屋主承包，也是每人每月十元。从此我天天与大伙儿从木屋区出发，背着书包，爬上华中后边的那个山岗，进入校园。

当年华中教室分布于钟楼主座、虎豹楼、新教学楼，我就读高中一戊班，在新教学楼二楼的课室上课。环顾四周，宏伟的建筑物，一望无际的大操场，予人以前程万里、大气磅礴的感受。我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绝然不同的环境，一种绝然不同的学习生活。到学校不仅仅是听课和考试，还有同学们自发组织的各种活动，像戏剧会活动、助学会活动、野餐等等。

我带着新奇、兴奋的心情融入新环境，开始沉醉于一个充满期待的季节。一批批新的书刊，我畅游于浩瀚的书海。助学



海天寥廓，云树苍苍，中有我华中——我很快意识到，这是个绝然不同的环境。

会的书摊令我难忘，每一个星期都会有新书摆卖，都是一些在一般书店买不到的书和刊物。老华校生大概都能领会，我们是如何渐渐地从阅读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书转移到接触诸如《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之类充满革命激情的翻译作品。各校的助学会书摊是我们精神粮食的供应者，至于他们是如何找来这些书刊，不关我们的事。

定时的各校联合野餐特别令同学们期待。唱歌、跳集体舞、玩集体游戏是野餐时的主要节目，而对于像华中这样的“和尚学校”，野餐更是同学结交女校同学难得的机会。我惦念母亲，清晨起来会想到她将如何自己搬动店面大门开始营业，入夜时分会牵挂她不懂得如何点亮家里那盏难搞的电光灯，有一个时期我每逢周末都赶回家，参加野餐的机会相对减少。

反黄运动如火燎原

进入华中后，才第一次听到有“黄色文化”荼毒青年这回事。1953年10月12日的中午，一位年仅16岁的女学生庄玉珍，光天化日下在珍珠山下被奸杀，引起公愤。各界人士把矛头指向殖民政府，怂恿色情书刊、色情电影及类似演出四处泛滥。华校中学生从1953年底开始，发动了反对黄色文化运动。

在华中，同学们举行各班级聚会、编印反黄歌曲、举办游艺晚会、燃烧黄色书刊大会，得到校方与师长的支持。1953年全新高、初中毕业同学组织了《艺术研究会》，在1954年3月间假快乐世界举行了为南洋大学筹募建校基金的联合大演出，吸引了五万多人观看。除了号召各界人士支持民族教育，演出的主题就是反对黄色文化。

配合反黄运动，一些宣扬健康文化的文艺刊物相继出版。先是《人闻月刊》与《荒地》，但是寿命都不长，很快就给殖民政府封禁。继之而起的是于1954年4月创刊的《耕耘》，与我同房的那位学长陈郁国参与其事。我自以为懂得一点文艺，也就特别为这些文艺刊物所吸引。有好几次陈郁国先后带我到位于密驼路和苏菲雅路的《耕耘》出版社社址，有机会与一些擅于写文章的朋友相聚，才知道写作原来是件很严肃的事。

反黄运动如火燎原，对于像我这样初出茅庐的年轻学生起了启蒙的作用，更为紧跟而来的五一三正义行动吹响了前奏。

五一三事件带来的震荡

1954年初，殖民地政府颁布法令，要征召18岁以上的青年参加国民服役，导致了轰轰烈烈的五一三事件。我不是适龄生，对即将发生的事缺乏迫切感，5月13日那天我与同学在惹兰



青春的热情燃烧不断
——50年代华中与友校同学携手推广文艺活动。



一把火烧尽黄色毒素
——50年代的反黄运动宣传品。

勿刹的体育场观看校际运动会，没有参加前去总督府请愿的队伍。警察对请愿同学动武，令各方感到震惊与愤怒。毕竟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越来越多的同学感到不安。不管适龄与否，我们开始天天看报纸，参加各种集会，追踪事态的发展。

接近期考时，教育部突然宣布各中学提前放假，显然要分化学生们进一步的行动。6月2日开始，全星华文中学3000多名学生在华中集中，抗议殖民政府警察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同时要求在籍学生豁免服役。“集中”是五十年代华校中学生为争取切身利益而进行的一种有效的行动方式，学生占领学校，在校内过集体生活，凝聚了团结的力量。法律上学校产权和管理权属于董事部，殖民政府（包括马绍尔领导的半民选政府）尊重自己的法律，除非董事部要求，一般上不敢轻举妄动。最感为难的是董事部，面对两方面的压力，只好尽最大的努力使事情得以解决。

6月2日的集中持续了22天，在董事部的斡旋下，殖民政府终于接受学生们的要求，允许在籍学生缓役。有些参加五一三请愿的学生被控告非法集会或阻碍警方执行任务，而马大学生也因发表同情五一三事件而被控煽动罪，审判期间，我们每天列队到位于芳林公园的地方法庭声援。

回顾过去，五一三事件深具历史意义。华校中学生的正义行动突破了战后紧急法令时代的白色恐怖，暴露了殖民地政府的弱点。那时正是世界上各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自决的时刻，同学们成功反抗殖民政府的国民服役，是对殖民统治合法性的公开质疑，促进了接踵而来的要求结束殖民统治的运动。五一三事件令同学们普遍觉醒，我们开始注意社会的动态，自己的前途。华校生的表现赢得了各阶层（包括不少受英文教育的大学生）的同情与支持，五一三事件更把学生和工友紧紧拉在一起，在关键时刻走进社会，创造了历史。当然，这个演变也让华校中学生成了不同政治势力争取和利用的对象，并且为此付出了代价。

人民行动党开始崛起

1948年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后，新加坡政坛成为一小撮亲英政客轮流做秀的场所。面对五十年代初世界各殖民地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殖民政府开始了在新加坡的宪制改良，在1954年颁布了林德宪制。新宪制赋予新加坡一个局部民选的立法议院，其中将有25名民选的立法议员。虽然首席部长、教育部长等将由民选议员出任，但是诸如司法，财务，政务等重要权限仍由总督委任的官员所掌握，总督在立法议院又拥有否决



(13) 这情景叫我们怎么得了呢？



(16) 啊！血淋淋的手又伸向这儿来了！

五一三事件期间

广为流传的画面。



(14) 我们就这样头撞铁地在水泥与铁栅之间被殴打！



(19) 不用怕！犯罪的不是我们！

的权力。只有英籍民和在新加坡出生者才有权投票，而殖民政府也毫无废弃钳制人民民主权利的紧急法令的意思。

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在维多利亚剧院举行成立大会。秘书长李光耀在大会上有这样的讲话：

“大家都知道，1948年马来亚出现了紧急状态，当时马来亚的英殖民地政府擅自掌握了专横的权力，这专横的权力是政府拘捕和扣留人民而不必加以审判，在这种情形之下，真正反对殖民地主义的坚强诚实的政党都绝迹了，政治上出现了真空。人民行动党认为只有取消紧急法令，民主政治才能产生。我们对取消紧急法令的要求将无妥协的余地。”

当年的李光耀为自己在华校学生当中塑造了好形象。从已公布的党发起人名单看，大家知道这将是一个真正要结束殖民统治的政党。很多同学出席了行动党在维多利亚剧院举行的成立大会，从一开始华校中学生似乎就与行动党建立了一种共生的关系。1955年4月举行立法议院选举，人民行动党抨击林德宪制，宣称这个宪制只给了新加坡人民25%民主。人民行动党不准备在这样的宪制安排下出组政府，只派出四位候选人参选。

我从报上获悉，二哥清祥竟然是行动党四位候选人之一，参选武吉知马区。我到密陀路的工会找他，他见了我二话不说，把我拉进他的竞选团队，从此我和政治结了缘。一个多月

的竞选活动，我们摇晃着人民行动党的旗帜走遍大街小巷，穷乡僻壤。一个又一个的群众大会，人潮和声势一天比一天盛大。沸腾的岁月，激发人心的年代。

一些有钱的华人组织了一个民主党参加竞选，分散了右翼亲英的进步党的选票。由马绍尔领导的劳工阵线标榜亲劳工，赢得了十席，与巫统、马华组织联合政府。行动党的候选人三位中选，二哥是其中一位。

福利工潮引发的骚动

虽然心里已开始骚动，高中一年级我还能规规矩矩把功课搞好。到了高中二可就渐行松弛，给了严厉的级任老师陈金凤充分的理由成天对我唠叨。1955年初我成了《人间出版社》的一员，社址在马里士他路（当年俗称乌桥）附近的金吉巷。为了方便来往，我决定搬出华中后面的木屋区。二哥为我在汤申路与庆利路交叉口附近（当年俗称红桥头）的纳福路信托局组屋租了一间房，我邀了当时就读中正中学的饶柏华同住，在小笨珍念初中时我们是同学。时值林德宪制选举的前后，我的生活步伐变得如此紧凑，再也抽不出时间回家探望母亲。

大选过后，标榜亲劳工的劳工阵线联合政府上台后，工友相继提出改善待遇或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工潮此起彼伏。福



备受瞩目的福利巴士大工潮
——1955年5月12日福利巴士车厂前紧张场面。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 福利巴士罢工工友向前来慰问的同学叙述工潮经过。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利巴士的老板阻挠工友参加工会，不但开除参加工会的全体工友，还另聘新工（当中很多是有私会党记录的）取代，并组织敌对工会让新工友参加，公开摆出好战高姿态，导致了从1955年4月底就开始的工潮。五一三事件期间，工友鼎力支持同学，双方有了患难与共的情结。从此全岛各地若有罢职场面，总会有华校中学生前往慰劳、支援。福利工潮期间，从一开始，每天下课后我们就乘坐罗厘浩浩荡荡结队前去慰问。5月12日全新工友发动全岛同情总罢工，镇压暴动队到场武力驱散罢工工友及围观的学生和民众，一时强力水龙头、警棍、石子、玻璃瓶满天飞。骚乱范围迅速扩大，造成了人命伤亡。

官方史上一向宣称，福利工潮引起的骚乱是罢工工友与华校

中学生有组织的暴动，但是始终拿不出佐证。我亲历其境，深知同学们的行动纯为自发，看不出有谁在背后指挥，也看不出同学有任何准备诉诸暴力的倾向。当年的社会情况、殖民政府的腐败无能、警方擅自动武、私会党徒介入、别有居心者从中挑衅，都可能是骚乱的导因。

5月12日骚乱的隔天，教育部召见各中学校长和校监，下令华中及中正总分校停课一周，复课日期视局势发展而定。表面理由是基于学生的人身安全，真正的原因是把骚乱归罪于学生。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发展，同学们隔天都不约而同到学校去。待到当晚，听说局势急转直下，福利工潮得到解决，老板收回解雇令，重聘回所有被开除的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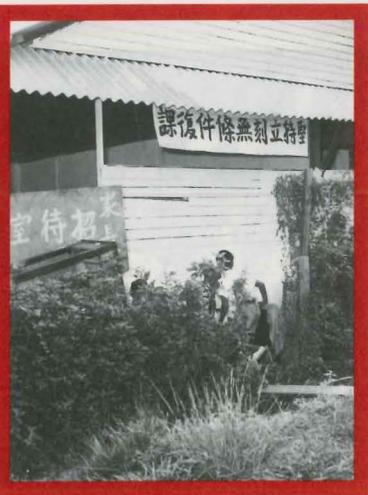
■ 罢工工友向前来支援的学生展示新闻资料。

友，也允许他们参加自己的工会。三校董教旋即要求立即解除禁令，让三校隔日开课。

“复课斗争，我们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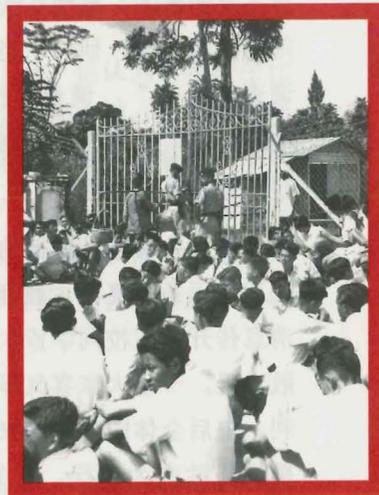
没有想到，5月17日教育局宣布，给予三校有条件的复课：第一，董事部得开除若干学生，名单由政府提供；第二，董事部须于14日内提呈解释，为何其学校不应被取消注册的理由。

消息传来，我心想更大的事就要发生，约了几个班上同学赶到学校去。只见校门紧闭，许多同学已在那里静坐。我们几个在场的班级代表讨论后，决定要求校长出来交待。几近傍晚时分校长才来，他说董事长李光前表示，交涉尚无结果，而且事情并不简单。



■ 建筑上张挂的诉求——福利工潮期间殖民政府勒令三所学校停课，同学要求无条件复课。

混乱中有同学说中正同学已在总校集中，要等董教的消息，我们应该到那边去。瞬间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分别赶往中正总校。夜幕低垂时分来到了中正湖边，三千多名各校同学齐聚在那里开大会，群情激动。大会延续至深夜，议决成立一个名为“全新华校中学生维护华文教育委员会（简称维委）”，由各校派代表参加。大会要求政府无条件让三校复课，同时议决分别在中正总校和华中集中，直至胜利为止，有些同学习惯把这次行动称为“复课斗争”。其他诸如育英、南中、南侨、中华等友校的同学也将罢课一天，以示抗议。当天晚上大家都忘了饥饿，等到半夜，一碗江鱼粥在手，其味无穷。



■ 华中校门前静坐——同学要求政府让学校无条件复课。

隔天回到华中，我加入维委的秘书处工作。复课斗争的目标符合各界的愿望，家长董教和各政党都呼吁政府让三校早日复课。马绍尔的劳工阵线政府上台不过一个多月，已感到来自各界的压力，要他实现诺言，平等对待民族教育。现在华校闹得满城风雨，他终于当机立断，下令成立一个“各党派九人调查委员会”，调查华校的情况，委员会成员是教育部长周瑞麒、地政及建屋部长阿都哈密、劳工部长林有福、议员林泉和、黄富南、吴忠良、林子勤、李光耀和MPD奈尔。

委员会果然迅速行动，建议教育部取消开除学生的成命，让三校无条件复课。教育部只好顺从，允许三校无条件复课。消息传开，三校同学皆大欢喜，决定结束将近一周的集中。解散当天，一早大家喜气洋洋，在华中大礼堂举行大会，庆祝胜利。午后全体同学与到来的家长，不少过3000人，列队在华中操场作胜利大游行。有的高举标语，有的敲锣打鼓，有的唱歌，欢呼声震撼山冈。本来集中于中正的同学也分批赶来，加入游行队伍，盛况空前。解散时刻，大家依依不舍。殖民地官员粗暴与蛮横对待华校，是这次事件的导火线。复课斗争使工人、董教和学生家长进一步加强了团结。

集中期间，学生家长和职工会代表都出席学生的集会，并发表讲话。在中正总校的一个集会，立法议员林清祥发言抨击

殖民地政府，“把工人的罢工推说是华校学生煽动，自己动用暴力却说学生暴动。华校学生与殖民地政府的利益有冲突，所以殖民地政府憎恨华校学生。”他呼吁政府立法平等对待各民族教育，并保证工团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不让人出卖华教。

在同一个集会，庄竹林校长也讲了话，他认为“华校生比英校生好，因为华校生对各种问题都会详加观察。”他当场提议组织家长联谊会，以帮助解决各种困难。集中解散前，学生家长分别在中正和华中开会，各选出六名家长组织“全星华校中学生家长联谊会”，并委任立法议员林清祥和报人连士升为顾问。会议也吁请中华总商会迅速召开侨团大会，共商华文教育前途。

侨团大会共议华教前途

五十年代的华文教育界有好几个组织，如董教联合会、华校联合会、教师总会、中学教师会、小学教师联谊会、华校英文教师公会等。这些组织多年来肩负推动华文教育的任务，马绍尔政府上台后不久，他们便不断敦促中华总商会召开全星侨团大会，讨论华校面对的问题。福利工潮后中学生的复课斗争导致“各党派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成立，这为侨团大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集中期间，同学在华中中学生食堂用餐。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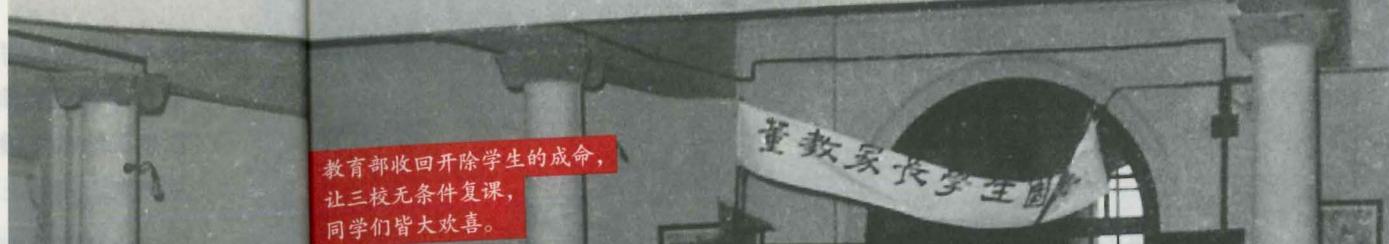
■ 同学们列队前往大操场，准备参加胜利大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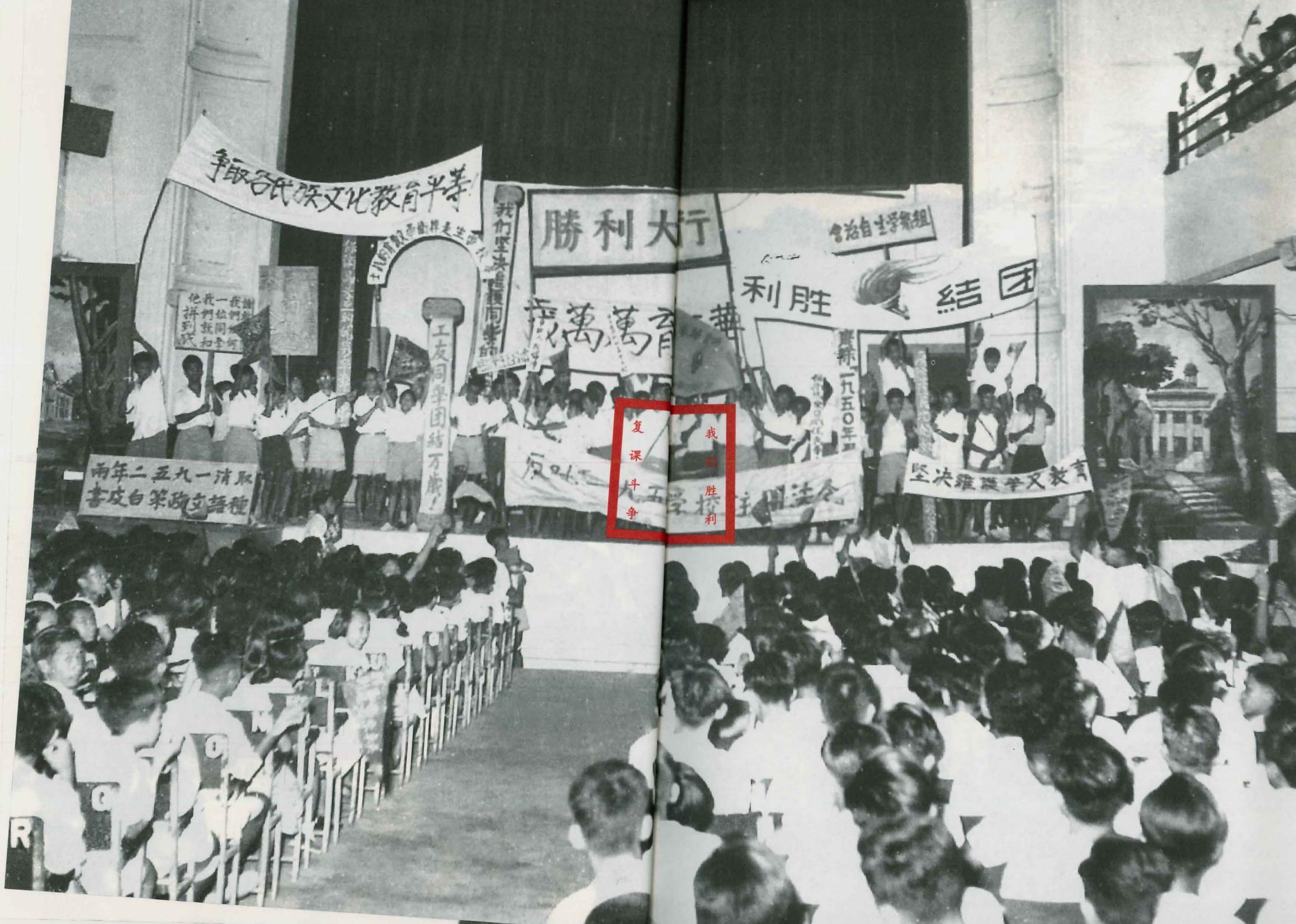


■ 集中解散后，同学们收拾包袱回家。



教育部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
让三校无条件复课，
同学们皆大欢喜。





爭取各民眾文化教育平等

勝利大行

自治學生會

勝利

團結

他我一致
拼鬥到底
到底到底

工友同學團結萬歲

萬萬青年

慶祝一九五〇年

兩年二五九一清取
書皮白笨政立語種

反吐
五學校

堅決維護學又教育

復
課
斗
爭

我
們
勝
利





3000多名同学与家长在华中大操场举行胜利大游行。

中华总商会与六个华教团体组织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在委员会严密策划下，侨团大会终于1955年6月6日在中华总商会所召开。共有503个单位的华人社团（包括各帮派会馆、职工会、学校等各类团体）派出600多位代表出席。会议规模之大，代表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有鉴于出席大会的人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筹委会要求与会者事前呈交议案，经其审核后，交由大会表决。时任中华总商会主席的高德根为大会主席，会议开始时，与会者就发言权展开辩论，针锋相对。所幸最终都能顾全大局，在维护华文教育大前提下顺利通过所有的提案。当时的华社领袖如董教主席李光前、南大执委会主席陈六使、立法议员林清祥和林子勤都全程出席了会议。

大会的议决案为：(1) 要求政府实现诺言，废除殖民地教育政策，尊重与扶持各民族母语教育；(2) 要求政府资助董事部建设及解决校舍困难问题，特别是乡村学校；(3) 华校教师应与英校教师待遇平等；(4) 华校学生应享有六年免费教育。

为求华文教育界今后统一步骤，大会成立了一个由各帮各式团体组成的二十一人中心组织：华文教育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行事积极，把议决案呈交各党派九人委员会，也在短时间内为华校争取到临时津贴金。

五百餘社團代表大會決議 組設華文教育委員會

經五小時討論通過五項重要議案：
請政府廢除殖民地教育政策
保存華文教育優良傳統制度
建設學校必須有平等之辦法
華校教師待遇應與英校者同
華校學生應享有六年免費教育



新加坡華人社團大會主席高德根演說

華校教育發展 供不應求一年，僑民子弟受其苦，華文教育 應由華人社團負責，不應由政府負擔。華文教育之發展，應由華人社團負責，不應由政府負擔。華文教育之發展，應由華人社團負責，不應由政府負擔。

第一、二、三項議案表決後
代表紛紛要求有發言權
第一項議案 華校教師待遇應與英校者同
第二項議案 華校學生應享有六年免費教育
第三項議案 建設學校必須有平等之辦法



立法議員林清祥氏

二十分鐘
華校學生應享有六年免費教育
建設學校必須有平等之辦法
華校教師待遇應與英校者同

为华文教育五百华团开大会献良策
——1955年新闻资料——立法议员林清祥起立发言，前排坐者（左一）为陈六使。

中学
联

一个时代的绝响



南洋女中罷課 抗議註冊官無理拒絕中學
成立以及給 全體同學課 予代表們全力的支持

POLLING STATION
處要投票通
→

1955年，成立中學聯的申請被拒絕，
1955年3月30日全星七所華文中學的近萬名學生展開大罷課行動。

楔子

1955年成立的全星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中学联）是星马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华校学生组织。她在风雨中诞生，也在风雨中消失，风停雨歇，一晃半个世纪，有关史料几乎荡然。我有幸曾是这段历史章节的积极参与者，在中学联短促的352天生命里，我天天与她相伴，与她一起成长。愿尝试根据手头掌握的资料，配合个人记忆，铺陈中学联短暂的一生。

■ 76

筹备经过

1954年的五一三事件期间，女皇律师布里特前来为被告非法集会的同学进行辩护，在欢饮会上，华校中学生争取免役代表团第一次宣布，要组织一个全星华校中学生联合会（中学联）。当时还在华中举行集中抗议的各校学生宣布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并委任李光耀、陈维忠两位律师为法律顾问。筹委会于同年10月间提出申请；隔年1月15日，社团注册官致函李律师，拒绝中学联注册，理由为“此团体将会危害殖民地之公众利益与良好秩序”。

筹委会不满当局的答复，通过李光耀律师向当局据理力争，岂料申请再度被拒绝。全星中学生于是在3月30日罢课抗议，有七所男女中学近万名学生参与行动。筹委会并发表声

明，将于4月2日在林德宪制下举行的大选日，集体前往，总督府请愿。当局立即宣布政府不准备接见任何代表团，并通过教育局召见七中学校长，要校长劝告同学别游行请愿。筹委会于是决定再呈书面请愿书，由董教转呈。

当时代表星马两地大学生的泛马学联也致函总督，请求准许中学联注册。大选结果，标榜亲民亲工人的劳工阵线组织政府，决定准许中学联有条件注册，就是章程必须明文规定，不得参加任何政治性之活动。筹委会认为这条件过于含糊，是个陷阱，注册官今后很容易找借口给中学联麻烦。于是由李光耀律师带领，数度会见教育部长周瑞麒，仍不得要领。筹委会一度反建议，章程中明文规定“不得做违反宗旨和目的之活动”，但都不为接受。多番争执后，筹委会最后决定接受条件，在章程规定“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政治活动及工会工潮活动”。¹

□ 77

中学联正式获准注册的日期是1955年10月7日。消息传开，各校鞭炮声喧天，锣鼓声齐鸣，可说是欣喜若狂。

为迎接中学联的诞生，筹委会出版了图文并茂的《中学联成立特刊》，也制定了会徽。至于会旗的设计与会歌的创作，虽有商讨，却始终没有定案。

¹ 《新报》1-11-1956第4版

组织结构

中学联的章程规定，各校照比例选出若干代表，组成校代表大会，再由校代表大会选出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中学联的领导核心，制定中学联的会务方针。除了正副主席，执委会也设立秘书、财政、组织、福利、学术、康乐、事务等部门。主席与各部主任组成常务委员会，另外还有一个中央宣传指导委员会。中学联在每一间学校设有分部，由校总务领导。校总务向中央执委会的组织部负责，其他各股则与中央执委会各有关部门配合。

获准注册后，筹委会在两三个星期里完成了9000多名会员的入会登记手续与推选校代表的工作。第一次校代表大会就在直落亚逸街刚落成的福建会馆举行，大会选出监察委员及执行委员，然后进行复选。好多前免役代表团和“维护华文教育委员会”的成员曾是催生中学联的“先驱人物”，他们没参与中学联的领导层，因为1955年已是他们的毕业年，隔年（1956年）他们都要到南大去升学了。孙罗文才华出众，是大家的领袖，也是当时整个运动的中心人物。虽然1955年底他高中毕业，1956年初他也进入南大，但仍留下来领导中学联，因为中学联的章程允许离校者保留会籍两年。

中学联第一届执委及监委名单：

主席：孙罗文；

副主席：李淑慧、吴有发、王鹤群；

秘书处正主任：郑玉书， 副主任：陈国相、陈再聪；

组织部正主任：陈子权， 副主任：莫乃江、池益芬；

互助部正主任：柳春基， 副主任：蔡石君、林德籁；

学术部正主任：林清如， 副主任：冯溢华、卢妙萍；

财政部正主任：薛济团， 副主任：陈清吉、郑敏娜；

康乐部正主任：林蕴杰， 副主任：许统英、陈锐坚；

事务部正主任：岑瑞华， 副主任：陈妙华、陈碧娟；

执行委员：许声宛、陈亚平、黄秤清、杨宝珠、张云腾、
曾梅蓉、苏礼彬、黄翠芳、蔡秀珊、黄清心、
何子爱、黄柔安；

候补执委：林春梅、张国良、黄昌文、李水吉、孙光景、
蒋淑规；

监察委员会正主任：傅孙民； 副主任：李伟镇、黄宝凤；

文书：陈世聪；

查账：黄素梅、曾云英、刘金龙；

候补监委：苏炳发、吕红账。

筹备期间，筹委会经常在位于经禧路的艺术研究会会所开会与活动。中学联获准注册后，决定把会所设在丹戎加东威京逊路14号，是当年中正中学校监林树彦的房产，他自己住在隔壁的另一间房子，我记不起中学联是否有给他房租。会所不仅是我们的活动中心，对我们几位几乎是天天在会所活动的同学来说，也是我们的家。这是一间浮脚厝，屋底下就是我们过夜的地方。虽然离华中远，我们每天搭15号巴士再转绿色巴士往返，从不觉得累。

中学联成立大会

筹委会原定10月23日在芽笼快乐世界举行成立大会，适逢电车工友罢工，学生交通成了问题。另一方面，警方的准字也拖了些时日才拿到，最后改为10月30日在快乐世界举行。

除了上万名中学联会员外，出席成立大会的还有师长、家长、社会人士及其他学生组织。大会主席冯溢华以庄严、坚决的声音说道：“现在，我愉快地宣布中学联正式成立！”她说：“中学联的诞生是马来亚学生运动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承蒙诸位的光临，我代表中学联向诸位致最崇高敬意。中学联备受别有居心者的摧残，但不足以使我们气馁，我们将站立于维护民族教育最前线，为民族教育奋斗。我们将彻底消灭黄色

文化，提倡健康文娱，并与各民族，在共同目标下，向劳工阵线政府争取真正的民族教育平等。最后，让我们高呼中学联万岁，全马各民族学生团结万万岁！”²

相继讲话的有来自泛马学联、泛马半岛马来学联、吉隆坡工艺学院、星洲马来学生同盟、家长联谊会等团体的代表。法律顾问李光耀律师以华语致词。他说：“中学联是同学们的血和汗换来的，希望大家爱护它，使它成为真正巨人。”他鼓励同学们爱护马来亚，消除与他族的仇恨隔膜，共组一个大家庭。最后，李律师高呼马来亚独立自由万岁，中学联万万岁。

致词时，孙罗文主席提醒大家，为了让同学们能搞好学习，中学联有任务为同学们争取一个和平与安定的学习环境。因此，中学联一心要贯彻的，是培养一种正确的学习态度，要课内与课外学习结合，特别是要同学关心时事，并促进各族学生的团结。

第一届监察与执行委员会同时举行宣誓就职，监督人为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与华侨中学教务主任黄芳奎。庄校长致训词时说：“中学联的成立，乃中学生大团结之表现，希望能引致各界的大团结。中学联最大的任务，正如章程中所示之团结三

² 《新报》1-11-1956第4版

大民族学生，而会徽中之书本乃代表学习，今后教师应尽其本分，同学应尽力学习，使程度能日益提高。有许多国家于独立后每患人才不够之病，许多部门均需专才以处理之，而今日已有专家控制民主政治之倾向，马来亚日后自治独立，其人才方面即寄望于同学身上。”

黄芳奎教务主任语重心长

在成立大会上，黄芳奎教务主任向同学提出几点精辟意见：

“第一，希望中学联能保持独立之精神，中学联有无比之力量，进步力量将会帮忙，但恶劣势力却想加以利用，因此中学联应该提高警惕性，五四运动为中国学生光荣之表现，但及后不能免于政党之斗争。中学联今后将循四大方针而努力，但最高原则应为追求真理，一切应不能脱离此原则。第二，希望各政党能维护学生利益，中学联会员均为学生，应给予良好环境，使能学习，希望各政党均能注意这点。第三，希望现政府实践教育诺言。说起过去本地教育，令人满肚牢骚，但此可以作为经验与教育。自劳工政府登台数月，对与学生有关之教育问题曾做下多项诺言，其中最重要者乃教育平等一事，希望此点能早日实现，使各民族能按照其文化方式发展。

有人云共产党渗透华校，此话乃属冤枉，但由此可知有人对华校学生存有深刻之误会。而此误会之产生根源，乃系殖民地教育政策。退一万步说，有少数学生谈共产，但此乃社会之产物，并非凭空掉下，而且，今日有者国家对共产党已予承认，因此，希望政府能以新眼光来看华校生。

今日学校与社会几成两个世界，学生在校所听所读真理，在社会上均成为大谎言，因此使学生深感不满，而在此种情形下，乃由他们之力量打出一条道路。

政府应了解青年乃将来建国之中坚份子，世界上任何国家无不重视青年教育，如政府存有偏见，视学生为化外之民，乃一可悲之错误，对将来建国将有莫大之阻力，希望政府能改变其眼光，才能制出公平之教育政策。”³

学习与青春结伴——中学联的方向

中学联执行委员会制定了一年的会务方针，主题是：搞好学习，加强团结。

常委会议接着决定把一年的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月开始，以“鼓起学习热潮”为中心活动。第二段学习工作

³《南洋商报》31-10-1956 第5版

的主题是“巩固学习成绩，充实学习内容”，由期考后开始。第三阶段中心工作定为“丰富学习生活，提高学习成绩”，从7月开始，为期半年，直至年底大考为止。

为贯彻年度会务方针以及中学联的宗旨，生命短暂的中学联领导全新同学展开了一系列深具意义的活动。

一、宣传周鼓起学习热潮

■ 84 在各校举办宣传周，推出师生座谈会、师长专题演讲，出版壁报、板报，主办各种比赛，在同学群中掀起学习热潮，建立正确的学习观。各校举行座谈会，探讨过去学习风气低落的根源，一般的结论是：（1）华文教育受歧视、班级人数众多、教学设备不齐全、师资缺乏；（2）中学联成立前，学生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集中学习的习惯与互助精神。

座谈会上，华中黄芳奎老师就指出，同学们应该互助，持久、自学；中华女中老师陈维经劝学生要多观察和比较。应中学联学术部要求，中正中学的老师利用休息时间向学生作专题广播。例如刘豫吉先生讲《为什么要关心时事》，陈一征先生讲《怎样学习数学》，张瘦石先生讲《学习语文的一些问题》，讲座得到同学们热烈反应。⁴

⁴《新报》22-3-1956第4版

经过“学习宣传周”后，大部分学生放学后仍然留校，三五成群在课堂里、在树荫下集体温习功课。各中学基本上都树立了良好的学习风气，读书与学习热情高涨，简直前所未有的。有些班级还为班上同学制定了下列学习公约：（1）准时交作业；（2）不作弊；（3）上课注意听讲。

二、干事训练班

常委会会议定期检讨各个阶段工作，并做出工作总结。总结报告指出，自从发动“鼓起学习热潮”以来，同学们学习情绪相对安定，效果相对提高，师生关系也大大改善，集体学习方式受同学欢迎。这当中各校干事同学起了很大作用，他们除了领导各项工作，也不断发掘并培养新干事。报告书也提出几方面的缺点：（1）有些干事不够积极，抓不住工作重心，致使各股无法配合；（2）干事独立工作能力不够，也缺乏创意；（3）对时局认识不够，影响了对工作问题的分析与判断。⁵

为了提高干事的工作能力，常委会于4月间在会所举办一个干事训练班，学员由各校分部推选。学习内容包括时事、工作汇报、工作方法以及人生观的培养。指导员是一些学习成绩好、修养好、领导能力强的高年级同学。在中学联会所集训

□ 85
⁵《新报》19-4-1956第4版

后，干事们回校后再分别举行校内干事培训班，有效提高了干事们的士气、纠正了不良工作态度、培养了干事对工作的积极性与能力。

三、集体郊游、春令、夏令会

1956年元旦，中学联组织了一个集体郊游。一千多名同学乘火车到新山，在苏丹公园野餐，并举办文娱表演。同学们的精彩演出和高度的纪律表现，予人留下深刻印象。

中学联常委会也曾在期考后，在巴西立的张源春别墅举行春令会，几辆大巴从不同地点运载各年级学生，在别墅内集中。两三天的集体生活很快地感染了许多年轻同学，燃起他们胸中的热血，扩大了他们的视野，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他们跟着觉醒了！6月间，中学联分部联合举办了另一个夏令会。

四、庆祝三八妇女节与纪念三二零总罢课

1956年三八妇女节，中学联在快乐世界举行盛大纪念会，有3000多名男女同学出席。孙罗文主席致词时，谴责警方阻挠纪念会的进行，对纪念会强加诸多限制。他抨击殖民地政府，想方设法牵制各种族与不同语文源流学生之间的来往。

为纪念1955年3月30日全星中学生抗议殖民政府拒绝中学联注册的总罢课，1956年3月31日全体干事在福建会馆举行纪念会，大会形容1955年3月30日的总罢课是马来亚学运史的光辉里程碑，这历史性的行动，突破了殖民地政府的重重压力，迸发出强力火花，奠定了中学联成立的基础。中学联宣传指导委员会为庆典发布了快报，也发布《纪念三二零》告同学书，号召同学们共同为实现会务方针“加紧团结，搞好学习”而奋斗。⁶

五、各校纪念五一三

“我们纪念五一三，是因为我们要坚持这场斗争中不畏强暴的精神！坚持五一三精神，华校学生就不会死；坚持五一三精神，我们才能争取独立，殖民地主义就会灭亡；五一三的精神就是不畏强暴，团结一致。”这是华中同学举行的五一三纪念大会上，一位同学的慷慨陈词与呼吁。

另六所中学的学生在同一天也分别举行纪念会，并通过下列议案：（1）决定五一三为华校学生纪念日。（2）只有真正独立的马来亚，身为马来亚公民的我们才有服役的义务。（3）大会要求中学联观察团向亚非会议提呈备忘录，并申诉在殖民地统治

⁶《新报》31-3-1956第3版

下的学生的悲惨遭遇。(4)授权中学联观察团和亚非中学生建立友好关系,并申诉马来亚学生的悲惨处境。(5)大会要求政府公开审判林蕴杰及所有无辜被捕的同学。⁷

同个时期,中学联也在会所举行一个“五一三史料展览会”。展览会共分三个部分,所陈列的史料从1954年4月1日民众服务法令公布开始,至五一三流血事件、六二大集中、到中学联成立,内容包括这段期间有关的剪贴新闻、图片、文告、壁报、血衣、歌曲、漫画、社会人士支持信件、家长署名信函、中学联首届监察及执行委员签名录,以及国际学联的电报、马来亚留印尼学生电报、广东华侨补习生电报等。

六、辩论会:马来亚为我们的国家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不少星马同学选择回中国升学,特别是五一三事件期间。可是,那是个单向的旅程,学成后回返马来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了培养本土意识,鼓励年轻人留下来参加反殖民主义及争取独立的运动,中学联于1956年5月间在会所举行一个题为《马来亚为我们的国家》的辩论会,参加者是中学联各校的干部。孙罗文在致开幕词时说:“中学联第二阶段的中心工作是充实学习内容。今天,我们要负起维护

真理、维护正义,我们必须先培养中学联的干事的口才,充实知识,磨练同学们的思想力,以及丰富同学们的判断能力。使得中学联在宣扬真理的时候,能够提出具体的理由,掌握住事态的正确观点的辩论会是有建设性的活动。在马来亚朝向独立时,对于这个双重国籍的问题,是必要加以解决的。”⁸

七、告同学书:争取期考好成绩

5月间,学术部发告同学书:

“在中学联第二阶段中心工作‘巩固学习成绩,充实学习内容’的号召下,同学们即以高度的学习热忱,展开对于各方面知识的学习,包括时事的学习。‘搞好学习’运动的实质,就是要建立正确的学习风气,提倡课内与课外学习的结合,因此对于行将到来的学期考试,我们是相当重视的,因为这次考试成绩的好坏,是会影响同学们的升留级的。正如一路来的各种正义行动,在推进‘搞好学习’的运动,我们还是要发挥同学们团结互助友爱的优良品质。因此我们提倡集体学习的方式,而今年以来,集体学习的风气已是相当普遍。为了争取这次期考的好成绩,我们号召同学们正确认识集体学习的本质,担负着坚毅的意志,英勇的、积极的巩固并推广集体学习,近

⁷《新报》15-5-1956第4版

⁸《新报》10-5-1956第4版

一步争取这次期考的成绩。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在今年3月间的短考，有少数不了解中学联或对中学联存有敌意的老师，企图利用考试来阻扰搞好学习的运动，比如故意无原则地提高程度，致使同学们的成绩不好而丧失学习的信心。然而，事实证明这部分人的“努力”只能是枉费心机，它非但起不了作用，反而暴露了其真面目。因此，我们愿意提醒他们，搞好学习是符合全新同学的切身利益，任何企图阻扰这个运动的诡计，非但起不了作用，最终将被人唾弃的。我们诚恳地呼吁敬爱的老师能予以充分的合作，争取期考的好成绩，进一步搞好学习运动。”⁹

各校同学响应中学联的呼吁，结果年中期考的成绩普遍提高。为了进一步提高同学们的程度，学术部鼓励各校分部于假期举办各科补习班，由高年级或成绩优良的同学负责教导，各校报名参加者踊跃。

八、对外联系：泛马学生文化节与亚非学生会议

中学联一成立，便积极加强与全马来亚各族学生的交流与团结。1955年底，中学联加入泛马学生联合会，并于年底派了庞大的代表团到吉隆坡参加泛马学生文化节。中学联也和泛马学联合作，出版华文版的定期刊物《马来亚学生报》。

⁹《新报》22-5-1956第1版

亚非学生会议于1956年6月在万隆召开，中学联受邀派了一个观察团，由孙罗文带领出席。中学联向大会提交了备忘录，详述星加坡华校学生的处境、反抗殖民地统治的斗争和对于平等的民族教育的追求。

九、抗议联合邦政府的旅行限制

1956年6月间，联合邦政府突然引用紧急法令，限制华中、中正、南侨、中华四校的同学组织旅行团到马来亚，除非事前向各州政府申请准字，而且人数也受限制。

6月15日，四校数百名同学代表在中学联开大会，抗议联合邦政府不合理的措施。会后中学联发表声明，谴责联合邦政府诬指中学联于1955年出席泛马学生文化节时呈献“不受欢迎”的节目，以及中学联1956年元旦集体到新山郊游是在“展示力量”。声明认为，殖民主义者肆意阻扰新马各族同学的交流，深恐两地各族学生的团结威胁到殖民主义者的统治。¹⁰

十、中学联全力支持1956年宪制谈判

自劳工阵线政府上台后，首席部长马绍尔深感林德宪制的局限性，几度与总督府发生摩擦，导致立法议会议决与殖民部进行谈判。1956年3月18日，文化总会假羽毛球馆召开“文化界

¹⁰《新报》16-6-1956第1版

9月22日，
1200多名干事在中学
联合会所开会，商讨
最新的镇压行动，
大家预感到疯狂的
镇压即将到来。



支持独立谈判大会”。在中学联号召下，几千名学生出席了大会。席上，孙罗文主席强烈谴责殖民主义，并呼吁同学们会后前往旧加冷飞机场，参加“全星人民要求独立大会”，向到访的殖民部官员展示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

在林清祥的安排下，中学联代表在独立代表团启程前往伦敦前，到马绍尔位于克里门街的官邸拜访他，表达全星华校学生对代表团的支持。席间，中学联代表献议动员同学们到机场欢送马绍尔和谈判代表。马绍尔感激同学们的支持，但表示不需要同学们的欢送。

除了参与“全星人民要求独立大会”，中学联自成立以来未曾参与其他政治或政党活动。

风暴前夕

1956年宪制谈判期间，殖民部态度强硬，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谈判破裂与马绍尔辞职，是英国人也是星加坡代表团里的右翼分子所乐见。事情的后续发展证明，在让出权力前，英国人决心先摧毁星加坡的左翼势力，再把权力移交给他所认可的人。

早在独立代表团动身前夕，人们已多少察觉到暴风雨前的征兆。1956年4月间，殖民地政府官员以“健康欠佳”为借口，

撤销了八名华校教师的注册。事情引发董教学三方的不满和抗议，显然，殖民地官员正与伦敦的殖民部配合，企图挑起一些争端。

9月18日妇女联合会和铜锣合唱团遭解散，政府也引用驱逐法令扣留了农民协会的林振国、妇联的陈蒙鹤、小学教师联谊会的陈广风和陈玉兴、中正中学的彭垂裳和陈孟辉。9月22日，1200多名干事在中学联会所开会，商讨最新的镇压行动，大家预感到疯狂的镇压即将到来。

■ 96

中学联被解散

果然，9月24日午后，政府通过电台宣布解散中学联。那时我们几个常以中学联为家的同学刚好从学校回来，在会所后面的工人房休息。得知消息，大家感到错愕，一时不知所措。当时看不出有警方或政治部人员出现会所，却没有想到应该把一些资料和财物移开，本来我们可以轻易从旁门把东西搬进隔邻林树彦的家。不久，报穷司派人到会所贴封条。随后主席孙罗文与法律顾问陈维忠来到，后面跟着政府人员，我们眼巴巴看着他们动手把中学联的所有财物、文物、包括桌椅、甚至挂在墙壁上的孙中山和鲁迅画像一并带走。隔天，他们又分别到华中与中正的分部办公室搬东西。

政府文告指责中学联违反“不得参加政治”的规定，再三与其他共党阵线机构组织及参加与政治有关的示威。这样的指责，荒谬透顶。虽然过后政府发表了《解散中学联白皮书》，虽长篇大论，却始终拿不出具体证据，证明中学联自成立后曾“组织及参加与政治有关的示威”。中学联只有参加过一次与政党有关的活动，那就是3月间支持各党派发动的独立运动大会，而教育部长也曾公开承认，学生参加独立运动，不能算是搞政治。中学联在它短暂的生命里做了哪些事，光明磊落悉数可列，不容掩饰，更不容歪曲或捏造。

□ 97

白皮书指中学联是一个共产阵线的组织，跟随共产阵线之政策。但是除了宣称被逮捕的两三名中学联职员拥有马共文件外，白皮书不曾说明到底中学联和马共有何种联系，它又如何追随马共政策。白皮书也大量誊抄共产党人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学习，硬套在中学联的学习运动上，不外就是为解散中学联找寻借口。

成立“反迫害代表团”

孙罗文主席当晚召集全体监察与执行委员，在华中开紧急会议。孙罗文会后招待记者，表示将指示李光耀律师和陈维忠律师依法对解散令提出上诉。他呼吁同学们保持高度镇定，继

续回校上课，静待事态发展。他也表示会致电中学联前法律顾问布里特，报告经过。

人民行动党也在当晚发表声明，指责劳工阵线政府要在中学联成长前，予以消灭。除非政府迅速纠正政策，否则将会迅速与它们所要代表的人民彻底隔绝。

隔天，全星加坡七校同学分别召开大会，选出代表组织了“星洲华文中学生维护人权及争取恢复中学联注册委员会”（简称“反迫害代表团”），成员为王鹤群、陈再聪、陈亚平、陈锐坚、苏礼彬、孙光景、黄昌文、岑瑞华、蔡石君、卢妙萍、林春梅、池益芬、郑玉书、林清如、李伟镇、陈清吉、莫乃江、苏炳发、柳春基、张国良、吴有发、张云腾、蔡秀珊、黄清心、林得籛、陈妙华、陈碧娟、蒋淑规、曾梅蓉、黄柔安、郑敏娜、何子媛、曾云英、黄翠芳、杨玩卿、江锦才、陈汉泉、许声宛、李永吉、杨宝珠。¹¹

各校同学本来计划从9月25日起留宿各自校内，以抗议政府解散中学联。有鉴于华中校长郑安仑和中正校长庄竹林当天相继收到教育局来函，警告若学生有任何行动，政府将关闭有关学校，“反迫害代表团”经过讨论后，决定接受校方的劝告，暂时不采取行动。

孙罗文被捕

10月1日孙罗文参加了代表团在经禧路艺术研究会会所召开的会议后，在东陵（乌节路）光艺戏院附近被跟踪的便衣人员强行掳走。消息传开，白色恐怖笼罩全星各校。

代表团跟着接到法律顾问传来的消息，部长会议火速拒绝了中学联注册的上诉。10月8日，全星各校同学召开大会，抗议孙罗文被捕，也要求政府设立公开调查庭，调查政府对中学联的指责。

10月11日我到华中上课，与我一起在庆利路租房同住的同学惶惶恐恐告诉我，昨夜警察上门要找我。原来昨夜警方大出动抓人，多名同学落网，不幸落网的是郑有领、张国良、卢妙萍和余文通。跟着来的消息，教育部宣布开除两名教师和142名分布各校的学生，我榜上有名。

学生已走投无路，代表团只好决定当天（10月11日）起，分别在华中和中正两校集中留宿。到华中集中的包括南中、南华、南侨和端蒙等校同学，到中正总校集中的除了中正总校、分校，还有中华和育英同学。两校集中人数近8000，代表团团员多集中于华中。

¹¹ 《南洋商报》26-9-1956第5版

董教拒绝自行关闭两校

政府显然知道，同学被逼得无路可走，不会再沉默。同日（10月11日）上午，教育部长周瑞麒召见两校董教，口头通知他们自动关闭学校，并把教师借出，教育部准备在两所英校为华中与中正两校的学生另行开课。部长限定董教4点半前答复。两校董事部于当天下午2时假怡和轩召开紧急会议，出席者中正为林树彦、康振福、林邦彦、孙得旗、张建金、刘木荣、陈福星、庄竹林；华中有杨赞文、陈六使、黄桂南、叶庆贺、郭珊瑚、潘国渠、林守明、陈龙得、黄芳奎。

庄竹林校长和黄芳奎校务主任向会议报告事情经过，指出今年（1956年）校内情形原本安静。这次事件之发生，是由于政府逮捕华校师生，继又封闭中学联的结果。日前又宣布开除百余名学生及两名教师，短期内发生一连串事件，学生认为他们无路可走。

会议决定函复周教长，告知借用教师，事出命令，当然只有遵照。至于自行关闭学校，董事部不能负责，如政府命令两校停课或宣布两校非法，乃政府之事，其后果由政府承担。¹²

¹²《南洋商报》12-10-1956第5版

陈六使慷慨陈词

10月11日两校紧急会议上，华中董事部副主席陈六使慷慨陈词，他说：

“两校此次事件，实际上乃由于党争所引起，并不是真正为当地教育着想。目前华校虽然拿有政府些少津贴，但所拿的乃是华人自己纳税的钱，这本是应该的。华校董事部自己出钱出力办学，对学校当然有其主权，在情理上是不应受干涉的。假使政府不抽税，学校不拿政府些少的钱，也可把学校办得好。在座董事多不是当地公民，实际上是替当地政府培养人才，这一点大家是应该明白，不要凡事听命于政府，自己要有主张。此次两校事件实是政府无能，对学生没有办法，并不是董事部没有办法。”¹³

针对陈六使的讲话，教育部长周瑞麒随即指控陈六使为学生辩护，洗脱罪名，一方面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一方面是为颠覆分子洗脱罪名。陈六使随即反驳周瑞麒：

“本人怀疑，周氏是否不识中文，以致对该次会议之议决案，以及通过之书面函件，均不能理会，而事后发出歪曲事实之谬论。”

¹³《南洋商报》12-10-1956第5版

“本人年来对于华教问题，已较少关注，缘本人虽为华中副董事主席，及福建会馆主席，但因华中由正主席负责，福建会馆属下五校，设有教育科处理，皆不必在人事上过问，而此次所以有发表意见者，乃因昨日出席中正、华中两校联席会议之故。

“关于周氏所云本人在会上指出‘此次中正、华中两校事件乃由党争所引起’，周氏认为无稽，本人认为周氏此种说法更属无稽。此次华校事件是否是由于党争引起，根据电台、报章及政府所发表文告，本市最近发生之种种逮捕事件，多数与本市某政党有关连，相信本市百万市民，皆有雪亮的眼睛，可一目了然，周氏是否有其独到看法，与众不同？

“关于周氏指本人‘乃为学生辩护，洗脱罪名’，此点更属危言耸听。周氏今天身为部长，出言应十分慎重，不可随便。其实，本人何曾为学生辩护，又何必为学生辩护。华校今日之凌乱状态，事事乃为周氏之施为所造成的。

“关于周氏指本人‘乃为本人利益，而一部分也为了星市之颠覆分子洗脱罪名’，周氏未免言重矣。本人在当地居住逾40年，一向所为，纯为有利地方及人民之福利工作，成绩如何，社会人士自有公断，可说并非纯为自身之利益而为。试问周氏过去所为以及自当教育部长以来，曾做就若干有利人民之事？

“本人乃无党无派之市民，一切社会工作均以有利当地政府与市民为大前提，又何曾为学生辩护，又何必为颠覆分子辩护、本人今日郑重请周部长今后发言务须审慎，尤须对本人之反驳，详加考虑，予以答复。”¹⁴

当两校董教代表杨赞文、黄芳奎、林树彦及庄竹林准时于10月11日下午4点半亲自把公函递交教育部长，并口头通知部长两校董教不愿自行关闭学校时，心情肯定是不安与沉重的。四人旋又回返华中，假虎豹楼会见我们几个学生代表，华中训育主任孙焕新及家长联谊会主席吴采唐也在场。回想起来，这真是个茫然、无奈、令人感慨的局面。董教学三方面本来没有矛盾，保护华文教育是大家共同的追求。但是风暴当前，如何面对难免看法有出入。杨赞文霸气十足，责怪学生不好好读书，整天搞无谓活动。他命令学生要马上解散，否则要负一切后果，惹来吴采唐理直气壮与他争辩。庄竹林和黄芳奎心里明白，其实学生无路可走。

多方沟通 学生坚守立场

10月12日，总督在宪报宣布，华中、中正两校“迁址”，学生分别到12所指定的英校上课。华中全体教职员旋即召开会

¹⁴《南洋商报》13-10-1956第5版

议，议决召见学生代表，劝告他们听多方面意见，先恢复正常状态，才谈其他问题。下午5时，黄芳奎、庄竹林、林树彦、陈诗豪、孙焕新再度到华中虎豹楼，召见代表团。他们劝告同学以华文教育为重，和顾及华中、中正两校的光荣历史，立即解散，以便学校照常上课。代表团商量后，觉得愿意交由同学全体大会决定，但也认为，除非政府有所让步，代表团很难说服同学。代表团屡向董教表明，两所学校绝大部分的同学支持中学联，支持大家的行动和要求，绝不会听从教育部的呼吁，到那几所英校去读书。只要董教学站在一起，任何意在摧毁华中、中正两校的阴谋肯定要失败。¹⁵

10月14日，家长联谊会会在福建会馆召开全星学生家长大会，有1000多名家长出席。大会通过议案，支持两校同学的行动和要求，也呼吁中华总商会出面解决问题。在提到教育部长责怪学生家长供给粮食与衣服于两校集中同学时，大会主席吴采唐问道：“难道我们的子女留宿学校，我们要让他们挨饿受寒，才能使周部长满意吗？这于人情上也是说不过去的。”¹⁶

¹⁵ 《南洋商报》13-10-1956第5版

¹⁶ 《南洋商报》15-10-1956第5版

泛马学联出面斡旋

从学生聚集校园那天开始，代表团已感知政治局势的微妙，明白要求释放被捕同学与恢复中学联注册根本是无望实现的目标。代表团一开始就要求中学联法律顾问李光耀律师，安排代表团与首席部长林有福会面，以缓和局势。由于多名代表原是警方要找的人，代表团要求会面时，由一批同学跟随保护。林有福通过李律师告诉我们，可以在10月17日接见十名前中学联执委，但不承认他们为学生代表，更不准大批学生跟随。

10月16日晚，代表团通过李光耀提出两项要求，保证代表有发言机会，及保证十名代表的人身安全，不会在途中被拦截逮捕，因为就在前一晚，又有两名同学被捕。林有福回复李律师，因不知代表的身份，也不知他们有过什么活动，不能给任何保证。代表团于是指示李律师转告，代表团决定取消会面。¹⁷

教育部要召集两校同学到几所英校上课的计划遭受重挫，只有区区300多名同学前往登记。各方人士都期待事情能有好的发展，希望一切恢复正常。泛马学联组织了一个调查团，调查政府逮捕学生以及封闭中学联的事件。调查团成员欧芝丹、

¹⁷ 《南洋商报》18-10-1956第5版



■ 与林有福和周瑞麒对话。

(背向镜头拿烟斗者是首席部长林有福，

面向镜头坐者前排右起是学生代表蔡石君、吴有发、王鹤群、林清如、陈再聪、李伟镇。)

杨詹美、胡詹美及阿俄斯沙林连日奔走各方，结果安排代表团于10月20日会见首席部长林有福和教育部长周瑞麒。泛马学联保证学生代表的人身安全，由欧芝丹等人亲身护送九名学生代表到首席部长的办公室。九名学生代表为：王鹤群、吴有发、林清如、蔡石君、陈再聪、李伟镇、陈碧娟、林得籁及林春梅。会谈期间，两名林有福的新闻官：李绍茂和叶瑞岩，在场充当翻译员。

与林有福、周瑞麒对话

会谈期间，代表团发言人林清如向首席部长提出四项要求：（1）要求政府收回开除学生师长的成命；（2）要求政府保障不再逮捕学生及教师；（3）要求政府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立即恢复“中学联”注册，取消一切对华校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公开审判被捕的师长及同学，否则应无条件释放；（4）要求政府保证学习为青年学生的基本任务。

代表团成员吴有发接着提出下列数项问题：

（1）我们搞好学习运动就是搞好功课和改善读书风气，为什么这样的运动不能搞呢？搞这项工作触犯了新加坡的哪项法律条文？



殖民政府决定以武力强行驱散集中同学。



10月25日傍晚起，大批群众聚集华中校外支援学生，学生纠察队在一旁维持秩序。



■ 110 ■ 中正同学在总校校门纠察。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 泛马学生联合会会长欧芝丹一行人前来华中慰问面临武力驱散的同学。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2) 在独立谈判期间，周瑞麒先生以代理首席部长的身份发表声明说：“学生参加独立运动不等于参加政治活动。”为什么现在又指责我们参加独立运动？请问当局的目的何在？是否当局需要我们时便说我们的好话，不需要时就封闭对独立运动有利的团体，逮捕对独立运动有利的人士？

(3) 强制董教“自动关闭”学校是不是维护华文教育的具体表现？

(4) 中学联共有13636名会员，周教育部长竟没有事实根据的说成是3000名，这充分说明当局对中学联是不够了解的，请问阁下将如何向全星人民交待“政府无理解散一个连会员人数都弄不清的合法社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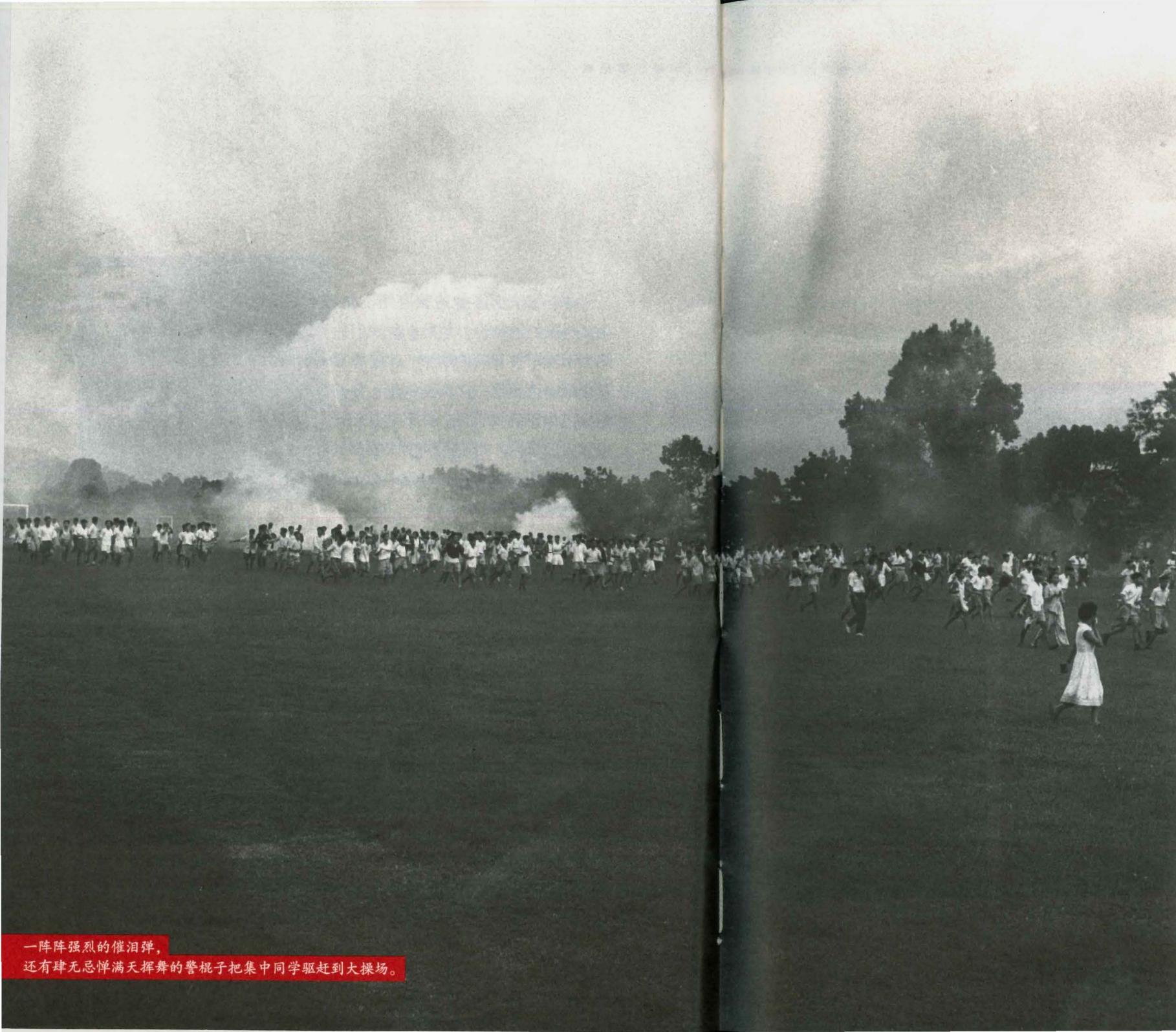
林有福表明，他的政府绝不允许学生组织学生会，也不承认代表们的身份，他是以代表们的个人身份予以接见。周瑞麒表示对于被开除的学生，政府愿意个别考虑，惟彼等需先重新登记。他更说：“作为学生，你们最基本的任务是在师长的指导下作正确的学习，并不是召开什么会议，因为召开会议是成年人的事。”当有代表要求周部长进一步澄清时，他生气回答：“我不是来与你们辩论，而是跟你们说一些话，喜欢就接受，否则请便！”

至于被捕的同学与师长，林有福也只能官腔回应：“所有被捕者将依法处理（指的是公安法令的条文），而任何人若未做错事，不需害怕被逮捕。若做出危害社会利益的非法活动，政府肯定会采取行动。”

这个会谈长达三个钟头，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我们无条件投降，自动解散。代表团觉得多谈也没用，最后发言人林清如总答复：“林有福首席部长给我们的答复使我们十分失望。可见政府没有诚意要解决当前难题，我们提出严重抗议。”¹⁸

会谈虽无结果，代表团过后致公开信给林有福，呼吁政府拿出诚意，停止对华校师生的迫害，尊重华校学生应有的权利。

¹⁸ 《南洋商报》21-10-1956第5版



一阵阵强烈的催泪弹，
还有肆无忌惮满天挥舞的警棍子把集中同学驱赶到大操场。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3000多名同学被强行驱散后，排队沿武吉知马路朝市区方向迈进。

队伍来到华央沙都，
眼见镇暴队在纽顿交通灯前头
摩拳擦掌，
朝向队伍高高举起福枪。



部分失散的同学来到芳林公园集合，再往前去福建会馆。

武力强行驱散学生

局势已经极为明显，这是一系列预谋的镇压行动。更多人被逮捕，更多社团被封闭。到25日止，被捕的包括文化界人士余瑞吉、许汉杰、杨志针、黄辰思、陈珠炎、林乃燕等。被解散的包括1953年全星华文中学毕业生艺术研究会、全星学生家长联谊会、中正中学同学会、小学教师联谊会等。

林有福与周瑞麒10月24日上电台广播，宣布25日晚8点将以武力驱散两校集中学生，呼吁家长带孩子回家。25日一早形势紧张，数千家长集聚两校，连续召开大会，发言者个个慷慨激昂，斗志坚强，准备面对最坏的后果。到了晚上，华中校门外满是人群，他们都是前来声援、保护集中同学的。消息传来，武吉知马沿路工厂聚集大批工友，正在游行前来华中的路上，与镇暴队起冲突。

25日晚，警方进不了华中校门，本以为他们会收兵回巢，没想到隔日凌晨时分，大批荷枪实弹的镇暴人员或剪破学校周围铁丝网、或索性爬越围墙闯了进来。他们团团围住图书馆、食堂、大礼堂和大钟楼等中心地带，把3000多名集中同学紧紧锁住。我们预料警方会用催泪弹，事先在礼堂周围摆了好多好多桶水，又交待同学们随身要带块布或手巾，因为湿布蒙着眼睛可以减低催泪弹导致的痛楚。催泪弹雨一般掷下，加上到

处摇晃的警棍，同学们一堆堆闯来闯去，结果全部人撤往大操场。警方步步逼近，最后只好冲出校门，几千人往市中心方向游行。

学生运动一大挫败

混乱中本已失散的代表团员，在游行队伍里再度组合。我们这时也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建议游行到坡底的福建会馆，到那里重新集合再说。于是我们几个代表挤到前面，走在前排。队伍来到华央沙都（巴慕乐路与武吉知马交界），眼见镇暴队在纽顿交通灯前头摩拳擦掌，朝向队伍高高举起来复枪。镇暴车上有人用马来话高喊，叫我们不得前进，否则就开枪。队伍并不畏缩，继续前进。在这形势紧张的时刻，队伍中的家长以及路旁的围观者突然冲到队伍前面，一方面阻止队伍再前进，另一方面不断与镇暴人员交谈。僵持了好久，最后我们接受家长的劝告，由在场家长分批带我们离开。私底下，大家相约福建会馆再见。

我们几个代表由家长护送（多年后何佩珠才告诉我，当天是她扮成我的家人把我带出去），很快到了福建会馆。不料午后政府宣布全岛戒严，所有公共交通停止服务，到傍晚点算，前来福建会馆的同学不过几百名。另一方面，听说在中正总校集中的同学被驱散后转往光华学校，但为数也很少。

当晚在福建会馆收听电台广播，知道当天警方也全面动员镇压职工运动。各业职工联合会、巴士工友联合会、农民协会等组织被封闭，林清祥、蒂凡那、方水双、兀哈尔、普都遮里等数十名工会领袖与干部一一被捕。

隔天，乘戒严令暂时解除，同学们从福建会馆分头散开。

政治低能的林有福心甘情愿为殖民地统治者手执屠刀，心想倘若紧接而来的宪制谈判有所成就，他当能坐享其成。他没想到，黄雀在后，最终落得悲惨下场，咎由自取。

一个时代的绝响

1956年的镇压行动，是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后，殖民政府地毯式扫荡反殖民地运动的翻版。不同的是，1956年的矛头最先指向华校学生和文化界，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学联。

在短促的352天生命里，中学联所表现的就是发挥中华文化优良传统，鼓起年青人学习的热潮，通过课内与课外学习的结合，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具有理念、具有正确价值观的时代青年。事实证明，几十年群众运动潮起潮落，社会的中流砥柱正是这一批批曾在中学联接受熏陶，即能干、又肯献身的华校生。

中学联展示了华校生惊人的自律能力，粉碎了殖民统治者把华校生视为洪水猛兽的恶毒宣传。通过与各民族年轻学生的交流，中学联为各种族的团结与互助作出了贡献。

1954年有在皇家山反对兵役的请愿，1955年有因福利工潮引发的学潮，那都是相对动乱的年头。正如庄竹林校长与黄芳奎教务主任所说，自1956年以来（也就是自中学联于1955年底成立以来）各校情况安定，华文中学生的读书和学习热忱，从来没有如此高昂。随着南洋大学开课，华社董教学三方对于自立更生、全面发展华文教育充满信心。一向歧视、敌视民族教育的殖民统治者肯定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华校生通过中学联所展示的高度组织能力与影响力，让殖民统治者心生不安与恐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中学联长大成人之前，决意将它连根拔起。

中学联，一个时代的绝响！

写于2011年5月

泛星
岁月

我短暂的职工运动生涯

1956年大逮捕余悸

1956年10月26日，集中于华中与中正两校的同学被军警驱散、左翼运动领袖和组织遭受扫荡后，局势一片混乱。我无从联络其他学生代表，也不敢回去庆利路住处，因为中学联被封后警方曾经半夜上门要找我。一连好几天在位于克里门梭路华侨银行职工俱乐部的一间工人房里，与同学张少军同宿。少军年纪比我大得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学潮后被育英中学开除，转校华中。他曾是肺病病患者，与我同班三年，一直体弱多病，喜爱文艺。他家境清贫，和在俱乐部当杂役的父亲相依为命，通常以俱乐部厨房的残羹剩饭填肚子。那间工人房原本只有一张帆布床，他为我弄来了另一张。深恐惊动俱乐部管理人员，大部分时间我就躺在帆布床上，呆望天花板。

正当会考或年终考试来临时刻，教育部迅速宣布华中、中正两校复课，但学生得重新登记。很多同学争先恐后到学校去，虽然心有余悸，也清楚自己已被教育部开除，甚至可能在“逮捕归案”黑名单之列，我还是怀着侥幸心理，与少军一起到校登记。几天前大家还在这里坚持，是强权与暴力击败了我们，放目四顾劫后余生景象，不胜感慨。绝大部分被开除的同学都没来，我想自己是来送死的？我随着大家填了表格，呈上后就步下山岗，准备“回家”。

在车站等巴士，忽见两个行迹可疑的人，似乎私下互比手势，再朝我走来，我估计大事不妙。恰好一辆巴士到站，同学争着上车，混乱中我挤了上去，夹在人群里，站近车门口。那两位仁兄也上了车，我更加确定他们来意不善。车开动了，很快便到了京士路南中站，我灵机一动，冲下车去，往京士路南中的方向奔跑。头也不回，迅速拐进一个马来甘榜，绕道加冕路，躲进一间叫德成园的木屋里。从前我在这里住过，在场的多是认识的同学。他们读着我的神色，大约知道发生了状况，但没人多问，我也没多说，歇了一会儿，间中不时探头外望，不见有动静，这才告辞。

近黄昏时分，我沿着南洋女中（现在的南洋小学）附近的羊肠小径行走。这一带的地理我还熟悉，当年有好几回夜里，我陪同住德成园的马大医学院学生黄德炎到附近马来亚大学校园内的水池捉青蛙。走着走着，我回想方才的情景，有点怀疑自己神经过敏，没有确定来者身份，没有确定是否后有追兵就死命奔跑，觉得有点可笑。出了路口，便是武吉知马大道，我继续一路徒步至纽顿，终于回到克里门梭路的工人房。这一天的经验，深化了我内心的白色恐怖，才明白为什么很多被开除的同学都认了命，不敢再妄想走进校门。

少军的工人房无法久留，几天后我托他问一问同班的C君，能否让我到他的家暂住。C君是富家子弟，在班上不算活跃，但

对我而言，这是个熟悉的老地方

——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的会所在密驼路与滑铁卢街交界的一所店屋二楼。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是为人友善、乐于助人。他住在武吉知马山坡上的一座高尚豪华洋楼，我曾到他家玩过。C君欣然答应我的请求，在那个非常时期，他的母亲、兄嫂待我如同家人，终生难忘。

尽管环境舒适，“逃难”的阴影一时挥不去。日子久了，渐渐明白自己没有“逃难”的理由，便开始出外跑跑。那时父亲在一间树胶厂做书记，寄宿厂里。三个妹妹也来新加坡升学，在巴耶礼峇一位叫王奇标的家租房住。我联络上他们，大大方方与他们来往，察觉没有不妥，于是决定走向社会，面对一切。离开了C君的家，搬到麦波申路一座店屋的三楼居住，屋主是一对年轻教书夫妇，是妹妹的朋友。接着，我报了名，到后港三条石圣迈克路一间私立英校读书。

迈进泛星的大门

很快地，有几位被开除的同学联络上我，也跟着到同一所学校上课。其实那不过是间学店，我们只是在那里混混日子。

1957年3月或4月间，有人通过妹妹相告，说有几位前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简称“各业”）的干事想和我见面。就在某一个晚上，我应约到我住处对面康元饼干厂附近的一间亚答屋去，那是林石塔所居住的地方。林石塔自我介绍，原来他也来自小笨珍，在工厂干活，是前各业干事。在场的还有另外几个人，也都是前各业的干事。



据他们陈述，自从各业被封后，前干事都纷纷想要重建组织。结果出现了两个不同派别的工会，一个是由现存、但没有活动的工会改组过来的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泛星），另一个则是新成立的全星工友联合会（全星）。言谈间，我发现林石塔属“泛星派”，其他人当中有“全星派”。双方经过多次谈判，决定放弃全新，集中发展泛星。他们找我的目的，是希望我到泛星帮忙，强化泛星的形象与号召力，让所有前各业的干事与会员归队。我心里明白，我是林清祥的弟弟，除了他们可能预期的“林清祥效应”外，我何德何能令人“顾茅庐”？其实那时我更想要的是继续在英校学好英文，所以没即刻答应，只说有空的话会先到泛星会所看看，过后我也真的这样做了。

记得是4月份前后，我第一次到泛星会所走了一趟。对我来说那是老地方，那正是前各业与马来亚黄梨工友总会共用的会所，地点就是密驼路与滑铁卢街交界的一间店屋二楼。前各业虽被封闭，但会所尚在，因为“黄梨工会”没有被查封。

泛星的前身是The General Employees Union (GEU)，由几位受英文教育人士发起组织，没有中文译名，它于1955年4月4日获准注册，会所就在前各业的隔邻。1955年和1956年是职工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虽然一板之隔的前各业搞得有声有色，GEU却始终活跃不起来，直到1957年转型前，会员不过区区500名。我不太清楚前各业的干事如何“接管”GEU，把它转为



■ 半个世纪后（2009年）我在广州和当年行动党与泛星几位元老相叙。
（前排右起蔡卓成夫妇、林石塔太太、卓可党太太邱慧；
后排右起戴秋声、林石塔、卓可党、作者。）

泛星的详细经过，只知道关键人物包括蔡维杰（时任“黄梨工会”秘书）、郑激发、林石塔、史立华、蔡卓成、梁再明等前各业班底。这些人与GEU的负责人谈判的结果，修改了章程，保留英文名，华文名则为“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

改组后，GEU的宋国良、安东尼、吴密斯等受英文教育人士保留主席和总务要职，但其他职位都由前各业干事出任。出入

几次，我与他们搞熟了，我终于接受出任受薪秘书，过后也成为中央执行委员。

1955年与1956年间，学生运动与职工运动相互呼应，结束殖民地统治与争取国家独立是彼此共同追求的目标。有了这样的经历与情结，来到了泛星我丝毫不感觉陌生或隔阂，特别是当我发现工作人员中有另两位前学运人士，黄翠云和林戴伟。黄翠云是前“1953年全星高初中毕业生艺术研究会”的副主席，熟络得很，中学联筹备与被解散后一段短时期里，我们就在他们位于经禧路的会所“弄帮”（暂居）。林戴伟是前华中同学，我与他有过一面之交，他的思想、言论相当激进。他原来是全星的台柱，本想拉拢前各业班底，以全星取代前各业，失败后选择投靠泛星。

殖民政府解散中学联、大肆镇压学生运动、破坏学生的学习环境。我甚至被教育部开除，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被剥夺了，前途茫茫；我投身群众运动，是很自然的选择，不需要任何人特别指使。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提到我参加工运时说，1956年林清祥被捕后，马共不敢冒险派出他们的地下干部，“决定指派林清祥的弟弟作为替代人选，由他继续高举哥哥在密驼路留下的旗帜。”¹ 没想到我当年崇敬的反殖民地运动

领袖，取得政权后竟然仿效殖民地政府口吻，把当年的学运、工运一律妖魔化。

前各业被封后，老板乘机向工人开刀，拉长工作时间、任意开除工人、剥夺工人应享的福利等等。前各业会员纷纷加入泛星，泛星的会员迅速猛增，数月内就超过万名，一连串的劳资纠纷令泛星同僚疲于奔命。在短暂几个月里，我参与了好几宗劳资谈判，学习了不少东西。工友的利益牵涉众多方面，除了工资，还有工作时间、年假和病假、升级条件、裁员条例、参加工会的权利等等，对于刚出校门的我，是活生生的现实教育。谈判期间近距离接触老板，有机会亲身体会劳资之间难以调和的利益矛盾，更目睹了资本家虚伪善变的嘴脸。

记得到劳工部与南顺食品厂的老板谈判那一天，在劳工司吴可培的办公室里，老板把一本厚厚的书（大概是有关经济方面的书）丢在桌上，用英语奚落我们，资本家财大气粗，令人恶心的嘴脸深印我脑海。另一天，我和马来同事布旺搭巴士辗转到达惹兰加由的万国园，一望无际浓密的胶林，像极了我在小笨珍时就熟习的“红毛园坵”。万国的经理是名叫赫依翁（Hiorn）的光头英国佬，他很耐心、绅士般客气地聆听我们的诉求，但是立场坚定，不随意妥协。尽管他皮笑肉不笑，还是赢得我们应有的尊敬。多年后我在土地局上班时与他重逢，回首往事，大家不禁哈哈大笑。

¹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291

泛星与职总合并胎死腹中

在我几个月短暂的职工运动生涯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泛星等左派工会与林有福劳工阵线所控制的职工总会谈判合并的经历。记得是年中某一天，书报业工友联合会的一位负责人邀约林戴伟和我与一位来自职工总会的罗先生会面。罗先生年约五六十岁，北方口音，满口理论，对当时的工运与政局有一套看法。他坦白对我们说，前各业刚刚被封闭，我们这么快就冒出来，遭殖民政府再次镇压是迟早的事。他建议泛星集团考虑加入职总，职总现有领袖愿意与我们谈谈如何分享领导权。

我们把这个突如其来的发展带回泛星，大家都觉得有趣，也详加考虑。我们当然没有天真、侥幸的心理，以为可以把职总当“保护伞”，更没有任何“夺取”职总的野心。我们把它视为统一工运的一个机会，是对争取工友切身利益有利的发展。我们很难断定对方究竟有多少诚意，但是既然可以进去，不能真诚合作时肯定也可以退出。于是双方正式接触，林戴伟和我是泛星集团的主要代表，对方是当时职总主席李有成、总务汪亮星和罗先生。

渐渐地我们探出事情的来由。1957年3月间，由林有福率领的独立代表团到伦敦参与第二次宪制谈判，过后立法会辩论谈判所达成的初步草案时，马绍尔讥笑代表团带回的其实是第一

次谈判时新加坡代表团所拒绝的方案，唯一不同的是把原来的防务与内部安全委员会改为内部治安委员会，还有规定“颠覆分子”不能参加新宪制下举行的第一次大选。马绍尔指责人民行动党“在谈判中出卖所有的人”²，他挑战李光耀同时辞职共对选民，到丹戎巴葛举行补选，李光耀接受挑战，当场和马绍尔双双辞职。没想到补选提名时，马绍尔却打退堂鼓，宣布退出政治。

多年后李光耀指名道姓，说当他还在伦敦谈判时，“林清如带工会代表向杜进才施加压力，要他指示（李光耀）在伦敦采取更强硬立场，同时要求星加坡提早重新大选，把林有福拉下来。”³他更把马绍尔对他的挑战与辞职，加罪于我和詹密星。其实自中学联被解散直到1957年中加入泛星前的一段日子，我过的是“躲躲闪闪”的日子，根本没有也不敢接近学运、工运或政界人士，没有见过杜进才、詹密星或马绍尔。我真不明白李光耀为何捕风捉影、大放厥词，硬要把我拉下水。

马绍尔随后退出劳工阵线，致使职总面对分裂。职总属下最大工团三军雇员联合表示要退出职总，组织工人党。跟着可能退出的工团包括商行雇联、银行雇联及保险公司雇联等团

²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306

³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304，305

(六期星)

日三月八年七五九一

本埠新聞

職工總會與泛星工聯

醞釀合併組織

成立新的工團聯合機構

雙方負責人正密切進行商洽中

據悉，本坡職工聯合總會及密駝律泛星工聯兩大工團，目前正在醞釀合併，成爲一個新的工團聯合機構，該兩工團負責人近日正在密切商談有關合併的一切事宜，能否成功，不久即可分曉。

記者自有關方面獲悉，該新的工團聯合機構的名稱，將仍爲職工聯合總會，若組織成功，預料將有約三十個左翼工團參加，該工團聯合機構組織的動機，係要增強職總的勢力，與正在籌組中的「工人黨」相抗衡。

查職總屬下擁有大多數會員的三軍僱員團體，爲籌組「工人黨」，會聲稱要退出職總，並曾表示一俟該黨組織成功後即將退出，由於三軍僱員團體計擁有約四萬名會員，而且渠等若退出職總，則其他擁有許多會員的商行僱員、銀行僱員及保險公司僱員等團體，亦將相繼退出，如此將爲職總的大危機，因此職總現有與泛星工聯及其他不同意見的工團商洽合併之舉。

132

體。職總內林有福的支持者深怕職總可能淪爲空壳，才有了與泛星集團的工團醞釀合併的戲碼。⁴

雙方在職總領導層改組的關鍵問題上達致協議後，泛星等卅三左翼工團便訂於1957年8月22日，在密駝路的泛星會所開會，準備通過與職總合併議案。沒有想到會議還沒開始我們突遭軍警包圍，我和多名工會負責人在公安法令下被捕，結束了我短暫的職工運動生涯，職總與左翼工團的合併也胎死腹中。在這之前，政壇上也發生了所謂“親共分子企圖奪取人民行動黨”的事件（1957年羽球館事件）。

133

1957年行動黨羽球館“奪權”風波

到泛星工作後，我結識了陳世鑑。他原是新加坡巴士工友聯合會的受薪秘書，1956年大逮捕行動時他漏網，幾個月後也出來走動，而且常到泛星來找我。通過他的介紹，我租了多實路附近改良信託局組屋的一個單位居住。

1957年8月4日，人民行動黨在羽球館開會員大會，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當天陳世鑑來到泛星，我從他和另幾個工會人員的談話中獲悉，行動黨支部人員準備在當天的選舉中將王永

⁴《星洲日報》3-8-1957 第8版

啟展至前日（八月廿九日）始舉行，料本月廿一日行會談云。

港女畫家

潘筱

來星展

最近由香港來星展的嶺南青年女畫家潘筱，將在本地畫個展，經訂於本月廿九日下午五時，在中華總商會開幕。高德根主持典禮，會將於十六日起出三天，至十八日每日開放時間由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歡迎各界人士參觀。

據悉：潘女畫展中，常畫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等，其筆法功力，深得畫壇人士之讚賞。

■ 馬紹爾退出勞工陣線，致使職總面對分裂。職總內林有福的支持者深怕職總成爲空壳，才有了與泛星集團醞釀合併的戲碼。

元拉下来，我只听说很多人不喜欢王永元，但不知道原因。好奇心的驱使，我决定以泛星受薪秘书的身份跟他们一起出席会议，在那个时候，这是很正常的事。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我一生中最不明智的决定，从此李光耀硬是把我和这个事件拉在一起。

隔天各大报突出报道，声称行动党中央委员会选举暴露了党内分裂，选举结果是“温和派”与“激进派”各得六席，被指为“激进派”者是TT拉惹、陈从今、吴文斗、陈贡元、王才安和陈世鑑。过了几天，李光耀向报界发表声明，自行把中选的委员分为“非共派”与“亲共派”，并说由于“非共派”所属意的三名候选人（包括王永元）落选，在道义上他们“没有权利担任党主席、秘书长、财政和他们的副手。”

双方僵持了几天，被认为是“亲共派”的陈从今和TT拉惹等人出面主政，出任党主席、秘书长、财政等要职，形成了历史上的所谓“亲共派”夺权事件。对于殖民政府来讲，这是再向左翼势力开刀的大好机会。1957年8月22日警方大肆出动，逮捕了近40名政党与职工运动人士，包括陈从今、吴文斗、陈贡元、王才安等刚上任的行动党党要以及大批党支部人员。

过后立法议会辩论逮捕行动时，林有福宣称逮捕行动是为了挽救行动党，李光耀则说那是因为林有福所领导的新加坡职

工总会，也就是他的“群众组织”，“眼看就要落入林清如手里”⁵，林有福才采取行动。孰是孰非，不屑猜测。

林有福在职总的人马和我们谈合作，他应该不会不知道，他也没有理由反对，因为一个包容不同派别、强大的职工总会有利于他与人民行动党竞争工运的支持。不论他背后怀的是什么阴谋，他也应该没有理由在左翼工团进入职总的前夕就下手把事情搞砸。虽然人民行动党一直是左翼工团心中属意的政党，1956年林清祥等人被逮捕后李光耀与左派工团渐行渐远，我们在泛星的人并没有就与职总合并的事和他商量，他心中感受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有个事实无需争辩，那就是英国人、林有福和李光耀的共同意旨是尽早把他们认为是“亲共”的左翼势力彻底扑灭。

“夺权”之说 从何谈起

1956年底学潮过后我一直处于动乱不安状态，根本没有特别关注到1957年3月在伦敦举行的宪制谈判，也不知道行动党支部和工会对行动党领导层的不满。在我还没到泛星工作前，我甚至想到要去李光耀律师馆做学徒（articled clerk）。父亲去见了李律师，他回答说“不方便”。1957年羽球馆事件发生

⁵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314

前，我完全没有听到有关党大会或中委选举的事。我也没到过支部，没参与任何讨论，连那出名的奎笼会议也是进到牢里才听到。虽然事后知道当时和我走得很近的林戴伟曾到各个支部活动，但是他从没有和我谈论过有关的任何事，到底他想做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一概不知道。

1957年8月的逮捕行动过后，有关的行动党人士经历严刑逼供，警方应该有足够情报了解事情的真相。没想到迟至1998年，李光耀还指名道姓攻击我。他说“1957年5月间丹戎巴葛补选，人民行动党不靠共产党人帮忙而获胜，林清如不但没有吸收失败的教训，反而尝试接管人民行动党。”⁶李光耀必须紧紧咬住我的唯一理由，不外就是要在我的身上寻找林清祥的影子，以便利于他打击林清祥，在林清祥及其战友之间制造猜疑与不和，同时为他无情铲除林清祥寻求道义基础。

我被捕后的个把月，从中央警署调到樟宜监狱的D Hall，时住Refractory Block (RB) 的林清祥给我字条，说蒂凡那、方水双、兀哈尔、普都遮里等人对于“夺权”事件大表不满，于1957年9月联名写了一封题为“马来亚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信给行动党中央委员会，谴责企图“夺权”的人士为左翼冒

险分子，患了“左倾幼稚病”。从那个时候起，TT拉惹、陈从今、陈贡元、王才安、吴文斗、陈世镹等所谓“激进派”开始背黑窝，成为“夺权派”、“左倾幼稚病患者”！在李光耀眼里是这样、在当时左翼高层的眼里也是这样。1959年我还在棋樟山拘留营的时候，也只好跟着写信表白，谴责“左倾幼稚病”和“左翼冒险分子”，无限尴尬。

根据陈贡元的说法，要是真有所谓激进派的话，指的应该是以林戴伟为首的几个党内外人士。他们在1956年的大逮捕行动后就积极于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党取代人民行动党。另一方面，他们也组织了全星，意在取代面临封闭的前各业，但是不成功。在那次著名的奎笼会议上，林戴伟带头发言，吁请在座的行动党支部出来组织新政党，遭到大多数出席会议者断然反对。多数出席者认为应该避免分裂，左翼运动应继续以行



■ 陈贡元（2010年于澳门）。

□ 137



■ 吴文斗（2014年于星加坡）。

■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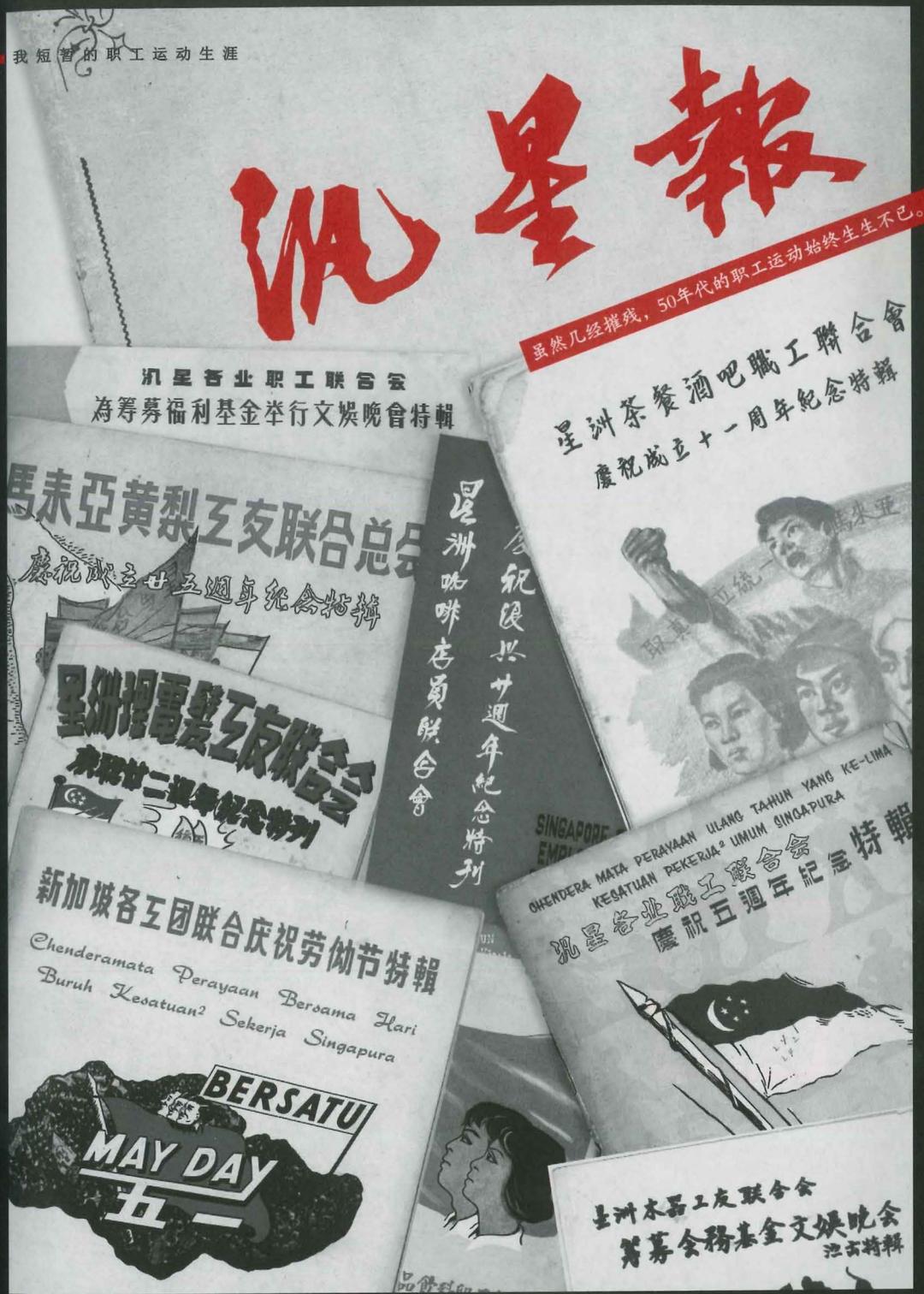
⁶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312

动党为中心，加强团结。除了原来已是中央委员的TT拉惹、陈从今、吴文斗，会议决定支持陈贡元、王才安、陈世鑑进入中委。选举大会那天，没有想到提名出来参选的候选人多达20多位。显然林戴伟所代表的激进派没有遵守奎笼会议所达致的共识，决定派他们的人出来试试，但得不到实力派的支持，他们全军覆没。在实力派支持下，“温和派”所派出的八名候选人有六人当选，落选的王永元和另一位人士是当时党基层不喜欢的人。

■ 138

《白衣人》的作者尝试追踪事件的幕后黑手，除了受访者一些毫无根据的猜测，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其实也不可能得出结论，因为那显然是党内基层不满领导层右倾政策的自发性行动。“温和派”乘机高喊亲共人士“夺权”，不失为公开邀请殖民政府扫荡反对派，然后修改党章，设立干部推选党领袖制度，一劳永逸霸占整个党，“夺权”之说，从何谈起？

谈到实力派当年为什么要出面主政，陈贡元说那时他相信对方的诚意，不过吴文斗表示，其实一开始他就认为那不是办法。中选的名六名实力派中委被指责为“夺权”，更大的原因在于他们掉入陷阱，居然接受出任党的要职。本来他们也可以选择不干，让党陷入混乱或瘫痪，那样的场面大家都要负责。



路遥
夜漫漫

我的青春坐了监

本埠新聞

警方援引公安法令大舉逮捕 政黨工會及新聞界 被拘捕者二十五人

政府發表白皮書列述共黨對本坡威脅 汎星各業工聯會所與新報社址均遭搜

本坡警察當局，於前兩日援引公安法令之權力，...

Sin Pao office deserted

ALTHOUGH no Government action has been taken against the Singapore Chinese newspaper, Sin Pao, its office in Cecil Street was deserted yesterday...

ARRESTS: MORE TODAY

THESE ARE THE PAP 'BIG FIVE' DETAINED BY THE POLICE



White

南洋商報

日六廿月九年七十九一

日四廿月八年七十九一

政警探三百人日夜出動 共逮捕三十五人

行動黨中委五名黨員十三名 各職工會職員總共十三名 新報經編兩部重要職員四名 當局發表共黨對本坡威脅白皮書

白皮書要點 政府昨日發表之白皮書定名為「共黨對新加坡之威脅」...

被捕卅五人略歷 引五名保人 五名保人 五名保人...

日八廿月九年七十九一

校長莊竹林被扣捕後 中正中學作緊急處置 委五人主持校務 令學生安心

新加坡中正中學校長莊竹林，於前兩日被捕，...

捕被生學中名八十四 首席部長林有福宣佈 秘密進行顛覆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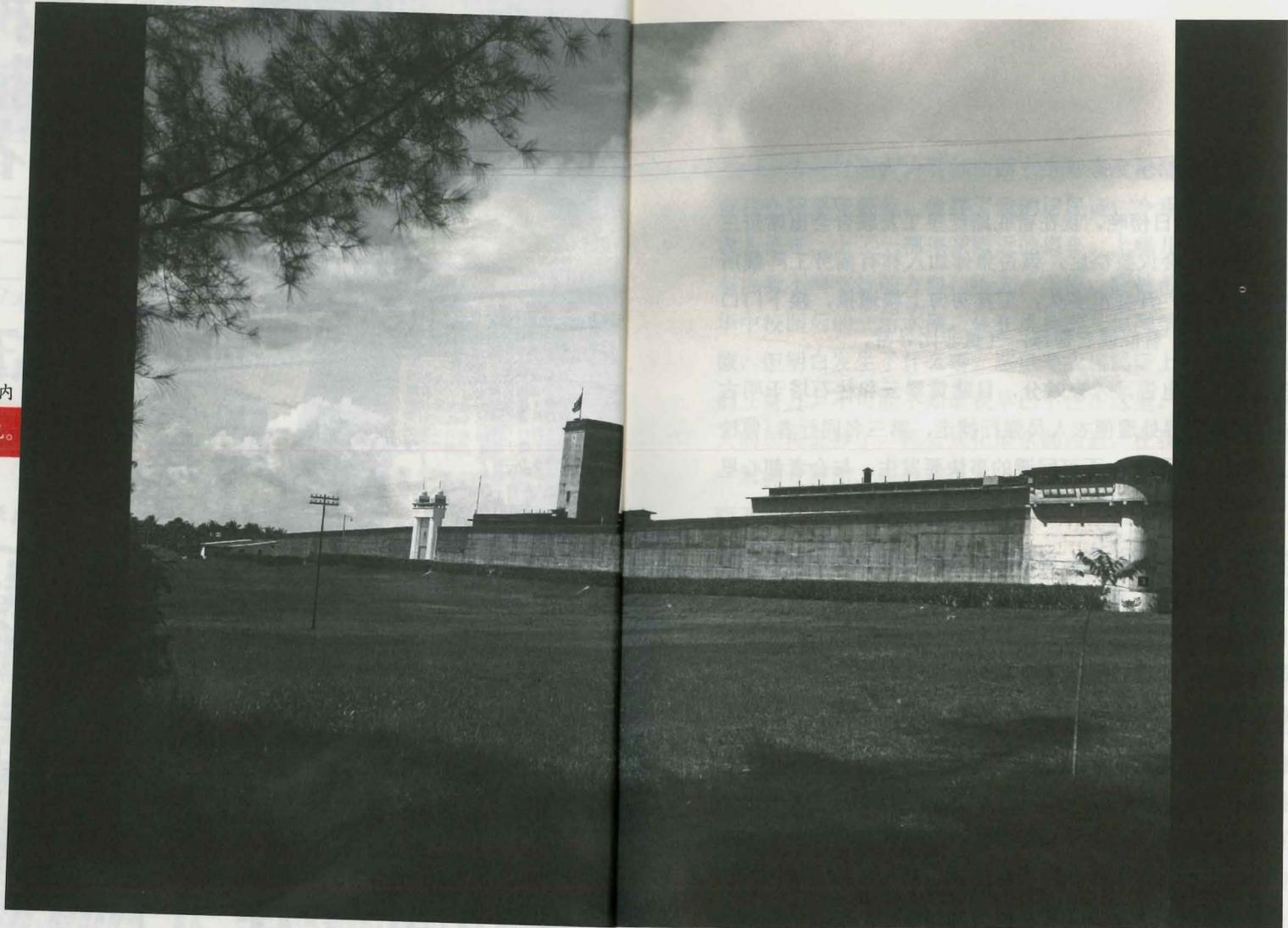
新加坡政府前日採用公共安全法令扣留四十八名學校中學生，...

1957年8月22日晚我与30多名工運、政黨及報業人士在公安法令下被捕。約一个月后，中正中学校長莊竹林與40多名學生也一一被捕。

路遥夜...的青春坐了監

青春禁錮鐵牆內

——1950年代樟宜監獄正面外觀。



照片提供：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夜幕下密驼路的骚动

1957年8月22日傍晚，我在密驼路泛星工友联合会出席卅三工团联席会议，会议要决定，该否集体加入林有福劳工阵线所控制的职工总会。开会没多久，工友匆匆上楼通报，楼下门口来了大批陌生人，看似便衣警探，气氛非比寻常。

之后又有人电告，入夜时分，目睹黄翠云和林石塔于明古连街与密驼路交界处遭便衣人员强行掳走，第三名同行者（曾松坤）趁乱脱险。我预感，不可回避的事快要发生，与会者都心里有数，却没有溜开的打算，沉着继续开会。

近8点，我离开会议室，站在楼角外望。每天这个时刻，总能看到K从这里路过，赶赴火电锯工联上班。正想着，她——一个在下来的日子里肯定令我思念的人——按时出现了。本想喊她，向她告别，却担心引起埋伏周边的爪牙们注意，只好默默望她摇晃着两条长辫的身影，渐渐消失于夜色。

不多久，十几名不速之客蜂拥上楼（多年后我才知道当中包括张嘉才、陈克昌和刘豪亮警监），来者命令众人勿噪勿动，其中一人掏出名单，点了十几个名字，包括林戴伟、蔡维杰、梁再明、屈志明，还有我。其余来人逐一抄下其他与会者的居民证，着令他们下楼去。接着，来人翻箱倒篋，把我们这些遭唱名者逐一带进房间。

一名身材高大，看似白面书生却态度粗暴的家伙拉住我，自我介绍是张警监。他要了我的居民证，令我跟他及另几名便衣人员走，上了一部停在附近的黑车。上哪儿去？我懒得问。车内看不清车行的方向，不久，车停，我被带下车——原来是华中校园后的一所木屋，住在里头的几位同学见到我，吃了一惊，但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这里是我居民证上写明的地址，他们（警方）不可能不知道我早已不住在这里。他们把屋内所有人的居民证抄了，再公式化地东翻西查，在我住过的房里找出一本裸女封面、看似黄色小说的书，头子拿着它朝我头上敲了两下：“老林，要是你真的看这种书，怎么会有事。”

之后，黑车来到花拉公园附近的一座组屋，无须我指点，他们直接带我拾级而上。那是三楼某单位，王校长的家。我搬来不过三几个月，看来早被人跟上了。他们急促地敲门，不等屋里人回应，竟抡起斧头，朝大门劈去。门开了，我看到王氏夫妇胆怯地站了出来。那头子和随从迅速地把我推进屋里，并警告屋里人不得交谈。问明了我所住的房间，他们粗暴地把我推进去，冷不防一个躺在地上的人站了起来，喊着“我是做工的”，他想跑出房，却给挡住了。那头子要了他的居民证，再掏出名单对照，说道：“陈世镒，you are also wanted！”。陈世镒与房东熟络，介绍我到这里居住，有时他也来过夜。那晚，他也在泛星开会，也知道就要出事，既然能溜出来（其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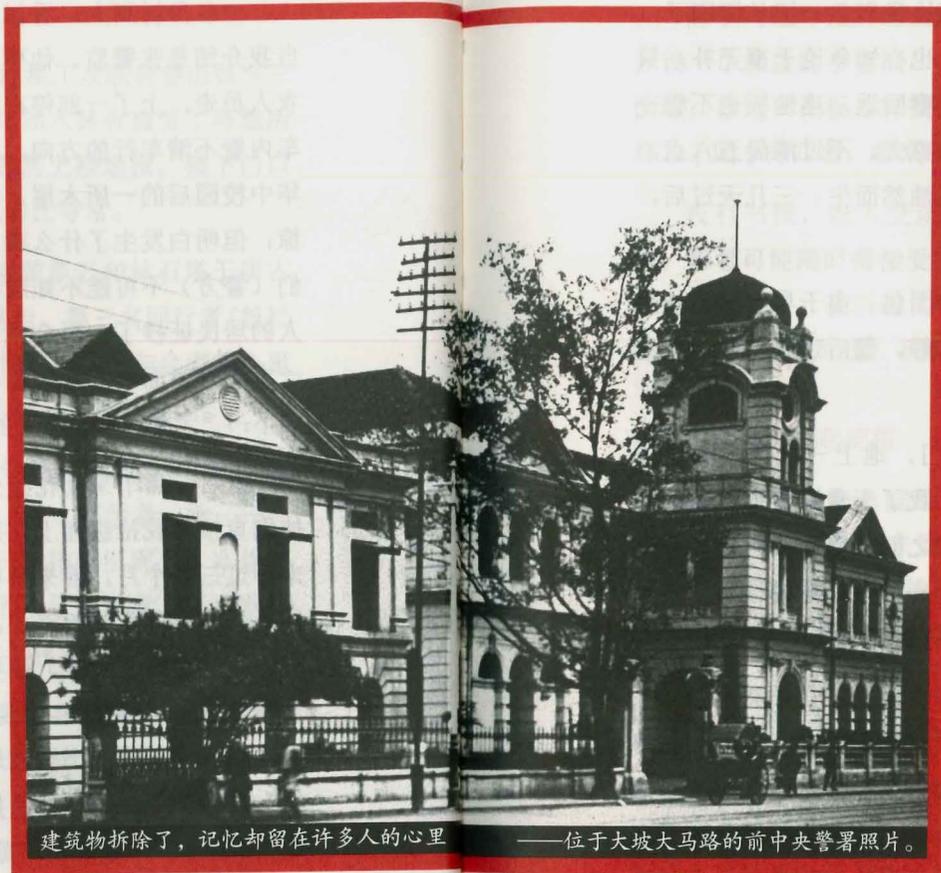
没有人知道他怎么溜的)，却跑到我家来过夜，令我不解。

除了几件衣服，我房里没有别的。头子显然不满，吆喝我：“还住过哪里？”我回说：“妈妈家，在柔佛笨珍”。离开前，我回头向王氏夫妇摆了个手势，表示告别和歉意。

中央警署黑牢10号

黑车再度启动。凌晨前，车子抵达一处看似警察局，原来是大坡大马路的中央警署。一名便衣小人拉拖物件似地把我强拉下车，再推进一道小门，进入窄小的电梯。电梯内有另一便衣，和一名全副武装的辜加¹警察。忘了

¹辜加（Gurkha）泛指殖民地时代英国政府惯于雇用的尼泊尔籍士兵。



建筑物拆除了，记忆却留在许多人的心里

——位于大坡大马路的前中央警署照片。

照片提供：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到哪层楼，步出电梯，重重铁门向我迎来。

我被令交出钱包、手表、香烟等随身物品，放入储物柜。香烟不能随身，我最在乎。他们命令我换上囚服，再由辜加警察把我关进10号牢房。已经多日没睡好，尽管面对硬邦邦的板床，我只想倒头就沉沉睡去。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多少人一道被捕……我一时都不想知道。

正要入眠，牢门开启，我有了伴。他叫陈木庭，人民行动党巴耶礼峇支部的干部。他说，被捕的人还真不少。他傍晚时被捕，先押到巴特礼路的一所学校，之后陆续又添了几个，才同车上路。

没多久，辜加警察把门打开，掷给我们各一把长柄刷子，示意我们洗刷地板。虽然不愿接受，也心知争论于事无补，只好装模作样起来。不一会儿，辜加警察回返，连地板也不看一眼，丢下毛巾和一套衣服，要我们冲凉去。不过清晨五六点，就要我们冷水冲凉，受刑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三几天过后，也就习以为常。

牢房早餐，一杯奶茶，两片牛油面包。由于早料到这一天会到来，昨夜上黑车至今，我心湖平静，餐后也懒得敲门请示抽烟，便呼呼地睡着了。

醒来不见牢友。辜加警察开了门，地上一盘饭，配一条小鱼和少许青菜。是午餐时候了吧？我了无食欲，勉强咽下几口，就要求出去抽烟。在这里，囚徒之间不得碰头，辜加警察向外喊，以他们的语言通报，确定外头没有其他囚徒活动，才带我出去。从自己的储物柜里取出香烟，我蹲在一旁缓缓吞吐雾，一边打量着周边环境。

这是三楼，政治部拷问政治犯的黑牢——有两排各七间的狭小牢房，中间是围着高墙通往前楼办公室的走廊。十四间牢房被四个冲凉房和厕所分隔为四个部分。后楼的尾端是警卫办事处，警卫清一色是辜加兵。短短的几分钟里，来自牢房的敲门声不绝于耳，看来黑牢已住满了人。

除了两张钉死於地上的板床，我的牢房空空如也，房门上开设一个加盖的小窗洞，可从外头窥探房里的动静。对门的那面墙，靠近天花板处有铁窗，也加设了黑铁丝网。房里强力电灯二十四小时开着，看来所有的牢房都一样。

没有书报，没人交谈，我与世隔绝，初尝丧失自由的滋味。想着可能随时得接受拷问，我无法入眠，也不想睡。回想昨天、数月来，甚至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并无一丁点见不得光的事，我迫切想知道：我所犯何罪？

牢友遭酷刑 我起疙瘩

晌午，牢友陈木庭回房，神色凝重，眼眶微红，一言不发，不断摇头。他看来遭遇不平了，我不敢冒然发问。晚餐后，我们一块敲门出去抽烟，彼此没有多谈。这被捕的第二个晚上，却是漫长难挨的一夜。

隔日清早冲凉，四个冲凉房里的谈话声愈来愈大，我和牢友也刻意提高声量。辜加警察不谙我们的语言，大家便借机互通有无，原来大都是昨晚捉捕进来的行动党和工会干部。当我听到行动党中委陈从今、吴文斗、王才安，还有《新报》易润堂等人的名字时，我揣测着殖民地政府这次行动的幅度。许多昨晚和我一起泛星被捉的人没来这里，应该是被关到别处去了。

午餐过后，牢友木庭又被点名出去，我暗自替他担心。没多久，辜加警察又来开门，该轮我上阵了？原来他是要我出去活动筋骨。我到一处相当宽敞的走廊来回踱步，这“健身室”不过是这黑牢的门面，每天让囚犯出来兜兜圈，证明它符合文明标准。走廊其实就在第八至第十四牢房的背后，若提高声量，能与里边的人通话。只是长相凶恶的印族守卫看得紧，难有机会。

■ 152 晚餐前，牢友回来了，脸色要比昨天更难看。他拉起上衣，让我看他红肿的腹部，用拳头示意那是刚被拳打的结果。他身上还有多处类似抓伤的痕迹，他几近呜咽地说：“电刑啊！”一些伤处已结疤，我想昨天他已受刑了，一阵疙瘩掠过心头，真没想到，手段如此卑鄙。

一整夜，牢友陷入沈思，对我的询问，只是三言两语。为什么他们要如此折磨他？施刑的详细过程究竟如何？我只能凭空想像。黑牢阴森恐怖，果然名不虚传。

连续被折磨几天后，牢友习惯了所面对的一切，开始有说有笑。从他的言谈，我感觉到他对自己承受得住煎熬而自豪，我打从心底钦羨牢友，想进一步了解他的情况，他却突然被调走了，不知去向。

被捕一星期左右，父亲从小笨珍来探监，二妹陪着。过去的一年，他几乎风雨不改，每星期都到樟宜监牢探望二哥。什么东西能带，什么不能，父亲都一清二楚。他带来两本书、一些水果，更重要的是香烟（原来父亲也知道我抽的是麦德汉薄荷烟）。按照规定，牢里的事一概不能提，我只能向他表平安。同样的，除了家事，外界的情况我也不得探问。

也许是想让我闷得发疯，父亲带来的书并没交到我手上。父亲或二妹每星期都得探监两回，除了探访我，也到樟宜监狱去看望二哥。想起我们兄弟俩如此连累家人，我总觉得愧疚。还好父亲识大体，明白错不在我们，尽管见面不许多谈，从他的脸容，我找到了温情和鼓舞。每次，我都想向他们探听K的消息，无奈他们并不相识。凭着每星期十几分钟与家人的短聚，我和这世界保持了一线联系。

少了谈话对象，日子仿佛愈加漫长。二十四小时灯火通明的牢房里，昼夜难分，我的睡眠逐渐失去规律，精神变得恍惚。我思念K，不知道她身处何方。令人烦闷的日子里，我发现了牢房里的一股恶势力——床底下的臭虫。由于入眠难，对臭虫的骚扰就愈发敏感和痛恨。床板的几道隙缝，是来犯者与我打游击的战场。我把手指搁在隙缝旁，耐心诱敌上阵，然后一一置于死地。每晚，我总能歼敌数十，战果丰硕。内心暗自庆幸，敌军的后援不绝，反而让我保持昂扬斗志。

胸怀坦荡 一无所惧

不知不觉，我被扣留已步入第三周，仍没人理睬我。某一天，便衣人员突然用车把我载出牢房，我有重见天日的喜悦，却不知对方葫芦里卖什么药。来到罗敏申路与丝丝街交界的罪犯调查局（CID），便衣人员才告知，我的律师要见我。那时李光耀、TT拉惹和陈维忠三位同情工人和学生的律师，经常主动免费为被拘留者提供法律服务。

来探望我的是李光耀律师，我向他简报了自己的情况，便急着向他打听消息。原来这次逮捕行动共扣留了三十多人，全是行动党和职工会干部，没有学生。《新报》已被查封，负责人傅无闷、李西浪，还有记者易润堂也都进来了。除了十余人被押於中央警署，其他都送到樟宜去。李律师说，殖民地政府为这次大逮捕行动发表了白皮书，但他没告诉我具体内容。我没追问，心想，不就是些陈腔滥调。

从调查局回到牢房，发现我有了新同伴。他是一名工人，也是行动党巴耶礼峇支部的干部，名陈悦盛，与我同夜被捕，已被拷问多次，遭遇和陈木庭相似。过了几天，他给调开了，我又陷入孤独。

进入第五个星期，仍然没人睬我。一个下午，辜加警察要我提早冲凉，我路经隔邻十一号，房里传来一片吆喝、拳打脚

踢之声，夹杂着声声哀号。冲完凉，见辜加不在场，确定十一号房没声响，我悄悄拉开门上的小窗口，一名瘦削的囚犯躺在床上。我们伏在门底下交谈了几句，他是林成业，行动党武吉班让支部的干部。他说刚刚挨揍，已不是第一次。他透露，他支部的另一负责人黄巩原，就在八号房。

我怀疑他们对我展开心理战，让两名受刑者先后与我同房，又故意让我有机会与林成业交谈，显然是对我营造恐怖气氛。可是我被锁进黑牢已个把月，他们却连名字也不问，唯一的解释是我底子清清白白，要逼供也无从着手。这一转念，想想自己本来就光明磊落，对一切也就处之泰然了。

转监樟宜 难友喜相逢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1957年10月8日），便衣人员让我换上自己的衣服，并收拾包袱。我不存侥幸心理，不相信这是要还我自由。当天中午，我果然到了樟宜监狱。这里处处铜墙铁壁，个个面孔冰冷，与我从书上所得的牢狱印象相去无几。虽然这里有点儿杀气，却不比中央警署黑牢阴森。经过一道又一道铁栅，我来到监牢登记处（Record Office），监狱官说要送我去D座，在这里我能穿自己的衣服。他还问我要吃中餐还是西餐，我不知所以地选了西餐。

走出登记处，穿过医院与教堂，再过一条长廊就到了C座与D座。站在D座铁栅前，里头闹哄哄的。狱卒一打开门，好几个人冲到我面前。记得有梁再明、林石塔、屈志明等人，他们都与我同一天被捕。除了几位还押在中央警署的黑牢，大部分人都都在樟宜D座。我还见到了林戴伟、陈世镒、陈贡元、吴文斗、陈从今、戴秋声，还有两位上了年纪的人，他们是新报的傅无闷和李西浪。从暗无天日的中央警署转到这里，这么多人相聚一起，喜悦之情，难以言喻。

D座有个大堂。大堂两侧各有一张长石桌，还有面对面的两排石椅，这是大家吃饭、学习和开会的所在。大堂外有一个我们专用的正规篮球场，尽头就是大牢的高墙。大堂与篮球场之间是“不设防”的冲凉处，十几个架高的水龙头定时为我们开放，那就是大家引吭高歌之时。大堂之上有两层楼，上百间又窄又小的囚室，晚上我们就给分别关在里边。隔天清晨狱卒来开门，一声“Muster”（集合），大伙儿就得下楼列队，让监狱官点算人数，这是所有政治犯数十年如一日的例常公事。

D座大堂里没有炊食设备，我们的伙食一概由监牢的中央厨房供给。中央厨房的一切烹饪和洗刷都由刑事犯负责。我选吃西餐毕竟没错，每天有四个鸡蛋，一大片牛油，质与量远比中餐强得多。我发现整个大堂里只有两个老报人和我吃西餐，后

来才知道，其实只有三几个人有机会选吃西餐，至于他们根据什么标准，无人知晓。

D座原本的牢友已相处整整两个月，生活早有规律。这里有提供书报，家人带来的书籍也可传阅。牢友们组织了一个生活委员会，除了照顾一般福利，重点是组织学习班、学习语文和时事分析。

1956年和1957年镇压行动下被逮捕的300余人，被关在樟宜监狱的不同角落。我们1957年进来的在D座，隔邻的C座，关着1956年被捕的人士。不过蒂凡那、普都遮里、兀哈尔和方水双等人被关在“自由营”，那是监牢附近一个不设防的集中营。二哥清祥待遇特殊，被单独关在监牢内的Refractory Block (RB)，即所谓的“顽固份子中心”。还有一些女政治犯和驱逐法令下遭受扣留者，被关在欧南监狱。

白皮书面具的背后

二战结束后，国际形势一片大好，西欧的老牌殖民者在全球节节败退，1956年苏黎士运河风暴给予英法联盟的沉重打击尤其振奋人心。牢友们士气高昂，连即将被驱逐出境者也不例外。好友林戴伟的理论水平与口才最棒，他的时事分析是D座牢友不可欠缺的精神食粮。那年苏联抢先美国成功把人造卫星

送上太空，戴伟的分析让大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当时斯大林正被赫鲁晓夫鞭尸。

整整两个多月没阅报，一到D座我就赶着翻读牢友保存的旧报纸，李光耀律师那次来见我时，曾提及政府在8月22日逮捕我们后发表了白皮书。我特意找那天的旧报一探究竟，读了立法议会辩论该白皮书的报道，发现其中不少微妙之处。林有福声称，逮捕行动是为了替李光耀保住行动党，挽救它，以免落入共产分子手中。李光耀极力否认，反指逮捕行动是为了防止林有福所控制的职工总会落入亲共分子手里。虽然双方所唱曲子不同，但是彼此表达的旨意是一致的：这是一场对共产主义的斗争！

1957年行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改选风波，知情者都明白那是基层不满当权派一味向右靠拢的结果。党内基层的激进分子决定展示力量，在党中央加强基层的代表权。原有的领导层不买账，高唱着“共产党人”夺取行动党的“阴谋论”，导致殖民政府再度为行动党“清党”。林有福心甘情愿，再度当了刽子手。

许多年后我读了相关档案，1957年8月22日大逮捕之前，新加坡总督柏列克（Sir Robert Black）致函英国殖民部大臣，声称逮捕这些人，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在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宣布独立时制造麻烦”。他也透露，“为了不要激怒华文中学

生，这次行动不会涉及华校中学生。”可是他话没讲完，就在1957年9月15日，顾合利、吴诸煌、叶汉沧、林廷铿、曾宪明、蒋石福、张国泽、刘基义等近20名华中与中正的学生相继被拉了进去。公安法令（内部安全法令前身）下抓人，可以不经审判将其长期拘留，哪里还需要看日子、需要什么白皮书呢？

回返中央警署的“第一道菜”

在D座住了一个多月，11月15日早上狱卒来相告，要我“pindah”（搬家）了。原以为是被调到监狱中的另一处，等我见到政治部便衣人员现身，才明白他们要调我回中央警署。

再度住进10号房，一切都还熟悉。肯定就要吃苦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我等三个月。其实我早想面对一切，我急想知道，到底我触犯了些什么。当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舍不得D座牢房的难友和那里的集体生活，我思念K和外边的朋友。

隔天早上辜加开了门，便衣带我出去。来到前楼，把我推进一个房间。好几个人围着一张小办公桌，坐在正中戴上墨镜、相貌凶狠的头目，自我介绍是罗警监。他令我在他正对面的椅子坐下，以毫不流利的华语指着桌上的两大堆文件说：

“老林，这都是关于你的文件和报告，你看这一大堆，我如何和你作口供？”

两旁的人不约而同插嘴道：

“聪明的话就和我们合作，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啦。”

罗警监指着其中两人接着说：“他们是小罗和小陈，人家都曾经是马共高级人员，拿过枪的，老林啊，你也不过是个小喽啰！”

又说：“其实你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否则不会请你进来。现在我们要你坦白，要你交代，只要你交代清楚，你马上可以出去”。

我不想也无从答话，因为对方讲的尽是废话。

“说说看，中学联被封后你到哪里去躲？又是谁指使你出来搞工会？”

显然他们不满意我的回答，名叫小陈的开始对我粗言秽语，当我怒目以对时，他居然劈里啪啦给了我几巴掌。我默默忍着，心想，这不过是“第一道菜”。

冰水与电刑——拷问室纪实

罗警监打开桌上的一份文件，冷笑，煞有其事地说：

“哈哈，早在小笨珍读书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就替马共做事，有没有？”

真是天方夜谭，我差点笑出声。我大声回答：“乱讲，当然没有！”

把我冷藏了三个月，连个招呼也没有，早料到他们找不出为难我的托辞，却想不到他们为我罗织如此粗糙可笑的“罪状”。在小笨珍的时候，我被公认为落后份子。现在他们居然要从小笨珍开始算账，我觉得不难应付。

他们提不出任何证据盘问我，只是任意撒网，希望从我身上套料。双方无言以对，迅速陷入僵局。罗警监令手下取走我的上衣，逼我站对冷气机，再不断地以冰水浇背，他们几个开始连珠炮式的以污言秽语，把我祖宗十八代骂光，时不时赏我几个巴掌。这些狗养的，老爱批评别人崇尚暴力，自己的手段才是百分百的暴力。刹那间，我被冻得周身发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呼吸急促。我知道哀求无济于事，只有强忍。

见我依然无动于衷，罗警监令我坐下，把我的两手拉到椅背后，扣上手铐，叫我动弹不得。他又从桌底下拉出两条状似电线的东西，其中一条往我背后拉去，像是缠在手铐上，另一条则执于手中。听牢友描述过，我知道就要受电刑之苦了。

果然，有人从我背后以布条往我头上一拉一绑，我双眼给蒙住了。接着我感觉有人以似是电线之类的条状物往我脖子一划，周身一阵抖动与剧痛。由于双手遭反绑，我无法站起来，

只能双脚乱踢乱踩。我听得到身边那些冷血动物的嘲笑声，对他们来说，这等酷刑算是家常便饭。

那条电线往我身上多处触碰，手臂、胸部、奶头、腹部、大腿和生殖器等敏感部位相继遭殃。每逢电流来袭，我周身剧烈震颤，肢体有将被撕裂的感觉。他们间隔性地用冰水浇在我身上，无以名状的痛楚，我不停地挣扎，放声嚎叫。

“老林，我看你还是合作吧，不要这么傻！”

“你何苦呢？敬酒不吃吃罚酒！”

他们连篇废话，足足折磨了我整两个钟头。等到有人为我解开那蒙眼的布条时，我早已筋疲力尽，声音嘶哑了。

我还是选择沉默。我正极度口渴。

他们见我一言不发，只好若无其事海阔天空地聊天，以打发时间。近午餐时分，才让另一名便衣人把我带回牢房。

我直奔冲凉房，打开水喉狂喝一阵，才回房去。辜加人送来午餐，我推开，我咽不下。好不容易有躺下的机会，可是全身疼痛，简直动弹不得。原以为午后他们会再折磨我，后来想起当天是星期六。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个周末，尽管身心极度疲累，我却彻夜难眠。我不知道也不去猜想，到底还有多少苦在前头等我。我怒气难消，一肚子的不服气，我忘了何谓恐惧。

你想跳楼吗？——拷问室纪实

隔天清早冲凉时，身体多处痛如针刺阵阵袭来，毛巾抹身，更难忍受。回房后我检视周身，只见被灼伤的部位有些已经结疤。

度过了平静的星期天。翌日本想求见医生，不料同一个便衣人早早便出现，在同个房间里，我们几个人又见面了。罗警监劈头就问：

“老林，你想通了没有？”

“你们谈的，都不是事实，有什么好想。”我大声回应。

他们对我在中学联和工会的活动看似没啥兴趣，提也不提。显然，他们的目的是逼我接受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以证明我应该被拘留。

又陷入了僵局。我又被令站到冷气机前，再一次接受几十分钟的冷冻煎熬。当他们叫我坐下时，原以为又要受电刑了。其中一人走近我，狠狠给我一记耳光，指着窗口吼叫：

“你想跳楼吗？你听过政治犯跳楼的故事吗？怎么跳，你懂吧，哈，哈……”我听懂他的意思，但毫不畏惧。在他们连环辱骂和厉声恫吓下，我在盘问室里度过了一天。

隔天一早，我求见医生。那名印籍医生面无表情，听取了我的投诉后也不表惊讶，他已习惯了这一切。检查结束后，我又回到盘问室。这一天他们没什么大动作，除了重复那些废话，就是辱骂和威胁，情况一如前天。

李光耀与李绍祖双双来探监

这天是星期三，我盼望父亲今天来访。前些日子每逢周三，父亲与二妹会大清早到樟宜监牢探访我与二哥。前几天我才被移监中央警署，不知今天他们来否。

近中午，便衣人终于来相告：准备见家人。他厉声警告，牢里任何事都不能讲。我表示明白，但心里早作决定，若不及时爆出去，岂不是要我继续任人糟蹋！见到父亲，我激动得说不出话，真想放声痛哭，待情绪稍缓，我才一口气说出实情。父亲红着眼眶，说立即找律师去。

午后，我又回到盘问室。罗警监嘲讽我：

“谁也救不了你啦，老林，你不合作，就死在这里头啦。”没多久，另一便衣人走了进来，和罗警监交头接耳，就把我带了出来。

他们把我载出警署，又来到罗敏申路与丝丝街交界的罪犯调查局（CID）。父亲才离开几个钟头，这么快律师就来了？果

然是律师，是李光耀律师！他带来了另一人，给我介绍，他就是李绍祖医生。我把事情经过详细复述，李律师细心记下，然后要李医生给我检查身体。记得当时李律师曾向李医生这么说过：“这大概是许启谟干的好事！”

许启谟是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江湖传言他极度敌视人民行动党，主张把李光耀等人也关起来。1959年大选前夕他出走，前往当时的马来亚联邦邦，人民行动党上台后就不再回来。李律师说他会写信给警方，提出申诉并要求调查，若证据确凿，可提控对方。

隔天，有位叫Cowan的白人高级警官来问话，说是要调查我被虐待的控诉。他毫无表情地问了几句就离开，连我身上的疤痕也不看一眼。再过几天，李光耀律师亲自到中央警署见我，建议我出面指认行凶者。李律师说警方已否认我的指控，他们声称，我身上的伤痕是自己抓伤的。中央警署的值勤医生也说，我当时的指甲特别长，而伤痕都在我伸手可及之处！既然官方的说词如此，我问李光耀律师，打官司可有胜算？李律师回说，那要看法官相信谁的话。

我不信正义能得以伸张，也担心自身还落在人家手里，出面认人后，可能招惹毒手。我急着要争取的，是阻止他们再度伤害我。考虑了片刻，我决定要求李律师为我保留提控对方的权利，希望借此牵制对方，别再野蛮动粗。

23rd November, 1957

WKL/LAY/MY

The Director,
Special Branch,
C.I.D.
Singapore.

告辞啦 黑牢

果然，他们不敢再胡来了，我感激李光耀律师及时出面，我才没有再遭毒手。

他们明知我的底子清白，似乎又不愿了结我的案子。下来的好几个星期，我几乎每天都被叫出去“上课”，听他们的陈腔滥调。渐渐地，他们对我失去了兴趣，决定不再花时间与我纠缠，但又不把我送回樟宜监牢去。我就像个包袱，被丢弃在暗无天日的黑牢里，独自度过另一段漫长的日子。

我习惯了黑牢的日夜操作，靠阅读书报度日，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活规律。就在这段期间，大哥带来了《莎士比亚（中译本）全集》，我一口气啃完它，睡觉时还把这两本厚厚的名著充当枕头。

我向李光耀律师投诉，请他设法让我回樟宜监牢，他说他只能写信要求。过后TT拉惹律师也来看我，他建议我向法院提出申诉。1958年3月初光景，在他的安排下，我到高等法院作了宣誓口供书，叙述我在中央警署遭电刑和虐待的经过。TT拉惹律师决定为我申请人身保护法令，要求法庭训令警方送我回樟宜监牢去。警方获知我的这项申请，也收到我的宣誓口供书。他们选择不等法庭处理，就匆忙把我送回樟宜。

Dear Sir,

re: Lim Ching Joo

On the 20th November 1957, the father of the abovenamed detainee saw the writer. His son, Lim Ching Joo, whom he saw at about 11.50 that morning, had informed him that he was assaulted by electric shock and by being placed in front of an air conditioner without his shirt on. That afternoon at about 5.30 the writer interviewed Lim Chin Joo together with a doctor Dr. Lee Siew Choh. We enclose herewith a copy of Dr. Lee Siew Choh's report.

Our client claims that he can identify all the five persons who were present when he was assaulted on two occasions; (i) Saturday, the 16th November and (ii) Monday, the 18th November both occasions at Room No.6 on the third floor of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building. We wish to lay a complaint before a police magistrate on this matter. We would be obliged if you will arrange an identification parade of all persons who were in the building of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on those two dates.

Yours faithfully,

Sd. Lee & Lee

c.c. to The Honourable,
The Chief Minister,
Singapore.

The Hon. Secretary,
Bar Committee,
Singapore.

Encl:

李光耀律师写给政治部主任的信，
申诉我被虐待并要求警方调查。

RESIDENCE: Dr. Lee Siew Choh, L.M.S. (S'pore)
 358-G, Duncarn Road, International Dispensary Ltd.,
 Singapore 11. 4 & 6 Hill Street,
 Tel: No. 68971. Singapore 6.
 Tel: 36550.

MEDICAL REPORT ON MR. LIM CHIN JOO

Date: 20.11.57 at 2.40 p.m.

Place: C.I.D.

Complaint: That he was shocked with electric current
 (wire attached to battery) on 16.10.57 at
 about 10 a.m.

Examination: Patient pointed to various parts of the
 body where he was electrically treated:
 Tiny and linear scab marks were visible on
 the skin on the following areas:-

- (1) Front of R. shoulder
- (2) Middle of R clavicle
- (3) Centre of manubrium sterni
- (4) R ant.sup.spine
- (5) Just below middle R inguinal ligament
- (6) Glans penis
- (7) Both sides of supra-scapular regions
- (8) R nipple.

李绍祖医生为我做的医药报告。

sd. LEE SIEW CHOH
 L.M.S. (Singapore)

20. 11. 57.

AFFIDAVIT

I, LIM CHING JOO, now detained at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Lock-up, Singapore, make oath and say as follows:-

1. I was arrested on the 22nd day of August, 1957 under the
 Preser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 1955, and was detained
 at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Lock-up from the said date of
 arrest up till the 9th day of October, 1957, a period of about
 48 days.
2. On or about the 9th day of October, 1957, I was removed
 to Changi Prison where I was kept until the 15th day of
 November, 1957.
3. On or about the 15th day of November, 1957, I was again
 removed to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Lock-up.
4. The following day, the 16th day of November, 1957, I was
 ordered to leave my cell and was taken to Room No.6, the
 Interrogation Room. I was ordered to stand in front of a fully-
 opened air-conditioner and to place both my hands on the said
 plant. At this time, I was with a bare body from waist upwards.
 It was extremely cold and it was beyond my endurance. Shortly
 afterwards, cold water was brought in and sprinkled over my
 back and front chest. This form of torture lasted for about
 20 minutes.
5. Soon after, I was hand-cuffed and my hands were placed
 behind me and fastened to a chair. Thereafter, electric wires
 were applied all over my body including my private parts (glans
 penis). At this time, I was blind-folded with a piece of cloth
 and I was unable to see the perpetrators of this electric
 shock treatment.
6. The cold torture as stated in para. 4 herein was repeated
 to be followed by the same electric shock torture. These two
 forms of torture were alternatively perpetrated on me. I was
 blindfolded whenever the electric shock torture were applied
 on me.
7. In all, I was subjected to the cold torture thrice and
 the electric shock torture was applied four times on the same
 day and these alternative forms of torture lasted for about
 2 hours.
8. On the 18th day of November, 1957, some 5 to 6 persons
 entered my room. I was slapped a few times by some of them. I
 was ordered to take off my shirt in front of the air-conditioner
 and cold water was brought in. It was sprinkled on my body and
 poured on my head. This cold torture lasted for about 15 minutes.
9. I reported the tortures inflicted on me to the Prison
 doctor when he came on his rounds on the same day.
10. On or about the 20th day of November, 1957, my father
 came on his weekly visit and I reported the aforesaid tortures
 to him and told my father to report this matter to my Solicitors.
11. After my father had left, I was taken to the Interrogation
 Room by a Police official and was ordered to stand in front of
 the air-conditioner without a shirt for about 15 minutes. Then
 I was taken to my cell. On the same day at about 2 p.m. I was
 again asked to come out from my cell by a Police official. I
 was ordered to stand before the air-conditioner. About five
 persons were present at this time. I stood before the fully-
 opened air-conditioner for about 10 minutes. I was told that my

我到高等法院所作的
 宣誓口供书。

my former Solicitor wished to interview me. I was then taken back to C.I.D. Interview Room. There I lodged a complaint to my Solicitor and also reported the tortures to a private medical practitioner who was also present in the C.I.D. Interview Room at this time. Exhibit marked "A" is a copy of the medical report made by the private medical practitioner. The Exhibits marked "B" and "C" are copies of letters sent by my former Solicitors to the Director of Special Branch and to the Chief Minister of Singapore.

12. The first phase of Interrogations lasted from the 16th day of November, 1957 until the 2nd day of December, 1957. I was again interrogated on the 21st day of January, 1958 and on the following day. I was not subjected to any form of torture on these two days. No further interrogation took place until my Solicitor wrote a letter to the Director of Special Branch on the 27th day of February, 1958 requesting for my removal to the normal place of detention at Changi. The Exhibit marked "D" is a copy of the letter sent by my Solicitor to the Director of Special Branch, Singapore. The 3rd phase of Interrogation started on the 28th day of February, 1958 and continued on to the following day. The same questions which were asked on earlier occasions were again repeated.

13. I was confined in a cell in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Lock-up for about 48 days soon after my arrest and now again for more than 100 days making my detention at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Lock-up for more than 5 months.

14. Apart from the physical tortures perpetrated on me as aforesaid, I am now going through a form of mental torture by being kept under conditions worse than convicted persons.

15. My continuous detention at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Lock-up for over 5 months is improper on the ground that it is of a punitive character.

16. I requested the Police officials to send me back to Changi Detention Centre and my requests were turned down. I protested by going on a hunger strike for about 7 days but to no avail.

17. I respectfully apply to this Honourable Court that a Writ of Habeas Corpus be issued directed to the Chief Secretary, Singapore and the Director, Special Branch, Singapore to have my body before this Honourable Court immediately after the receipt of such Writ to undergo and receive all and singular such matters and things as this Honourable Court shall then and there consider of and concerning me in this behalf.

SWORN to at Singapore this
6th day of March, 1958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C. M. Wong A Sworn
Interpreter of the Court.
Before me,
St. C. M. Wong
A COMMISSIONER OF POLICE.

This Affidavit is filed on behalf of Applicant by Mr. T.T. Rajah Advocate & Solicitor, 26 Raffles Place, (2nd Floor) Singapore, 1.

日五廿月四年八五九一

李俊英動議 政務部長依醫官意見為警方辯護

林清祥之弟林清如曾受電震酷刑



政務部長依醫官意見為警方辯護

林清祥之弟林清如曾受電震酷刑

政務部長依醫官意見為警方辯護

林清祥之弟林清如曾受電震酷刑

政務部長依醫官意見為警方辯護

林清祥之弟林清如曾受電震酷刑

4-19 設會調查虐待政治犯 李俊英動議遭否決

政務部長依醫官意見為警方辯護

林清祥之弟林清如曾受電震酷刑

1958年的南洋商報，全面報道了立法院有關設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政治犯遭虐待的辯論。

当时投诉遭电刑和虐待的政治犯包括了吴文斗、陈木庭和陈悦盛。TT拉着律师把我们的宣誓口供书传送给所有立法议员。结果，有一位独立议员李俊英在立法议院提出动议，要求设立一个独立的公开调查委员会，调查政治犯遭受虐待的申诉。辩论过程中，殖民政府的政务司否认我们的指责，并声称我们肆意诬蔑警方！李俊英议员严正指出，“这一切控诉皆系令人震撼，令我们回想起日本宪兵统治时期。我不准备说它们是真或假，假如是不真实的话，那政府更应该出来证实它们是假。政府只图否认，无济于事。设立公开调查庭是政府唯一可行之路。”

当时的立法议院为殖民政府所控制，李俊英议员的动议被否决，是意料中事。

樟宜RB 让我“思过”

1958年3月的某一天，我回到樟宜监狱，但不获准重返D座与其他政治犯在一起，我被禁锢在专门关押顽固分子的单人隔离囚室——RB (Refractory Block)。在我之前，二哥清祥已经在那里被关了一段时间，他们调走了二哥，把我关了进去。RB是关押在服刑期间违规的罪犯以及一些所谓“顽固分子”的所在。就位置而言，RB是监狱里一个受特别保护的角落，里

面分成前后两大部分，前半部有六间房，每间房正中是一张相当大的石床，石床后面是囚犯被单独关押时活动的地方。我被单独关在其中一间房，另五间空无一人。RB的后半部分除牢房外，还有行刑处。被单独关在那里的囚犯，有触犯牢规而受罚者，有等待鞭刑的囚犯，还有死囚。我住在RB前面部分，天天看到这些囚犯进进出出。

自1957年8月22日被捕以来，除了10月份有一个月左右在D座与其他政治犯同住，至今已超过半年的时间我被单独监禁。这期间虽不断严刑拷问，但始终找不到拘留我的正当理由，他们理应释放我才是。现在又把我单独丢进RB，分明是变本加厉的惩罚。当时我深信自己不会被关太久，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新加坡反殖民地斗争的局势，都给了我足够的信心，我觉得自己很快就会重获自由。我不担心自己眼前的困境，反而感到自豪，相信这一切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即将露现，到时我们政治犯个个都成了英雄。

这段期间，我大量阅读。在牢里，只要通过检查，非政治的书一概可读。大哥是我精神粮食的供应者，他知道我从小喜欢文艺，很有系统地把一些文学读物带来给我。我也下苦功自修英文，世界书局出版的《英汉四用字典》是我唯一的工具书，这本字典与我相伴多年，破旧不堪，九年后随我出狱。

《海峡时报》是我最简便易得的读物，我每天都选择一两则新闻，查明生词的意义，再通篇死背。大哥带给我一本尼赫鲁的《世界史一瞥》(A Glimpse of the World)，收集了当年尼赫鲁在狱中写给女儿英迪拉的信，以浅白通畅的英语向女儿述说历史，我几乎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时日一久，我的英文词汇丰富许多，基本语法也全都掌握，阅读与书写毫无困难，只是发音求教无门。

其他五间牢房没人居住，我有了较大的活动空间。白天他们开放我的牢房，我定时在走廊漫步，锻炼身体。也就是这个时间，我又找到了有趣的消磨时间方式——打壁虎。监狱里到处壁虎为患，我用橡皮筋做武器，香

烟盒的纸皮做子弹，打得奇准！很长时间，打壁虎就是我牢里消磨时光的最佳娱乐。

樟宜RB 我不寂寞

RB的后半牢房经常客满。里头的刑事犯出入都经过我牢房，我偶尔也会和他们聊上几句，对来自三山五岳的好汉也算多了些了解。有时狱卒会让我进去行刑室看看，那是死囚上吊和鞭笞犯人的地方。犯人挨鞭时，医生会在一旁观察。我不时看到一些刚被抽鞭的人，屁股开花，疼痛得无法穿上衣服，只能光着身子走来走去，臀部涂了蓝色药水。有时狱卒会为我指认，哪一个犯人是死囚。死囚就刑后，尸体也得经过我房门前运出去。不过那都是大清早的事，我从未亲眼见过。

几个月后，林戴伟也从D座调来RB，与我同住一室。我们相识始于泛星，前后不过三几个月，工作繁忙，我们少有机会深谈。他说五一三那年就读华中高二，原是五一三领导层的中坚份子，因为病重，被逼离校，好几年一直没有做什么。8月22日当晚，他和我同时在泛星被捕，他就直接被送来樟宜，没到中央警署受拷问，我觉得他比我幸运得多。他在中国出生，却在公安法令下被捕。调过来RB不久，他才接到通知，将他改在驱逐法令下关押，他因此面对被驱逐出境的命运。

■ 174



■ 陪我出狱的，是这本用了九年的《英汉四用字典》——它破烂，却踏实了我的心。

□ 175

1958年9月的某一天，数名狱卒来到RB，没多言，催促林戴伟收拾包袱，只说要他pindah（搬家）。我们匆匆分手，RB外头传来阵阵雄壮歌声、口号和喊叫，原来40多位在驱逐法令下被扣留的政治犯正给押出去。后来才知道他们被押到马来亚巴生港口，连同马来亚一两百个政治犯同船被驱逐到中国去。

很久以后，我听说了一些林戴伟的故事。他被驱逐到中国后，初几年在家乡厦门，继续读书，后来被派送到北京。文化革命期间，他辗转去了泰马边境，跟上游击队。至于他后来下落，朋友当中不时有各种传闻，我无法查询真假。

渐渐地我和铁面无私的辜加狱卒搞熟了。闲来无事时，我就饶有兴趣地和他们聊天。也许我能讲几句英语，监狱给我提供所谓的“红毛餐”（European diet），比起其他政治犯被分配的中餐，“红毛餐”像样得多，每天都有鸡蛋和牛油，分量也多，一个人吃不完。每天我都储存好些鸡蛋和牛油，我有个小小的火水炉，到了深夜炒米粉或做三文治，狱卒仙都尔是常客。他说以前在吉隆坡半山芭监牢当过狱卒，家住吉隆坡仙都尔路一带，大家也就这样叫他。渐渐地我们成为“深交”，他成了我在牢里牢外可靠的送信人。

感情那回事

我被捕投牢，刚满20岁，其他牢友一般比我稍大，也都是风华正茂的未婚青年，一腔热情，真心面对一切。当年搞中学联，“中学生是否该谈恋爱”是辩论会的热门议题。很多人知道，歌德笔下的痴情少年维特，为一个原不属于自己的少女殉情；但是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才知道世间有像保尔科察金那样的年青人，会为了革命而毅然与冬妮娅分离。感情与人生理想的碰撞，这就有了恋爱观这回事，有正确与不正确的恋爱观争论！

几个月前在D座和大伙儿在一起，发现好几个有女朋友的牢友情绪低落，我能了解。在泛星的时候，我知道林戴伟有个女朋友，但是他从不提起。到了RB，我们在一起，也不见他有情绪问题。倒是我，K的形象始终浮现在脑海里。

我在中学联总部工作时，曾与她有数面之缘。当时她是中华女中的一名干事，



■ 学生时代的K

高挑、清秀，气质特出，给我留下难忘印象。中学联解散后，我们无缘再见，直到我去泛星做事，命运的安排再让我们续缘。原来她父亲有间叫“日本馆”的百货公司，就在泛星会所附近。她的同学黄翠云（后来成为我二嫂）毕业后决定献身工运，在泛星当秘书，和我同事。我们有了较多的接触，不知不觉，她走进了我心里。无需语言，我和K之间仿佛都了解彼此的内心（哈哈，现在她说是我自作多情！）。

■ 178 我不知她原本想上大学，无意间叫她来为工友服务。还要她到一间离泛星颇远，位于惹兰勿刹的右派工会当受薪秘书。她来自富裕家庭，算是她老爸的掌上珠，根本不需要这份工作。但是她欣然答应了我，令我对她更为倾心。

军警包抄泛星那晚，我在黑暗中目送她远去，把呼唤积压在心里。我已遭囚一年有余，我想念的人，究竟怎么样了，她会不会等待我？我不免心生烦恼。毕竟，失去自由之前，我还来不及说出那神圣的三个字。狱卒仙都尔帮我信外递，但是，传出容易传进难，我始终没有接获回音。

虽然时感烦闷，还不至于垂头丧气，感情的事拖不垮我。我早睡早起，学习与运动，都严格遵守自己定下的日程表。初中三那年，曾经暗恋班上一位女同学，她发现后居然与我白眼相对，还在我面前故意和另一位男同学亲热，滋味既苦也酸。感情的事，还算是有点小经验！



■ 1957年初林有福政府与陈六使交恶，教育局以密函警告陈六使，指责他3月21日主持华侨中学国专图书馆开幕时的致词具政治意味。4月6日华侨中学董事部假怡和轩开会，陈六使公开否认教育局的“密函”指责。出席会议者有杨瓚文、黄桂楠、高德根、林庆年、潘国渠、黄奕欢、莊丕唐、郭珊瑚、郑天赐、张梦生、叶庆贺、郑安仑。

照片提供：

Nayang Shang Pau©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大牢幸会庄竹林、林建才

跨出RB，就是监狱特设医院，是犯人病痛时寻医求助的地方。医院楼上分两部分，前面是供犯人祈祷的小教堂，后面是另一间房子，被权充牢房，时有三两个政治犯被关在这里。我被关在RB期间，吴文斗、易润堂、朱然和庄竹林相继被关进这小牢房。庄竹林校长那副落寞的神情，我无法忘怀。庄校长当时是中正中学校长，我被捕一个多月后，他在驱逐法令下被扣留。好几次我路过医院走廊，恰逢他从小房间下来，在医院一旁的草场散步。当时，凡是在驱逐法令下被扣留的人，都被当成刑事犯，监牢有条文，规定驱逐犯得穿上刑事犯的制服。他个子高高瘦瘦，穿上囚服，有空荡荡的感觉，五十来岁的人，在这空气凝固的空间里，默默无语，与我招一招手，仿佛都很勉强，我油然而生无以名状的心酸。档案资料显示，庄校长被扣留不只是因为他同情当时的学生运动，更重要的是他与陈六使关系密切。他和陈六使同是创立南洋大学的核心人物，也是当时为华文教育奔波最卖力的人。林有福领导的劳工阵线政府沦为殖民统治者的傀儡，首席部长林有福及教育部长周瑞麒后来与陈六使交恶，本来也要将陈六使逮捕，与庄竹林一起驱逐出境。后来发现陈六使有英籍民身份，要驱逐他出境得先取消他的英籍民资格，而要取消他的英籍民资格就得通过伦敦的殖民部，为了不去惊动殖民部上下，决定暂时作罢。

1957年底，政府实行新的公民登记，合格的市民都纷纷登记为公民，陈六使虽然合格，有关部门却被指示拖延他的登记手续。到了1958年初，新宪制下的大选即将举行，但林有福为殖民政府充当了几回打手，威信扫地。殖民政府曾尝试促使行动党与劳工阵线联合组成“社会主义统一阵线（United Socialists Front）”，以共同对付左翼势力的威胁，但最终无法如愿。

林有福政府转而积极拉拢陈六使等华人社会上层人士，希望挽救垂危的政治生命。总督顾德和周瑞麒双双出席1958年3月的南洋大学落成典礼，在致辞时赞扬陈六使的办学精神。陈六使的公民权登记随即获批，而庄竹林也在1958年7月被释放，另一位华社领袖陈岳书的女儿陈蒙鹤也同时获得自由。由此可见，庄竹林的一抓一放，实为一种政治交易。

庄竹林一走，我立即被调出RB，搬进他腾出来的小牢房。原来，他们需要用RB的空间关押另一名重要政治犯——林建才律师。林建才是前马来亚劳工党领袖林建寿的兄长，英国剑桥大学出身的律师。1945年他和朋友创立了马来亚民主同盟，这是新加坡史上第一个要结束殖民地主义的政党，成员纯是受英文教育的精英分子，如约翰·伊峇、沙玛、沙末依斯迈、余柱业、蒂凡那等。比起后来的人民行动党，民主同盟更早致力于

争取新马的独立。英国人觉得这是一批不会与它妥协的民主人士，于是毫不迟疑打压它，把民主同盟解散了，1951年还扣留了约翰·伊峇、沙玛、蒂凡那、沙末依斯迈等领导人。林建才侥幸漏网，他潜逃到北京，并在北京广播电台工作了七年。

1956年马绍尔到北京访问时与他会面，相信他并非共产党人，也不再参与政治活动，答应安排他回来。他在马来亚的亲人与即将成为马来亚首相的东姑·阿都拉曼关系也不错，力主他回去。林建才回国时途经新加坡，马绍尔已下台，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长，结果林建才被拘留，来到了RB。

因庄竹林的离去，我戏剧性的成了医院上方小牢房的住户，不久来了同伴，是前中正学生洪金珠和徐金聪。林建才从RB的牢房每次进出都会看到我，久了，他知道了我的身份，偶尔就过来和我聊上一两句。他知道我们这些牢友都是行动党的支持者，都在等待迎接胜利。有一天，他非常直接地对我说：“不要太相信那些人啦！”事情很快得到印证，林建才所言属实，深烙在我脑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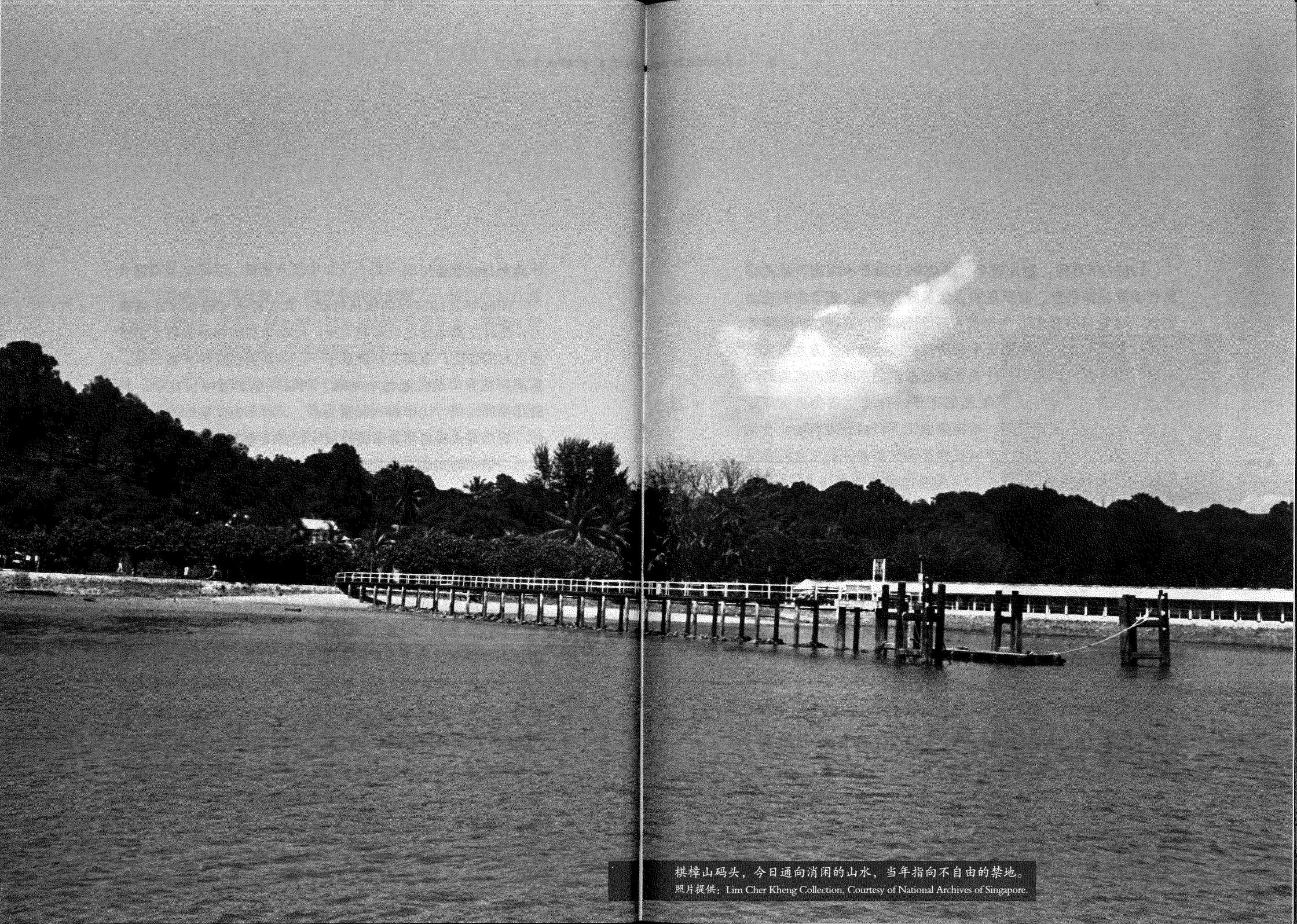
1959年新加坡大选前，林有福政府释放了林建才，他立即离开新加坡到马来亚。档案资料显示，当时亲人民行动党高层领导的劳工阵线人士和政治部英籍长官对林有福释放庄竹林、陈蒙鹤和林建才的决定，有所不悦。

行动党上台不做人

1956年及1957年的镇压行动，大大打击了新加坡左翼势力。当时左翼地盘足以影响大局，行动党高层领导表面上仍然摆出左的姿态，事实上却表里不一，尽其所能扯林清祥后腿。林清祥在党内地位超越李光耀，1956年选举党中央代表，林清祥得1500票，比李的1400票为多。1957年宪制谈判接近尾声时，居然有人提出附加条件，规定政治拘留人士不能参加在新宪制下举行的大选。消息公布后，李光耀高声抗议，并说若不取消这条文，谈判就破裂。而谈判并没有破裂，附加条件依旧保留，在新宪制下，1959年的大选林清祥与他的伙伴被剥夺了参选权利，从此被排挤出即将掌握政权的自治政府。

1956年林清祥被捕后，被有组织地孤立。他被单独监禁一整年，同个时期他的战友蒂凡那、普都遮里、兀哈尔、方水双、曾超卓等人却一起被关在自由营，李光耀定期与他们会面。等林清祥于1958年从RB被调到自由营时，李光耀与蒂凡那已经在许多方面取得默契，包括他们几个人在获释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行动党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立场，以及上台后如何处理政治拘留者的问题。

林清祥看得出事情的微妙变化，虽然他觉得应该同时释放所有政治犯，也不赞成在未恢复自由前就发表声明，但他一向来尊重蒂凡那，因此决定与大家步伐一致。



棋樟山码头，今日通向消闲的山水，当年指向不自由的禁地。
照片提供：Lim Cher Kheng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1959年5月间，新加坡举行新宪制下的首次大选，一般预料行动党稳操胜券。监狱里的官老爷看风转舵，把政治犯视为贵宾，尽量讨好我们。大选前夕，所有政治犯获准集聚D座，与自由营的林清祥、普都遮里、蒂凡那、兀哈尔、方水双等人会面。林清祥告诉我们，行动党只要求殖民部释放八名与行动党中央有关的人士，若殖民部不肯，行动党不会出面组织政府。至于剩下的政治犯，李光耀承诺上台后分批释放。他们八位出狱时，将发表联合声明支持行动党的非共民主社会主义立场。

大家听后觉得内有玄机，还是决定信任领袖，听领袖的话。我找了个机会问林清祥，李光耀如何保证会分批释放其余政治犯，他说有书面保证，由蒂凡那保管。

6月4日大选结果，行动党获胜，隔日林清祥等八位人士像英雄般步出樟宜监狱大门。我们听得到外面群众前来迎接英雄的响亮欢呼，但是群众不知道，还有另一批人被困墙内，前途茫茫。

蓝天碧海棋樟山

1959年6月15日，我和孙罗文、卢大通、邱有才、顾合利、陈文英、吴祝保、徐金聪、林星隆、陈悦盛、陈木庭、吴耀成、王钦、林安沪、蔡文洪、黄清汉、林亚才、洪金珠、谢瑞怀等

26人被押上囚车，离开樟宜，往市区方向行驶。沿途处处是大选期间留下的形形色色标语布条，飘荡着人们为新中国到来而欢腾的气息，而我们这群为追求新生而丧失自由的人，却身在囚车，往不明确的方向前进。多年后翻阅档案，原来内部安全委员会把我们26人做出这样的分类：“16名是死硬共产党人，6名可改造者，其余只是同情者”！

不知不觉来到红灯码头，我们被押上渡轮。从渡轮上回望新生的岛国，几许期望几分失落。约45分钟的行程，渡轮把我们载到了南部岛屿——棋樟山。一望无际的大海，是久违了的景色。岛上四周有不少别墅，那是殖民地长官度假的地方。岛的中部有几座兵营式平房，原是检疫中心，早年南来移民在登陆本岛



■ 比起樟宜监狱的铜墙铁壁，这面铁丝网人性得多了。

满以为自由就在眼前，
我们认真学唱《Maju-lah, Singapura》，
也不忘游玩嬉戏。



前，必须先到这里接受隔离检验。现在，这个地方成为违法吸鸦片者的拘留所（Opium Treatment Centre或OTC）。

我们被安置在一个围着铁丝网的临时拘留所，它靠近OTC，是一座陈旧的建筑物。这里有十几个房间，我和林星隆同住2号房。一个颇大的食堂，食堂周围是厨房和公厕。建筑物盖在斜坡上，躺在睡房里，望出去是蓝天碧海，景色宜人。斜坡下另有几间小屋，是守卫人员的休息室。除了拘留所大门驻有守卫，所里没有其他守卫人员。

来自政治部，负责把我们从樟宜监狱带过来的林警长介绍OTC的吴主任给我们认识，我们生活上的一切事务，都由他负责管理。他上头有个叫Major Hill的总管，不过我们来没多久他就离开了。吴主任告诉我们，每天承包商会把鱼、肉、蔬菜和水果送来，一切炊事、洗衣和卫生工作等拉杂事，由我们自己打理。我们可以集体或分批到海边游泳，或到OTC打篮球，也可在岛上四处溜达，但每一次都得由守卫人员陪同。同在樟宜监狱那样，我们组织了生活委员会，分工负责各项事务。

在樟宜监牢，由于有清晨排队点算人数的规定，必须早起，棋樟山没这玩意，我们得以迟起床。最初几个星期，这一点一滴的自由，感受还是美好的，但我们似乎也渐渐失去了方

向，天真地相信一切，接受一切：人民政府诞生了，是配合政府开始承担建国任务的时候了！

总理走访拘留营

赛益·朱比赛编撰的国歌《前进吧！新加坡》，我们很快便学上手。新国旗的设计公布了，尤素夫·依萨克被委任为第一任自治邦元首等新信息不断进入我们的视线，随着元首宣誓就职，我们在食堂挂上元首伉俪的玉照，也在食堂大门口立了旗杆。每天晨操前，没有人要求，没有人强迫，我们很主动地唱国歌，行升旗礼！有一回，来自中央医院输血组的人员来向烟霞客抽血，应吴主任的建议，我们也排队为国家献血！我们这一群牢里的人，居然比谁都急着要表现对新生国家的效忠，回想起来，可笑得很！

李光耀和蒂凡那是棋樟山熟客。1950年蒂凡那、约翰·伊峇和沙末依斯迈等民主同盟领袖被英国人逮捕，就拘留在此，李光耀是他们的辩护律师，因此来过棋樟山。距离拘留所不远的地方，有一所面海的度假别墅，自治政府成立后，成了行动党要人休闲的地方。

当上自治政府总理大约一两个月后，李光耀来到别墅度假，顺便过来探望我们。兴奋、激动和期望，我们热情地欢迎

李总理到来。令我们失望的是，在近一个小时的交谈中，李总理没有明确表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去。他重复向我们解释，权力操在由英国、新加坡、马来亚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他提起八大领袖的释放和他们出狱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暗示我们自己必须作些努力，方便新加坡政府争取释放我们。过后，他把孙罗文叫到一边，谈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李总理的来访和谈话，在我们当中引起不小骚动，有些人感慨愤怒，认为行动党政府准备背信弃义，有些人开始动摇，认为是选边站的时候了。

总理到访后不久，有一天吴主任忽然来报告，安排我们出海到安乐岛去，与岛上的犯人比赛篮球。安乐岛是流放私会党徒的地方，离开新加坡本岛有一个多小时航程距离。那一天，我们二十几人从棋樟山出发，兴高采烈来到安乐岛，直到傍晚才兴尽而归。没过几天，吴主任告知，当局派了个福利官员到拘留所驻扎，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与他商量。福利官天天坐在食堂里，初初我们心怀感激，没多久便发现来者不善，没必要的话我们就不到食堂去，呆在房里聊天。

敏感的文洪怀疑天花板有东西在走动，说可能有蛇。他自告奋勇爬上去，一不小心失足踏穿天花板，整个人掉下地，而被穿破的天花板露出不寻常的电线。陈文英谄电器，觉得事有

蹊跷，不声不响提了个半导体收音机到户外绕了一圈，神色凝重对我说，天花板上有窃听器。我们先后探头上去看看，果然发现两个小黑箱，分别放在孙罗文和我睡房的天花板上。

陈文英叫几个人在我房里讲话，然后提了收音机，带大家到食堂去，收音机清晰播出我房里人的谈话。在场的福利官装蒜，一副懵懂模样。我们据情报告吴主任，隔天就有一个我们相熟，名叫阿牛的政治部杂工大方向来把家伙撤走。从那天起，福利官就消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安排我们到安乐岛去，正是为了方便他们安装窃听器。

不是自己的政府吗？还来这一套？

我给总理写封信

1956年，孙罗文等人被捕，两年的拘留令早已到期，也给延长了。我和另几人于1957年8月被捕，两年的拘留令就快到期。当时大家这么想，既然不能做到取消拘留令、恢复我们的自由，拘留令到期了总该放人吧？难道行动党的政府长官会签得下令状延长我们的扣留期限？

拘留令到期前几天，我们几乎天天缠着吴主任，打听动静，他总是乐观地对我们说：“到那一天，我会很高兴让你们回家啊！”这儿原是鸦片烟客的拘留所，因此吴主任没有看管

政治拘留者的经验，不知道拘留令可以一延再延。他或许也暗忖，行动党政府怎会签发令状继续拘留“自己人”。

就在拘留令满期那一天下午，政治部人员终于出现，来人是我们叫他老关的警长。他一看到我，就高声叫我把陈木庭、吴耀城、屈志明等七八个人找来，有点趾高气扬地对我们说：“我代表人民政府，哎呀，不就是你们的政府吧，你们的拘留令被延长六个月，这是部长王邦文签发的拘留令。”我们心里早有怀疑，对于继续被押禁不太感到意外。只是看到拘留延长令居然是“自己人”签署，难免有些痛心。

已将近三个月了，不仅无人获得释放，反而是拘留令被延长了。疑虑与迷茫交织，拘留所里士气日益低落，开始有人觉得我们应该有所行动，譬如说学八位领袖那样，写个声明对一些问题表态。几经讨论与争辩，决定由我执笔，就民主社会主义、国会民主制度、行动党政府等问题写了一份内容与八大领袖声明相似的声明，大家毫无异议，签了名，寄了出去。

1959年底的一天，蒂凡那、兀哈尔等人来见我们。他们说，李总理接到我们的集体声明后，表示没有多大价值，最好是个别写信表态。坦白说，我们那时还没有理由怀疑新政府的诚意，大家都急着出去，也就决定根据已经签发出去的集体声明，个别再度表态。



棋樟山守望自由的日子近了，却又远了

——殖民地政府签发的拘留令到期时，人民行动党新政府的内政部长却签名延长它，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蒂凡那来访那天，他把我拉到一旁，批判了1957年行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改选风波，我明白他的意思，我需要表态，需要解释，为什么我会在那次选举大会出现。

我相信蒂凡那等人是诚意来帮助我们的。既然我与事件无关，也毫不知情，在当天大会出现确实不明智，难免会引起各方不同的解读。我在给总理的信里，批判了“左倾冒险分子”，也对于自己在当天的大会出现表示遗憾。我万万没料到，我不但没有因此获得自由，人家反而利用我的信去达到本身的政治目的。隔年发生王永元事件，李光耀于1960年8月3日在立法议会辩论时，把我写给他的信念了出来。我是太天真了，根本不知道人家是怎么玩政治的。

K说：“我会等你。”

行动党上台后立即把我们从樟宜送来棋樟山，应该是个明显的讯号——我们还得上在里头长呆个时候。拘留所的条件还算不错，我开始考虑，该如何利用时间做些事。从小我就希望能好好受教育，几番辗转，好不容易才到华中修读高中课程，但高中还没毕业就被教育部开除了，从此深造无门。透过吴主任的安排，我和吴祝保、谢瑞怀等人报名参加了1959年底的高中会考和剑桥九号文凭考试，结果我双双告捷，而且成绩亮眼。

我和谢瑞怀决定报名南大，希望翌年（1960年）开学前能获得释放，前往云南园追梦。

1960年农历除夕下午，拘留所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吴主任奉命宣布，大家可以回家过年，年初三“回巢”。

我不知家在哪里，只知道父亲、大哥就住在后港四条半石，武士革路姑妈家附近。幸好我有他们的电话，到了武士革路口的一间咖啡店，我借了电话报信，弟弟出来把我带回家。那是富安路一间非法搭建的锌板排屋，那个年代，这类非法建筑比比皆是。一进门是小客厅，然后就是两间不设窗口、密不透风的小卧室。尾端是厨房，厕所就在一旁。厕门一开，臭气扑鼻而来。父亲、大哥、姐姐和弟妹通通住在一块，这就是我们在新加坡的家。

姐姐当家，负责一切家务。我到家时，她和其他弟妹已回小笨珍。母亲一直守住小笨珍老家，那是一间杂货店，是我们林家的老本。父亲当时在新加坡一间树胶厂当书记，放工回来看到了我，还以为我获释了。大哥在南大图书馆任职，还没回家。本来爸爸、大哥和弟弟也打算较迟时回小笨珍团圆，我的出现使他们改变计划，留下来陪我过年。倒忘了那个年是怎么过的，只记得当时恨不得马上见到K，但是想起音讯断绝已有一段时日，还是不敢冒昧行事。一夜忐忑，真是难熬的大年除夕夜。

大年初一，一早二哥就来电，说中午会过来。时间一到，大伙儿果然来了，多是工会的人，K也来了。她坐在一角，头上仍扎着两条长长的辫子，我和她打个招呼，不好意思多说话，就回头和大伙儿闲聊。没多久，同来的黄翠云谈起二哥等人刚被委任为政治秘书，总理形容他们是政府与人民的桥梁。然后她低声对我说：“我作你的桥梁，今晚请你们看戏！”

当晚应约来到大坡大华戏院门口，见到二哥、黄翠云和K。进了戏院，我和K相邻而坐，银幕上演的是半夜场喜剧《五朵金花》，但精彩的剧情压抑不了我紊乱的思绪。这不正是我千盼万待的时刻吗？我岂能强装若无其事？电影接近尾声时，我开口了：“好久不见了，等下我们找个地方谈一谈，好吗？”

我们来到美芝路一间“伦章”字号的三层楼旧店屋，从边门拾级而上，来到了三楼的前房。K说平时就和另两个女同事住在这里，周末或节日才回妈妈家。K的冷静令我紧张，结结巴巴地我把心事说了出来，她始终保持微笑，然后说：“我看我们是可以在一起的，我会等你！”我内心的喜悦不言而喻，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第二天大年初二，她陪了我一整天。深夜分手，想起明天就得“回巢”，有“彩云易散，皓月难圆”之感。

总理要给我“奖学金”

谢瑞怀和我同时接到南大的录取通知。我们分别写信给内政部，要求能尽早获释，让我们及时报到上课，可是音信如石沉大海，我决定把此事搁置一旁。谢瑞怀的父亲向记者放话，希望儿子不会丧失求学的机会，导致总理公署政务次长陈新嵘发表长篇声明，不但把责任推给内部治安委员会，还要政治犯“自己努力，帮忙新加坡政府争取内部治安委员会释放你们自己”。

不久，总理第二次来探望我们。像上次那样，他在饭厅对大家讲话，同一套老调，把责任推给英国人和联合邦政府，还要我们相信，行动党政府一直在为我们争取自由。过后，他找孙罗文和我个别谈话。他先到孙罗文的睡房前与他谈了一阵，再示意也要和我谈谈。

我把总理带到山坡下一间空置的守卫室里，那天他穿短裤，着运动鞋，在坐下之前他说要小便，我说厕所在山上，我们小便时都靠着树头。总理毫不迟疑拉起裤脚，在最靠近的一棵树下办了事，这一个动作无形中把我们的距离拉近许多！坐下后他说收到我的信，相信我是真诚的，问我出去后做什么？我说想去念书，他说：“要念书？好，我安排奖学金给你去国外！”“去哪个国家？什么奖学金？”“科伦坡计划奖

学金，去纽西兰。”当我表示需要时间考虑时，他显得有点不悦，他要我当场决定。这是我人生大事，我不想草率，还是坚持要时间考虑。一两个星期后，我写信告诉总理，说我接受他的好意。他的秘书回信说，会尽早安排，但得先咨询内部安全委员会。在几个月里我连续写了好几封信，总是没下文，最后是不了了之。

多年后（1967年），在当时的新加坡大学演讲时，李总理居然说那年到棋樟山见我，建议给我奖学金到奥克兰大学读法律，我却拒绝，因为我只是想进入新加坡大学。“他想到新加坡大学来，不是真的要读书，而是要搞革命。”他先颠倒是非，再美言几句：“他后来在监牢里读法律，无师自通，考获伦敦大学（校外考试）法学士文凭。他曾是聪明的人——现在还是。”²

李总理一年内二度造访，不能说他不关心我们，但是我们不清楚他心里对我们这群人的真正想法，只能凭外面局势的发展做些猜侧。

王永元原为李光耀亲信，1957年至1958年他出任新加坡第一任民选市长，表现不俗，声望可说盖过李光耀。根据《白衣

²《海峡时报》（星期日）8-1-1967 页1

人》一书作者透露，1959年行动党大选获胜后，推选总理时，王永元在党中央所得票数和李光耀一样，后来杜进才行使主席权力多投了一票，才让李光耀当上总理，而王永元则出任国家发展部长。李、王之间有心病、有矛盾并不叫人意外。自治政府成立初期，实行了一些令白领阶层不悦的措施，又对强大的左翼势力提心吊胆。王永元终于决定炮轰党中央，在1960年6月行动党常年大会上，提出著名的芳林支部16项动议，其中包括要求党不背离建党宣言，恢复职工会注册，释放政治犯等吻合左派人士诉求的动议。常年大会辩论的结果，王永元被开除出党，导致后来的芳林补选。

该如何看待王永元事件？这事件的发展将如何影响我们？我们在拘留所里的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心里多了一层负担。

拘留所里学习马来文

行动党上台后，宣布马来语为国语，掀起一阵学习马来文的热潮。成人教育局在全岛各处开班教马来文，也定期主办考试，颁发证书。我们在拘留所里也热烈响应，由成人教育局派来的曼梭老师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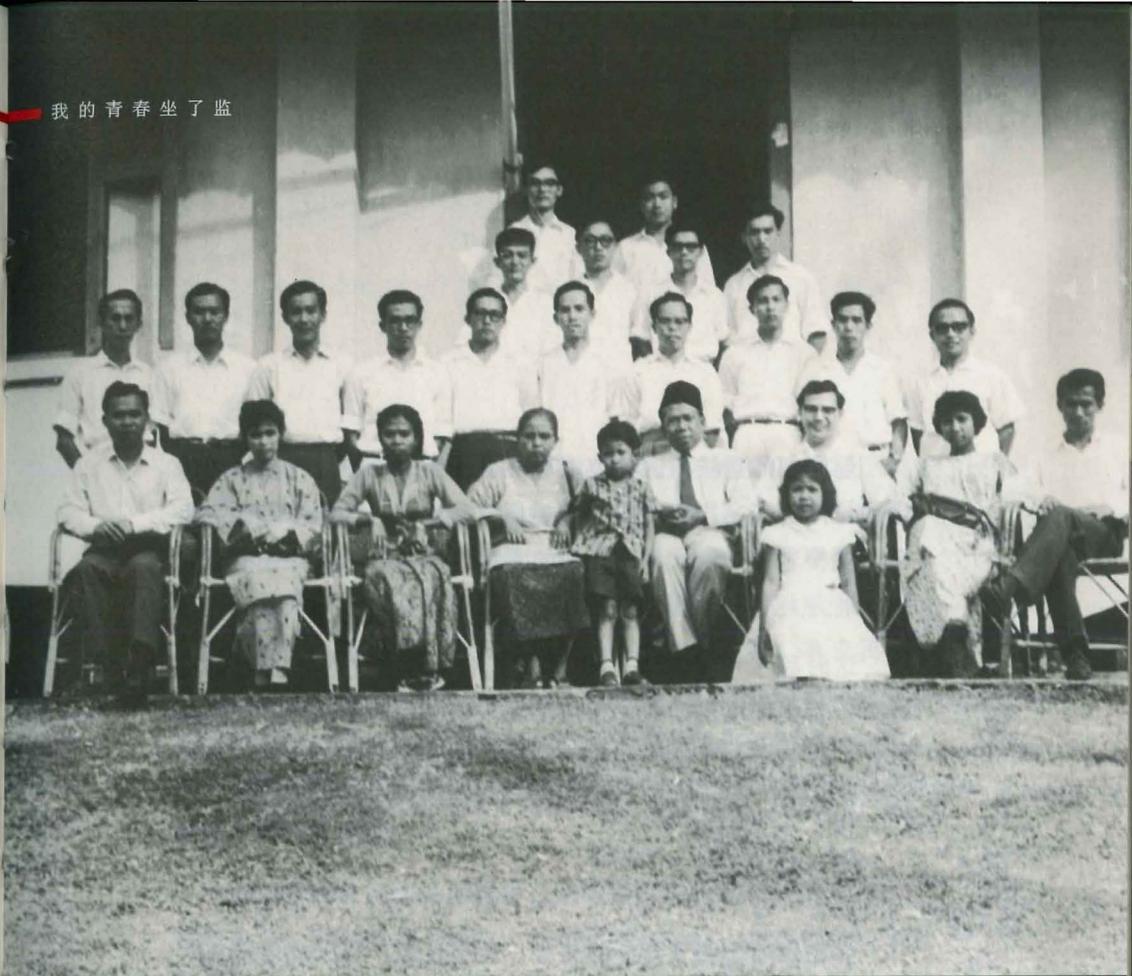
我在联合邦的甘榜里长大，有不错的马来语根底，学起马来文驾轻就熟。我花了半年多，一口气考取成人教育局第一、

第二和第三级文凭。之后又学爪夷文，考获爪夷文文凭，看得懂爪夷文版的马来前锋报，感觉很满足。

提起学习马来文，当年的同伴都有难忘记忆。有几个工友出身、年少时没受多少教育的同伴，像卢大通、林安沪、邱有才等人，学起马来文特别有心得。他们狼吞虎咽似地读完随手拈来的马来文书籍，报刊更不用说了，学习欲望与能力之强，令我佩服。日常生活中，我发觉大家更喜欢用马来语交谈，看来我们这些人与生俱来就有马来亚意识。

■ 202

棋樟山生活片断——马来同胞过年，我们设茶会招待马来老师及其家人。



曼梭老师是棋樟山英校的马来文老师，一家人住在学校周围的一间房子。拘留所的生活委员会常举办集会，借以调节生活。曼梭老师一家大小是我们的常客，他儿女的歌舞表演或班顿朗诵为大家带来不少欢乐的时光。

这时除了中英文书，我也读了不少马来文著作。我特别喜爱一部由印度尼西亚作家阿都姆依斯撰写的小说《错误的教养》，把它译成中文。后来大哥把它拿给人民行动党的《行动周刊》连载，稿酬颇丰，部分解决了日后我攻读法律的费用。

好心肠的吴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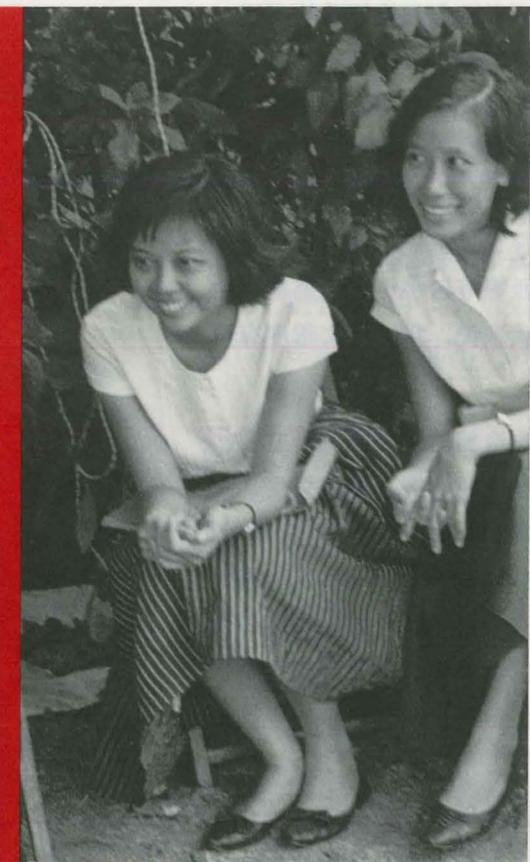
吴主任是个四十开外的文官，注重仪表，每天衣着端庄，鲜艳的领带，光亮的皮鞋。然而他从没摆官架子，满脸笑容，很友善地对待我们。他就住在拘留所隔邻的一间洋楼，依山面海，波光粼粼，尽收眼底。

吴主任是个虔诚的教徒，一开始似乎看准我为目标。他知道我一直在学英文，主动要当我的老师。一天傍晚把我叫到他家去，拿出一本圣经，放在我手里，说这是最好的英语读本。我的确要搞好英文，心想这何尝不是一个难逢的机会，决定听他的。

从此，每星期总有三两个傍晚，有机会在他舒适的客厅，一面跟着他念圣经，他认真地纠正我每个字的发音，一面听他叙述书中细节，心里不由为他对主的虔诚所感动。客厅外，夕阳下海景秀丽，忽而柔和微风伴着浪花细语，忽而疾风夹杂万马奔腾般的怒涛咆哮，我真要相信是神创造了万物。本来我只听过圣经里的亚当、夏娃和挪亚，跟了吴主任一些时日，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和摩西等等名字也逐渐熟悉。主的故事有它吸引人的地方，不过对我来说，我的英文程度有所进步才是最重要的。

每个星期我们会见家属时，由政治部的林警长负责监视，日子久了，大家都成了朋友。他和吴主任一样，是英校生，大概是剑桥九号文凭毕业生吧。行动党上台后，像他们这种白领人士感觉不安。首先，马来语成为新加坡国语，要升官得先考马来语，林警长考了两次还不过关。一起聊天时，吴主任常透露，他的愿望是考个经济荣誉学位，林警长只希望能有个学位，方便转行。我心想，他们为生活拖累，要读书谈何容易！如今我有大把光阴，岂能不善加利用。

有一天，生委会问吴主任，他是否能把我们的伙食预算，以现金支付给我们，由我们自己向承包订伙食，吴主任欣然答应了。于是“明天该吃什么，后天该吃什么”，凡想得到的都



■ K的辫子不见了，我印象深刻。右为黄翠云。

列入了菜单，生活因而添加几分乐趣。由于精打细算，伙食费总有余额，我们得寸进尺，要求他让我们过海，到红灯码头附近购物。好心肠的吴主任，真的不懂得说“不”，有一回竟然让守卫陪我们渡海，到真者里巷（Change Alley）一带，像游客那样购物！

“怎么，你急着出来是吗？”

1961年初，农历新年前几天，拘留所里喜气洋洋，大家等着回家过新年。有家小的盼望那顿团圆饭，有女朋友的就如牛郎等着会织女。午后过海，坐的士来到武士革路口，我在就近的咖啡店摇电话到K家里。接电话的正是她，显然她早在家等候。她说已约定一起和二哥、方水双和他太太陈丽英吃饭，然后去看半夜场。

我先回到武士革路父亲家，家没有大变化。对家人来说，我的归来算不上喜事。最近父亲探监时开始发牢骚，想到三两天后还得送我回去，这一聚一散只能更令他老人家发火。

忘了怎么来到二哥住的地方。那是剑桥路（俗称白桥）的一间单层新洋房，二哥和方水双夫妇合租的。不久，K到了。她的辫子不见了，秀发下黑眼珠溜溜转，一袭浅蓝衣着，真美丽！我们五人分乘两辆的士来到小坡二马路的一间餐馆，饭后K和我径自离开，漫步到大马路的奥迪安戏院，看半夜场《甲午风云》。

戏院里，我们谈到王永元事件。K问起我写给李光耀总理那封信，说我的信被公开了，很多人对我有意见。我只简单回应，没有也不需要作太多解释。初一早上，二哥带了几个朋友到父亲家探望我。聊了一阵，一位前中正同学突然站了起来，走到我身边，以半嘲弄的口气问我：“怎么，你急着出来是吗？”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显然对我写给李光耀的那封信不以为然。脸红耳赤是我当时很自然的反应，我默不作声。

我不想再见任何人，剩下来的一天半，我一直和K在一起。她说工团与行动党的关系紧张，王永元的芳林16提案把工团置于被动地位，二哥林清祥等人左右为难。K很悲观，情绪也低落。到底我还得在里头呆多久，我们一点把握也没有。我

说很想争取得出国读书，K表示同意，她自己也有再去读书的念头。初二午后我们到勿拉士巴沙路逛书摊，K买了两本英汉字典给我。

年初三，一早二哥来送行。父亲见到他，提议一起到后港四条半石的李美影室拍张合照。合家欢？其实也只有父亲、大哥、二哥和我，母亲和其他弟妹都在小笨珍。想起了她，已近五年没见面。妈妈，是个倔强的妈妈！

像准备回巢的小鸟，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上渡轮，木然挥手向岸上送行的家属告别。岸上的人依依不舍，渡轮上的我们垂头丧气。一路上大家默默对坐，无语。

回到拘留所里，士气低沉。大家心里明白，行动党一上台，当权派显然下了决心，要把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人士拒于权力中心外，当权派与左派人士的分裂终究是迟早要来的事。

隔海遥见 政治硝烟起

1956年林清祥在党中央选举时高票中选，被委任为助理秘书长。蒂凡那、方水双等人也是中央委员会成员。然而，1957年新加坡宪制谈判代表团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的新宪法，居然蓄意规定条款禁止林清祥等人参加在新宪制下的选举。1959年6月4日林清祥等八位领袖获释前，行动党领导层匆匆赶在5月31日



■ 过了年初二，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登船，挥别岸边的亲友，背着自由的方向远去。



大年初三，我准备回棋樟山拘留营，二哥一早来送行，父亲把握当下，提议一起到后港四条半石的李美影室照相留念——父亲坐前，大哥站立右边，我在左侧，二哥居中。



那年，母亲（坐者）与其他弟妹在老家小笨珍过节，也照相留影。

（即5月30日大选后隔天），假福建会馆召开大会选举新中央委员，把林清祥等拒于党外。林清祥等人获释后，被委任为有名无实的政治秘书。林清祥等人虽然也回到密陀路的工团，已经倒向领导层的蒂凡那却被委以重任，出面组职工总会，林清祥等人被迫靠边站。

行动党上台一年有余，本来是开国元勋之一的林清祥对政府施政方针根本就没有发言权。林清祥和他的朋友被视为党内异议份子，是左翼人士、是“亲共分子”。他们只能当应声虫，没有伸展力量的空间。在行动党领导层心目中，牢里的我们必定是林清祥的忠实跟从者。因此故意不给人，一来考验林清祥对领导层的效忠，二来离间林清祥等人与他们的支持者。我们成了他人的政治筹码，如今王永元冒了出来，局势变得更加微妙。

就在这个时候，孙罗文不止一次对我说，新年期间他在外面时，朋友劝告他：“必要时宁可倾右，倾右后要转左容易；从左转右会比较难！”很久很久，直到今天，我还是摸不透个中奥妙！

4月芳林补选，王永元以芳林16提案为口号，高票击败了行动党的易润堂。这回补选，林清祥等人公开支持行动党，我们在牢里的人有点儿摸不着头脑。1959年的大选，行动党靠

左派势力支持，击退右翼的人民联盟和自由社会党，得票率不过54.1%。上台后因取消公务员津贴进一步召致公务员不满，政权尚未巩固就遭王永元的夹攻，政权其实摇摇欲坠。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势力现在决定不与王永元联手，转而继续力挺当权派，当权派不仅不领情，反而相信左翼人士非有他们这把“安全伞”不可。左翼人士的态度，为后续发展埋下伏笔。

芳林补选过后，有一次二哥来探监。我问起左派在芳林补选的立场时，二哥说为了反殖民地运动的团结，工团号召人民继续支持行动党。然而，行动党领导层却把芳林补选的失败归咎于工团，把气泄在左派人士身上，屡屡威胁放弃政权，要让英国人吊销宪制，然后收拾左派人士。

万没想到，安顺区行动党议员巴哈鲁丁不幸逝世，导致另一场补选。就在这个时候，东姑·阿都拉曼突然提出建立一个包括马来亚、新加坡、北婆罗洲三邦的大马来西亚。新马合并本来就是行动党建党时宣布的奋斗目标，但东姑向来反对新加坡回归马来亚，因为他担心华族人口为多的新加坡会削弱马来人在政治上的优势。而今他竟然改变了态度，内中必有玄机。

对于正在为如何铲除左翼势力而烦恼的行动党领导层，东姑的建议显然具有吸引力。林清祥等六位工会领袖看透背后的阴谋，发表声明反对东姑的建议，但同时号召安顺选民支持行

动党。安顺补选行动党又告失败，马绍尔击败职工总会主席马末阿旺。

蒂凡那和马末阿旺等人公然把败选责任归咎于林清祥，并宣布解散职工总会，另组职工会中心(Trade Unions Centre)，林清祥也被逼组织了SATU(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rade Unions)。紧接而来是立法议院信任动议的大辩论，结果林清祥、李绍祖等人被开除出行动党，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我们围着食堂那个破旧的收音机，聆听李光耀有关“合并的斗争”系列广播，情节离奇，戏剧化有如间谍小说，真假难分。

我们身陷囹圄，从棋樟山遥见岛国硝烟冒起，心里干着急。事关切身利益，我们通过报纸、电台与每周家属探监的机会，追踪外边世界的种种信息。局势瞬息万变，牢友情绪随波动荡，可想而知。

我们不如刑事犯

过了年回来，我已做好较长期的准备。我向史丹福函授学校(Stamford College)报了名，通过函授攻读剑桥高级文凭(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的课程，准备年底参加考试。新加坡教育体系里，这张文凭很重要，它是报读大学的必备条件。报读大学，仍是我的梦。

为了集中应付考试，我找了林安沪，一起搬出拘留所主座，到山下近海的一间小房居住。其实它离拘留所主座和食堂不远，只是山坡稍陡，上下吃力，每天来回几趟，如同强制性的体能锻炼。

我们把小房打扫一番后，觉得还蛮舒适。躺在床上外望，是隔邻的布勒巴岛，之间的水道常有渔舟往来。踏出房门，可远眺新加坡本岛的夜景。我们最爱晚间观看点点渔火在海上徜徉。有一个晚上，皓月当空，船上传来《夜下佳人》的歌声，说不出是优美还是哀怨，只记得我们陶醉难忘。不错，那正是中秋佳节，真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啊！

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只可爱的小猫。蓝眼睛、长尾巴、一身浅灰色。抱上山给大伙儿看，都说是只暹罗猫。日子过得无聊时，这小东西为生活增添的乐趣可真不少。它陪我们住在山下小房里，三餐也跟着我们上下。没多久，它怀胎了，产下一雄一雌。我嫌多事，坚持要安沪打发它们走，它们也就走了，随我们家属过海去。

牢友们对外面局势的演变开始有不同的感受，一块谈天时难免有争论。孙罗文开始成天忧心忡忡，眉头紧锁，主持生委会会议时，常为一些琐事唱反调。有一次与一位牢友争辩得脸红耳赤，几乎动起武。陈文英本来和兀哈尔、蒂凡那被关在樟

宜的自由营，因为不是“行动党中委或与中委有密切关系”的人，没有随“八大领袖”释放。他一开始就和大家格格不入，拉了两三个人自成一个圈子。拘留所里的动静，“第三只眼睛”尽收眼帘。现在浏览相关档案，新加坡政府在向内部安全委员会建议继续关押政治犯时说：“有迹象显示，这些人正开始软化，最终会屈服。”

我的房前有一小片平坦草地，晚饭后牢友漫步而来，席地而坐，常常聊到深夜。望着远处璀璨夜景，大家各有所思，所



自由若即若离，比起有个明确日子踏出牢房的作奸犯科者，我们自叹不如。

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自由若即若离，比起有个明确日子踏出牢房的作奸犯科者，我们自叹不如。

功课繁重，我一时想不了太多。为了准备年底的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我攻读英文、经济、历史和文学四个科目。没有老师，只靠书本和函授学校的讲义，读来颇为吃力。唯一的方法是多读几遍，不懂读到懂；再不懂，只好死背。

考试那天，守卫带我到岛上一所英校的课室，教育部派来的官员带来了考卷，静坐一旁监考。考完试的轻松心情，给我在拘留所的生活带来了不同的节奏。

K送来一台唱机

1962年2月4日，农历除夕，大家像过去两年那样准备回家过年，却没料到孙罗文、卢大通、顾合利、林安沪、吴祝保和我六个人却临时被告知不准出去。接到消息，我们都愣了，说不出话来。要是所有的人都不准出去，还可理解，因为外边闹翻了，偏偏只对我们六个人“另眼相待”，带来的不只是失望，还有随之而来难以形容的心理压力。真是没想到，为何要如此折磨我们！

吴主任不谙政治，一脸无奈地安慰我们。他说已通知家属明天来探监，叫我们今晚做几道好菜，回头他送啤酒过来。安

沪是烧菜能手，但这个除夕夜我们一点儿胃口也没有。孙罗文草草吃了几口，一言不发回房里。我们五人相对痛饮，当晚竟把一整箱（12支）皇帽白啤喝个精光。我半醉不醉，K的身影一直盘旋脑海，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年初一近午，二哥与二妹来看我。二哥刚从吉隆坡回来，他和社会主义阵线的几个代表出席了在那里召开的“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大会议决反对拟议中的马来西亚计划，认为那是新殖民地主义者的阴谋。

我格外想念K，相信这天她必定很失落。二哥带来一个日产唱机，是K送来的，还有唱片《画中人》。二哥顺便和牢友打招呼，除了安慰，他也没能对大家说些什么。我选了两个向岛民买来的珊瑚，托二哥带给K。《画中人》让牢友听出耳油，大家似乎都把自己想象成画中人。祝宝找来另一张唱片，是悦耳动听的英文歌曲《Listen to the Rhythm of Falling Rains》。这些玩意，为我们解去不少烦忧。

这个春节，孙罗文和我深谈了几个晚上。他终于相信，行动党当权派一上台就准备与左翼势力（他们眼中的所谓“亲共势力”）一刀两断，我们成了他们在这场



我心里想，就在牢里继续 追求我的大学梦吧！

角力的筹码。只要他们和左翼人士的角斗不结束，我们就休想获得自由。假如行动党政府真心要遵守诺言释放我们，相信英国人或马来西亚是阻止不了的。

新年过后不久，有一天我和几位牢友出席了一个由安不鲁斯法官主持的上诉委员会，这原是每年的例行闹剧，法官、主控官与原告全是一伙人，岂能指望什么？这一天，安不鲁斯法官显得有点不寻常，详细问我们出去后想做什么。若干年后我阅读有关档案，当年上诉庭的确建议释放我和屈志明、陈悦盛、顾合利、陈木庭、吴祝宝、邱有才等人，可是建议还未提呈到内部安全委员会，新加坡内阁就将之否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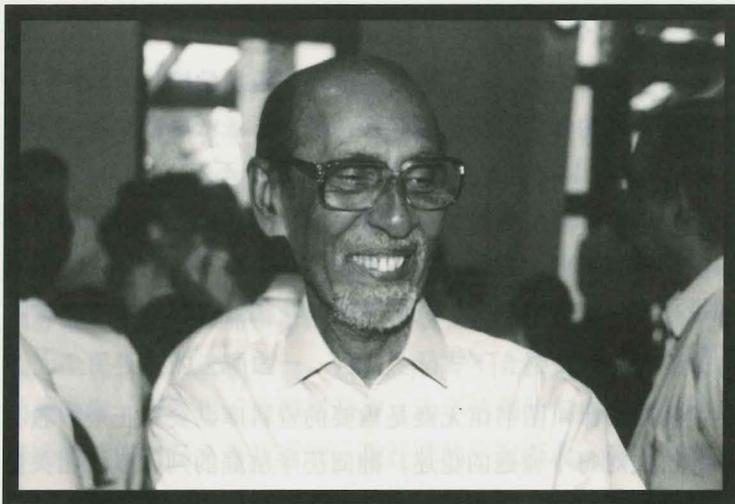
牢里修读校外法律课程

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揭晓，我所考的四科（英文、经济、历史、文学）成绩都不错，获颁准文凭。史丹福函授学院要我谈谈对于该校函授课程的感想，分明要利用我做广告，我还是敷衍了。我曾在他们的一些印刷品得知伦敦大学的校外考试制度，顺便要求他们提供有关的资料。我心里想，就在牢里继续追求我的大学梦吧！

吴主任一听到消息，兴致勃勃地找我谈天，毕竟他也算是我的英文老师！他建议我攻读经济，考个经济学士学位，我说得好好考虑再决定。主管“家属探监”的政治部林警官也为我

高兴，他说自己很想半工读，考个法律学位，以备后路。可是他和吴主任一样，腾不出时间自修，看来我这只笼中鸟还是有令人羡慕的地方！

二妹当年正好是新加坡大学法律系学生，她说我不妨就报读法科。热情的TT拉惹律师大加鼓励，叫我读法律。在伦敦大学的课程里，罗马法是必修科，需要懂得拉丁文，我对此有点担心。TT惹拉律师受训于英国，他要我别担心，课本全是英文的，只是某些法律名称和条文是拉丁文，可以死记。就这样，



■ 大好人TT拉惹律师帮助我很多。

我向伦敦大学报了名，攻读法律。隔年（1963年）6月是第一年考试，科目为罗马法、宪法、英国法律制度和合同法。

大学寄给我一份长长的教科书单，书价每本起码数十英镑，那时一英镑相等于新币八元，这无疑是我面对的第一个问题。超级好人拉惹律师给我带来好几本书，虽不是最新版，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记得他带来的那本罗马法有普都遮里的签名，普都遮里1959年被释放前本来也有意报读同个课程。大哥那时在南洋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图书馆里有不少法律教科书适合我用，他帮了我一个大忙。借不到的书，只好靠大哥与二妹助一臂之力，向书店订购。

大学当局介绍几所在伦敦或附近的函授学校，他们专为参加校外考试的学生提供函授课程，我选了沃士里豪尔函授学校（Worsley Hall）。记不起学费多少，总之不便宜，单单来往航空邮费就是一笔可观数目。函授学校定期邮寄各科讲义给我，也定期给我作业。我以后港的家做为与大学和函授学校的通讯地址，大哥和二妹便成了我的交通员，避开了拘留所正常管道的繁文缛节。

修读法律，图书馆无疑是重要的资料库。要真正理解教科书和讲义对每个课题的论述，翻阅历年法庭的判例以及相关资料是项重要的，而这一切只能在图书馆里找到。我没有机会上

正规图书馆去，学习过程每有搁浅，挫折感就特别强烈，不时闪过半途放弃的念头。

我唯有尽量多订阅法律刊物，或特别花些钱要求函授学校提供额外教材或资料。能坚持多久，能跑多远，得看自己的造化。

被操作的全民投票

我面对的真正挑战，是纷扰的岛国政治风云。说实在话，事关自己切身利益，岂能一直置身度外？我的学习生活受到干扰，不在话下。

有关新马合并的辩论日趋白热化，一时岛国红帽满天飞，各种各样的阴谋论见诸报端。凭借右翼政党的合作，行动党政府在立法议会迅速通过了全民投票法案。社阵的主张是，若要合并，就必须是真正的合并，新加坡和其他各州地位平等。所有新加坡公民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同时，必须根据人口比例分配中央国会议席给新加坡。行动党政府反对把社阵的主张列为全民投票的选项之一，它认为马方不会接受，而他们（行动党政府）不敢也无力得罪马方。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行动党政府对马方百依百顺，把社阵的主张歪曲，列下三项荒唐透顶的选项，并决定9月1日举行投票。当得知社阵准备号召

人民投空白票时，立法议会居然召开紧急会议修正法令，把空白票归为得票最多的选项！

投票结果不出所料，75%的选民“支持”行动党主张的合并方案。行动党政府敲锣打鼓，电台天天叫嚣：“我们通过公开辩论，终于击败了共产党人及他们的统一战线！”、“我们已从共产党老虎背上逃脱了”、“这是人民的胜利！”。我们这些被拘留者深感费解，左派的影响力消失得如此的快？仅仅剩下25%？左派还能走多远？我们的士气深受打击，一时感到前途茫茫。

社阵抨击整个投票程序不民主，“法令剥夺了人民自决的权利，投票进行过程完全不公正，计票程序荒唐透顶，投票结果并没有表达真正的民意”。林清祥承认投票结果是个挫折，他说：“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我们太过老实，没有玩臭。”他呼吁社阵支持者坚持和平的宪制斗争方式，争取最终在全马赢得胜利，建立一个代表广大人民真正愿望的政府。

若干年后，杜进才在一次访谈中坦白承认，1963年的全民投票，一切全由李光耀一手设计，不管你怎么投，结果都是支持行动党的合并方案。他说，“很少人看得懂选票，很多人也不知沙巴到底在哪里。怎么选呢？不过我们还是过了关。”他提到厚黑学，认为厚脸皮、黑心本为人性，搞政治者亦然。³

³ 《Melanie Chew: Leaders of Singapore》，1996 p.92

弄权扭曲历史进程

1963年的农历新年没有“放假”，大伙儿在拘留所度过一个闷年。二妹捎来消息，K走了，到英国念书。我没表示什么，我了解她的心情，希望她以自己的前途为重。

记得当年李光耀曾经抨击林有福动用公安法令抓人，声称他绝不会把双手插进林有福用过的“肮脏手套”。曾几何时，他忘了当年的“豪言壮语”。2月2日，这个难忘的日子！行动党政府与英、马政府联合引用内部安全法令，展开了恶名昭彰的“冷藏行动”，一举把新马两地近千名左翼人士扫个精光。他们再也无法自夸能通过公开辩论，通过以理服人的民主途径取得胜利。他们以军警和牢房对付政敌，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连英国人也承认，没有治安上的理由足以支撑“冷藏行动”，背后是政治的考量。不经公开审判把政敌无限期囚禁，摧毁他们的身心，逼使他们在思想上就范，这就是新加坡建国过程一个时期的人权纪录。

二哥林清祥再度被捕了，最初被关在欧南路监狱，没几天后转移到中央警署，再到樟宜监狱。可怜家人从此每个星期又要跑两趟，轮流探望我们兄弟俩。其实我们的拘留所与码头有一段距离，又要上下斜坡，对父亲来说有些吃力，他还是坚持常来。

K 的离开、
牢外局势的突变无时不在考验着我读书进修的精神与毅力。



就在这个时候，电视来到新加坡，吴主任真好，很快就给我们送来一个黑白电视机。记得开始时只有一个播道，而且每日播放时间也不长。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为了追踪电视节目，我还是花了不少时间和大家挤在食堂里，或多或少分散了读书的心情。电视机和电台天天播出“马来西亚会像太阳一样升起来！”（Malaysia as sure as sun rises!）等宣传口号，很快地我们也就觉得厌倦了。

■ 228

K的离开、牢外局势的突变无时不在考验我读书的精神和毅力。一个华校生靠自修读法律，语文根底不够好，又没有图书馆，我做的真是个大胆的尝试。我渐渐觉得睡眠不足，父亲也看得出我有点萎靡不振。好心的林警长向父亲建议，买一种叫做“勒脱精”的补品给我吃，他竟然听他的话，我也就吃了，而且还是一连吃了几年！

重返樟宜“老家”

考期将至。有一天中午，大队武装狱卒突然冲进拘留所，五步一岗，分布在拘留所各个角落。白皮监狱总监詹姆士一脸杀气跟着进来，吴主任胆怯地尾随其后。

詹姆士高声喊道：“尽快收拾，我们要带你们离开这里。要是谁抗命，武力对付！”

我们即刻意识到，棋樟山的“假日”就此结束了。他们肯定不会送我们回家，大家心里都琢磨着。

“冷藏行动”后，我们的确曾心存侥幸，希望这一轮风波过后，应该是恢复我们这些“前朝逆子”自由的时候。其实1959年行动党上台以来的一切是是非非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与现有权贵更谈不上有什么冤仇。可是人家并不这么想，心狠手辣，还是要把我们折磨到底。

这一天突如其来的行动，我们毫无心理准备，也不明白为何来者如此杀气腾腾，带来那么多武装人员。既是人家阶下囚，只好任人摆布。除了衣服和一些必需品，我们最繁重的随身物件就是书本。对我来说，这一搬动特别吃力，好在还有牢友相助。在这个小范围住了四年，与日夜相伴的景物都有了深厚情感，要离开还有点依依不舍。渡轮上，痴目送别棋樟山，悠悠绿水中，它渐渐消逝，细声叮咛我们一路小心。

□ 229

没猜错，我们回到樟宜监狱。想起四年前从这里离开，一切就像个梦。我们被分成两批，邱有才、顾合利、林安沪、吴耀城、陈悦盛等人被关进RB，这是扩建了的RB，林清祥、陈炎成、陈世镒、何标等人已在里边。剩下的十几个人来到E座，我看到了林福寿、甘绍仪、曾广营、谢炎辉、张少军、戴渊、蔡伟潘、何卓华、郭刚和、洪君平、卢一平、张铭文、赛·查

哈里、胡赛因、马哈迪瓦等30多人，都是“冷藏行动”的难友。除了几个本来就认识者，很多“新客”都是只闻其名不知其人，如今同是落难人，一见面也就情同手足了。我不禁这么想，让我们这些“长期住户”此时此地出现，或许是刻意给“新客”们下个马威，要他们知道，这不会是两年三年的事。除非投降，否则就得准备坐穿牢底！

熟人当中，张少军和我在华中同班三年，同是喜欢写作，多年不见，想不到会在此重逢。戴渊、谢炎辉、曾广营也曾是华中同学，还有几位是1957年我在工会认识的。至于林福寿、赛·查哈里和马哈迪瓦等人，却是新交的朋友。好几十个人挤在一起，新交旧雨，故事一时谈不尽、听不完。

E座两层楼，楼上原是犯人工作坊，白天开放给我们活动。每天晚饭后，我们分别被关在楼下的牢房，每间牢房约有2米宽3米深，除了石床和抽水马桶，里面什么也没有。我等了好几天，倾尽理由，才拿到一个木箱，权充书桌。我的考期逼近，这一次搬迁是个沉重打击。兵荒马乱的，除了心里诅咒“他娘的”，还是咬紧牙根，天天关在牢房里开夜车。

考试终于来到，那一天，狱卒带我到监狱主任办公室旁的一间空房，在教育部特派官员监视下，顺利完成第一学年的考试。

1963年大选重挫社阵

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宣告成立，我们在牢里又度过了一个朝代。当天上午，通过电视看到马来西亚联合邦的敦伊斯迈医生在新加坡市政厅台阶出现，威风地宣布新加坡成为独立自主的马来西亚的一部分。接下去就是一连几天的喧嚣秀，很多人不知道，新加坡进入马来西亚，其实形同被绑架。

在这之前，行动党政府已经宣布，立法议会定于9月21日举行选举。行动党角逐所有51个选区，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与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各派出46名候选人，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联盟则有42名候选人。虽然领导层及干部在“冷藏行动”下——被逮捕，社阵还是有能力派出一批具有资历和潜能的候选人参选，当中包括了十几位南洋大学毕业生。

这是新加坡作为马来西亚成员之后，类似“州议会”的选举，新组成的新加坡政府没有权力释放我们，因为内部治安是属于中央政府的权限。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关心这个选举，因为选举结果与整个左翼运动、与我们的切身利益关系紧密。从提名日开始，我们通过报章与电视跟踪选情，一直都很兴奋，对选举结果抱有很大的希望。

新任监狱总监姚昆宝不懂政治，以为大势就要改变，我们很快就会大权在握，总想找机会讨好我们，入夜牢房房门敞

开，方便我们到楼上看电视。接近投票日，连关在RB的牢友们也可以过来和我们一起。电视机画面上，李绍祖医生频频出现，大家心里都有胜利在望的感觉。

开票当晚，我们齐聚电视机前，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焦急等待第一个结果的宣布。记得选民最少的巴西班让选区最先带来不祥的预兆，跟着社阵候选人节节败下阵来。这是一个沉重而令人心碎的难忘夜晚，令人难以置信的噩耗接踵传来。落幕时分点算得失，社阵只赢得13席，行动党37席，王永元1席。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起了分裂选票的作用，有近十个选区因人民统一党的参战，社阵以几百票之差输给行动党。此后我常常这么想，要是当年王永元和李光耀分裂时，左派选择与王永元联手，历史就非得改写不可。或许这样的想法太天真，或许左派当年死挺李光耀也算天真，历史学者有大功课要做了。

去年的全民投票输了，人家浑身诡计，有一千个理由可以解释。这个大选，对手早已民心尽失，可说是过街老鼠，为什么还会输？隔天起身，人人黯然神伤，垂头丧气。我也心神不定，一起床就把一支笔误当牙刷，顺手抓了径自往冲凉房走去，闹了笑话。

大选后不及两个星期，行动党政府再进行另一轮镇压。中选

选的13名社阵议员当中，有三位还未宣誓就职就被扣留，另两

位被迫转入地下。同时被扣留的，还有另几十名人士，包括落选候选人及职工运动领袖。

监牢已客满，又有二三十人给塞到我们E座来。我看到王发祥、林源德和他的弟弟林源明、林世昌、林建生、谢醒民、陈献美、张寿川、欧笑作、周增禧、李腾禧等人。E座楼下的牢房爆满，最后连楼上大堂也排了几十张床，既拥挤，又嘈杂。

不久，伦敦大学来信通知，6月间的第一学年法科考试，我的科目全及格。四科成绩有B也有C，就是没有A，我满意，决心准备参加明年6月举行的第二学年考试。

孙罗文终于“转向”

这些年来，我们在牢里一直都组织生活委员会来规划集体的生活。在棋樟山的时候，生委会负责的主要还是三餐事项，因为当局给钱让我们自己采购食物，而牢友也都各有自己的学习计划。现在回返樟宜监牢，生委会再也没有机会插手处理伙食。在这里，政治犯的三餐就像五十年代那样，由监狱厨房供应，厨房里的大小事务由牢方挑选的刑事犯打理。给什么吃什么，不得挑剔。生委会的主要任务，还是关注牢友的其他福利，必要时向监狱当局交涉。此外，生委会也负责组织牢友的学习生活。

1957年进来时，政治犯不是中学生就是工友，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那时正值反殖民地主义运动高峰期，大势看好，大家士气高昂，学习风气鼎盛。到了六十年代，抓进来的有不少大学生、高级知识份子，受英文教育的也大有其人，可是大家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处境，原来的政治盟友成了最险恶的敌人，如今翻脸成仇，知己又知彼，心狠手辣更胜一筹。监牢外，大选失利后的社阵及其他左翼势力继续遭受打压，坎坷前途可想而知。

E座的牢友在思想上面对严峻考验。私底下彼此经常交换悲观言论，发泄悲观情绪。也有人自此生活放松散漫，无心学习，每天伸长颈项望着E座大门，希望有人开门叫唤自己的名字，为自己捎来一线希望。这一切，生委会管不了。难得的是，几位受英文教育者显得格外坚定与乐观。年轻时我有机会接触过马来知识份子，就不曾见过一个像赛·查哈里那样具有理念、开朗豁达的人。在这里，他很快和很多人成了朋友，谈笑风生时他总是焦点人物。他努力学华语，不到几个月表现就令人刮目。林福寿是专业医生，甘愿放弃荣华富贵的生活，义无反顾追求自己的理想，在逆境中他高风亮节，英姿飒爽，很受牢友尊敬，成为生委会的领导者。

孙罗文和我在华中是同学，在中学联是同事，关系相当密切。过去四年一起在棋樟山生活，对彼此的思想、性格、生

活习惯了若指掌。学生时代他是同学们的偶像，给人严谨的印象，令人敬畏。这些年来呆在牢里，基本上他保持一贯的作风与形象。可是日子久了，牢友觉得他越来越冷漠，与人格格不入。还在棋樟山的时候，他就已经自我孤立，多数时间躲在房里，少与人交谈，只有和我还谈得来。来到E座后，虽然“新客”当中有很多人算是他的老朋友，他还是振作不起来。我忙于准备考试，和他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从棋樟山回来樟宜没多久，他被调走了。再过一两个月，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他了。他获释了，但是他的讲话，使许多人愤怒。然而，“孙罗文效应”在E座没起什么作用，因为牢友一般知道他迟早会有这一天。只是我与他相处多年，难免有所失落。

有一天，李绍祖医生获准进来E座探望我们，那是预料不到的事。忘了他说些什么，却忘不了他为我带来的那一块深红色手帕，手帕两边绣了英文字母L。他说他不久前从伦敦回来，见到了K，手帕是K托他带给我的。信物在手，顿感K的缕缕温情，无疑是一种及时的激励。

女律师法丽列在大学时期是社会主义俱乐部会员，她听说我正在攻读法律后，便通过二妹表示想来探望我。几次会面后，觉得她也是个具有理想、充满热忱的青年。另一位陈祖荣律师，原是几位南大同学的代表律师，也来见过我几次，他具

正义感，见面时谈的多是政治。有这样多的人关心我，加强了我学习的决心。

1964年6月，我参加了第二学年的法律考试。两三个月后成绩揭晓，四科全部及格，等级比第一年好。翌年是最后一学年，我肯定要加油冲到底！

“新天地”苦中作乐

常有一些诸如太平局绅之类的社会名流，会被安排到监狱巡视，他们也顺便看看政治犯。这一张张虚伪造作的嘴脸常令我们作呕，成为我们嘲弄的对象。有一天，马绍尔也来了。看到E座有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他打趣地说：“那你们不是可以天天开群众大会吗？”在一旁的监狱高官听了有点尴尬，无意间透露我们很快即将搬迁。

没多久，我们果然搬家了。新家是三座相连的崭新宿舍，坐落在最靠近樟宜大路的围墙内，每一座宿舍约有20几个房间。我们一百多人由生委会分配，大多数是两人共住一房。我是受到生委会特别照顾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自己一个人住进第三（C）宿舍尾端的一间房。

每座宿舍都设有大门，晚餐后由狱卒上锁，隔天清晨才来开门让监狱官点算人数。个别的房间没有上锁，所以同一座宿

舍的人晚间可以自由来往。像以往在监牢里“搬家”那样，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找木箱亲自钉个写字桌，好在监狱当局常有要丢弃的各类箱子，所以问题不大。房间里光线充足，空气新鲜流畅，使我很快就能集中精神读书。

新家范围很大，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宽阔。宿舍前面有个标准型篮球场，篮球场与围墙之间有一片旷地，我们把它当菜园，栽种各类蔬菜。除了自给，牢友常把消费不完的蔬菜交由家属带回家去。篮球场左边是个规模不小，附设厨房的食堂。我们每天把监狱中央厨房送来的伙食重新料理，配上每周家属带来的“加料”和自己收成的青菜，一般上吃得还满意。生委会把大家分成几组，轮流负责大伙儿的炊事，我还当了组里的“火头军”。

二哥他们20几个人继续留在RB。他获知我们这边有空地，托监狱官带了一对兔子给我，附上一张如何饲养兔子的手抄说明书，看来他很有心得。第三宿舍冲凉房后有个小角落，我向狱方要了些铁丝网，算是给白兔安了家。母兔每个月都生产，就像副机器。没过几个月，我有了小兔一大群，每天得花不少时间跑进跑出，拔草喂养，替它们清理粪便。看到兔崽子迅速长大，一天到晚蹦蹦跳跳，天天有牢友来“观光”，也算乐事一桩。

来到新家，大家心情平静下来，学习热忱也提高许多。生委会主席林福寿医生是一位好领导，性情温和，谈问题条理分明，在各方面树立很好的榜样。我和住在第三宿舍后半部的郭刚和、叶精忠、何卓华、谢继忠、欧笑作、周增禧、郭孝信等人混得很熟，经常海阔天空谈个不休。何卓华是烹饪好手，郭刚和家开药材店，两人很快就打起我那一群兔子的主意，由于小围栏容不下太多的兔子兔孙，我只好不断地满足他们的“食欲”。

怎么说我都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功课，1965年6月间，我完成最后学年的考试。马哈迪瓦也报名投考，他参加的是第一学年的考试。

新加坡被驱逐的反思

新加坡进入马来西亚时代，新格局出现了。行动党领导层深知巫统是座铜墙铁壁，不能直捣，想要在马来西亚立足，只能设法搞掉马华，当巫统的老二。可是巫统诸公早已领教过行动党头头的惯用伎俩，想起他们当年如何利用新加坡左翼势力上台，然后过桥抽板，赶尽杀绝，巫统上下可说是戒心重重。

1964年4月马来西亚举行全国国会与州议会普选，行动党派出十一名候选人参加角逐国会议席。行动党高声喧嚣马华已没落，自夸只有行动党才足以代表城市选民，抑制左派（马来西亚）社会主义阵线势力的扩张，希望借此赢得马来选民的支持。行动党领导层这回打错了算盘，他们野心勃勃，不仅激怒了巫统的忠实盟友马华，更招来巫统基层的猜忌与反攻。一时反行动党的情绪高涨，行动党派出的十一名候选人，几乎全军覆没，只有蒂凡那一人当选。选举致使激进种族主义分子抬头，种族之间的关系渐呈紧张。1964年7月间与9月间，新加坡发生了两场种族骚乱事件，造成16死200多人受伤的惨剧。

行动党领导层进而游说马来西亚在野党，组织了“马来西亚团结论坛”（Malaysian Solidarity Convention），鼓吹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新概念。论坛于1965年6月间在新加坡国家剧场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同时宣布即将到全马来西亚各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这个概念。行动党领导层低估了巫统内部极端种族主义分子的影响力，这些极端分子乘机大肆宣扬煽情言论。就在巫统的常年大会上，基层代表大肆攻击行动党，公开要求“逮捕李光耀”，会场四周广布“打倒李光耀”、“打倒PAP”等各类标语。

日九廿月十年五六九一

九年鐵窗無人問 一舉成名天下聞

林清如獄中苦讀 考取倫敦大學法律學士

(本報記者廿八日專電) 政治犯林清如君，在倫敦大學法律學士學位考試中，以優異成績，名列第一，在該屆公認之倫敦大學法律學士中，名列第一。林君在獄中苦讀，其精神之可嘉，實為一般人所罕見。林君於一九五七年八月廿三日，因參加馬來亞獨立運動，被政府逮捕，入獄。在獄中，他苦讀法律，並翻譯英文小說。林君在獄中，曾翻譯英文小說，如《紅燭》、《子夜》、《阿Q正傳》等。林君在獄中，曾翻譯英文小說，如《紅燭》、《子夜》、《阿Q正傳》等。林君在獄中，曾翻譯英文小說，如《紅燭》、《子夜》、《阿Q正傳》等。

吉隆坡中國報

一九五七年十月廿

HIS OTHER SUCCESSES INCLUDE A PASS IN STD III MALAY EXAM...

Political detainee passes external LLB exam



LIM CHIN JOO
Younger brother of Lim Chin Siang

A POLITICAL detainee, Lim Chin Joo, 28, has obtained the external degree of Bachelor of Law from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with second class honours.

He is the younger brother of Lim Chin Siang,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Barisan Sosialis, who is also under detention.

This is Lim Chin Joo's biggest success in his academic studies undertaken continuously since his detention about nine years ago.

Detained in '57

Results relea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uthorities yesterday, showed that he passed his final law examinations, which he took in June this year.

When he was first detained on Aug. 23, 1957, Lim had not even passed his Chinese Senior Middle III examinations. He was then a final-year student, and the detention prevented

SINGAPORE, Thure.

him from sitting for the examination. Since then, he has successively passed the Senior Middle III, the Cambridge Overseas School Certificate, the 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s Intermediate Laws, and the Final I and part II of the LLB degree.

In between these examinations, he also successfully appli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Lim has passed Standard I, II and III examinations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examinations conducted by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He also passed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examination in the Jawi animation in the Jawi script, and was also successful in obtaining from the Adult Education Board the certificate for the Std. III Chinese Senior Middle III (secondary) national language examinations conducted by the board.

Lim's father, Mr. Lim Teng Geok, 55, a clerk, today showed a Straits Times reporter who called at his reporter's house in a zinc-roofed house in Vaughan Road, off Upper Serangoon Road, all the certificates obtained by his son.

Mr. Lim said that Chin Joo is his third son among 12 children. Lim Chin Siang is the second.

'Happy'

Speaking of Lim Chin Joo's academic achievements, he said: "I am happy to hear it, and hope he will be able to come out soon, so that he will be useful to society."

Since passing his Std. III national language examination, he has translated into Mandarin an Indonesian novel, entitled "Hana dan Corrie" by Abdul Mois, which has been published by a local publishing house.

Another political detainee, Mr. A. Mahadeva, a former journalist passed the intermediate law examin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九日星洲報

1965年10月30日星期六

我在牢里考获法学士学位，对父亲而言是头等大事，连甘榜父老也登报祝贺——父亲细心整理的珍贵剪报，留着 he 清晰的笔迹。

馬表通報

九年鐵窗無人問 一舉成名天下知

林清祥之弟清如 獄中考獲法學學位

入獄前是高中生，苦讀之下，精通巫英文，最近翻譯一本印尼長篇小說，開在付印中。

(本報新加坡訊) 此間左派重要領袖林清祥之弟林清如，雖然與兄一樣受政府拘禁，但在九年鐵窗生活中，却也在學術上獲得了頗為優異的成績。他考取了倫敦大學法律學士學位。

林清如是於一九五七年八月廿三日，因參加政治犯拘禁的。當時他雖然還是一個年僅十七歲的高中生，但對學術卻有一種異常的興趣。在獄中，他苦讀法律，並翻譯英文小說。林清如在獄中，曾翻譯英文小說，如《紅燭》、《子夜》、《阿Q正傳》等。

林清如在獄中，曾翻譯英文小說，如《紅燭》、《子夜》、《阿Q正傳》等。林清如在獄中，曾翻譯英文小說，如《紅燭》、《子夜》、《阿Q正傳》等。

貴友佳佳午拾月

新加坡南洋商報

政治犯林清如獲法學學位 弟清祥為其慶賀

政治犯林清如君，在倫敦大學法律學士學位考試中，以優異成績，名列第一，在該屆公認之倫敦大學法律學士中，名列第一。林君在獄中苦讀，其精神之可嘉，實為一般人所罕見。林君於一九五七年八月廿三日，因參加馬來亞獨立運動，被政府逮捕，入獄。在獄中，他苦讀法律，並翻譯英文小說。林君在獄中，曾翻譯英文小說，如《紅燭》、《子夜》、《阿Q正傳》等。林君在獄中，曾翻譯英文小說，如《紅燨》、《子夜》、《阿Q正傳》等。

林君在獄中，曾翻譯英文小說，如《紅燭》、《子夜》、《阿Q正傳》等。林君在獄中，曾翻譯英文小說，如《紅燭》、《子夜》、《阿Q正傳》等。

子清如君考獲法學學位誌慶

榮譽法學士

爭光

林金 賀 敬 林茂

林順 林豐 林連 林利 林玉 林多 林金

林順 林豐 林連 林利 林玉 林多 林金

林順 林豐 林連 林利 林玉 林多 林金

1965年8月9日那天，我们突然在电视上看到李光耀“声泪俱下”，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新加坡忽然间独立了！除了报章与电视的报导，我们在牢里无法得到更多信息。行动党高层如何突围，如何与各方达成交易，这天大的国家大事是如何决定下来的，直到今天为止，国人还是被蒙在鼓里。就连杜进才也说，除了李光耀和吴庆瑞，行动党高层没有其他人知晓，新加坡是如何被赶出马来西亚的。⁴

很多在“冷藏行动”下被抓进来的牢友当年强烈反对行动党政府为了一己之私，在不平等条件下仓促把新加坡带进马来西亚。事实终于证明，他们的主张才是正确的，所有当年反对该项马来西亚计划的政治犯，理应立即获得释放！

经过几次镇压行动，新加坡社阵领导层的实力大受打击。李绍祖如何面对这个新的局面？他并没有像我们当初所期望，把握时机向人民广泛宣传当年社阵对马来西亚计划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他也没有在国会动议释放所有反对马来西亚计划而被逮捕的人士。他提出“不承认新加坡独立”的主张，接着更宣布“杯葛国会”的决定。

⁴ 《Melanie Chew: Leaders of Singapore》1996 p.97

新加坡的独立是真是假？独立了，对我们牢里的人来说，是较好还是较坏？牢友之间不时交换意见，对时局的发展也各有看法。

就在这“历史性”时刻，我收到伦敦大学的通知，考获二等荣誉法学士学位，成绩比预期好得多！父亲喜出望外，把消息传给各报，我一时成了新闻人物。没多几天，我被调到中央警察局，重游八年前的旧地。

“招安”啊“招安”

屈指一算，我们这批1956年或1957年就被拉进来的人，蹲牢已近十年，都被尊为“元老”了，没人意料到，后来竟然还有被关上十几二十年的政治犯。我们像包袱那样被人丢进铁窗后，就无人过问了，年复一年，毫无动静。要是有关方面派人找你谈话，表示不忘你的存在，我们总会觉得些许兴奋好受些。我抱着希望来到中央警署，实际的感受与九年前被逮捕时完全不同。

九年前的景物依旧，同样的牢房与铁栅，同样脸无表情的辜加人，看来这黑牢一直都还在为统治者肩负不平凡的历史任务。我住进6号房，那是十几间牢房当中较宽敞、光线较好的一

间，缺点是对街楼下有好几间殡仪馆，一整天都在办丧事，哀声刺耳。

这回处理我案件的是王姓与郭姓高级警监。一番寒暄与客套后，他们开门见山问起当年扣在我身上的那个“莫须有”罪名，我一时火了，责问他们为什么花了九年时间还没厘清真相。他们忙说：“老林，你不谈也罢。反正这么久了，我们可以想办法把案件了断。现在的问题是，新加坡独立啦，你也学有所成啦，你应该争取出去，为国效劳。不过你要出去的话，对一些事情总要有个交代、要表个态啦。”

我感觉不对，坚决地说：“我没有什么好交代，都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是搞个清楚才让我出去，不然的话，留条尾巴，改天又有借口把我拉进来。”接着下来就是好几天的说教，最后从他们自己的言谈中，我发觉他们也知道当年的所谓“情报”是靠不住的。

我懂得什么叫做“表态”。这次来中央警署前后，已经有好多人像孙罗文那样，发表书面声明、上电视接受访谈，然后被释放出去。内容虽然不一，但我总觉得毕竟不光彩，我怎能接受？

从前在这里忍受煎熬，斗志高、士气昂，晚上从没有失眠过。可是这回感觉有些不同，面对“招安”压力，缠绕脑海的

问题越来越多，也就越睡不下。幸好两三个星期后，他们见我无动于衷，就把我送回樟宜的“自由营”。

“自由营”指的是樟宜监狱围墙外，靠近丹那美拉一片以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宽阔园地。这就是所谓“不设防”的牢狱，内有供员工与囚犯住宿的宿舍、各类工作坊、菜园等，短期徒刑或即将获释的长期徒刑犯人通常被安置在这里。1956年被林有福逮捕的几个左翼领袖如蒂凡那、普都遮里、兀哈尔等人，一开始就被关在这“自由营”。

“自由营”范围内的一座宿舍，我和傅树介医生、巴尼、陈世镒住在一起。傅树介和陈世镒同在1963年的冷藏行动中被捕，一先一后被关进“自由营”，巴尼在1963年的大选中获选为克罗福区议员，还未宣誓就职就给拉了进来。

我的心湖再度荡漾

事情接二连三发生了，我原本平静的心复受干扰。先是刚过去的中央警署之行，接着是印度尼西亚“九二零事件”的演变，进步势力遭遇空前大浩劫，苏卡诺总统大权旁落。国际方面中苏关系闹僵了，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一切我们料想不到的事都发生了，我难免感到迷茫，不知到底自己从

哪里来，又该往哪里去？接踵而来的，是报上刊登“林清祥亲苏派”和“林福寿亲中派”在樟宜狱中殴斗，以及林清祥在中央医院企图自杀的消息。过后才知道，无所谓两派，无所谓殴斗，但林清祥紧急进入中央医院是真的，原因是他的忧郁症病情突转告危。事后社阵主席李绍祖获准偕同记者到樟宜监狱采访林清祥，原来殴斗事纯为谎言，数月后有关报章公开道歉，并赔偿林清祥和林福寿的名誉损失。

■ 246 大局势逆转，行动党政权乘机加紧向政治犯施压，颇见成效，居然有好几个大家熟悉的政治犯获释前，公开承认自己是潜在政党、职工会、学生会的马共地下党员！监里牢外，一时乌烟瘴气。

我们在“自由营”的四人来自四种不同背景，其中傅树介出身名门世家，是李光耀从政初期的得力助手。他极度不满李光耀对左翼盟友倒戈相向，赶尽杀绝。陈世鑑曾是巴士工友联合会领导份子，看法、讲话欠缺火候。巴尼教师出身，六十年代初开始活跃于左翼运动。他本来受到李光耀器重，但是他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也反对排挤和镇压林清祥等左翼人士。林清祥等工运人士于冷藏行动被捕后，巴尼几乎独当一面领导饱受摧残的新加坡职工联合总会（SATU）。至于我，在牢里度过了几个朝代，与外界隔绝多年，对一些事有不同的感

触。我和他们三个人见面不久，谈来谈去总离不了时局近况，特别是有关政治犯出狱的事。巴尼几次和我深谈，当他知道我根本和马共、抗英同盟或其他地下组织毫无关系时，对我竟然被关了这么多年表示惊奇和不满。他说他不同意李绍祖不承认新加坡独立以及退出国会的主张，也觉得既然我们都和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表明非共立场及拥护议会民主制度不见得有失体面。

1965年圣诞前夕，夜黑人静时刻，一群教会人士来探访，《平安夜》歌声悠扬感人，基督对我突显伟大。一位看似牧师的人喊了我的名字，递交一张圣诞卡给我，上面写着：“我们没忘了你（you are not forgotten）！”，下端署名国际特赦委员会（Amnesty International），我深受感动。

青春遭禁锢 我有憾无悔

出了年，巴尼离开了。他在电视上讲了话，承认新加坡独立，拥护议会民主制度。不多久，政治部的郭警监来见我，问我是否能像巴尼那样表明态度，我说可以考虑。没隔几天我被押到丝丝街的罪犯调查局，住在四楼的一间房里。我发现从RB调来的陈炎成就在隔壁房，他说他会和王发祥一同上电视，而另一位也是来自RB的陈仁贵也会跟着上电视。

办案的王警监和郭警监这回只是公式化地见了我，没有多啰嗦。我说可以表明政治立场，但他们得还我一个清白，给我机会洗清“莫须有”的罪名，他们说没问题，但是电视访谈录好后得先交内阁批准，才能释放我。

接着下来的日子，他们安排我到东陵的一间别墅住，这也是王警监与家人的住家，许多政治犯获释前都在这里接受贵宾式招待。一个多月里，我先后和陈根源、方来华、林生益等人同住在一起。每天晚饭过后，王警监总会陪我们到附近走走。那是富人聚居的高尚住宅区，王警监忠于职守，不停地说教，每个傍晚为我注射资本主义的麻醉剂。陈根源原是个工人，方来华是南大学生，林生益是工运人士。我进一步打听，天啊，人家的电视访谈早已录好，只是等待出去。想到自己还没登台，也没什么好“交代”，难免心有疑虑，不知道人家是否会“宽容”让我就这样走出去。

终于有一个早上，王警监来通报，下午到电视台接受访谈。他口头约略给了我一些指示，我不置可否地听着。来到电视台的制摄室，赫然发现，访员竟是时任总理新闻秘书的傅超贤和星洲日报采访主任卢光池。两人连珠炮似的发问，我一时不知哪来的镇定，不管王警监有什么期待，我尽量发挥自己内心的话。归途中王警监似有几分冒火，拉长了脸，还暗示别妄想这样就可过关。我可是心里这么想，我已算是够合作的啦，就到此

为止，决不会重来。那时我可没预料到，过后会有像谢太宝、林福寿、傅树介这样的硬骨头，宁可坐穿牢底也绝不就范。

僵持了几天，王警监开始有了笑容，说上面批准了，不过仍要他写一份对我的评估。他和我商量，该如何说明我的政治立场。我说自己是个民主人士，他说以他的观察，我更相信个人自由，就形容我是个民主的个人主义者好了，我微笑不答。他问我未来的计划，我说想出国深造，他说会建议给我奖学金出国，我先谢谢他了。

终于有一天，王警监兴奋地告诉我，总理要接见我。他说我是第二个获得总理接见的政治犯，第一个是巴尼。我没有特别喜悦，也没有其他选择。这一天，王警监把我带到政府大厦，要我晋见总理李光耀。

我们老早就认识，他曾是我的辩护律师，当年我受虐待时他帮过我，我心存感激。但是他当上总理后，继续把我关了这么久，剥夺了我生命中最美丽的岁月，再多的言辞也难抚平我心中的怨气。我们握手问好，但昔日的“战友情结”老早消逝。他用英语和我交谈，我至今仍记得他谈话中用过的两个字：static（静止）和incorrigible（无可救药）。他相信一个人的思想不会永远static（静止）不变，又说若非林有福早早把我关起来，今天的我必然incorrigible（无可救药）！他问我出去后要做什

么，我说要出国深造。他若有其事地回答，“我不能现在就让你出国深造，这样做会使马来西亚误会。”我真不了解，释放我并让我出国与马来西亚有何相干？他不是已和马来西亚闹翻了吗？他说要把我留在新加坡，在政府部门服务。我说我不会接受任何政治性任务，他叫我放心，他不会在政治上利用我，他要我在民事部门服务。

1966年复活节前夕，郭警监载我回后港的家。姑母洪玉环早来家里等了，原来她是我的保释人，要我今后遵守几个条件：（1）除非事先得到警方许可，不能离开新加坡；（2）每天晚上七点至隔天早上六点不得出门；（3）不能参加任何政治、工会或学生会活动等等。姑母在释放令上盖了手印，我自由了！

从20到29岁，辛酸诉不尽的九个年头，夜长路漫漫，青春被禁锢，我有憾无悔。想起那么多被迫家破人亡、坐牢长达二三十年的昔日战友，我的遭遇，何足挂齿。

重返陌生的牢外世界

踏出牢房不过几天，内政部派人来相告，要我到律政部报到。律政部就在政府大厦一楼，楼上恰是当时的总理公署。常任秘书KR詹德拉把我带到他属下的土地局，把我介绍给土地局

总监安姆史特朗—我的上司。行政人员解释了我的职务和工作条件后，递交给我一本厚重的公务员手册，我开始了公务生涯的第一天。

办公室里，人人投我以异样眼光，我仿佛来自神秘的外星球。下班后，又觉得无所去处。旧友多已失散，即便知其下落，碍于形势，也就避免接触。我走进全然陌生的世界，处处感觉不自在。我与K通信商量，是她即刻中断学业回来，还是等些时候我再争取过去与她相会，我们一时拿不出主意。

不久，王警监找我谈话，告诉我内政部成立了一个“政治拘留人士协会”，要所有前政治拘留人士入会。我好不容易走出围墙，岂料墙外有墙，一时寒意心中起。我还是铁了心不回头，只想往前看。我告诉王警监，那协会分明是个政治性组织，既然限制我不得涉及政治活动，我便没有理由参加那样的组织。王警监见我意志坚定，终于网开一面，我心头踏实许多。

过了年，K决定中断学业，即刻回国。我到机场迎接她，K还是以以前的K。唉，世间谁人比我更能触及她内心的几多沧桑。毫无准备的情形下，我们成了家，携手共步漫漫人生路，细细咀嚼生命下一程的意义。

电视台访谈附录

访员：傅超贤、卢光池

《原载于南洋商报星期刊（1966年4月17日，星期日）第十八版》

问：林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林：我和马共的地下组织并没有关系，当然我也谈不上是一个共产党员。

问：那么，你是参加了什么活动被捕的呢？

林：是在九年前被捕的，那是很久的事情。我反对殖民地主义，痛恨殖民地主义，同情当时马来亚共产党的斗争，因为他们形成了反对殖民地主义的斗争，在那样情况下，我被指涉及了“统一战线”的活动，这已经是过去的历史。我没有意思在未来的时候和共产党人的运动有所关系。

问：林先生，那么你对共产党在本邦有没有什么前途？你是不是有意思想要反对共产党？

林：关于共产党到底在本邦有没有前途的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问题，这应该是由新加坡人民决定的问题，不过，我可以这样的讲，我个人是相信，新加坡大多数

人民是接受议会民主制度。只要一天他们对这个议会民主制度有信心，当然共产党革命要在这边成功的希望就很小。

问：那么，照这样说，共产主义是不适合新加坡？

林：假如说新加坡人民觉得议会民主制度是比较适合新加坡这样的社会情况的话，当然共产主义在这边就没有办法行得通。

问：林先生，我相信你是对议会民主跟共产主义有些研究，你能说明这两种制度的基本区别？

林：我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是主张一党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既然是主张一党专政，当然不会容许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反对集团的存在，在那样的制度之下，人民不可能在他们认为需要的时候，以和平的方式改变他们的政治领导，这是一点。另外一方面，共产主义强调集体的观念以及纪律，在那样的制度底下，个人自由这种基本概念是难免受到否定。这个是我个人对共产主义以及民主制度之间的差别的两点的看法。

问：林先生，你以前是工运领袖，目前你认为一位真正的工运领袖的态度是应该怎样？

林：我谈不上是一位工运领袖，虽然我曾经在工会里头担任过一位小职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职工运动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在提高工人的生活以及为他们争取比较好的工作待遇。虽然我个人并不相信职工运动是可以完全和政治脱离，但是我相信职工运动是可以脱离政党而独立存在的。

问：林先生，新加坡在独立的时候，便马上宣布采取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你对于新加坡政府在国际问题上采取这种立场有什么意见？

林：我赞同新加坡宣布的这种在国际事务上采取中立以及不结盟政策。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这样小的国家要在国际方面和这个或那个集团结盟的话，对新加坡的利益并不会是有帮助的。这个是我的看法。

问：可是，你这个军事基地的问题的看法又是怎么样呢？

林：我原则上是反对一个独立国家里头允许外国军队驻扎的，因为在政治上来讲，对这个独立的国家是一种负担，不过以新加坡的情形来看，我相信假如说马上要英国军事基地离开的话，会对新加坡的经济以及防务带来相当大的一种困难。

问：林先生，印尼就宣布要承认新加坡了，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怎么样？

林：我觉得这是大家应该高兴的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印尼和新加坡在过去的几个年里头关系是非常不好，假如印尼作为新加坡的一个邻邦能够和新加坡和好相处，我看这个是大家所乐意看到的事情。

问：林先生，你对新加坡的独立有什么看法，或有什么感想？

林：我个人对于新加坡独立的真实性没有表示怀疑过，我认为那是新加坡人民要摆脱外来统治的一种毅力以及决心必然的结果。

问：林先生，你刚才讲过，你不相信共产制度会受大多数人民的接受，那你对国际共产运动鼓吹世界革命或者武装革命，你认为他们会不会成功？

林：我看有一个事实是大家所不能否认的，就是共产主义在今天已经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一项事实。至于说共产主义不能够在目前的疆界以外发展，我个人的基本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革命不是一种商品，可以由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国家推销。我的看法是：我认为决定历史或创造历史的是人民，而不是两三个领袖。比如说以新加坡的情形来说，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相信新加坡人民大多数在目前是接受这个议会民主制度，而且他们要这个议会民主制度的基础上来创造一个比较繁

荣，比较快乐的社会；只要一天新加坡人民保持这样的决心，当然共产主义革命在这个地方就不可能成功。

问：照你的看法，共产党是要用哪一种方式在本邦煽动革命运动？

林：我看任何具有政治常识的人都可以了解，共产党本身不仅仅是一种政党，他们是代表一种政治运动。他们的方法是很多，除武装革命之外，他们可以，也有时候在宪制的范围之内进行他们的斗争。比如说对于民主合法集团的渗透，这些都是他们的方法。

问：林先生，以前你是泛星各业职工会及前中学联负责人，你可不可以把当时这两个机构活动里面的情形告诉我们，是不是这两个机构有共产分子的渗透？或者受共产分子的控制？

林：那是九年前的事情了，那已是成为旧时代的历史了。有个事实是大家不可以否认的，就是在这些团体里面，是有受到共产党人的渗透。我想这是一个事实。

问：林先生，我要转换话题，你什么时候被监禁的？

林：我是在一九五七年八月被监禁的。

问：啊！这样，到现在差不多有九年啦？

林：是差不多九年啦！

问：那么，你在监牢中的待遇怎样？

林：由于我在监牢的时期是相当长，大家都知道，在这几年，在这长时期里面是有不同的政府，在不同的政府下，会有不同的待遇。在初期，那还是殖民地政府，我的经历并不是很愉快的。

问：这样讲起来，林先生，你在监狱里边已经过了几个朝代了。（同笑）

问：我再请问你一下，听说你要释放了，释放后，你的计划是怎样的？

林：我对我的将来没有详尽的计划，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的，就是：我个人向来对政治没有偏爱。虽然我同意，我认为人是不可以脱离政治而存在的，但是我认为比方说，服务社会，服务人群，这些不一定是政治家的一种私有物。一个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同样也是可以为社会服务的。

在短期间内，我会找一份工作，当环境许可时，我准备到国外再升学。

问：林先生，我们都知道，你已经考到法律的学位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在监狱里面学习的情形？

林：假如你要问我，我的学习经验是怎么样，我是很难回答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学习经验，由于我在里面的时间是相当长，虽然我有学到一些东西，在比较上说来，也不算是有什么惊人的地方，在监牢里头我是尽量在环境所许可的情况下争取时间读书，要谈方法，我觉得最主要要看一个人的决心和毅力。

我在监牢里头，大家知道是不会有图书馆，也不会有人来个别指导你。另外一方面呢，一个坐牢的人，当然有一个坐牢的人的烦恼以及问题，监牢给我提供了充分的时间，但我个人是有一定的决心，在这样情况底下多少学习了一些东西。

问：当时被捕以前，你是中二还是中三？

林：我是高三还没有完。

问：高三还没有完？

林：是啊。

问：自从被捕之后，你拿了多少张文凭？

林：好多张了，大大小小要讲是相当多了，但是，那些都不是怎么有价值的东西。

问：请数一数给我们听一听。

林：比如说，马来文……

问：那么，你在监牢里有没有见林清祥先生？

林：我们并没有关在一起，因为樟宜监狱是一个很大地方。里面分为很多不同的部分，他和我都各自在不同的部分。

问：那么，你差不多有九年没有见到你的哥哥啦？

林：没有这样久，有时候比如说，去年，我祖母逝世的时候，我们就曾经一起回家去。

问：笨珍？

林：唔。

问：林先生，你为什么会选择读法科？

林：并没有有特别的原因促使我选读法科，假如说，一定要说有原因的话呢，我可以勉强的讲，或许是因为我身在监牢，我在监牢有这种亲身的体验，不要谈我自己，比方说：谈监牢中那些犯人，他们都是跟法律搞上关系才进监牢的。我自己有这样的感觉，法律或许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东西。一方面也可以讲，我也没有什么特长可以读，对于经济，对于理科，都不是很有兴趣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就选读了法科。

问：你可否谈一谈，在议会民主制度下的法律程序，司法程序，你对这种制度的意见？

林：根据我所了解，司法独立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基础。在一些民主制度非常健全的国家，比方说，在英国，他们司法是完全独立的，也就是说，不管执政党是工党也好，还是保守党，司法方面的事情，并没有受到政治上的干预。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健全的制度。

问：有什么优点？

林：要谈到优点，譬如说，一宗案件假如能由一个不受任何政治偏见所影响的人加以判断的话，总比一个具有政治偏见的人来判断好得多了。换句话讲，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在这样的制度底下，个人的自由是比较有保障，也就是说，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是比较有保障的。

问：林先生，有些人认为民主制度或者民主议会制度是向西方抄来的，学来的，你的看法怎么样？

林：就事实来讲，所谓民主制度，和英国、美国脱离不了关系的，因为来源是那方面。新加坡和马来亚方面呢，因为曾经受到英国的统治，英国过去的文官制度，各方面都曾经被马来亚接受。就事实来讲，这是没有错的。你说，这个议会民主制度是西方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假如仅仅是在于这个制

度是西方的，就认为它是反动的，将整个民主程序一笑置之。我个人看法，这不仅是消极，而且也是错误的。这是我的看法。

问：我们都知道，社会总是要进步和发展的，你对于个人的自由，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作用，看法是怎么样？

林：我的感觉是这样，人是要自由的，假如说在一个社会里头，大多数的人不能感觉到他们是自由的，对本身的事有一种独立作主能力的话，这样的社会是不进步的。我觉得，假如社会要进步，个人的自由就应受到尊重，而且要受到保障。

问：那么个人自由，有什么范围没有？

林：在民主制度里头，个人自由当然有一定的范围，换一句话讲，在一种法律的范围底下，也会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在法律之下，法律四周围之内的个人自由。

问：大家都知道，林先生是从联邦来的，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来的，在什么学校念过书。

林：我在一九五三年底到新加坡华侨中学升学，那时候是念高中，一九五六年高三还没毕业，我就被当时的教育部开除。

问：你现在不是新加坡公民啦？

林：不是新加坡公民。

问：林先生，你刚才谈过促进社会的重要性，那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算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部分，那么，你认为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对促进社会进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最好保证？

林：我个人对于经济学没有研究，不过，我粗浅的感觉是：这要看一个地方的社会情况以及历史、地理以及各方面的条件来决定。

问：以新加坡方面来讲。

林：以新加坡方面来讲，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岛国，独立不到一年，目前新加坡正在发展工业，以便摆脱它对转口贸易各方面的依赖，而新加坡本身要发展工业，虽然说人力及各方面都有了相当条件，可是新加坡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要依靠外来的投资。当然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新加坡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对于工业化的成功与失败是有很大的关系。

假如有很多人来投资的话，你一定要使那些人相信，他们的利益不会在一种好像“国有化”各种各样的口号下受到牺牲。

问：我想再问你一个关于法律上的问题，因为你是读法科的，你已经讲过很多，在议会民主制度下的司法独立性，你有没有对非民主制度下的司法制度有些研究，请发表一些意见。

林：非民主的，在这方面我没什么研究，到底他们的司法制度是怎么样的。

问：你读法科的时候，没有研究这些问题？

林：一般的理论是接触过了，比如说：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法律是统治者用以压迫被统治者的工具，这是一种看法，虽然我在课本里头有读过，但是我并没有深刻的研究。

问：林先生，我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你考到伦敦大学法科学位，刚才你说，你将到外国去留学，那么，不久你就要释放，是不是会当律师……

林：在一个时期之内，或许是一两年之内，我会留在本邦，至于在新加坡会在律师楼里实习，或者在其他地方工作呢，我还没有确定。

问：那么，你是想把律师当作你一生的职业了？

林：我目前没有这样的打算，实际上我读法科，不一定是想做一个律师。

问：谢谢林先生，解答了很多问题。

林：谢谢，谢谢！

风 雨
共一程

与孙罗文的交情

时代风向标 50年代学运核心人物

1954年，我进入华中就读高中一年级，孙罗文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那风一样飞扬的名字，我居然和他结伴翱翔了一段长长的日子，并肩而行，那般近。

那一年的5月13日，为了要求豁免殖民地政府新颁布的国民服役，数千名来自星加坡不同华文中学的在籍生行动了，他们集体前往总督府请愿，结果遭警方强行驱散，造成了流血事件。5月18日，全星华文中学生凝集力量，在中华总商会成立了一个55人的“要求豁免国民服役代表团”，孙罗文脱颖而出，被选为代表团主席。孙罗文口才伶俐、分析力强，加上来自土生华人家庭，英文根底好，他迅速成为同学们心服口服的领袖，一座学运的风向标。中学联，创建了孙罗文的群众舞台，从此叫他叱咤于时代的风口浪尖。

五一三事件后，孙罗文一方面通过各校干部，号召、团结、动员全星华文中学生以行动支持正义斗争，另一方面领导“免役代表团”出入中华总商会、怡和轩俱乐部、各重要华人机构、马来亚大学校园、马来学生组织，争取各界支持学生的行动与诉求。孙罗文是50年代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在他的领导下，学生运动自五一三事件后节节推进，成了50年代反殖民地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

众望所归 当选中学联主席

孙罗文大我三岁，但只高我一班，算是个超龄生。1955年“复课斗争”时，我参与了在华中的集中活动，在“维护华文教育委员会”（维委）的秘书处帮忙，第一次接近了孙罗文。那时他还在领导“免役代表团”处理“五一三”的后续发展和争取“中学联”注册事宜，他虽不是“维委”正式成员，却仍是那场斗争的灵魂人物。从那刻起，他坚定而从容的语调、严肃的脸孔、让人肃然起敬的神采多年来深藏于我的记忆。他和我们几位只能卖弄点笔墨的同学很合得来，也谈得来，他是我们的导师。

1955年底中学联获准注册后，华中同学举行会员大会，选举代表出席中学联的“校代表大会”。孙罗文在大会上亲自提名我为华中



■ 孙罗文，当年魅力不可挡的学生运动领袖。

代表之一，我也在“校代表大会”获选为中学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复选时被推举出任学术部主任，孙罗文获选为主席。我是高中部的插班生，比起很多从初中一年级就进来华中的同学，我是个“新客”。活动不过几个月，不善言辞，认识我的同学（特别是低年级同学）也不多，却能进入中学联中央委员会服务，更受命为一个部门的主任，我想，这分明是孙罗文对我的信任。

1955年10月30日中学联在快乐世界举行成立大会，孙罗文致辞时指出，学生的基本权利和任务是学习，中学联要为同学们争取更好的学习环境和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着开会议决，以“搞好学习、加强团结”为第一年的会务方针。为了贯彻会务方针，学术部肩负了繁重的任务。坦白说，学术部该做些什么具体工作，如何组织，如何开展，当初很大程度上我得靠孙罗文面授机宜。还好我跟得快，我们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执委会也成立了一个中央宣传指导委员会，协助各部门推广工作。

中学联被封 孙罗文被捕

中学联成立那年正值孙罗文的高中毕业年，但章程允许他继续留在中学联服务两年。翌年年初，他到南大升学报读历

史系。中学联的会所在加东，一西一东，两地距离遥远，但是中学联的会议或活动，他都出席不误。没多久，孙罗文离开南大，到后港三条石振南小学当代课老师。由于中学联学术部的工作繁多，时时需要听取领导的意见，我和孙罗文的接触自然频密些。我每天放学就到中学联会所去，后来索性留宿会所。常和我一起留宿的还有王鹤群、吴有发、陈再聪等人。我们四人都是烟鬼，但我们都敬畏孙罗文，抽烟时都不让他看见，因为他会不客气地训斥我们。会所是座浮脚楼，楼底下是我们的“鸦片间”，也是我们过夜的地方。

当时孙罗文在同学中的威信至高无上，对很多同学（包括我）来说，他是绝对的偶像。开会讨论问题时，他常等大家发言后才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以理服人，一般上大家都会听他的。只是日子久了，我感觉到中央执行委员会里有几个人意见常与孙罗文相左，看似有宗派主义在作祟。多年后在牢里相处，他说当时学生界的确有不同的小集团，凡事都想左右中学联的决策。今日回想，在那风起云涌的时代，领导一支像中学联这样庞大的队伍，确实得有几分能耐，欠斤缺两，干不成事。

1956年9月24日殖民政府强行解散中学联，10月1日孙罗文在东陵的光艺戏院附近被政治部人员逮捕。隔年8月22日，我也

被捕，两人同在公安法令下遭扣留，分关两处。1959年6月，行动党上台组织政府，我们并没因此获得自由。棋樟山拘留营，我们重逢，漫漫长夜，促膝回忆中学联，点滴在心头。

坎坷少年路 土生华人家庭的异数

在一起的日子久了，知道了更多孙罗文的背景，他的少年路，坎坷曲折。1934年，孙罗文诞生于后港的小商人之家。8岁那年，日军占领了新加坡，怀疑他父亲涉及抗日活动，要逮捕他。第一次他成功逃脱，但没多久就被逮着，从此一去不返。孙罗文的父亲嗜杯中物，亲戚不多，所以他自小与母亲和外婆一家的关系比较密切。外婆信基督，传送给孙罗文兄妹家庭温暖。

孙罗文的外曾祖父是侨领，乐善好施，是史学家宋旺相笔下的人物。生为土生华人，外婆家讲的是不合文法、夹杂英语和福建话的巴刹马来话。他父亲死后，母亲当家佣干活养家。在棋樟山拘留营的日子里，几乎每周的家属会见日，我都会见到孙罗文的母亲到访，一看她就是那个历经沧桑的妇女，不过为人却乐观、豪爽。

约七岁那年，孙罗文进入后港的美以美英校就读。二年级没念完，日军汹汹来犯，生活顿时失序，他只好辍学。日治

期间，他在光洋小学读日文。和平后，舅父要他去圣安德烈继续读英文，可惜迟了一天报名，因满额而被拒。外祖母认识光洋小学校长吴福临，他便报了名读华校。隔年，外祖母与他商量，问他要不要再去圣安德烈报读英校。他觉得自己对华文有了感情，也觉得做峇峇或会被歧视，加上大舅也对他说，读华校更有出路，读英校只能当个书记，他就此留在光洋读完小学。

光洋有位名叫蓝善元的老师，思想左倾，积极引导学生阅读南侨日报与其他左派书报。在蓝老师以及当时中国局势的影响下，孙罗文成了一个具有理念、思想激进的热血青年。孙罗文在校是个高才生，功课好，英文特别强；年年名列前茅，连任班长。他在光洋有个朋友圈，感情好，志趣相投；但是他口齿伶俐、能言善辩，早就显现领袖的才能。小学毕业后，很多同学到华中升学，可是孙罗文家穷，去不了。他写了一封长信，投书南侨日报，希望得到帮助往中国深造。文章刊登后，引起华中董事长李光前的关切，给了助学金让他就读华中。

铁窗八载 孙罗文决定“转型”

孙罗文与李光耀的关系本来良好。李光耀和女皇律师布里特同是“5.13”事件被控的学生的辩护律师，他也是协助争取中学



孙罗文（站立于后）作者（前左）与拘留营主任Emile Goh（前右）
合摄于棋樟山海边。

联注册的律师之一。1954年底人民行动党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成立大会，孙罗文带领了不少华中同学前去捧场。

□ 275

华校生和工人在1959年扶持行动党上台，行动党上台后却没释放我们，还把我们押到棋樟山去，我们的未来夜长梦多，孙罗文特别失望。拘留所里，我们的住房相连，因此时常一起对着窗外绿林哼唱，他爱唱《哈罗哈罗，万隆》这首歌。当年他带领中学联代表团参加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学生会议时，这首歌流行一时。后来我们发现彼此的房间天花板上竟然都装置了窃听器，一种莫名的敌意油然而生。我和其他几位难友的拘留令最先到期，当我们接到行

动党政府签发的延长拘留令时，孙罗文受到很大的打击，渐渐消沉。他原是拘留营生活委员会主席，从此消极乏劲。几个月后，顾合利取代他，领导生活委员会。

1960年农历新年，我们获准回家过年，回营后孙罗文对我说：“朋友告诉我，必要时不妨转右，从右再转左容易，从左要转右就难！”坦白说，我悟不出个中奥义，只能一笑置之。不过孙罗文看来是认真的，说到做到，他开始讲些令人难于理解的话，也刻意表现得与牢友格格不入。

1963年“冷藏行动”过后，我们被押回樟宜监狱，同几十位新进来的政治犯关在一起。新人当中有好多人原是孙罗文的同学或朋友，但我觉察不出他对故友重逢的特别感受。大部分时间他留在自己房里，而我忙着应付考试，也少和他交谈。没多久，他被调走了。他获释了，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他，他讲的话令大家愤怒和失望。

要是孙罗文令他的昔日老友难以释怀，更多还是因为他获释后的言行。1966年我获释后到土地局工作，孙罗文在青年领袖训练中心服务。有一天，他兴冲冲来找我，建议一齐去见林清祥，说服他表明立场，争取出来。我不明白他的来意和动机，也没想到要向他多问，只觉得他似乎还是‘胸怀大志’，

心里难免有些反感。后来我聆听他存于国家档案局的口述历史，他说，当年在学生运动呼风唤雨，脑里想的，是要学外祖父那种“光宗耀祖”的榜样。他讲的是否是真心话，我这个“老朋友”也无从判断。

很多老友刻意回避孙罗文，不与他来往。林清祥不以为然，在他的劝说和安排下，孙罗文出席了幾次牢友农历新年聚餐会。

人生多风雨。大家毕竟是同学、战友和难友，我始终与孙罗文保持友好关系，我忙于工作，每次见面都是他到律师馆找我。1998年我退休后，不是出国就是忙于怡和轩活动，鲜有时间回律师楼，和孙罗文见面的机会更少了。记得最后一次是他陪史立华一起到律师馆找我，他们两人膝盖都有毛病，步履维艰地随着我从柏龄大厦走到书城用餐。

叱咤青少 晚年病来磨

2007年，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团体圆切线举办了名为“逍遥游”的图片展览，展出50至60年代学生活动的图片。展览会结束后的某一天，一位展出负责人告诉我，孙罗文也曾前来参观图片展，不过他刚刚心脏病发作，躺在中央医院急救病房里。

我打电话到孙罗文家里，家人说他动了手术，已回家休养。我到义顺他家探访，他虽身体微弱，但精神尚可，已能下床走动。他没多说话，反而是他太太刘凤贤把他得病的经过全告诉了我。原来他心脏不好，心血管堵塞导致心肌时常绞痛。他一向讳疾忌医，只靠止痛药缓解疼痛。数周前，夫妇俩乘坐长途巴士到马来西亚旅游，一路北上槟城。回程途中孙罗文突感不适，心肌绞痛得很厉害，服完随身携带的四十几颗止痛药，依然无效。来到大士第二通道，他不支倒地，紧急送院。医生告知除了开刀，别无他法。可是孙罗文血糖高，又有轻微中风的历史，医生向家人坦言，动手术风险大，家人只得把全部希望托付在医生身上。上苍保佑，手术顺利完成，孙罗文脱了险。

孙罗文原是巴耶礼峇卫理教会的基督信徒，结婚后随太太改信天主教。太太是个护士，她说丈夫是个不愿求医、不愿服药的“顽固病人”。她透露，他们的儿子定了亲，未过门的媳妇来自江浙，已择定良辰吉日，就希望他赶紧痊愈，一起到中国参加婚礼。我转头向老朋友说，我自己50岁那年就接受心脏绕道手术，定时检查，听医生的话定时吃药，好歹也过了20余年。我劝他好好照顾自己，当上了爷爷，人生别有乐趣。谈到这里，我发现老朋友眯着眼睛，不断微笑，含着满足和信心。

怀念他 不一般岁月的一段情谊

2009年《白衣人》发布会过后几天，孙罗文太太在电话上告诉我，孙罗文不行了。我赶到他家，他直躺在床上，闭目，不语。自心脏手术后，孙罗文元气大伤，陪家人到中国为儿子娶亲归来，糖尿病愈发严重，多病来磨，他逐渐显现老人痴呆的迹象。有一天他在家不慎跌倒，撕裂了臀部韧带，就医后健康每况愈下。在宏茂桥护理中心躺了几个月，他始终下不了床，总是闭起眼，不说话。家人看不到任何进展，索性带他回家，亲自照顾。我来到他床前，叫了他，他张目看了一眼，没说话。太太报上我的名字，问他是否认得我。他开口回答：“清祥的弟弟”，停一阵又说，“清祥死了”！看来他神智清醒，我提了几个老友的名字，他都点头反应。坐了一会儿，我便向他告辞。

2010年初，我出席农历年初三的老友聚餐会后，决定再去看望孙罗文。他太太说，他还是那样，整天躺着，闭起眼睛不说话，不过能吃能排泄，偶尔教会的朋友会过来，用轮椅陪他下楼走走。我问候他，问他是否记得当年中学联的副主席李淑慧，当我告知她死了，他立即反问：“啊，什么，死了啊？”他的表情是不信、惊讶、感叹。接着他又陷入沉默，当时我



孙罗文出席了数次牢友新年聚餐会。

(坐者右起陈文光、曾广营、陈国本、李思东、叶永明；站者右起王英展、李文忠、黄仲仁、孙罗文。)

想，老朋友似乎决心不再睁眼看这世界，不再向这世界发出了点声音。

数月后，一连几天孙罗文吃了东西就呕吐，太太把他送进邱德拔医院，不料隔天他就撒手西归了。报馆记者找上我，问我有何感想。我说在50年代，孙罗文是我的偶像，他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贡献大，功不可没。后来我们各走各的路，但是一直是朋友。

林福寿医生说过，“不合理的长期拘禁，让被拘留者在看不到出去的希望下而动摇。我们不应该责怪孙罗文，应该责怪的是内部治安法令的不合理拘禁。”孙罗文始终是我的朋友，我不想、也不知道如何评论他的历史地位；我愿意着墨记录与他的交往，因为我珍惜与他在不一般岁月的一段情谊。

温文
尔雅

尊敬的陈仰成老师



我們要求政府尊重人權的保障!

我們要讀

送我

华中、南中两校同学在皇后坊立法院前示威，

要求释放陈仰成老师。



■ 首席部长马绍尔接见两校学生代表及校长，谈论陈仰成老师被拘留的事。

(背向镜头左起马绍尔、郑安仑、胡铁鹏、未详；

面向镜头左起刘佩金、陈民光、梁国新、陈妙华、未详、未详；站立者左起柳春基、郑有领、黄书桂)



■ 南中同学排队签署致首席部长的抗议信。

五六十年代的华中同学，很少人不知道陈仰成老师。就在今年1月3日，陈老师走了，噩耗传开，大家无限感慨在心头。

1954年在华中念高中一年级时，陈老师教我历史，直到隔年他被捕为止。在这之前，我的大哥清吉和二哥清祥都是他的学生。

陈老师的历史课，一直都是同学们津津乐道的事。他常把历史和时事结合，以一种谈

古论今的方法，让学生觉得历史其实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镜子里会找到自己的影子。他以独特的教学方法，循循善诱，激发起我们求知的欲望，开拓了我们人生的视野。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课，是1954年报上刊出有关左翼人士组织人民行动党的消息。他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及发起人的背景，相当准确地认定，这个新政党将会是很有作为的政党。他自豪地向我们说，发起人之一方水双是他的学生，他原来的名字是方子范。

在课堂外，陈老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很少看到他和任何同学多说话，同学们课外活动的场所，也少见他的影子。温文尔雅的儒士风度，有时近乎羞答答的谦逊举止，是陈老师留给同学难忘的印象。

陈老师在同个时期也是南洋女中的历史老师。师母王映雪就是陈老师的学生，她出身名门闺秀，父亲是银行买办。那一段师生恋，是当年华中与南中两校广为流传的佳话。

1954年五一三事件后，全新华文中学生华中集中，要求学生延缓服务兵役，大群工友相继前来慰问和支持。1955年5月发生福利工潮，华文中学生深感义不容辞，天天到亚历山大路的巴士车场慰劳罢工的工友。殖民政府接着宣布关闭华中与中正，导致五一三事件后的另一轮学潮。全新华文中学生分别

在华中与中正同学集中抗议，立法议院各党派议员出面斡旋，殖民政府最后无条件让步，让两间学校复课。

想不到殖民政府秋后算账，事后动用公安法令，逮捕工运人士方水双，也逮捕了陈老师。集中期间我在代表团秘书处工作，事情看得相当清楚，陈老师根本没有涉及学生们的行动。对于陈老师的被捕，同学们群起抗议，高举布条列队前往首席部长的办公室请愿。过了没几个月，陈老师终于重获自由，但却永远被剥夺了重执教鞭的权利。

多年前我在伦敦档案处翻阅解密的官方文件时，曾尝试找出当年殖民政府扣留陈老师的真正原因，但不得要领，只找到当年首席部长马绍尔会见学生代表团的会谈记录。冗长的会谈记录显示马绍尔的确花了很长时间，耐心地和学生代表对话。对于学生代表的追问，马绍尔始终说不出需要扣留陈老师的理由。他重复对学生代表说：“你们年纪小，很多事情不知道。不过放心，陈老师很快就要到英国去了，你们好好回去读书吧。”

那天到殡仪馆探丧，向师母王映雪探问这件事，原来她父亲曾托人要求马绍尔的协助，早日恢复陈老师的自由。她说：“确有其事。马绍尔建议我父亲送仰成到英国去读书，别再回华中教书。孙罗文听到消息，前来提醒我父亲，那可能是

变相驱逐，因为仰成是外地出生的”。另一个原因，那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还不到一年，刚做外公的也不舍得与他离得太远。

陈老师祖籍福建泉州，与我算是同乡。双亲移民缅甸仰光，陈老师于1922年在仰光出生，他的名字由此而得。几个弟妹也都在仰光出生，长大后回中国受教育。陈老师本来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就读历史，由于战乱，转读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毕业时正逢国共酝酿内战，本来有意前往台湾进行研究工作，不料亲友建议他南来，想到马来亚教书。

1947年南来途中，命运的安排，让他结识了同船的郑安仑。1936年郑安仑在清华大学毕业后，曾返新在华中短暂执教。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国参加后方的救亡工作，先后在昆明、兰州和西安讲学。1947年返新原是为了探亲，准备再回上海大厦大学当教授。不料华中薛永黍校长因故于1948年辞职，李光前决定聘请郑安仑出任华中校长，陈老师也就跟着郑安仑到华中当历史老师。

1955年陈老师被逼放弃了在华中的教师生涯。南洋大学成立后，据说校方本来有意聘请他去当历史讲师，但始终不得要领。走头无路，陈老师只好到岳父的银行当职员。师母王映雪说：“他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一颗菩萨心肠，对客户有求必

应，结果是呆账一大串，上面的人总是不高兴”。退休年龄一到，陈老师也就离开银行，到妻舅的专业事务所，协助一些行政工作。

师母眼里的陈老师，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也是一个好大哥。自从他当年离家南来，即便自己生活潦倒，也想尽办法在多方面帮忙在大陆和仰光的弟妹。谈到陈老师家人，师母王映雪饶有兴致地特别提到陈家的老三。这个弟弟跟着国民党到台湾去，当了空军飞行员。有一次在福建沿海执行任务，给大陆的炮火射中后掉入海里，渔民把他救了，最后定居大陆。

陈老师育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子学的是会计，目前在上海做事。女儿留学英国后，嫁到香港。虽然接近九十高龄，陈老师本来身体还算硬朗，希望能见到长孙成家，岂料那一天不慎身子一摔，入院住了几天，竟于1月3日与世长辞。

出殡那天，我再到殡仪馆见他最后一面。陈老师本有教育英才之志，却未能伸展才能，胸中难免郁结愤懑。他虽安详躺着，我却依稀见他似有白发三千丈！

安息吧，陈老师！

写于2011年2月15日



华中与南中同学集会，
抗议无理拘留陈仰成老师。

正 气
凜 然

勇敢的林福寿医生

引言

1963年的某一天，我从棋樟山被押回樟宜监狱，关进E座牢房，在那里第一次遇见了林福寿医生。1965年我被调到不设防的自由营，就此离开了他。1982年林医生获释后，我们时有来往。2012年4月12日，我前去林医生位于如切台的住家拜访他们夫妇，没想到那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聚会。2012年6月4日林医生溘然逝世，7月11日众亲友在中华总商会礼堂举行一个庄严追思会，以下为我在追思会上的讲话。

■ 296

“1963年我在樟宜监牢第一次见到林福寿医生，那时我已经在牢里度过了六个年头。1956年与1957年有好几百个人在公安法令下被扣留，很多人被驱逐出境，也有些人陆续被释放。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时，牢里剩下约70多名政治犯。新政府释放了8个他们认为不得不释放的领袖级人物后，我们都以为，三几个月就会陆续获得自由。没有想到，上了台后，新政府倒戈相向，与扶持他们上台的左派人士划分界限，我们，还在牢里的人，成为了行动党政府进行内斗的政治筹码。

“1966年我获得释放，坐了九年牢，原以为已经是做了很大的牺牲。没有想到，后来的人，像林福寿医生那样，竟然可以坚持上10几年、20年、甚至30年。回想起来，自己是太渺小了！”



■ 站者左起林福寿、陈宗孟、作者；坐者赛·查哈里。

□ 297



■ 站者左起作者、陈仁贵、Jomo K、林福寿；坐者沙末·伊斯迈。

“林福寿医生和那些更早离开了我们的战友如林清祥、Sidney Woodhull、James Puthuchaery、A. Mahadewa、Salahudin Ghouse、Samad Ishmail、林史宾等人一样，都是50年代新加坡历史上所出现的最优秀的政治领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就是结束殖民地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60年代初，他们反对由英国殖民统治者与新马两地当权派所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个行不通的计划，事实证明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当时有人说，左派人士反对马来西亚，因为他们害怕受到以巫统为主导的中央政府的镇压。林清祥曾经反驳这种说法，他说，作为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人士，他们随时准备牺牲，准备坐牢。事实上，在马来西亚正式成立前，他们就在1963年的冷藏行动下被拘留。1965年新加坡被赶出马来西亚，他们继续被拘留，比起他们那些同时在冷藏行动下被拘留、但被驱逐到马来西亚去的同伴，他们在新加坡被拘留得更长久，有些人家庭被拆散，有些人因此失去了传宗接代的机会。

“1972年林福寿医生从牢里通过TT Rajah律师与他太太陈宗孟医生所发表的那份公开声明，我相信大家都读过。这篇声明，可以说是所有政治拘留者的集体控诉书。很少人能有林福寿医生那样的勇气，以那样坚定的态度和语气，表现出那种威武不能屈

的精神，这篇声明，使我想起文天祥的正气歌，想起历史上英雄人物那种万古常存的浩然之气！林福寿医生正气凛然，他因此付出代价，多坐了11年的牢。1982年出狱后，他继续战斗，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从没有间断。

“林福寿医生受英文教育，和受华文教育的人毫无隔阂，正如林清祥受华文教育，也和受英文教育的人毫无隔阂一样。他们都是具有恢宏大志的领袖，通过传播人生最崇高的理念和价值观团结各民族人士。对于他们来说，语言，教育，和文化的差异从来就不是团结各族人民的障碍。

“除了那些想要摧毁他们的理想与意志的人之外，林福寿，就像他当年的战友林清祥等人一样，没有敌人，只有朋友。没有私心，只有一心一意为民服务的精神。1959年行动党上台后不久，内部矛盾表面化、面对分裂时，林清祥、林福寿等先辈为了顾全大局，曾经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希望各方共同把反殖民地运动推行到底。他们并不寻求高官厚禄，没想到要做部长、议员、或政治秘书，他们想做的，是作为社会基层的真正代表，作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但不为行动党当权派接受。具有宽大心胸、包容与谦让精神、真正能为各阶层人民谋福利的人被剥夺了为国家效劳的机会，是国家无可弥补的损失，是再多的经济成长或物质财富也弥补不了的损失。

“现在我们的社会贫富两极化，才想起应该建立一个包容性的社会。我觉得，有些事还是必须从头、从根本做起。正面肯定所有曾经为反对殖民地主义运动、为民族事业、为奠定现代化新加坡基础作出牺牲与贡献的人士应有的历史地位与尊严，停止对他们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抹黑与丑化运动，发扬他们宝贵的精神遗产，才是建立一个包容性社会的必要过程。

“去年我们在这里缅怀陈仁贵，今天我们缅怀林福寿医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也应该想起所有离我们而去的其他朋友。单单去年，陈仁贵去世后，我们的好友黄金汉、丘友才、陈世镹也都静静地走了。人的生命有长有短，一个人只要在他有生之年，曾经踏实地为国家与民族事业作出奉献，他的一生就应该算是有意义的一生。自古以来，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一场为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结果。这是一条前仆后



■ 陈仁贵



■ 丘友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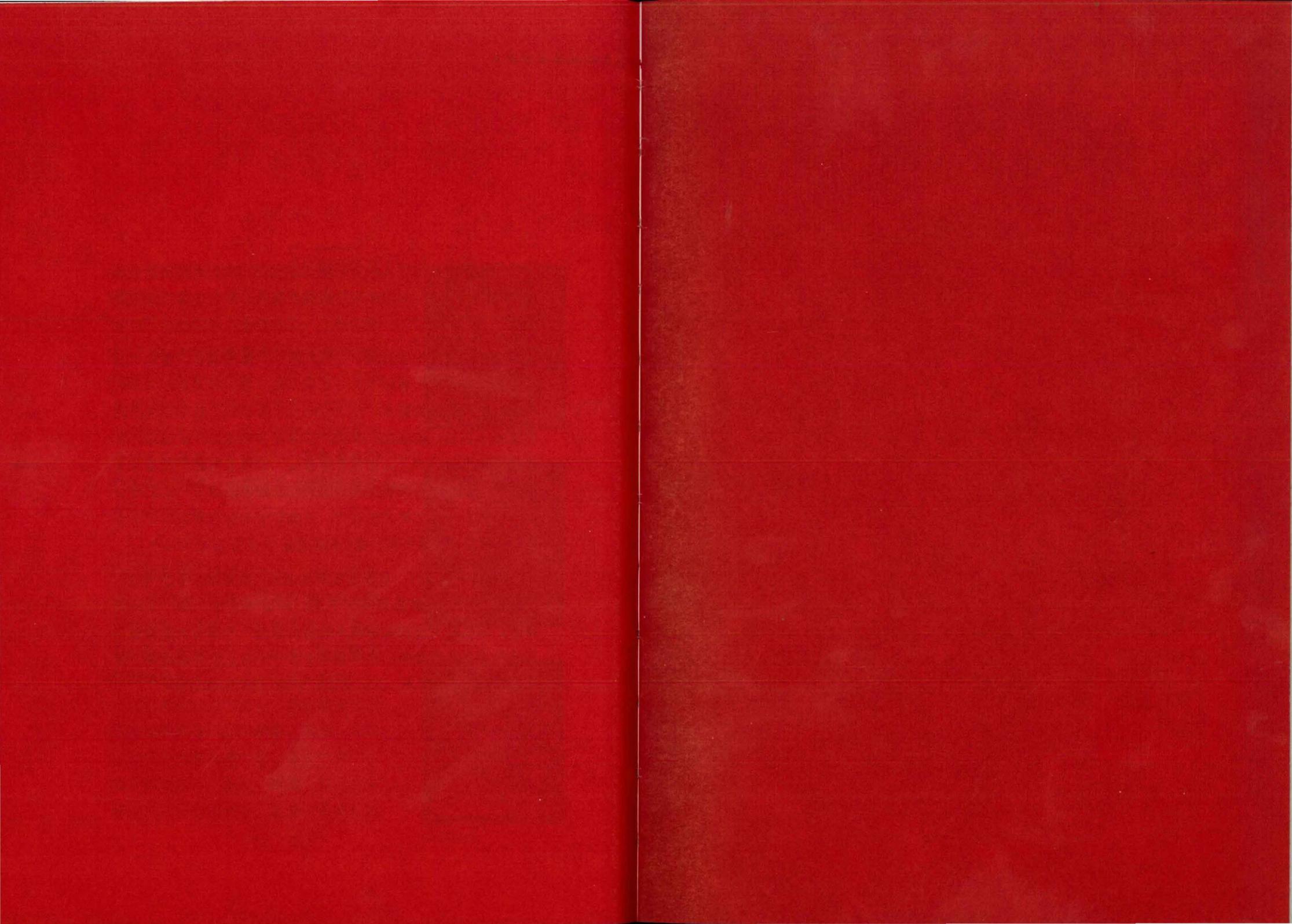


■ 陈世镹

继的漫长道路，没有人敢肯定终点在那里，没有人可能自夸自己已经走到终点，更没人有资格指着别人，说人家是个走不到终点的人。

“中国有个作家说过，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林福寿医生并没有死，那天在光明山与我们告别的，只是他的躯体。他已经离开了那躯体，他的灵魂和精神将永不消失，就在我们身边，等着我们去感受，去追随。今天我们相聚一起的人，来自各方各面，对很多问题可能看法不尽相同，但是我们同样受到林福寿医生精神的感召，我们应该不分你我他，寻求更多的认同，才能有个共同的愿景，才不会辜负林福寿医生等先辈对我们的期望。

“今年4月12日，我和朋友到林福寿医生家探访他们夫妇，把他们动人的故事简单写了下来。林福寿医生夫妇一生同甘共苦，可说是大时代的楷模。他们的经历，是新马人民反殖、反帝历史灿烂的篇章。我要求林太太——宗孟医生站起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向陈宗孟医生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琐事
真情

二哥活在我心中

——为纪念二哥逝世18周年而写

一张家庭照的故事

二哥清祥是显赫的历史人物，却常自认是个平凡人。身为他的弟辈，手足间的蒙尘琐事，藏着我许多无法割舍的记忆，他的身影，总是萦绕，长留我心。

二哥大我四岁。他出生那年（1933年），世界陷入经济大萧条的恐慌中。我出生那年（1937年），日本军全面入侵中国，震撼五湖四海，撩起海外华人沸腾热血。二哥记忆里的叔叔（父亲唯一的弟弟）是热血青年，常讲述爱国故事、唱抗战歌曲给他听，叔叔是二哥的偶像。当时陈嘉庚在南洋掀起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思潮，透过叔叔的言行，在二哥心田播下了种子。

1942年日军攻占马来亚，逃难期间我们家被烧毁，财物荡然。母亲随身细软中藏着一张旧照，是林家硕果仅存的战前家庭合影，但二哥不在其中。二哥儿时的模样，我了无印象。

这是一张专业相馆拍摄的家庭照，为何二哥和其他姐妹不在其中？我年少时常问母亲，她向来话不多，常半开玩笑地说，“你二哥阿祥吗，他是买回来的！”根据大哥的回忆，有一天我们从小笨珍到新加坡探访三姨丈，住宿大坡南天酒店，照片就在南天酒店的摄影室拍摄。1939年叔叔响应陈嘉庚的号召，参加南侨机工队前赴滇缅公路。此后祖母日思夜念，常常



■ 二战前的家庭合影
——为什么只有父母亲、大哥与我？



■ 叔叔是南侨机工，
是二哥的偶像。
(摄于70年代)

抱着我们兄弟号啕大哭。二哥没跟我们出来新加坡，是母亲把他留在家中陪伴祖母，同时照顾两个妹妹。

母亲曾珍藏这张照片，后来交大姐收存，保留至今。照片上看来我约略三四岁，大哥十岁光景。父亲一身白色套装，文质彬彬；母亲传统唐装，端庄大方；大哥长裤大衣，翩翩一少年；我则吊带童装，面带傻气。母亲穿高跟鞋，父亲、大哥和我穿皮鞋。从照片看，那原是一个快乐的小康之家，战争，却毁了它！

3年8个月战乱期间，大哥与二哥为父母亲分忧，挑起了生活担子。有个时期我们一家分别住在甘榜里的店屋和靠海渔村的木屋，二哥两头跑，主要的工作是在店里帮忙，同时照顾年幼的弟妹。大哥常说，二哥从小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相当冷静、能挑大梁的人。

1945年战争结束，二哥回小笨珍培群小学复学，直到小学毕业。1949年二哥离家到新加坡深造，已是个饱受战乱煎熬、志在四方的青年。

李光耀：“会坐牢的，你怕吗？”

1953年我初中毕业后离开小笨珍，到华中念高中。抵达新加坡那天，二哥到车站迎接我，一身打扮不像是个学生。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因参加学潮而被开除，到某职工会做事。

人
列

1955年初某一天，父亲兴致高昂到学校找我。他说，“你哥哥清祥要做官了！明天我们一起去找他。”父亲从报上获悉，二哥就要代表人民行动党参加立法议会选举。隔天我应约到父亲位于陈桂兰街的工作地点，两人从那里步行到密驼路的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上了二楼，父亲发现二哥就在前面的小房间里，示意我在外等候，他自己进房间去。没多久，父亲出来，脸色不悦。二哥跟着踏出房门，问我是否能留下参加他的竞选工作团队。父亲离开后，二哥对我说，“父亲幻想多多，以为我这就要发财了。他居然说他可以帮忙我，有些事情我不便出面的话，他可以代为出面！他真是异想天开啊！”我问他如何打发了父亲，他说，“我好生气啊。把他训了一顿，还叫他慢慢等，迟早他要到监牢探望我。”

我能够理解二哥的态度，父亲或许不自觉地伤了他的自尊。但是他对父亲如此不近人情的苛责，我为父亲难过。从那天开始，我心中的二哥变成了巨人，他不仅仅是我们林家的好弟兄，他有了一个更大的家，更多的兄弟姐妹。之后我投身狂热的竞选活动，追逐他的风采。二哥中学都没念完，论理那么清晰，语言那么丰富。他的智慧、语言、力量来自他和群众的亲切交往与互动。

回忆他的从政经过，二哥说当年他到职工会工作后，常和工友参加华校学生所组织的野餐活动。通过学生领袖的介

绍，1954年他认识了李光耀，受邀参与组织人民行动党。第一次见面时，李光耀对他说，“会坐牢的，你怕吗？”这直言明问，二哥并不诧异，他知道，这会是一个真正要结束殖民统治的政党，忠于这个政党奋斗目标的人都必须随时准备牺牲。二哥年方21，不会预想到，也可能不在意，人家要他打先锋。成立大会举行前，二哥在另一名发起人曾昭卓协助下，把建党宣言译成中文。那是一份涵盖当时新马政局各项课题、措辞激烈、反殖精神洋溢的万言书。二哥说，党内人得江山后，很快就将建党宣言给忘了。

1955年2月13日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邮政工友联合会的会所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正式宣布参加林德宪制下的立法议员选举时，李光耀亲自把二哥从台下拉上台，宣布他本人、二哥、吴秋泉、陈维忠、曾昭卓为行动党候选人。正式提名时，陈维忠和曾昭卓没参选，由蒂凡那取而代之。

那次选举，蒂凡那落选了。许多年后，李光耀说，“蒂凡那输了，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¹而今身在阴间的蒂凡那和二哥，听闻斯言，不禁要同时感叹，阳世阴间，如何分得清？

¹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页217

人民行動黨建黨宣言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由李光耀譯成中文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約有五萬萬七千萬的亞洲人民，已從殖民地制度的桎梏中獲得了自由。曾經支配着亞洲的命運數世紀，戰前仍是牢不可破的殖民地制度，在戰爭結束後的不及五年中，已被具有着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的亞洲人民所粉碎了。今天，亞洲人民的普遍覺悟，及他們為爭取人權與自由所具有的信心與決心，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摧毀的。正因爲這種趨勢，使到殖民地統治者在亞洲的基礎已幾乎整個地動搖了。

大家知道：馬來亞今天仍舊是存在於亞洲的少數殖民地之一，在這裏，要求獨立自主的呼聲越發高漲着，一些所謂「民族領袖們」，他們一面向人民誇耀着一個自由民主的馬來亞的美麗遠景；一方面却懷疑着馬來亞的六百萬人是否具有足夠的力量來管理自己。因此，當人民要求以行動去爭取獨立民主時，他們却表現出充份的猶疑與恐懼。

亞洲人民的鬥爭史實告訴我們：十二萬萬七千萬的亞洲人民既然能從避免災難中獲得自由，那麼，無疑的，馬來亞的六百萬人也將會同樣的獲得自由，人民行動黨完全有信心與決心去實現獨立民主的馬來亞國。

我們認爲：真正代表馬來亞人民利益的政黨，他們今天的迫切任務，應該是儘速終止殖民地主義。任何政黨，倘若其宗旨是在發展或改良殖民地主義，那麼，他們不僅是欺騙自己，同時也是愚弄人民。事實告訴我們：殖民地

政府乃被用來作爲建立與扶持殖民地性質的經濟與政治的工具而生存。任何花言巧語及表面的粉飾，都不可能掩飾殖民地主義的本質。

這就是說：任何改良政策，都是絕不可能改變馬來亞的現狀。不幸的是：戰前迄今，仍有甚多政黨及政治家確信可以通過改良的方式，自然而然的促使馬來亞的殖民地主義步上絕境。其實，這種對殖民地社會的本質毫無認識的看法，無疑是助長殖民地主義的發展吧！

我們完全不敢妄想以這樣的方式來實現獨立民主的馬來亞。雖然，戰後英政府在馬來亞實行了一連串的政治改革，但這種種憲制改革是在戰後馬來亞的政治、經濟處於極端危機下產生的；其目的是在形式上變換統治方式以應付目前環境，而在本質上仍是仍然有效的保留其利益。

爲了解釋殖民地社會的性質，首先，我們必須瞭解殖民地的經濟實質及這「實質與主權的關係。明顯地，馬來亞的經濟今天仍是附屬於英國的利益而存在的。英國穩固地控制着馬來亞的經濟，並驅使馬來亞的經濟作爲滿足其本國的對外政策而存在。誰都知道，英國在馬來亞所榨取的利潤，對解決其本國的經濟困難始終佔着重要地位。

一個國家統治着另一個國家，這種事實絕不能說是因爲兩個國民生長了友愛關係，殖民地主義者奪取殖民地時並不會花掉巨量財力，或犧牲大批兵員。由於殖民地統治者的利益和人

民的利益是處在對立的關係中，因此，殖民地主義者很少願意花大批的人力物力，去從事改善人民的生活。可是，殖民地主義統治者與其敵對者在爭奪殖民地的矛盾上，有時却使他們熱誠地扮出一副人道主義者的面孔，無情地丟掉擊敵對者在其所佔領的殖民地中所施行的非人道行爲。

殖民地統治者奪取殖民地完全是爲了自身的經濟利益。早在十九世紀時，一個有名的殖民地主義者底政論家張伯倫會說過：「帝國主義是商業！」這句話，這種強調經濟的論調在廿世紀仍然流行着。在一九四三年即爭取「四大自由」的鬥爭期間，英國殖民地大臣克蘭盧(Lord Cranborne)便會向國會警告說：「任何脫離照顧自己利益的立場者必須明白：你們本身的事業及生活是完全寄托在帝國的存」

「標榜着社會主義者的故員文，在一九四六年也會公然地說：「我不準備犧牲英帝國，因爲我知道如果英帝國墜落，……我們國民的生活水準就會降低得相當利害！」

以上的種種論調，使我們不難明白：殖民地統治者在附屬地區所建立與維持的經濟機構是爲了什麼。顯然地，殖民地的經濟是完全作爲發展與繁榮宗主國的經濟而存在的；它被允許只在在不損害宗主國利益的，及補助宗主國的經濟利益的發展下而存在。

馬來亞現有的經濟是殖民地性質的。惟有在馬來亞人民獲得了獨立後，馬來亞的經濟才能擺脫殖民地制度的束縛。

亲人——同条藤上的苦瓜

1956和1957年，二哥与我先后在公安法令下被拘留。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二哥与另几位前行动党党要获得释放。我则多等了7年，直到1966年才获释。1963年，二哥在《冷藏行动》下再度被捕入狱，1969年因健康问题宣布退出政治，前往英国就医。那个风烈雨暴的时代，许多年轻人的共同出路就是蹲狱坐牢。青春摧残，家庭破裂，一些人甚至因为长期监禁而失去了传宗接代的机会。

二哥心感慰藉，他有个患难与共的家。二哥参政初期，做官发财的陈腐观念曾残留父亲脑海，但现实教育了他。在二哥政治生涯最严峻的时刻，父亲出任政治拘留者家属联谊会的筹备委员会主席，多次代表政治拘留者家属仗义发言，抨击当政者。二哥遗留下的笔记本，有若干描述父亲

的片言感语：“父亲在新加坡出生，受过几年小学教育，当过商家书记，经营过小商店。一生热心社会，曾任马华分部要职，学校、神庙理事等等。从不打骂孩子，吃尽苦头但常常幻想多多。我成为“红人”并坐了牢后，他的思想变得左倾，痛恨当权者。”

在二哥眼里，“母亲就像一副生产机器，每两年生产一次。不知道什么是产前与产后假期，总是在店里工作到产期前一天，产后隔天即刻出面在店里帮忙，记得我（二哥）很多时候当起弟妹的保姆。母亲生性倔强、独立、吃得起苦，但是对儿女的态度相对开明。在孩子面前，不管内心有多大委屈或痛苦，始终不会流露出来，是个令人尊敬的母亲。”

大哥本来在马来亚的华文小学教书，二哥在政坛崭露头角后，大哥的教书准证就无缘无故被吊销。后来他到南洋大学当图书管理员，60年代人民行动党左右派分裂，大哥也跟着被炒，从此含辛茹苦，靠教导马来文养育一家大小。大好青年怀才不遇，二哥常为大哥抱不平，“老大只读完初中，但是手不释卷，文学修养特别好。为人和蔼，有颗善良的心。生性则优柔寡断中带着偏执。为了是我兄弟的缘故，他先后失掉了两份工作。接着当马来文补习老师，搞马来文翻译，编马来文字典。他最适合搞文化工作，就可惜没有这个机会。”

对于我本人，二哥这么写道，“现在提提我三弟，像家里其他兄弟姐妹，他也是靠自学而有今天的，而他是自学中最成



■ 1959年6月4日二哥清祥出狱后，与前去欢迎的大哥清吉合照。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功者——在牢里念完高中，读完法科，现在是本地成功律师之一。他本来在小笨珍念完初中后，才到华中念高中。他给我的印象是，政治上认识并不深，可能是由于是我弟弟的关系，在华中居然成为学生领袖之一。之后，白白地去坐了九年牢，其实，政治上他也没有非革命不可的要求与表现。他生来乐观、聪明、有果断，具有着干哪一行都会成功的条件。”

当年我如何脱颖而出成为学生领袖？只因为我是林清祥的弟弟？牢里牢外，我和孙罗文相处的日子很长，有时谈到这件事时，他惯用的回答是，“是什么原因都好，我没有选错了人就是啦。”至于我为什么会被拘留，而且还在行动党政府手下继续被拘留多7年？二哥说得对，这与我们的兄弟关系绝对有关。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里，至少有十几次把我的名字和一些与我无关的事扯在一起，不外就是要找二哥的影子，把事情嫁祸于他。有意无意间，我成了历史舞台上的一个配角。

“平凡人”的低调岁月

1969年二哥前往英国，一呆十年，结了婚，养育了两个儿子。那阵子，他的健康时好时坏，又要打工过日子，生活并不安定。1975年父亲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二哥同家人回来守丧。逗留期间，二哥亲身观察了一个物事全非的社会。我主动

探讨二哥回来定居的意愿和可能性，几经周章，1979年二哥终于举家搬回新加坡。媒体冲着我而来，尝试追踪二哥回返的下落与未来动向，为了不打扰二哥，我把他们一支开。

我在自己与陈仁贵合伙的律师事务所为二哥安插职位，设法协助他适应新环境。他一时忙于安顿生活与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少与他人来往。我们的事务所后面就是高等法院，二哥喜欢抽空到法院图书馆溜达，因为那样的地方，少有熟人。不料某一天，高等法院法官A P Rajah诧异地发现了二哥，快手快脚把他拉进自己的密室，抱着他哭了起来。二哥还在伦敦时，A P Rajah是新加坡驻英最高专员，好几次派人找二哥，询问二哥在生活或其他事务上是否需要专员公署的协助，二哥一律回绝。二哥说，A P Rajah



■ 1975年我前往伦敦探望二哥。
(左起二嫂黄翠云、太太的侄女林春蝉、二哥、作者；前面站者是二哥长子子毅。)

原是前进步党人，对于他（二哥）在政治上所受待遇深表不平与同情。

1980年，在大哥陪伴下，二哥前往中国。一来旅游，二来顺便前往昆明探望叔叔。旅途中他突感不适，到了上海紧急入院，发现是心肌严重阻塞。他在上海华东医院留医三周后，大哥陪他回来，探望叔叔一事只好搁下。翌年，二哥前往澳洲接受心脏绕道手术，身体状况才逐渐复原。

这段期间，在健康与时间的许可下，二哥接见与拜访了大部分还可能在新加坡见到的昔日战友。陈仁贵、马哈迪瓦、赛·查哈里等人与他从往最密，他们经常一起到马来西亚造访老友。在一些社交场合，二哥会偶尔与一些退休的行动党人应酬，至于达官显要，则一律回避。蒂凡那原是二哥亲密战友，可是在二哥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倒戈相向。蒂凡那就职总统前夕，通过太太寻找二哥，说很想见二哥一面。一向重感情，宽以待人的二哥，决定还是去走一趟。我把二哥载到蒂凡那位于民东园的住家后面，从后门进去客厅。他们两人坐下谈话时，我在客厅一角看报纸。归途上，二哥说蒂凡那表示他心情很烦杂，也感到寂寞，希望能时常见面。从二哥的表情，我看不出他对这次会面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几年后蒂凡那不再做总统，有一次通过朋友转告二哥，说他人在马来西亚，希望二哥过长堤到新山见面，二哥没去。



■ 1993年同游廖内丹戎檳朗。
(左起二哥清祥、作者、马哈迪哇、陈仁贵、卢逸萍。)



■ 右起许贻猷、二哥、方水双、傅树介（摄于90年代初）。

二哥一向强调自己是个平凡的人，没有写回忆录或自传的需要。虽然常有来自各方的人士上门造访，一般上都是没有记录、海阔天空的闲聊。国家档案局显然不曾尝试要他作口述历史，但是1992年新加坡广播局曾经找他，要求与他做一个摄像访谈（Camera Interview）。二哥原以为是要他谈一般的时事问题，答应了下来。接到对方寄来的访谈题目时，才知道要谈的是他的过去。二哥觉得那不是、也不可能是让他厘清历史问题的可靠途径，决定推辞访谈。过后，二哥根据自己的记忆与手头资料，就新加坡广播局所拟定的问题，还有一些更早期的历史资料，亲手做了一份笔记，洋洋数万言（部分见附录二）。

1995年左右，二哥接受了Melanie Chew的访问，访谈记录收集于她的著作《Leaders of Singapore》，于1996年发布，这应该是二哥退出政坛后，绝无仅有的一次。

历史公论 必见天日

1996年2月5日近傍晚时分，我在律师事务所接见客户之际，二嫂紧急来电：“清祥不行了！我叫了救护车。”她语气慌乱，当下挂机，我来不及进一步询问。

二哥多年来为心肌绞痛所困，连日屡感不适。我知道当天中午他到依丽莎白医院做例常心脏检查，还拿了药回家，难道事情有了突变？二嫂的第二个电话紧接而来，果然是心脏病

发作，救护车载了二哥，在赶往陈笃生医院途中。离开事务所前，我摇了个电话给马哈迪瓦，取消和他原定的约会，顺便把二哥的情形告诉他。

我抵达陈笃生医院，太太与二嫂早已先到。急救室里，只见二哥全身布满急救仪器，不过医生已经停止操作。二嫂在一旁抽泣，我推动二哥的身体，喊他几声，毫无反应。马哈迪瓦冲了进来，高声喊着二哥的名字，可是二哥再也听不到，他走了！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晴天一霹雳，消受难。冰冷的急救室里，我们痴痴凝视着二哥的身躯，撕心裂肺，欲言无语，欲哭无泪啊！

二哥辞世的消息犹如山洪爆发，震撼各界。街坊巷尾，各类媒体，竞相报道，惋惜与褒扬之声，不绝于耳。连向来有系统地抹黑其声誉、抹杀其贡献的政治对手也不得不公开附和，对二哥的历史功绩与崇高品格美言一番。

二哥出殡前夕，蒂凡那从加拿大打电话给我，电话中他似在抽泣，讲不出话来，只说刚打了个电报给我们。他的电报出现在隔天的海峡时报，他这样告白：

“在50年代，不可抗拒的反殖民主义浪潮震撼了新加坡。林清祥是那个时代的领导和最响亮的声音。我曾经是他最亲密的同志，这一点，我从不后悔。行动党是骑在这个浪头上成为

第一个民选政府（如果不是完全独立的政府的话）。初期和继后的意见相左，是无法抹煞历史事实的。”

二哥逝世不及两个月，好友TT拉惹律师也走了。新马两地的朋友于1996年3月17日在吉隆坡为他们举行了一个庄严的追悼会，会后一群前马来亚劳工党人士建议为二哥出版一本纪念集子。陈凯希、林史宾和我为集子的出版做了筹备工作，收集了不少资料。我也与新加坡的好友陈国安整理了一篇题为《林清祥光辉的一生》（见附录一）的文章，简单介绍二哥的生平事迹。我们把文稿与照片交给前吉隆坡报人王锦发（也是我小学

同学），本想由他编辑出版，不料他半途就逝世，事情因而耽搁下来。我与王锦发太太取回资料，交给了前劳工党人士祝俊雄，他与他的朋友组成的《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编辑委员会接手负责编辑与出版。

2001年马来西亚著名学者（现任联合国经济发展署副秘书长）K S Jomo与已故新加坡律师陈仁贵在吉隆坡联合出版一本名为《历史长空的一颗明星》（Comet in Our Sky）的书，收集了几篇由独立学者所撰写，客观评论二哥历史地位的文献，其中包括剑桥历史教授TN Harper的《林清祥与“新加坡的故事”》、澳大利亚历史学者Greg Poulgrain的《林清祥在英属东南亚去殖民化过程的角色》、马来西亚资深政治家M K Rajakumar的《林清祥在新加坡历史上的地位》等。祝俊雄与他的朋友把这些文章译为华文，结合原有的资料，于2002年在吉隆坡出版了《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上下两集。

2013年11月，由历史学者孔莉莎、傅树介、陈国防编撰的《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50周年纪念》一书在新加坡出版，全面暴露了“冷藏行动”背后的阴谋诡计。

二哥在沉默中溘然而逝，一晃18年，但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将陆续浮现，历史公论自有伸张的一天。

写于2014年2月5日（二哥的忌日）

■ 320

■ 318



■ 1996年2月9日二哥出殡，众亲友在翡珑山凭吊场面。

□ 321

附录
之一

林清祥光辉的一生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1956年3月林清祥在花拉公园群众大会演讲。

时代哺育了他

正值世界陷入经济大萧条以及中日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林清祥于1933年2月28日诞生于新加坡直落亚逸街的一个商店小职员家里。暴风雨送他到人间来，此后风雨连绵，霹雳时作，他六十多年的人生旅程，也似乎无日不在狂风骤雨中奋勇前进。铁血交织的伟大时代哺育了他，拓展了他的视野，也同时塑造了他的性格，坚定了他的信念。

在大萧条的袭击之下，弹丸小岛新加坡蒙受的创伤尤为显著：锡和树胶的价格猛跌，出口锐减，商家和工厂相继倒闭，员工大量失业，生计艰难。林家父母一筹莫展，只好搬到柔佛小笨珍，另谋出路。在小笨珍，他们开了一间杂货店，赚取蝇头小利，以维持全家的基本生活。童龄的林清祥进入当地的培群小学读书，直到1942年日军南侵，学校被迫关闭才休学在家。

日治时期，林家也和其他村镇居民一样，为了躲避日军的迫害，逃到邻近的丛林深处去。大家赤手空拳，开辟芭地，养猪种菜，艰苦地熬过三年八个月。林清祥也就在这时候学会了养猪、养家禽、理家务、耕种，而在经历了差一点被日本兵逮捕的危险和目睹邻居惨遭日军杀害的种种事件后，他较早时期的一些模糊的政治与民族意识也加强了。

林清祥的政治与民族意识，早在五、六岁时就已经开始萌芽。那时，他唯一的叔叔响应陈嘉庚号召前往中国参加抗日活动。之前，叔叔常常抱着他学唱《中国不会亡》等抗日歌曲，同时他所就读的学校也悬挂孙中山遗照、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及唱国歌《三民主义》。他懵懵懂懂，也以中国为认同的对象。等到战后学校复办，他插入高小班级时，还读了所能找到的几乎所有有关中国民族英雄人物的通俗本传记。

1948年，林清祥在培群小学毕业。由于家里弟妹众多，父母负担沉重，无法让他继续升入中学，他只好暂时按下求知的热忱，到父亲友人的“洋土库”里当一名小员工，赚钱帮补家用。一年后，他辞别小笨珍，回到了诞生地新加坡。

面对民族解放浪潮的冲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德、日等“轴心国”在欧洲、北非和亚洲战场的全面战败而结束，西方老殖民主义者又以主子的姿态，重新回到并占领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但经历了战火蹂躏和备受帝国主义迫害的亚、非殖民地人民，再也不甘沦为永远被西方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奴隶，而要自己当家做主，主宰自己的命运。于是各地反殖民主义，寻求自治、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而又波澜壮阔地此起彼伏，相互照应，节节推进。

在国际大气候的冲击之下，英属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各族人民，也相应对殖民地政府的各种不合理的政策和措施展开猛烈反击；一时间，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蓬勃发展，融合各民族各阶层的政党以及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党也相继成立。

1946年1月24日，也就是殖民政府恢复统治马来亚约半年光景后，殖民政府为了分裂各民族日益坚定的团结，也同时为了维护本身和某些利益集团的权利，颁布了《马来亚和新加坡——关于未来的宪法的声明》白皮书，同年12月11日又颁布了《马来亚改制建议书》蓝皮书。前后二书的主要内容都是要把战前各自为政的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合并成为英属殖民地的马来亚联邦，新加坡则从战前的海峡殖民地划分出来，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以期达致“分而治之”的目的。殖民政府这种无视各民族人民意愿的倒行逆施，即刻触发两地工人的一系列罢工抗议。1948年2月1日，蓝皮书正式生效。同年6月20日，殖民政府同时颁布“紧急法令”，对付曾在抗日战争中与新马人民并肩作战的马来亚共产党及左派人士，马共被迫转入地下，发动武装斗争，而两地各民族人民的反殖斗争也跟着升温。

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向年轻的林清祥涌来。先是激起他潜藏已久的追求真理和正义的意识，鼓动他的勇气和决心，拓展他的视野，又使他最终投入反殖斗争的大潮里。

从三十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到战后反殖斗争，前后约二十年，为数众多的华校出身青年，总是义无反顾的站在战线的最前端。他们与殖民主义者战斗，出生入死，无憾无悔。较后，殖民政府利用他们与入侵日军作战，获胜之后，却又恐惧他们壮大的力量，而想尽方法，用尽手段来压制他们，扑灭他们。首当其冲的便是华文教育，特别是华文中学。1947年8月，殖民地政府的教育咨询会通过一项“十年教育计划”，为控制民族教育亮出第一招。1949年2月，新加坡华文中学举行联席会议，一致拒绝殖民政府别有用心的学校津贴方案；同年10月，华文中学学生会抵制《学校注册法令》。1950年5月，殖民政府御用的立法议会三读通过《学校注册法令修正案》，落实通过“学校注册”的手段来控制华文中学；同年9月，代理华校副提学司雷罗建议，华校依照英校制，一年改为三学期。这一建议随即遭到华校联合会一致反对。1951年底，华校中学生掀起学潮，抵制殖民政府教育政策下的会考制度。结果，参与罢考的学生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教育部强令学校开除。

短暂的中学生涯

林清祥于1949年间重返出生地新加坡，先在公教中学读了半年初中一，第二年即转入华侨中学，就读初中二。他踏进华侨中学校门的时候，社会上各民族人民的反殖斗争，正通过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等等全面展开；但华侨中学则面对殖民政府与日俱增的摧残与破坏。殖民政府不但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学生们敬爱的老校长薛永黍，将他投入狱中监禁至死，甚至进而勒令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关闭。著名报人洪丝丝当时就在他的时论里，再三针对两校的被令关闭事，发出了强烈的抗议。

林清祥正好处身在这个风雷激荡的大时代里。校外、校内发生的事情，对他几乎无一不是宝贵的教导和强烈的冲击。于是他积极学习课内与课外的知识，同时也热烈的参与种种护校和维护民族教育的活动。1951年年底，他也和多数初三毕业生一样，抵制会考，随即遭政治部拘捕审讯。过后虽无罪释放，但政治部并不干休，迫使校方把他开除学籍。

投身工人群众的队伍

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各民族人民的反殖斗争，随着亚、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连续取得胜利，而于1950年代初期渐

臻高峰。1952年，新加坡军港工人发动三次大罢工，其他行业工人热烈响应，给予殖民政府一记沉重打击，使它不得不准备改变统治方式。第二年10月，殖民政府指派以林德爵士为首的代表团来新加坡调查宪制；林清祥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投身工运，担任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樟宜分会的受薪秘书，并兼任巴耶礼峇分会秘书，把为工友争取福利并与迅速发展的反殖斗争相互结合起来。1954年2月，《林德宪制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其中的两个要点是：“把立法议会改组为民选议员组成的议会”，以及“组织部长会议以代替前此的行政会议，作为政府的最高决策机关”。同年4月，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成立，林清祥被推选为秘书长。5月13日，华校中学生为反对殖民政府强蛮推行的学生服役政策，结队到总督府请愿，当场为警方所殴打、镇压，并被拘捕六十多人，学生集中于华侨中学校园达二十多天以抗议警方的无理拘捕。这期间，所有华中文学停课，社团、工会、学生家长与各阶层人民一致支援学生，谴责殖民政府。这年里，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在林清祥的领导下，迅猛发展；到1955年底为止，会员已由成立之初的二百名增加到近三万名，成了当时新加坡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工会组织。

最年轻的人民代议士

1954年11月，一个名为“人民行动党”的新政党应运而生。秘书长李光耀于1950年8月由英国学成归来，最初担任邮电工友联合会的法律顾问，接着应邀担任数十间各行业工会及华校中学生组织“中学联”的法律顾问。由于这种渊源，人民行动党的诞生和初期发展，都和工运唇齿相依。第一届党员大会选出的14名中央执委会，就包括了两名来自教师团体和7名来自各行业工会。林清祥觉得曾遭警方拘留，不便出面，于是推荐了好友方水双出任执委会成员。当时的《人民行动党宣言》几乎涵盖了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和愿望，例如：“人民行动党的宗旨就是不使用武力以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自由”；“每一个公民，不论贫富，不论是主人还是工人，都会把人民行动党看做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我们必须缩小财富分配不均，保证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获得他们在工业和企业中的丰硕果实”等等。李光耀在回答记者时更明确地说出：“对此（民族独立）是没有妥协可言的，我们拒绝新加坡和联合邦的宪法，因为最高权力和控制权仍旧落在殖民宗主国家手里，而不是在人民手里。凡是剥夺人民主权的宪法，我们都不能接受”。人民行动党俨然成了一股进步力量，与当时代表殖民主义意识和垄断资本家利益的进步党和劳工阵线针锋相对，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戴。

1954年4月1日，举行首届立法议会普选。其实，所谓“由人民选出议员组成立法议会”也者，不外是殖民政府耍出的一项花招而已，政权依旧牢牢地掌握在英国总督手里，“民选”政府中的重要部门——政务、律政、财政也由英国官员控制；“首席部长”徒具空名，职务也只限于工商、劳工、教育、地方行政、交通及卫生等较“次要”的领域。这一届“普选”，人民行动党派出四人参加，结果三人当选，成为反对党议员。林清祥代表人民行动党竞选武吉知马区议席，高票当选，也自此正式踏入政坛，为争取国家自治、独立献出他的一生。

当选议员后，林清祥对来访记者提出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他说：“人民行动党所提出的争取新、马自治独立和反殖民统治的正确主张，是适合现阶段人民的要求的。在这4年的过程中，我们若正确的执行既定的政策，人民行动党必然会受到人民一致的拥护，以后可能成为执政党。”

“我们认为，除非对目前的宪制加以改变，外来统治政权宣告结束，实行普遍的民选，人民行动党是不准备执政的。因为我们若在现阶段不民主的宪制下执政，等于我们附和统治者的政策，做他们的傀儡政府，这是我们所不愿意干的。”

“执政的劳工阵线对其提出的诺言和竞选主张，在总督尚有特权的今天，是否能够切实地执行，达到目的，很有疑问；假如劳工阵线真的要解除紧急法令，改变其他的政策，将直接和殖民地统治者的利益起了冲突，总督便可能运用特权，解散内阁，推翻现政府，成为圭亚那事件重演。所以，论理，新加坡也只有10%的民主。”

“人民行动党这次仅提名4位候选人，也正是这个道理。本来我们是可以提名25人的，而这25人都可能获选为立法议员。但我们认为，与其在紧急法令下举行的竞选中获选执政，不如成为反对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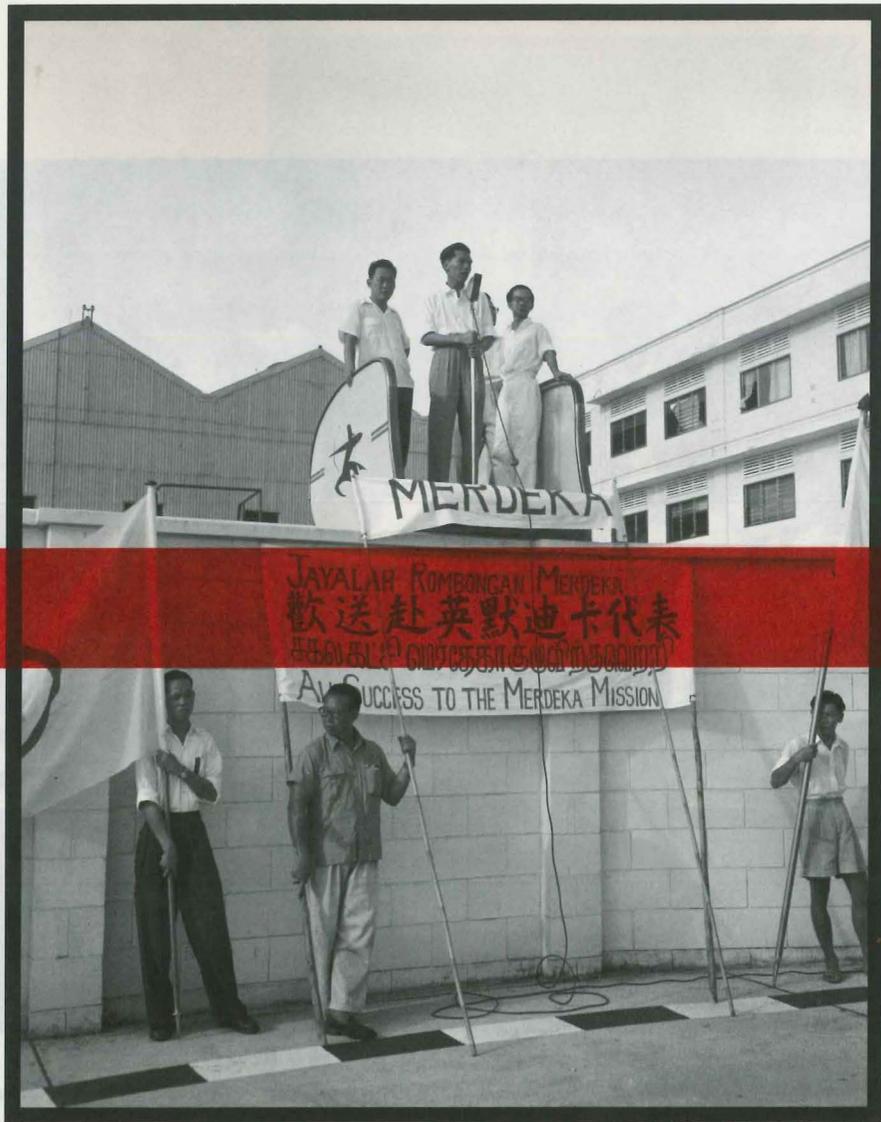
与殖民部展开宪制斗争

虚有其表而又残缺不全的“民选”政府是欺骗不了各族人民的，当然更不可能让各民族人民取得当家做主的权利；但高高在上的殖民主义当权者反而通过这个所谓“民选”政府，对各民族人民的反殖斗争和合理要求加紧镇压。就在劳工阵线政府组成后的不及一个月的1955年5月12日，原来只属劳资纠纷的福利巴士工友罢工事件，却由于警方到场镇压，而酿成大暴动，波及全岛各处，肇4死19伤。同年6月13日，左翼工会为支援海港局工友的罢工发动同情罢工，结果7名工会领袖被警方

逮捕。500多个华人社团于同年6月假中华总商会召开大会，冀望“民选”政府能改变殖民政府一向以来对华校和华文教育所实施的种种含有恶意和不合理的措施；大会一致要求“民选”政府协助保持华校传统和关注华文教育的问题。

“民选”政府也明了本身权力有限，备受殖民主义当权者牢牢操纵，而在面对不同社会层次的问题时，甚至被人民视为傀儡政府。林德宪制实行后，有关各方即不时为了职权的重新分配而产生争执，议会内外要求允许新加坡马上独立或自治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身兼立法议员和工会领袖的林清祥：一方面在议会内同殖民主义者及其代理人针对各种课题，进行不懈的斗争；另一方面则几乎不分昼夜的投入工运的组织工作和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中，以工会为家，以桌椅为床几乎成了他这时期的生活方式。

1956年4月，一个以首席部长马绍尔为首的13人各政党代表团，到伦敦就新加坡林德宪制问题与英国殖民部官员举行谈判，林清祥和李光耀代表人民行动党参与。林清祥时年23岁，是众人之中最为年轻的一位，也是最具群众基础的一位。因此，特别引致殖民部大臣的“青睐”，别有用意地送他一朵红玫瑰。为时一周的谈判无功而返，因为殖民部在多个关键性问题上拒不让步，以及代表团成员各怀鬼胎，立场迥异。马绍尔



■ 1956年四月间李光耀与林清祥动身前往伦敦参加宪制谈判前，在机场向欢送群众致词。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 宪制谈判代表团出发前，在新加坡立法院议事厅开会。
（坐者左起陈威廉、林春茂、林坤德、代表团宪法顾问Sir Ivor Jennings、马绍尔、李光耀、林清祥；
站者左起朱玛波、Abdul Hamid Jumat、林子勤、林有福、黄福南、A J Braga）。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也因此辞去首席部长，改由林有福接任。多年后，林清祥曾对这次谈判的失败作出检讨。他认为谈判的失败有三个原因。首先，英国人想扑灭新加坡的左派（所谓的亲共）势力，以扶持另一股能为英国人接受的势力接管政权。其次，当时正好塞普鲁斯和锡兰出了问题，促使伦敦的保守势力有藉口拖延给予新加坡独立或自治。最后，新加坡的代表团根本就是各怀鬼胎，不能一致对外。

不经公开审判的政治拘留犯（1956年—1959年）

1956年10月，林有福果然向反殖运动进行横蛮的镇压。学生团体、工会、农民组织以及其他群众组织一一被强行解散。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在戒严令的掩护下到处搜捕反殖分子，结果有将近300人在公安法令下被关进牢里。作为整个运动的中心人物，林清祥首当其冲。

这是林清祥第二次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囚禁初期，他被关在当时位于桥南路的中央警署。警署的顶楼是戒备森严、阴森恐怖的拷问室。他就在那密不透风，终日见不到阳光的密室里被关了好几个月。1957年初，他被移到樟宜监牢，继续受到单独监禁，不获准与任何其他政治拘留者来往。林清祥对这一切处之泰然。他深切了解这是所有真正为民族独立事业奋斗的人



林清祥在樟宜监狱外（1958）。

1959年6月4日林清祥等人
获得释放，
在监狱大门口释放鸽子。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们的必然遭遇。他充分利用时间，充实自己。他努力学习以掌握马来语文，几乎读遍了所能接触到的古典及现代马来文学的代表著作。

镇压行动甫过，林有福于1957年初率团前往英伦，重开宪制谈判。1958年5月，双方宣称谈判圆满结束，新加坡将于1959年获得局部自治——外交与国防大权仍操在英国人手中，内部安全则让一个新、马、英三方组成的委员会管理。新加坡将在1959年举行普选以产生第一届民选政府。

林清祥在多年后曾这么指出：“对英国人及其同谋者来说，新加坡要获得自治，其代价是先把新加坡的真正反对殖民主义势力（即左派或所谓的亲共势力）加以消灭”。其实，在答应给新加坡局部自治后，英国人仍然感到不安。英国人明了当时由林有福领导的劳工阵线已是臭名昭著，而其他极端右派的政党如进步党等早已沦为新加坡政坛上的渣滓；唯一能在1959年大选获胜以组织政府的，显然就是人民行动党。因此，确保人民行动党不受左派或所谓的亲共势力的控制，成了英国人的当务之急。

为此，英国人指使林有福在1957年8月进行了另一次大镇压行动。100多名职工运动的活跃份子及行动党改选后的各级领导人被关进了监牢。这时的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中，只剩下一小

撮为英国人所能接受的受英文教育人士。与此同时，英国人也宣布禁止林清祥及其他政治拘留者参加即将举行的大选。

潜伏的内部矛盾

人民行动党的领导层，早在1956年即已呈现分裂的迹象。李光耀和吴庆瑞等人自称为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并视林清祥、蒂凡那、方水双等人为亲共份子。在福利工潮过后，林清祥、蒂凡那及方水双等人被要求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在他们被拘留期间，英国殖民主义者一直将林清祥单独囚禁；另一方面，却安排李光耀、吴庆瑞等人定时走访蒂凡那、方水双、兀哈尔等人，试图使他们与林清祥划清界线。这些本来是林清祥最为亲密的战友，在他毫不知情之下，陆续签署了一份题为《马来亚社会主义的目标与道路》的文件。等到最后一分钟，也就是1959年大选刚结束而人民行动党即将上台，从而释放政治拘留人士已成为尖锐课题的关键时刻，林清祥才被要求签署这份文件。林清祥并不反对文件的内容，但对于不得不还在被拘留期间签署这样的文件方才出狱，深表不满。

林清祥曾为了反殖民主义阵线可能闹分裂而感到苦恼。他甚至曾经向李光耀表示，为了不让反殖民主义阵线闹分裂，在必要的时候，他愿意在出狱后离开新加坡。李光耀对他的这

个建议并不感兴趣。李光耀深知林清祥本是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英雄，有助于人民行动党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取得政权并巩固政权。

原来新宪制下的第一届选举，于1959年5月30日举行。竞选期间，人民行动党公开声明，要是几位与行动党领导层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拘留人士（包括林清祥）不获得释放，即使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胜，他们也不会组织政府。林清祥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他坚持所有政治拘留人士，应在大选后立即获得释放；但李光耀等人声称，英国人与即将成立的内部安全委员会（由英国与新加坡政府代表各3名，马来亚联合邦1名组成的掌管新加坡自治邦内部安全事务的所谓“3-3-1”委员会）绝对不会同意林清祥的看法。李光耀答应争取分批释放所有政治拘留人士。

5月30日大选结果，人民行动党席卷43席，上台组织第一届自治政府。6月4日，林清祥等几位与行动党领导层有密切关系的人士走出樟宜监狱时，大批群众夹道欢迎。过后，林清祥被行动党政府委任为有名无实的财政部政治秘书。对此委任，他考虑了好些日子才接受。在这个时候，他心里挂念的，是如何争取监狱里大批政治拘留人士早日获得释放，以及如何使反殖民主义运动向前再跨进一步，以争取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完全独立。

取得自治政权之后，行动党领导层感到兴趣的，是如何与所谓的亲共势力划清界线并进而将之彻底铲除的问题。他们重组了职工总会，当时表现得十分投靠行动党领导层的蒂凡那被委以重任，出任秘书长。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等人则被安插在秘书处。行动党领导层也组织了人民协会。这个组织日后成了他们控制社会基层的主要工具。

其实，林清祥并不热衷于高官厚禄，也不和人民行动党当权派争夺什么领导权或地盘。他仍然真诚地期望行动党政府能够完成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以争取新马的真正统一和独立。他也随时准备全力支持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以实现其建党的目标与宗旨。

人民行动党内自称非共派的人士常说，林清祥及其战友跟非共派合作的真正目的，是要借他们作为掩护，以避免英国人的镇压。其实，正如那个年代的热血青年一样，林清祥等人早在参加学生运动时，就已经在思想上作好被殖民统治者镇压（被捕坐牢、驱逐出境、甚至牺牲性命）的准备，而且在往后的反殖斗争的实践中也充分证明他们是真正的爱国志士，所谓要借非共派作“掩护”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掩护”论只不过是所谓非共派用来自我膨胀的自欺欺人之谈。

至于林清祥及其战友真心诚意地、换句话说是不加防备地跟所有号称反殖民主义者（包括上述那些自称非共派人士）

合作，这正是林清祥及其战友的反殖斗争原则和爱国团结的品质与胸怀的光辉体现，在反殖运动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在此不妨指出，那些自称非共派的人士当年与林清祥及其战友合作，不外是想利用林清祥及其战友发动与组织群众，以作为他们在与英国人谈判的筹码。当得逞后，他们就觉得必须设法保住自己在行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就有与所谓亲共份子划清界线、林清祥等人被逐出党外的事件发生，新加坡的政坛最后也成为一小撮人的专利品。

无法避免的公开决裂

上台后不久，行动党领导层发生内讧，党元老之一王永元原是新加坡的第一任民选市长，他公开摆出反英国人的姿态，这使英国人不满，也令行动党的其他领导者感到不安，很快成为行动党当权派的眼中钉。终于，他在1961年初被逐出人民行动党。随后，他提出著名的《芳林十六提案》——其中包括争取全面自治政府，废除内部安全委员会，释放政治拘留人士等符合当时广大群众要求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成了芳林补选的主要议题。林清祥明知本身处境困难，但还是本着“左翼团结”的原则，呼吁芳林选民支持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他希望借此维护反殖民主义阵线的团结，以及逐步争取全部自治而直至独立的最后目标。不过，当时人民群众对行动党政府的不满情绪

已经高涨难抑，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终于在芳林补选中落败；可是，行动党当权派不愿了解一般群众的心情，始终对林清祥的诚意表示怀疑。因此，芳林补选的失败，也被算作林清祥的账，因而当权派对他及其同伴更持敌对的态度。林清祥及其同伴和行动党领导层之间的正面冲突，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芳林补选过后，一向视新加坡为“小中国”，并将其拒之门外的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突然于1961年5月22日提出建立大马来西亚的计划（计划中的成员包括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砂拉越、沙巴与文莱）。林清祥与他的同伴看出英国人担心其同谋者不可能长久控制新加坡和砂拉越等地，深恐这些地区会落入所谓的亲共份子手中，终于拟出组成大马来西亚计划，以确保英国人在这个地区的长远利益。大马来西亚一旦付诸实现，首当其冲的一定是新加坡的真正反殖民主义份子。在英殖民部的授意下，人民行动党的当权派深知借助于这个计划以摆脱自己的困境正是时机，因此立即作出正面回应。与此同时，他们还匆匆忙忙抛出一个所谓“新马合并计划”以争取主动。

1961年6月初，由于安顺区一位行动党议员的逝世，因此必须举行补选。出来挑战行动党候选人的是前首席部长马绍尔。6月2日，林清祥联合其他几位工会领袖发表联合声明，表明他们反对建议中的马来西亚计划下的新马合并安排，但号召安顺区选民在补选中支持人民行动党，以促使行动党政府争取废除

内部安全委员会并为新加坡争取一个全部自治的政府。然而，行动党领导层并不欢迎这样的表态。他们显然要促使自己泡制的“合并安排”尽早成功实现。

1961年7月15日，马绍尔在安顺区补选获胜，致使李光耀与林清祥等人的分裂扩大与表面化。形势发展的结果，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詹姆斯·普都遮里等人及其他13名行动党立法议员被逐出行动党。7月29日，林清祥等人宣布决定组织新政党——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由李绍祖医生出任主席，林清祥担任秘书长；兀哈尔、傅树介、林福寿、多米尼等都是要员，阵容盛大。一场与人民行动党针锋相对的斗争自此开始，而且斗争的场合不限在议院内，也在议院外。当年的情景，李光耀多年后依旧难以忘却：“他们的干部在经验和人数方面都比我们的优越得多”，“我们骑上了一头狂野的老虎，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恐惧而变得瘫痪无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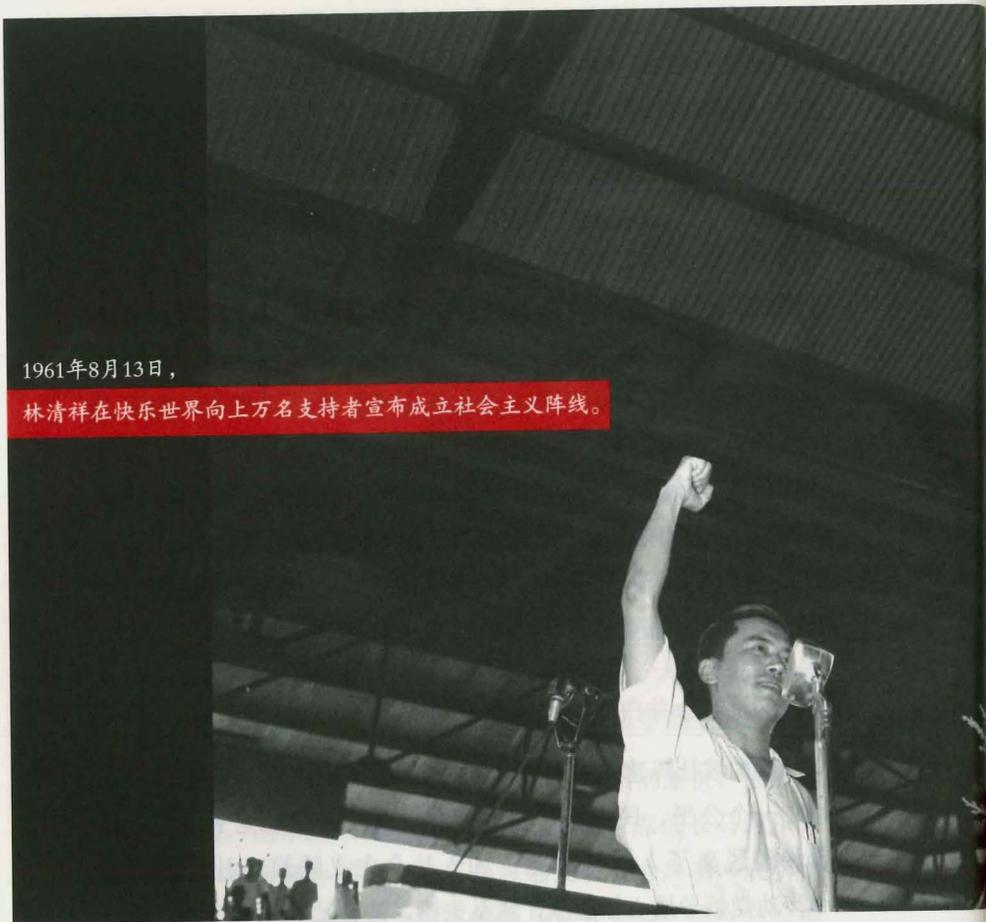
激烈的反《合并白皮书》斗争

新加坡社阵建党的主要目标为争取新马真正的统一与自主，建立一个公平、民主与进步的社会。众多的行动党干部与支持者相继脱离了人民行动党，加入社会主义阵线，社阵的声势令行动党领导层心惊胆战，慌乱失措，终日忙于寻求反扑之计。

■ 346

1961年8月13日，

林清祥在快乐世界向上万名支持者宣布成立社会主义阵线。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行动党当权者首先集中火力，对林清祥进行人身攻击。他们通过所谓《电台十二讲》，大事渲染林清祥为马共周边组织的成员。这显然是公开邀请内部安全委员会向林清祥及其同伴开刀。

与此同时，行动党政府也加紧与马来亚联合邦总理东姑·阿都拉曼以及英国殖民部积极部署大马来西亚计划的实现。行动党政府声称，要通过《新马合并白皮书》方式加入“马来西亚”而使新加坡得到独立；其实，其真正的目的，却是要引起马来亚政府及英国殖民部对新加坡强大的民主势力产生恐惧，然后合力消灭之，以收借刀杀人之效。根据行动党当权者泡制的《新马合并白皮书》规定，新加坡的外交、国防、财政及内部安全等重要事务交由中央政府掌管，新加坡政府只保留掌管劳工与教育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公民与马来亚其他州的公民，并不能享有共同的公民权，新加坡公民只能在新加坡岛内享有选举或被选举权。此外，新加坡在中央国会议席的分配也受到歧视，不能与马来亚联合邦其他州一样享有同等的比例分配席位；以一个拥有两百多万人口的新加坡，在建议中的“马来西亚”，仅能分到15个中央国会议席。

林清祥和社阵认为这种合并安排不合理，林清祥指出，没有共同的公民权，哪有真正的合并？哪有真正的独立？他进而认为，若要真正的合并，新加坡应像马六甲，槟城或马来亚联合邦其他州一样，成为马来西亚的一州，所有新加坡公民应直

□ 347

接成为马来西亚公民，跟其他马来西亚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他又认为，行动党政府所鼓吹的“通过马来西亚计划而取得独立”所能带来的其实只是一种“假合并”，“假独立”，后患无穷。

为了使倡议中的官方合并安排具有合法性，行动党政府决定举行一项全民投票。社阵、王永元的统一党以及马绍尔的工人党，都要求在全民投票时，应该只让新加坡人民选择到底他们接受不接受倡议中的“马来西亚计划”下的《新马合并白皮书》。行动党政府却著手部署了一套花招，即给予选民三种都是接受合并的选择：A. 接受新马合并白皮书；B. 让新加坡成为像槟城或马六甲那样的一州（但详细的条件与内容并没有公布）；C. 接受不差于北婆三州的条件（条件如何，也没有详细列明）。

林清祥认为，拟议中的全民投票根本就是一个闹剧，并决定号召选民抵制全民投票，以投空白票表示抗议。为了防止人民投空白票，行动党政府再通过立法规定，若大多数人投下空白票，那将意味着人民要将合并的问题交由立法议会的大多数党去决定。在全民投票进行期间，行动党政府也公然向选民表明：要是他们选择B项，所有那些非新加坡出生的公民，将丧失他们的公民权；同时也警告，政府可能把空白票视为B项的赞成票。这确实是一出史无前例、丑态百出的闹剧——就连曾任行动党主席多年的杜进才博士，几年后也坦然承认，全民投票

是李光耀一手搞出来的，就连他（杜进才博士）本身最初对投票的程式也感到莫名其妙。在接受《Leaders Of Singapore 1st edition 1966》作者Melanie Chew的访问时，杜博士坦白承认：选民根本无从选择，也根本不知道槟城、马六甲，甚至沙巴等北婆三州的真正情况如何。结果，不论投A、B或C，选的都是“合并”一途。然而，在现有的新加坡官方史册上，1962年9月1日的这场全民投票，竟然被百般不厌地描绘为行动党以公开辩论和民主方式，打败其政治对手的“辉煌”典例。

马来西亚计划也遭受菲律宾与印尼的反对，造成印尼与新加坡——马来亚联合邦进行对抗，文莱苏丹也对马来西亚计划不表热心，决定不加入。文莱的民族



全民投票宣传大会上，
林清祥向群众分析马来西亚计划的真伪。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1962年1月25日新加坡社阵代表团出发参加在吉隆坡举行的五邦社会主义者大会，在火车站合影。（前排左起王清衫、刘坡得、陈新蝶、方水双、林福寿；后排左起兀哈尔未婚妻、兀哈尔、李绍祖、多米尼、盛南君、未详、林清祥、巴尼、林史宾、未详。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主义者更在这时强烈要求让文莱独立，并发动了武装斗争，结果遭受英国军警镇压。

必须指出，由于先有文莱拒绝加入，后有新加坡被逐出以及其他演变，现在的“马来西亚”，已经同原来的“马来西亚计划”距离甚大。还须指出，林清祥及其同伴坚决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下《新马合并白皮书》的“假合并”，这同当时印尼、菲律宾基于领土或其他考虑而反对“马来西亚”，根本是两码事。

□ 351

“冷藏行动”下再度被捕

1962年全民投票过后，林清祥已经确定新加坡即将被强硬带入拟议中的“马来西亚”这一严峻现实，他在向社阵第一届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呼吁党员在未来的年头里应联合五邦（即新、马和婆罗洲三邦）的社会主义者，继续遵循宪制途径为建立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和平等的马来西亚而奋斗。反“马来西亚”的斗争，实际上已经使五邦的左翼力量加紧团结起来，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永久秘书处已在1962年宣布成立。林清祥也呼吁社阵党员，别为了全民投票所受的挫折而气馁和消沉，应准备争取在即将举行的新加坡大选中取得胜利。

为了保证“马来西亚”计划能顺利实现，也为了保证今后“马来西亚”的政权仍由亲英的封建集团和右翼势力所控

制，英殖民主义者及其同谋决定先发制人，在“马来西亚”成立的前夕扑灭左翼势力。由内部安全委员会（由英国、新加坡、马来亚联合邦组成）一手策划的一项取名为“冷藏行动”的镇压行动，终于在1963年2月2日展开。成千名军警漏夜出动，包围了社阵、职工团体、农民组织，以及其他群众组织，扣押了将近300名左翼知名活跃人士，包括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普都遮里、多米尼等等。此外，当局也四处追捕进步分子，制造白色恐怖局面。

■ 352

“冷藏行动”可说是新马民族独立历史上的一次政治大浩劫，英殖民主义者及其同谋根本不知如何为那些被拘留的人士“定罪”。根据林清祥多年后透露，他是在被拘留了超过两个月才接到一份对他的“控状”。这份“控状”除了重复他之前两次被拘留的“理由”外，就是列举了他近年来所进行的公开、合法的活动，然后把这些公开、合法的活动涂上色彩，这根本不能令人信服。就凭如此这般的“莫须有”的罪名，林清祥从此失去了自我申辩的机会，失去了人身自由，也永远不再有参政的权利和机会。

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

行动党政府与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匆匆签下了马来西亚计划协议书，但协议书的内容及详细的条文并没有定案公布。在镇

压了新加坡左派势力、保住了行动党的政权之后，联合邦方面眼看行动党领导层并无感恩之意，双方的内争立即出现。争执最为激烈的，是有关新加坡方面的税务。当时的马来亚联合邦财政部长坚持要掌管新加坡的财务税收，并规定新加坡必须将其60%的税收交给中央政府。这一决定，行动党政府并不表赞同。此外，新马之间到底能否建立共同市场，条件如何，双方如何对付私会党分子以及反贪污问题等也发生歧见，这一切无不明仓促拼凑起来的马来西亚计划，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扑灭新加坡的反殖爱国力量即所谓亲共分子的势力，而不是要为新加坡带来真正的独立。尽管如此，“马来西亚”还是在1963年9月16日宣告正式成立。

□ 353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举行闪电大选。行动党囊括三十多席，社阵仅得13席。根据马来西亚计划协定，由中选的议员选出15名代表出席吉隆坡的联邦议会。势力强大而且最具群众基础的社会主义阵线为什么会在9月21日的大选败下阵？对此，政治评论者早有定论，大选是在“冷藏行动”过后立即举行。在“冷藏行动”中，社阵的领袖及所有中坚分子都被拘留，接着，社阵支部被捣毁或陷入瘫痪状态，好多人为避开被捕而东躲西藏，整个新加坡笼罩着白色恐怖气氛。处于这种情况下，社阵如何能取胜？在新加坡的官方史册中，这次的选举同样地屡屡被形容为人民行动党以公平、辩论的方式击败其政治对手的一项“光辉”成就。



1965年中西报谣传，
宣称“林清祥亲苏派”与“林福寿亲中派”在狱中殴斗，
李绍祖医生一行人前去探监，林清祥与牢友热情迎接。
事后有关媒体向他们两人道歉与赔款。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马来西亚成立后，行动党政府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行动党无法取代马华公会成为巫统的亲密伙伴。相反地，行动党与巫统的关系，随着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而变得紧张起来。1963年9月的新加坡闪电大选，巫统与马华虽然试图在新加坡争取立足点，可是两者的候选人全军覆没。另一方面，行动党也派出十多名候选人参加1964年3月间举行的马来西亚国会选举，结果也只有一位获选。

行动党与巫统的争执逐渐升级，极端种族主义的势力迅速抬头。1964年6月到9月间，新加坡连续发生两起种族冲突，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1965年初，行动党企图在马来西亚另找伙伴，与其他在野政党组织了马来西亚团结联盟，并提倡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人民行动党开始集中火力抨击在宪法下受到保护的马来人特权。1965年8月，联邦政府终于决定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这就是新加坡“独立”的由来。

独立初期的新加坡

新加坡在马来西亚的经历，充分证明了林清祥与社阵当时所采取的正确立场。他们从来就不认为英国人所搞出来的马来西亚计划会为新加坡带来真正的独立。事实也充分证明了“假合并”安排与筹组马来西亚的真正目的，不外是要对付像社会

主义阵线那样的进步的民族主义份子或左派人士；当然，行动党本身一旦不听话，也会遭殃。人们可以看到，在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的前夕，行动党领导层也差点成了被对付的对象。杜进才博士后来曾公开承认，除了李光耀和吴庆瑞之外，行动党的其他领导人对马来西亚计划下的合并并没有真正的参与。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独立时，一般群众雀跃万分，燃放鞭炮以示庆祝。他们感到高兴，因为新加坡终于摆脱了当年为社阵与林清祥所极力反对的马来西亚计划下的“假合并”。李光耀悲从中来，当众落泪，他内心的痛苦是可以理解的。像林清祥一样，李光耀从来不认为新加坡可以自己寻求独立。他们两人在创建人民行动党时本来有个共同的奋斗目标，那就是争取一个新马统一，独立与自主的国家。对林清祥来说，如今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正印证了先前他所指出的：假的合并，必将带来恶果。然而，新马的真正统一从此也就变得遥遥无期。作为一个毫无天然资源，本来与联合邦内地紧紧相连的弹丸小岛，今后的新加坡将更需依靠英美经济实力以保存一条生路，这正是殖民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却是林清祥等反殖爱国人士所不愿见到的。

行动党领导层一向宣称，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是当时的内部安全委员会一手策划与执行的。可是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宣告独立后，林清祥等人并不曾获得释放。实

实际上，行动党领导层对付政治拘留者的手段要比英国人更为无情、毒辣，任何政治拘留人士要想获得释放，都必须公开谴责自己的过去，不肯就范者，就得面对无期的拘留。

为了巩固政权，行动党政府继续围攻社阵。他们控制并利用电台、报章，作为攻击反对党的有效工具；同时，也通过各种法律阻扰反对党的发展。一些被行动党政府视为潜在的敌对势力（例如南洋大学和华文报章等），也被一一加以对付或改组。从那时起，新加坡反对党变得一筹莫展，毫无作为。新加坡也成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顺民乐园。

辞去新加坡社阵的一切职务

六十年代期间，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日益恶化，与越南也开始交恶，致使全世界正在为推翻旧社会以创造新社会而斗争的人们，顿时感到失望和茫然。在本地区，印尼的建国之父苏卡诺总统也在场军人政变中被推翻。新加坡宣布独立后，社会主义阵线既不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又杯葛立法议会选举。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对群众运动和政治拘留者更加迫害和肆意挑衅。林清祥身陷囹圄，外界的一切演变难免带给他巨大的精神打击。他长期患高血压症，多年来为民族独立事业劳碌奔波，废寝忘食，根本无从好好求医就治。自1963年再度被监禁后，身心所受的折磨，以及来自各方面的重重压力，令他的病

况日益严重。1969年中，他终于决定辞去在新加坡社阵的一切职务，退出政党政治领域；接受了前往伦敦寻求医疗的流放安排。关于这件事，各方面议论纷纷，人们也对此做出各种各样的猜测。日后他确曾承认：在那个时期，他的情绪低落，精神陷入迷糊与沮丧状态中。

羁留伦敦期间，林清祥虽然健康不佳，但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他当过搬运工人、工厂散工、水果店伙计。1970年，他在伦敦与当年泛星联合工会的总务黄翠云结婚。婚后他们共患难，度过了多少风风雨雨的日子。他一度考进伦敦大学，本想修读经济学，不过由于健康的关系，后来不得不辍学。他的两个儿子——子毅与子宽，先后在伦敦出世。

林清祥在伦敦前后待了十年，心里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恨不得及早投回祖国怀抱。1979年，他终于克服种种困难，举家搬回新加坡。不幸的是，他很快发现自己患上了心脏病。1981年，在前往中国途中，心脏病发作，他不得不进入上海的华东医院接受紧急治疗。两年后，他前往澳洲进行心脏绕道手术。往后几年，他的心绞痛时有复发，迫使他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工作和生活。这期间，尽管病魔缠身，他始终关怀他人，胸怀新马。对于两地政治形势的发展他屡有自己的看法，也有许多感触，但从不失望。1996年2月5日，他来不及再进行另一次心脏手术，而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历史最终自有判断

林清祥的逝世，震撼了新马政坛。各方人士（包括他生前的政敌）都异口同声推崇他为一个献身又有高尚品格的政治家。他在新马独立运动和建国事业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得到了各方人士的肯定。人们都为他没有机会继续为他的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而感到由衷的惋惜。

林清祥不曾受过高等教育，而他真正参加政治运动的年头也不算长。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通晓华、巫、英三语。自始至终他都能赢得各方人士的敬仰，可见是个多么具有魅力与富有传奇性的人物。英国殖民主义者一向把他称为共产党人或亲共份子，以方便对他进行政治迫害。他从不否认，在50年代初期，他曾经是抗英同盟的成员，因为在那个时候，抗英同盟是一个当时所有真正要为新马争取独立的各阶层人们所可能参加的唯一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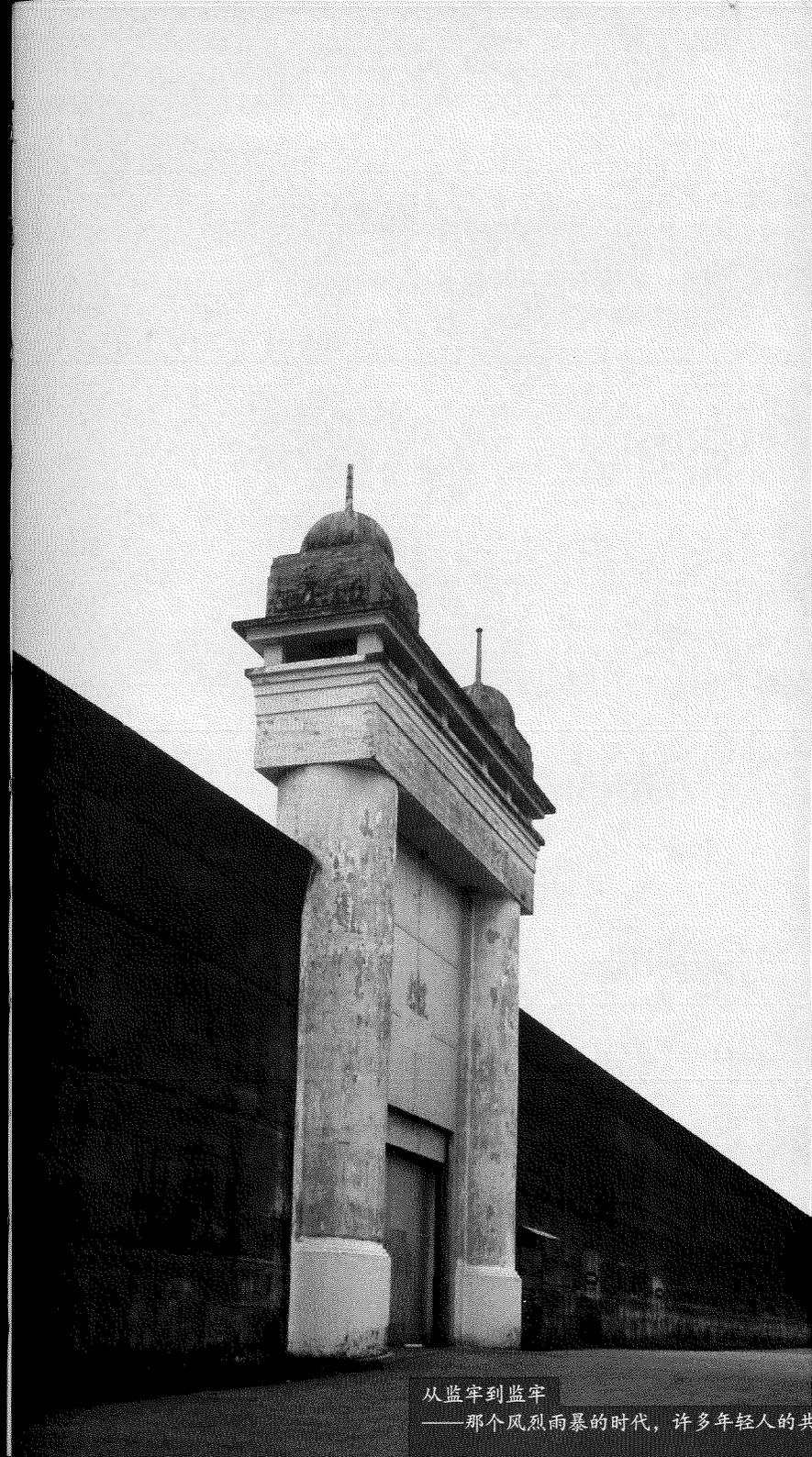
任何认识林清祥的人都知道，在他参加政治运动的短短几年里，他的政治主张是鲜明的。他的首要任务是要团结所有反对外来统治的爱国人士，争取新马的统一，并建立一个独立、民主与繁荣的国家。或许，年轻时代的他在思想意识方面确曾倾向苏联与中国（在那个年代，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倾向于反对以英美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及支持以苏联与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很自然的事。）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自己在反殖

运动中所具有的地位，为遥远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宣传。对他来说，在祖国取得独立之后，要成立怎样的政府，要建立怎样的社会制度，都应由人民通过民主方式决定。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人民行动党还没有分裂的时候，他从不与那些自认为非共派的人士争夺人民行动党的领导权，也从不对那些自认为非共派的行动党领导人进行任何人身攻击。事实也清楚显示，人们一致给予肯定的，是他在五、六十年代新马反殖民主义运动中所做的贡献，以及他对于建立一个新马统一、独立、自主的国家所可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如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越离越远，年轻一代也很难将新马的统一当做一回事；人们迟早要追问，造成这种局面的历史责任该由谁来担。

此时此地，人们深感惋惜的是：新马（特别是新加坡）的政治领域，就因为缺乏或容纳不了像独立前所出现的那种富有理想、具有远大抱负和牺牲精神的有如林清祥那样的人才，而显得多么的狭窄与平庸；现有新马（特别是新加坡）的史册，也就因为缺乏对所有曾为新马独立与建国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士的客观评价与肯定，而显得多么的不真实与残缺。新马的历史学家，肯定有大功课等着做。

本文初稿由陈国安于1998年完稿，经作者补充和整理，以叶敬林笔名刊载于2002年出版的《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下册）》



照片提供: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从监牢到监牢

——那个风烈雨暴的时代，许多年轻人的共同出路就是蹲狱坐牢。

附录
之二

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

引言

1992年7月间，新加坡广播电台邀约林清祥与该台的时事组作系列访谈，他再三考虑后，加以婉拒。事后，他针对采访者所提的问题以及一些新马早期的历史问题，凭手头资料和个人的记忆，亲笔拟就一份手稿，洋洋数万言；本文整理自他的一部分手稿。



(I) 当你是在校学生(1952年)你的理想是什么?

我出生於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大衰退的第五年。這時的經濟衰退波及面廣，也延續相當長久，顯然，新加坡也受到影響。於是在戰約三年那年，我父母便從我出生的直落亞逸街搬遷到柔佛州的小笨珍。我的童年便在那兒渡過。一九三六或三七年七七年的抗爭，中國戰爭剛着外友，緊接着於一九四二年日本侵入馬來亞。當時我才九歲，就讀於小笨珍培英小學三年級。接着的三年八個月是日本佔領時期。

一九三九年或四零年，我唯一的朋友，父親的弟弟，內務部長蔡庚宇君，當時中國當抗日救國工作人員。當時，我才五歲，他早已抱着我唱起“中國不會亡”，“美哉，美我中華民族！”等抗日愛國歌曲。我讀的十學，掛着暖中山人畫像。

兩首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們齊努力”的詩歌每天唱着“三民主義……”也是升青天白日旗。想之期，這期間，我有了愛國的政治意識。蔡承在當時當然是指中國。恨的是佔領中國土地的日本鬼子。

在日本佔領三年八個月中，我是首先從人放火燒得精光。當時，我父親開什貨店，店旁是住家。我們不是是欠了錢還不起的一些貧苦逃難的。隨日子，我們全家隨着大家逃亡，躲到叻叢林家外避難。這期間，我學會了養豬，籐，看店，耕種；這除了差莫被日本兵連捕所危險。見之門一個倉的朋友。既新加坡大眾鋼鐵廠總代理的父親洪宇璋的妻子女被誘拐，逃難到我家的時候。這一切加上了我最早時期的一些模糊的政治與民族意識。

(2) 你如何成为职工运动领袖?

一九二一年底或二年初,当时我就读新加坡中学初三,我参与了罢考事件。随着被开除出学校,也遭政治部拘留的一个星期。之后,我遇着琉璜式的半公开生活,躲之内地几乎住遍了新加坡各个角落。所以要说这样,因此,在那个年代,你一旦被政治部列入黑名单,你的人身自由也就失去了保障。这期间,我当过几间学校的“教头”,用的名字是“梁先生”。

一九二二年底或二年初,一位巴士工友介绍我往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担任分会当受停职秘书。接着兼任该会巴葛礼券分会秘书;接着也担任了与华里纺织厂工友联合会秘书职位。

这期间我认识了与华里纺织厂联合会主席兼新成立的各业工厂工友联合会主席林振国先生,他高扬高锦吴先生旗帜也邀请我参与担任该会秘书的职位。

当时在-梁先生介绍下,我已向李光前先生有了接触,经李光前介绍 Onely Rd 私人住宅地底层的集会,高村有关“劳工人民运动”一事。

五四年底人民行动党宣告成立。

二二年四月林推受副下第一屆大选,在-梁于邮政工友联合会介绍进行竞选候选人大会。林推受被推选为竞选候选人之一。大选结果选中选为武吉智马区议员。

这时期我为什么会成为职工运动领袖,原因很简单,一九四八年六月警察状态,一九二四年新加坡工运的状况。

一九四八年六月,由于紧急法令所实行,许多被解散好斗的职工会被宣布解散,大批工运负责人,不是被捕就是遭驱逐出境,存在的职工会都是英国当局允

(3) 一九二四年与一九二五年的暴动

若我记错罢工的是五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学生为申请免役在总督府前靠近 Penang Lane 与警察发生的冲突,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二日福利巴士工运发展至暴乱的事件。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我们先对暴动的定义来个清楚的认识。从字面上看暴动仅是指的一群人、有组织,或自发的采取了某些越过法律允许范围的行为以实现或企图实现其一定的目标。

暴动可以有自发的,有组织的,也可以有被动被挑起的。暴动要产生要先具备一定的社会心理状态,因为这是一种往往在激愤高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行动。

与组织性
“没有一切向钱看的心理状态”“没有对股市行情趋于正常全面认识的心理状态”“最近深刻^{批判}的服民大暴乱难以出现。”“没有了里人觉得受重视的社会心理状态”“今年初美国里人的大暴乱不可能出现。”

每一个社会,在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从一种旧秩序转入另一种新秩序;或在它已达到了需要对其旧秩序进行刻不容缓的变革时,多少会出现一些暴动或暴乱——除非这个社会已达到了牢固的又经妥善加以巩固足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社会心理机制。

认识了这些,也就不必奢望某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某些暴动或暴乱那样的坏;那种脱离历史条件,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状态,盲目自大或自欺欺人的所谓“今

⑤ 一九五六年四月伦敦宪制会议 (22.4.56 - 13.5.56)

(A) 历史背景:

- a) 林德宪制的局限性
 - b) 人民要求真正完全的独立、自主。
- 林德宪制实行不久, 首席部长便因要求一个正式办公室, 楼下坐左增设四个副部长席位而英国总督起了争执。
-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英殖民地大臣答新加坡方面一个礼拜, 首席部长终向议会提出要求正式允许新加坡独立的议案, 独立之期又进一步是议会个别修改自治, 议会通过之。
18. 8. 55. 英政府致函首席部长, 取请总督为英委任副部长一些条款, 并致函一新加坡代表团在林德宪制实行一年时交还英国政府之。
28. 12. 1955 华玲和谈
- 这期间人民信託了学运运动, 举行了群众大会, 要求马上予新加坡独立。
- 一项欢迎理英国工党代表团, (Geoffrey Lloyd 领导) 以表达新加坡人民渴望自由、而独立的“独立圈”活动也於一九五五年三月初举行, 其高潮为 18. 3. 56 於旧加冷举行的各史程之群众大会, 出席人数近四万人。

(B) 答覆派13人宪制谈判代表:

- (一) 首席部长马绍尔先生
- (二) 四位部长: Hamid Sumat, Lim Teo Hock, S. M. Sumathay, 及 Braja.
- (三) 政府后座议员: 余福川, 黄富南
- (四) 行动党代表: 李光耀, 林清祥
- (五) 民工党代表: 林子勤, 陈维廉
- (六) 自由社会党代表: 林坤乾, 林春茂,

(十) 关于合併问题

你对此问题的立场?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七日, 礼阵成立时, 我代表礼阵表明了对此问题的立场:

“如果真正的合併不能立即实现, 组织——包括北婆三邦在内的邦联又无进展, 该为实现在一九六三年取得完全内部自治而奋斗。”

“新马来亚联邦的真正统一意味着新加坡加入后婆罗文甲的转换似, 其公民全部自动成为真正联邦公民, 享有联邦公民一切权力的义务。”

“新加坡由此成为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人口之比例选派代表在国会, 也是其比例而, 与他们共同分享政治生活命运。”

“分享政治生活有如舞队, 舞队人民可别其他舞队竞选联邦国会议员席。” “他们不可半在政治领域影响马来亚人民。”

“这项权力是国会比在之基础, 是宪制内必须而在那以便中央国会能反映出全马人民的心声。”

“没有人指我的‘反合併’…… 那些喜欢半生熟马哈蒙者怎能指责我完全熟马哈蒙者不喜欲马哈蒙者呢?”

“关于争取完全真正的合併, 我们是严肃认真的。若联邦政府说明他得接受我们的联邦即不可分割之一部份, 我们得会甲来甲去地全力支持他。”

“合併问题的最新发展来自两地总理之联合声明, 是具体而明确的。而此些安排并不构成真正的合併, 楼下我就得谈到它。”

“我们欢迎开始之谈判, 合併是两国人民共同愿望, 不久会到来。”

“虽然我们若在某些政治问题上看法不同, 但肯定他是国家发展的领袖。对那些看法不同问题, 我们表明我们不同之看法是基於民主精神地评述他。對於我们同意的他问题, 我们言行一致支持他。”

经历过几乎被日本兵逮捕的危险，目睹了父亲的朋友，现新加坡一位姓洪名人的父亲，在妻子儿女被日本兵惨杀后，逃难到我家的实况，这些真实故事，加强了我早期模糊的政治与民族意识。

日本投降后，经过数月至一年时间，小笨珍的培群小学复办，1946年我重新投入校园完成我的小学教育。我插班五年级，读了两年，1948年小学毕业时，我已经十五岁了。

这段期间，我几乎读了所有关于中国民族英雄人物的通俗本传记。在校除高唱“三民主义……”外，也跟着唱：“打回东北去……打倒赤色帝国主义……”，双十节还代表同学发表了反共的题为“痛定思痛”的演讲。

小学毕业后，家里经济不好。只好在父亲朋友的洋土库里当跟班，工作了一年多，1949年初或年中才回到新加坡，先跳级进入公教中学一年级下，居然考得还不错。1950年正式转入华侨中学，进入初中二年上甲班，这时我已十七岁了。（一些对历史无知或蓄意不良者，常含血喷人讲我们是超龄生，有意渗入中学搞政治欺骗活动。）1949年、1950年是个历史性的年代，当时亚、非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席卷全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学校里一片沸腾，大夥儿兴奋地谈着、唱着，热泪盈眶地迎接着人类新的历史的到来，身为被迫害与被鄙视最甚的华校生，身为还在殖民地桎梏下挣扎的奴

隶，这种心情与表现是可以理解的。我是人，是个血气方刚，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经历过不少在正常环境下同龄人无须经历的事件，自然而然地，我投身到这历史的洪流中去。

这期间我似乎忽略了功课，沉醉于阅读及其他活动，我阅读了不少苏联作家的小说、诗歌，也醉心于哲学、历史与政治书籍，慢慢地，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国家、民族与人民若不能得到自由解放，个人也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而国家与人民要获得自由、解放，便必须唤醒与团结所有最受压迫、迫害的人，团结起来奋斗到底。从书本中，你可以这么说，我开始倾向于并接受社会主义，接受它为人类的一种美丽远景。我深切感到，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拒绝看到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贫穷、疾病，人人可以平等、自由与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的实现。”理论上接受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所宣示的美丽远景，与实际上成为共产党组织一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五十年代共产主义是世界两大思想体系之一，是极受欢迎与普遍被第三世界接受的思潮，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历史最久的一个政党，反对英国统治最坚强的政党便是马来亚共产党，在许多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的政党出现前，已有无数爱国儿女投入马共的怀抱，为实现摆脱英国人统治而奋斗。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51年底我接近了抗英同盟的活动并在稍后成为其活动及小组领袖。回想起来我为自己能响应时代号召，毅然加入了抗英队伍而非亲英队伍感到自豪。总结而言：我当时的理想是为摆脱英国人统治，为实现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马来亚而奋斗。更概括地说，我经常提醒自己要是在吸最后一口气时可以这么对自己说：“这里躺下的是个普通的灵魂，在他有生的过程中，他已极尽所能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人类最美丽的理想——为实现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没有贫穷、疾病，人人可以自由发挥其潜能的和平与民主的社会而奋斗！”这些话与苏联著名革命小说《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主人公所讲的有点像。

你如何成为职工运动领袖？

1951年底我就读华侨中学初三，参与了罢考事件，被教育部开除出学校，之前我也遭政治部拘留了约一个星期。离校后，我过着流浪式的半公开生活，躲躲闪闪地，几乎住遍了新加坡的每个角落，因为在那个年代，一旦被政治部列入黑名单，你的人身自由也就失去了保障，这期间，我当过几间小学的“教员”，用的名字是“余先生”。

1953年底或1954年初，一位巴士工友介绍我到新加坡巴士车工友联合会樟宜分会当受薪秘书，接着兼任该会巴耶礼

峇分会秘书；随着也担任了马来亚纺织厂工友联合会秘书的职位。

这期间我认识了马来亚黄梨工友联合总会主席兼新成立的各业工厂工友联合会主席林振国先生，他与他的同僚杨高锦先生对于我在两个工会的表现有好印象，便热情地邀请我前往担任他们的总务要职。

当时在一些马大生与华校中学生介绍下，我已与李光耀先生有了接触，出席他在Oxley Rd私人住宅地下层的集会，商讨有关筹组人民行动党的事。1954年底，人民行动党宣告成立。

1955年四月林德宪制下的第一届大选，在邮政工联所举行的行动党候选人介绍大会上，李光耀亲自宣布我为候选人之一，大选结果，我当选武吉知马区议员。要理解我为什么会成为职工运动领袖，需要回顾一下，回顾1948年6月紧急状态实施至1954年新加坡工运的状况。

1948年6月，由于紧急法令的实行，许多被称为好斗的职工会被解散，大批工运负责人，不是被捕就是遭驱逐出境，存在的职工会都是英国当局允许的，符合英国资本家与本地厂家利益的所谓黄色工会。这些工会根本不照顾会员利益，不少职工都不愿意加入。因此，私会党乘机活动，控制工人，一面向工人收“看头钱”，一面向老板敲诈中饱私囊，工人有冤屈却无处申诉。

林德宪制的进展，说明英国不得不做些政治让步，政治气氛因而稍微开放，许多新的职工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这些工会如各业工厂职工联合会，比较能照顾工人，逐渐取得工友的信任与支持。

1955年大选竞选运动期间，群众情绪高涨，冲破了自19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以来的白色恐怖氛围，工人的恐惧心理逐渐消除，他们敢于团结起来，加入好的工会，为争取自己合法的权益而奋斗。那次大选，我敢说敢言，深深取得人民的信任，特别是劳动人民和工人眼中，我成了真正的代议士，是准备为他们牺牲的英雄人物。

当我加入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时，会员不过近千名，不到一年，增加到三万多名，成为当时声势浩大的工会之一。当时，如果缺乏新的历史条件，缺乏一大批工会骨干，缺乏敢于牺牲、齐心合力的干事，我个人的努力根本无济于事。当然，我个人具备了一些特殊品质，例如：准备牺牲，与工人真正打成一片，即使当了议员还在工会睡板凳，处处为工人设想，并能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努力，这都是使我成为职工领袖的条件。

同年，十八帮派的私会党头目参加了由叶朝福安排，在丝丝街叶氏总会召开的会议。他邀我出席，我单刀赴会。那次会谈的主题是“分地盘”，事后许多过去被私会党控制的工友转而加入我们的行列，这些帮派失去收“看头钱”的地盘，都想向我开火。

那段日子里，有好些具正义感，而有同盟或洪门会意识的私会党与我们站在一道，其他的，则想方设法破坏工运。今天的工运，怎样都不能与当年比论，今天的工运领袖无须面对这些考验！

你加入工运想达到什么目的？

不外就是：

唤醒、团结工人，为他们争取合法权益，包括工资、工作条件、假日、病假、花红等等。

通过团结他们形成股强大力量，以废除不合理的劳工法令。

在政治上提高工人的认识，共同为争取实现一个独立自由、和平与民主的马来亚而奋斗。

具体的说，也在当时号召他们加入人民行动党，促使它在选举中获胜。

你在当职工运动领袖期间（1954年-1956年）犯过错误吗？

我是凡人，是历史的产物。我身上刻印着历史的烙印，与其他人一样，也受历史局限性的局限，我当然会、也曾经犯过错误。

在各业工厂商店职工会举行第一届代表大会时，我便提醒干事们要多多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不要动不动就罢工，这显然是认识到在过去一段时间有些过错。不过，若带着有色眼镜看，认为左翼职工会与工运领袖天生好斗、存心制造工业不安，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我们不能纯粹以今天的眼光看过去，或对过去下结论，正如拿今天父母教育儿女的方法与祖父母相比，祖父母的许多做法似乎是陈旧，违背儿童心理的。今天的工运一方面多少要有政府撑腰，有若干利于工人的法令支援，老板也非常开明，不仅不阻止，不少还主动劝工人组织起来，他们培育训练员工，给予福利，甚至分享利润……通过种种办法积极提高生产力，今天的环境也使员工真正认识到必须与老板合作，努力生产，同舟共济。五十年代情况完全不同，福利车厂工潮的起因之一便是老板不准工人组织工会，他们聘用新工来破坏工会，另组公司工会，与工人对抗，不少老板甚至通过私会党、政治部暗中殴打工人干事，逮捕工会负责人。若没记错的话，当时的皇帽汽水厂甚至这样规定：女工不准结

婚。当年工人即使要争取加薪一分钱，都要通过集体力量来达到，这便是为什么当年有这么多工潮的客观历史原因，我记得当年工会属下的杨协成工人为了加薪而罢工，出面与我会谈的是蔡某某黑社会头子，他活动于巴丝班让尾及武吉知马一带。

谈谈1954年与1955年的暴动。

若我没理解错误，你指的是1954年5月13日中学生为申请免役在总督府前靠近Penang Lane一带与警察发生的冲突及1955年5月12日福利巴士车工潮演变为暴乱的事件。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我们应对暴动的含义有个清楚的认识。从字面上看，暴动似乎是指一群人有组织、或自发的采取了某些超越法律所允许的行动，去实现或企图实现它的特定目标。

暴动可以是自发的、有组织的，也可以是被挑动起的。暴动要产生，先得具备一定的社会心态，因为它往往是在激情高昂的情况下才会有行动。

“没有一切向钱看的心理状态”、“没有对股市行情与组织法缺乏全面认识的心理状态”，最近深圳的股民大暴乱难以出现；“没有黑人觉得遭受歧视的社会心理状态”，今年初美国黑人的大暴乱不可能出现。

除非一个社会已经确立了牢固而又习惯于调整以适应新历史条件的民主机制，否则当它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阶段，从旧秩序转入新秩序，或者当它刻不容缓，到了必须调整某些旧秩序时，总会出现暴动或暴乱。

认识了这些，也就不必要对某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某些暴动或暴乱耿耿于怀；那种脱离历史条件、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状态，妄自尊大或自欺欺人的所谓“今天多太平，你们当年多乱”的说话，这显示了言者若不是无知，便是有意愚民以巩固自己。

1954年至195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一个从实施“紧急状态”转入实行林德宪制改革的转折点，一个由充满高压的白色恐怖转入极有限度自由、民主开放的转折点。

在这样的历史转折过程中，新兴力量与旧势力、旧习惯、旧传统的斗争往往更为激烈。一些出轨的行动，如不合程序、法规、惯例等的“骚扰”或“暴乱”也就必然浮现。渐渐地，当新势力完全战胜或克服了旧事物，新的处事程序、法规、惯例便形成并被接受，社会也自然安稳了。

你当议员时期望得到什么？

政治方面：

1955年4月2日林德宪制下举行的第一届大选，行动党派出四名候选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出马竞选武吉知马选区。

当时行动党所提出的竞选纲领如下：

- A. 争取一个全部民选拥有主权的立法议会；
- B. 建立一个多种语言的立法议会；
- C. 废除国民服役，只有一个全部民选的立法议会才有权通过抽壮丁法令；
- D. 与马来亚合并；
- F. 所有以马来亚为永久居留地者应授与公民权，拥有特权的外国人不应授予投票权；
- G. 废除紧急法令中有关禁止言论、结社等自由的限制，一个非全部民选的议会无权实行不经审判的拘留令；
- H. 修改劳工法令。

社会方面：

- A. 废除劳资纠纷法令中不利于工人利益之条款；
- B. 通过“劳工宪章”以便：
 - i. 订下最低薪酬
 - ii. 男女同工同酬
 - iii. 40小时工作周

- iv. 每年两星期年假
 - v. 童工与分娩女工津贴
 - vi. 对失业者的援助
 - vii. 增强劳工赔偿法令以协助在工作中受伤的工人
- C. 让十六岁以下儿童享有免费教育，各民族有权发展它本身的教育与文化；财政上援助各民族学校；
- D. 清除贫民住宅区，予信托局免息贷款以建造低廉价格之住屋。

经济方面：

- A. 实施税率改革以保障本地工业；
- B. 争取全马来亚之贸易自主权；即废除对胶、锡出口之禁令及由本地自行控制黄金储备金。

当选议员或人民代议士时，我非常期望：1. 能继续在议会内外通过教育，发动群众去实现以上的竞选纲领，即便不是全部，至少也包括其中大部分；2. 为我选区人民尽我绵力，替他们解决待解决问题。

当时的立法议院只许讲英语，未实行多种语言制，我是华校生，英语差劲，这大大妨碍了我在议会发挥自己的辩才。

竞选时期的气氛如何？

1954年4月的选举，有限度的政治开放，群众热烈响应了行动党的号召，这是因为当时行动党提出的竞选纲领适时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而行动党领导人与候选人如李光耀与林清祥等都敢于仗义执言，积极抨击殖民地政府，抨击那些不利于人民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政策，在广大群众间引起共鸣。竞选时期，各种大型群众聚会如火如荼展开，气氛热烈，默迪卡之声响彻云霄，当时出席群众大会的人数，经常是上万或数万名以上，而现场秩序井然又充满激情。竞选运动的展开，大大提高了群众的认识，那些向来亲殖民政府的政党则被唾弃，大选日群众自发地以“坐自由社会党的车，拿民主党或进步党的钱，投行动党的票”的策略去击败那些被唾弃的政党。

你在武吉智马选区获胜时的感觉如何？

感到欣慰，也感到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大，要做的事很多，要学的更多。这是场宪制斗争，你必须对宪制与法律有起码的认识，而这些文件都以英文书写，你不能先停止工作来学好它，自己是华校生，仅仅是初中三年级学历的华校生，责任感又很强，面对的压力非比平常，也许因为责任心重，加上全心献身人民，自己总算苦拼出一条道路。

你对1956年4月伦敦宪制会议（22. 4. 56-13. 3. 56）的回忆。

历史背景：

1. 林德宪制的局限性。
2. 人民要求真正完全独立、自主。

林德宪制实行不久，首席部长便因要求一个正式办公室，接下来为增设四个副部长席位与英国总督起了争执。

1955年7月25日，英殖民地大臣来新访问前一个礼拜，首席部长终向议会提出一项要求“马上允许新加坡独立”的议案，会议通过，但“独立”字眼被进步党议员动议修改为自治。

1955年8月18日英政府致函首席部长，取消总督有关委任副部长的一些权限，但欢迎林德宪制实行一年后，组织一个新加坡代表团到英国磋商。

1955年12月28日的华玲会谈，马绍尔看似举足轻重。

这期间人民开展了签名运动，举行了群众大会，要求马上让新加坡独立。一个为迎接英国工会代表团，以表达新加坡人民渴望自由与独立的“独立周”活动于1956年3月初举行。这项活动诉求的高峰，是1956年3月18日在旧加冷机场举行之各党派联合群众大会，出席人数多达四万人。

各党派13人宪制谈判代表：

1. 首席部长马绍尔先生；
2. 四位劳阵部长：Hamid Jumat、Lim Yew Hock、J. M. Jumebhoy、Braga；
3. 政府后座议员：余炳川、黄富南；
4. 行动党代表：李光耀、林清祥；
5. 民主党代表：林子勤、陈维廉；
6. 自由社会党代表：林坤德、林春茂。

不利于谈判的一些主客观因素：

- A. 代表团摆不出真正团结的阵容，各成员缺乏共识是主因。马绍尔本身不够坚定，经常受情绪所左右；自由社会党代表随时准备与英国人妥协；李光耀所要看到的，是能确保行动党执政又能控制左派的宪制安排，他也不愿看到马绍尔在争取自治、独立方面的风头比他还健。
- B. 当时英联邦一些通过宪制途径独立的国家如塞普鲁斯、锡兰等地的某些发展，致使英国执政保守党内的右派，抗拒对新加坡这个军事要塞做太大的宪制让步。

C. 新加坡代表团员只是不很强烈地表示：“立即使新加坡取得独立、完全自治是阻止共产主义威胁的办法……”

D. 但英国殖民地大臣Lennox Boyd在一项结论中却表明：“英国被要求在与新加坡的关系上，在现阶段采取断然、永久的做法，放弃一切权力与力量。然而现阶段所观察到的是，新加坡并没有一个安定的民主政府，且没有政党持大多数议席，当它无法预见未来内部的发展，而又面对亲共强大的渗透力量在工作着时……”因此，英国需保有最后的权力，以阻止新加坡落入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

E. 单就行动党代表李光耀与林清祥来说，两人之间就存有许多可以说是“历史造成的分歧”：

i. 1954年底行动党成立时，经过长期磋商，达致了具有非常进步意义的建党宣言。1954年与1955年狂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使党内分成了所谓温和与好斗派，紧接下来温和派被冠上“非共”字眼，于是也就有了“好斗的亲共派”。1955年福利工潮后不久，行动党第二届中委改选前夕，李光耀提出要所有所谓好斗与亲共的中委退出选举，结果第一届中委中的蒂凡那、方水双、曾昭卓、与可能参与竞选的林清祥只好退出选举。

ii. 以上是李光耀与林清祥历史性分歧的一部分，可以说李先生对具强大群众基础的行动党左翼非常恐惧，一直担心会被排挤或取代，而不幸的林清祥又成为当时历史产物，被视为行动党左派的公开发言人，在李先生的构思里，最切实可行，理想的新的宪制安排是：“让英国人继续提供个安全网，让他有时间把党组织建起来，可以温柔的说话，让英国人举着‘大棒子’，换句话说，一个可以控制的局面。”在这点上，客观地说他的看法和英国人的看法吻合：“需保留最后权力，以阻止新加坡落入共产主义势力范围。”

iii. 在伦敦会见了当时在英国念博士学位的吴庆瑞，李光耀见到了“亲共的约翰·伊峇如何与非共的吴庆瑞在马来亚论坛及留学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扩展彼此的影响力，及最后吴庆瑞如何战胜了约翰·伊峇……”，在这样的鼓舞下，李先生更坚定了他的“非共”与“非共必胜论”。

iv. 在李先生眼中，林清祥既然是“亲共的”、甚至是亲共势力的发言人，这之间关系的微妙与表现出某方面的貌合神离就难以避免了。

我在谈判的立场如何？

A. 基于上述认识，我知道谈判成功希望非常小。

B. 我的立场，基本上也该是行动党的立场：

i. 全力支持马绍尔争取包括控制内部治安权力在内的完全自治宪制；

ii. 唯一的局限是，应设有一个英国拥有大多数席位的防务与内部治安委员会，英国方面仅提供意见与咨询，但不能强制执行政策；

iii. 若英方不喜欢新加坡政府不顾其劝告，它有权解散政府与终止宪法。

我对上述立场强烈的表现，多少会给李先生一种错觉，以为若无法实现，我宁可看到会谈失败。这真是又一种“历史造成的分歧”。

我希望在宪制谈判会上达致什么？

A. 最起码地，我要避免它破裂，但它似乎一开始就注定破裂了。

B. 从以上的分析，我深知自己是绝对孤立的，也深知谈判一破裂，接下来的必是大逮捕，自己与许多同僚必将被捕，成为接下来的宪制谈判的牺牲品。

C. 有些“史书”与评论家总喜欢说“林清祥是唯一一个希望会谈失败的代表……”这种见解的逻辑是，林清祥是马共，而马共是好斗，喜欢暴力的。这些人忘了，林清祥是否是马共还待查考，这些人更忘了林清祥至少知道，1955年12月28日马共已于华玲与东姑·阿都拉曼举行会谈，在林清祥看来，这意味着马共在大退却，也许当时不那么明确，但会知道，若大后方都在退却，难道孤岛上的新加坡反要来场大反攻吗！

代表团就像马戏班

说新加坡代表团的表現如马戏班，只有抬举它，并没贬低它，马戏班至少有一定的组织法、纪律、程序、既定节目内容与观众。

部分代表团成员一抵伦敦，便进行政党政治活动，如马绍尔向留学生发言，寻求行动党摆脱亲共力量的影响，接下来李光耀的某些活动多少炫耀行动党在留学生与英国朝野人士之间有更大影响力，这对促成代表团团结一致应该都是不利的。

在伦敦会谈期间，我与李先生在ST James Hotel同住一套房，但他似乎忙于与吴庆瑞在一起，而我又几乎得空就由约翰·伊峇陪伴，这多少加深了大家的“历史造成的分歧”，我当

时的政治思想意识虽较接近约翰·伊峇等人，对他们也极尊重，我也会见了马共驻欧洲代表林凤美，但是对他们的许多做法却不认同，总觉得他们似乎太脱离了现实。

马六甲出生、后来当上行动党内政部长的蔡善进，当时也在英国留学，他曾这样谈到：“林清祥当时曾试图使约翰·伊峇，旺·哈密与吴庆瑞之间达致和解……”，李光耀在致杜进才一封信中提到这事，“林以为我对这项和解不太热心——在听完了吴庆瑞谈到约翰·伊峇的事后，我不太热心倒是真的，这些人比起他们在新加坡的同伙更难合作。”

以上插曲说明我当时仍非常尊重李先生，也希望见到反殖力量的大团结。

由于双方对于“内部治安”掌管权无法达至协议，会谈陷入僵局。马绍尔过后想召集代表团会议，提出折衷办法，我支持他的建议，但遭到一些团员的阴谋破坏。一些代表团团员在与英方默契下，已酝酿由林有福取代马绍尔，因为马绍尔已宣布，谈判若失败，他将辞职。

会谈失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通过早前在丽的呼声任职，当时在英帝国学院研究原子能的张拭，打电报予Jamith Sing，要大家绝对保持冷静，不可轻举妄动。

1956年10月，你在公安法令下被捕？

1954年大选中，我已成为群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是个肯牺牲，坚决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人物。

1955年我已成为左派或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职工领袖，不仅是各业厂商工会总务，也是许多个别工会的顾问，又兼任妇女协会、农民协会、家长联谊会顾问。

同年，不由得我自己，历史已使我成为行动党内左派的发言人或领袖。

不仅在行动党的所谓“非共”领袖，在英国政府、联合邦政府及其他一切右派政党看来，我是坚决反英的亲共首领。

1956年四五月间在英国举行的宪制谈判破裂，关键问题就在于内部治安权力及如何先清除像我这样的份子，所以1956年10月26日，宪制谈判失败后的五个月，我与许多同僚被捕是预料中之事。

你的被捕对职工运动有何影响？

五、六十年代，学生运动与职工运动是反英殖民主义运动最坚强的两股力量，说它们是反殖先锋并不为过。没有取得他们支持，不会有今天的行动党政府，没有他们的牺牲，英国人

不会退出或这么早退出，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新加坡，站在英国人立场，怎样分裂与削弱这两股力量是重要的战略之一，逮捕这两股运动的领袖、基层领导人及封闭他们的组织是削弱与瓦解这两股力量的方法之一。

这就是说，我与我的职工运动同僚被逮捕，肯定地会暂时、直接地打击职工运动，影响工人生活，使反殖民运动出现暂时混乱。我们被捕不到一个月，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面对被封闭时，1956年11月23日的英文报章就曾这样报道：“密陀律工人奔向职工总会求援”。职工总会主席Jaganathan说，“一些雇主继续通过各种理由，割减工人薪水，剥削他们……雇主的借口是没能力继续付起现有的薪水。”

这则报道反映，我们被捕后许多老板趁机报复，他们认为现在又是有政府撑腰的时候，纷纷用各种借口废除掉与我们签订的合约。

要往深一层看，我个人觉得，若我们没被捕，1957年8月行动党中委假羽球馆举行的改选，完全可能不会出现那样的局面。

被扣留期间，你的感觉如何？

我在1956年10月26日被捕，1959年6月4日才获释。扣留初期被关在欧南监牢与几个面临驱逐出境的政治犯在一起，我有种感觉，当局也有意强迫驱逐我到中国去。1956年10月25日深夜，大批政治部人马搜查各业工联，我的东西全被带走，连字纸篓内的垃圾都带走，我当时住在工会，一本英国护照及出生证留在工会，也全被取走，可是，后来竟出现了我究竟出生于何处的

我被单独监禁，关在一个叫Refractory Block的地方，指的是不可改造者、顽固者的拘留处。我的亲密同僚蒂凡那、方水双、兀哈尔、曾超卓、普都遮里及陈文英则全部被关在自由营（之后改称明月湾的拘留营）。约在1958年正、二月间，政治部突然调我往自由营与我的同僚们在一起。我一到，面对着他们已起草拟好的一份声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把我与他们隔离这么久，才突然调我来与他们住。我被扣初期，李光耀先生常到牢里会见我。最初谈的是各业厂商职工联合会将面对被封的问题，接下来他非常担心由于我的被捕，在外头不知道要跟谁接头的问题，有一回他隐隐约约写了个“林村”的名字，问我是否认识他，可靠吗？这是相当微妙的问题，我面对的是个战友又是律师，我当时只好含糊过去。之后，他非常担心五九年

的大选及是否要组织政府的问题，看到他有着这么大的后顾之忧，就在此时，我向他提出，我要离开新加坡，前往印度尼西亚深造。

在单独监禁期间，我把重点放在学习马来文，靠着几本中巫字典，包括一本爪威马来字典，我学会或基本上觉得已能掌握马来文，我这么热衷于马来文，可能是深受当时思潮影响，认为掌握了它（它当时已普遍被接受为国语），便能更好地搞好各民族团结工作，我几乎读完了古典与现代马来文及印尼文诗歌、班顿、小说，具备这些基本条件，也是我提出到印尼进一步深造的原因。

回到自由营与我同僚一起后，面对一份已起草好的“马来亚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声明，大家都提心吊胆，想知道我的态度，原来这期间李光耀、吴庆瑞等经常访问他们，要他们在出狱前先表态。

“与我的同僚决裂，孤立自己，更坚决前往印尼”，这个念头似乎困惑着我。当然，最后印尼没去成。李光耀先生一直劝我留在新加坡，他似乎非常看重我，过高地估计我，在行动党成立早期，几次他向我说：“只要你和我们站在一道，战役的五十巴仙胜利便定了。”看完了同僚们起草与签署了的声明，我修改了几个字眼，终于签上。这便是后来著名的出狱声明的背景。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共产党员之一”，我签完声明后，蒂凡那以轻松口气这么对我说，这似乎是很有意义的一句话。说实话，我并不太在乎那声明的内容，原则上，我总觉得在狱里签署有点不明智，用英语说是under duress（被逼的）。当时，这项声明的签立终于成为一个先例，自此以后，政治犯要获得自由便必须签署一纸声明。这期间我总有点奇妙地感觉，蒂凡那几次告诉我，有一回，外头有人如何用金箔纸包装message，混在他太太带来的咖喱羊肉里面，差点被同僚吃掉，闹着由于心理作用而引起的皮肤敏感。之后，我们被全部调往樟宜山，在那里我们是贵宾，非常自由。约在1959年6月4日出狱前一两周，我们又被调回樟宜监狱，出狱前夕6月2或3日，行动党中委假福建会馆匆匆举行大会，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若要我简短说说被扣留时期的感觉，可以这么说，感到未经审判长期被扣是种非常残酷的刑罚，表面上顶文明、斯文的，我被分配到不错的食物，每天有两粒鸡蛋，当议员每月五百元的津贴照发，还有一个半神经质的犯人叫温阿历的替我打扫牢房。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想这种刑罚比起日本人那种白刀进红刀出，或一颗子弹快速解决掉更残暴。因为，这是种慢性的，经年累月的，逐步摧残人性的作法，这种刑罚比施在刑事犯上的刑罚更残忍，一个刑事犯即使杀人放火定下死刑或终身监禁，他有个目标，死刑若上诉不得逞就是订期见上帝去。终

身监禁的人扣七扣八也不过需在牢里十二、三年，他知道自己有个日子可以等，而政治犯是无限期的，直到你在人格上做出自我摧残、满足政治敌手时才有所谓获释的机会。

最好的一种体会办法是，让我把你们关在一个最最舒适的房间，给你山珍海味，不过不准阅读任何未获批准的读物，不准与他人交谈来往，不准有电视或有长短波具备的收音机，起身入睡一切有规定，别说关你一年半载，一个月就好了，然后你告诉我感觉如何？而在被关期间，由于是政治犯，你又不须工作，像犯人那样工作，你除了在那小天地踱方步以外，剩下的是时间，无数的时间，若你不能自拔，在那种情况下你真正才会体会到什么叫着度日如年，而当你望着那座牢狱石墙内外，有多么多事你想做，你可以做而你不准做，你才真正会懂得什么叫挫折感。

谈到我在扣留时期发生的一些令我感到无奈、挫折的事，有些例子：

A. 1957年8月行动党党委的改选事件，我记得很清楚，阿末·伊勿拉欣在事件过后到Refractory Block探望过我，我对他表明并不赞同TT拉惹等人的做法，但我更强烈表示，李光耀等人退出中委并与TT拉惹等人公开决裂，划清界限，无异于邀林有福尽早向他们下手。事情果真如

此发展，不久，陈世镹、陈从今、吴文斗、王财安与陈贡源等另一派中委全被逮捕了，我的挫折感异常强烈，我坚信若我们没有被扣留，这事件完全可以避免，以更适当的方式得到合理解决。

- B. 关于我的同僚蒂凡那、方水双、兀哈尔、曾超卓及普都遮里等签署主要由蒂凡那起草的“马来亚社会主义者的道路”之出狱声明，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它是有分量，具远见的，不过，这文件产生的经过与背后动机我不很同意，它是在我被完全隔离受单独监禁情况下出现，是在全体同僚被扣留时，在被迫情况下的一种表态。我有被玩弄的感觉，我一向主张坦诚相对，我相信当时若我们没被捕，这件事不致于发生，即使历史条件要求，大家能坦诚相对，同样一份或更好的，更具说服力及影响力的文件可能会在自由的，完全正常的气氛下产生。
- C. 郑越东代表工人党在市议会竞选中突然退出选举一事，我当时并没有看出其中具有什么特殊意义，没想到还是马共地下与李光耀的一宗“交易”。
- D. 1957年3月与1958年5月在英国举行的第二与第三次宪制谈判之事，我既然参与了第一次宪制谈判，对要谈的内容，第一次谈判破裂的因素都相当清楚。我前此曾指

出，为了使第二次宪制谈判成功，我与我的许多同僚都将被牺牲。1957年3月与1958年5月的宪制谈判我们都在牢里，基本上它内容与第一次谈判大体相同，谈判肯定会达成协议，对英国人来说，至少新加坡强大的左翼暂时被削弱了，对李光耀先生来说，他的一大后顾之忧相对减少了，更何况谈判中又出现了一项被新加坡各政党接受的“禁止知名颠覆份子参予第一届大选之条款”。有了这项规定，英国及所有害怕或担心我们在牢里被提名，又势必获胜，并将在来届国会或政府中起一定影响的因素人为地给除掉了，于是各方功德圆满地欢庆宪制谈判圆满结束。

对于“颠覆”的涵意与看法，我与李光耀先生的看法有原则上的不同，一般来说，颠覆指的是通过各种行动破坏现存制度。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不仅我们新加坡人民，亚非拉人民都风起云涌献身于破坏存在着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制度，行动党的成立及其建党宣言也反映这一时代精神实质。因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特别是作为反殖政党来接受这样的条款，说得温和点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已经独立了，拥有自己完整主权又是民选政府在掌管，问题就有了质的差异。

知道1959年大选结果时，你的反应如何？

“兴奋、雀跃又有点茫然”是当时的反应。兴奋与雀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己协助建立与支持的政党终于在大选中取得胜利，可以执政了。从个人自私自立场看，自己就要获得自由了，怎不叫人感到兴奋与雀跃呢？而感觉有点茫然，带着混杂着不知所措与又有点失望的情绪产生的茫然，却不是局外人能理解的。“马来亚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文将引起的观点分歧与纷争；仅六至八名与党领导层有密切联系的政治犯立即获释，其他遭扣留者必须等待些时候才能获释；大选运动激起的期望与现实情况差异可能带来矛盾；未来个人将起与可能起的作用；李光耀先生，至少对我还存着的多少个人后顾之忧……单单这些就够你产生“有点茫然”的感觉了！

当你与其他同僚走出监狱时，感觉如何？

1959年6月4日，在内定内政部长王邦文先生引导下，我们离开樟宜监牢，步上停在外头的豪华汽车，被载往设于大坡大马路的行动党总部，在那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马来亚社会主义道路”的表态声明。一路上受到两旁群众热烈欢呼，当我过后往密驼律泛星工业工友联合会会所时，迎接的是欢呼、鞭炮声；横在会所大横柱的大标题是“欢迎民族英雄林清祥获得自由。”之后，我往武吉知马选区，裕廊路支

部，一路上，群众拥挤在道路两旁欢呼，除了兴奋感动外，你不禁发现群众对自己的期望是非常非常之大。“将做什么？能做什么？”又强袭你的心头！凭着自己多年在群众工作中积累的经验、直觉告诉我，“你是当前群众运动的真正地心吸引力！”现在回想起来，若要夺去行动党领导权或置行动党政府于死地，当时，我只要一声呼唤，刚成立的政府将非常难过关，不须等到1961年或1962年！

艾登园茶会（1961年7月）是怎么一回事？

1961年7月是新加坡政坛的重要时刻。该年4月，著名的芳林补选、5月1日在惹兰勿刹举行的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上，李光耀暗示将放弃政权、5月27日马来西亚总理东姑·阿都拉曼提出了倡组“马来西亚”之计划、7月27日安顺区举行补选。

芳林补选是因为王永元提出十六条议案，导致被开除出行动党后所造成的。这十六条议案普遍地反映出当时群众的要求与情绪，以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高层认为这是一种挑战，是王永元个人野心的表露。在思想意识上，王永元与李光耀应该没有重大分歧，不过之间却存在极大个人矛盾。1959年6月5日我出狱的第二天，行动党元老陈岳英曾到泛星工联访问我，这时他已坚决站在王永元一边。他告诉我王永元想与我见面，谈谈如何合作防止李光耀的独裁与右倾走向，我婉拒了这项邀请。

当时，我做了一件该做的事，把情况反映给李光耀，我知道他对我存有很大疑虑，我不能不设想这是否是他设下的圈套之一。除了王永元设法找我之外；一位前亲密战友的夫人也频频来哭诉，而且说她要离婚。我对这事非常谨慎，不过是听了就算。李光耀深知我这位战友变了，但我可还没有。换句话说，我与这位战友有了思想分歧。我一不小心，李光耀必利用任何机会以证明“林清祥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一旦发现同志立场变了，会不择手段斗倒斗臭他们。”

芳林事件的发生说明王永元与李光耀已水火不相容。王永元相当明了当时群众的心理与情绪，十六条议案便包括了“释放政治犯”与“统一工运”的问题。这使一些左翼领导人感到为难，也误导了群众，绝对多数左翼领导人在王永元与李光耀间选择了李光耀。在他们看来两者都是深具野心的人，一个是多少摸透了的，一个是未知数，只好选前者，却也不否定王永元“要求释放政治犯”与“统一工运”议案的正确性。李光耀并不满足，他要求绝对的，没条件的支持。否则，失败了就“放弃政权”，让英国人来收拾左派。

芳林补选的结果，行动党是失败了。就在李光耀恫言“弃权”声中，马来西亚总理于1961年5月27日提出了组织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联邦，汶莱、沙巴与砂拉越在内的马来西亚计划。

基于以上背景，我们一些被认为是行动党左翼的领袖们，想到应该到英国驻新加坡专员公署拜访谢尔克（Lord Slirkirk）最高专员。既然李光耀要“放弃政权”，“收回安全保护伞，让英国人来收拾左翼”，接下来的马来西亚计划也是为解决“新加坡有太多华人，太多左翼”的问题，左翼领导人当然想要了解英国人的态度，“是否英国政府只容许行动党执政，别的政党，如左翼政党循宪法途径取得政权并尊重宪法，难道英国人就不容许？”这就是参加艾登园茶会的真正目的。

这本是件寻常事，是搞政治活动，特别是遵循宪法的政治活动极其正常的合法活动。

行动党却故弄玄虚，说是项“密谈”，是什么“左翼领导人上了英国佬的当”，好像除了行动党几个寡头外，其他的人都是轻易任人摆布的蠢物。在政治斗争中，各派领导人都须懂得用兵，所谓“兵不厌诈”就是这个道理，有时也免不了要与“恶魔”握手，这有如李总理1959年大选前几次秘密与马共全权代表“密谈”一样，没有人可说李光耀与马共全权代表密谈，是谁上了谁的当，双方就像是在互下一盘棋。硬说我们上了“英国佬的当”，说穿了不过就是“我可以做的，除我以外任何人都不可做，若你硬要做，便是荒唐、幼稚、不合逻辑！”

关于新马合并，你对此问题的立场？

1961年9月17日，在宣布成立社会主义阵线时，我代表社阵表明了对此问题的立场：

“如果真正的合并不能立即实现，组织一个包括北婆三邦在内的联邦又无进展，我们应该为实现在1963年取得完全内部自治而奋斗。与马来亚联合邦的真正统一意味着新加坡加入后像马六甲与檳城那样，其公民全部自动成为联合邦公民，拥有联邦公民一切权利与义务。

新加坡因此成为联合邦不可分割一部分，以人口之比例选派代表进国会，如其他州似的，与他们分享共同政治生活与命运。这是国会民主之基础，是项宪制内必须的安排，以使中央国会能反映出全马人民的心声。现下有人指我们‘反合并’……那些喜欢半生熟马铃薯者怎能指责喜欢煮全熟之马铃薯者是不喜欢马铃薯者呢？

关于争取完全与真正的合并，我们是严肃与认真的，若联邦政府接受我们为联邦不可分割之一部分，我们将会非常高兴地全力支持那样的安排。

虽然我们与东姑在一些问题上看法不同，但尊重他是国家民选的领袖。对那些看法不同的问题，我们表明我们不同之看

法，并基于民主精神批评他，对于我们同意他的问题，我们将言行一致支持他。

新马之统一一向是马来西亚社会主义者的立场，现在东姑既然要接受我们，我们毫不犹豫支持没有保留教育与劳工政策或某些特权之真正的合并，我们仅想以平等公民身份加入马来西亚，为共同美好的将来努力。

我们明了，合并后我们将暂时面对强大右翼政权，可能面对镇压。我们的道路将是艰苦的。我们曾遭受政治扣留与迫害，我们准备牺牲。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不让个人安危阻挠两国人民之统一，我们已说过，我们准备面对人民说服他们这是正确的选择。

我们要求，合并后在泛马来西亚举行大选，这样做才能使合并后的中央国会具有真正代表全马人民之精神。民族与国家团结不是党派政治，应把各党派歧见置一旁，全力发动人民以立即争取真正与完全合并。

若东姑在现阶段不能接受完全与真正合并，另一出路是组成一个包括联合邦，新加坡，及北婆三邦之邦联，在邦联安排下新加坡将是自由与享受完全自治的单位。

行动党主张的并不是合并。没有任何人可以声称自己属于一个国家，除非他是那个国家百分之百的公民。有哪个具自尊心者，愿成为二等公民？

当联合邦人民可以来参与和影响新加坡人民的政治生活，我们却无权去过问他们的政治，共同选出一个具真正代表性之中央政府。这算是什么样的合并与统一？因此，行动党的合并计划，不但不能促进民族团结，反而会带来严重后果。”

新加坡宣布独立时，你感受如何？

历史已经证明我们是对的，李光耀不顾人民愿望强硬推行“通过马来西亚之合并”，不到三年便破产了。两地人民本来更亲善，经那么一搞，关系更坏了。新加坡终在1965年8月9日被驱逐出马来西亚，宣布为独立国。

1993年4月23日，在结束访问汶莱时，在记者招待会上，李光耀说，“每一次来到汶莱，总是会想起前苏丹乌马赛夫汀，他说话很温柔，人也非常和气，我记得和他一起出席和英国之间的一连串有关成立马来西亚的谈判。当时，谈判已进入最后的阶段，我们和马来亚已达成协议，但是他们却还无法达致协议。英国的官员已经有点不耐烦，但他却很固执，他却还是如往常一样，安静、轻松自在，但他清楚的显示，他并不准备改变立场。

“现在回想起来，他才是真正的智者。数年之后，当我们被马来西亚赶出来时，他问我：马来西亚怎样了？所以他是正确的，错的是我。我想，他的直觉必在当时告诉他，我（要和马来亚合并）的决定，并不一定是正确的结论。所以，我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联合晚报1993年4月24日第四版）

我们一向宽宏大量，欢迎知错能改者，但不能轻易忘掉历史教训，它们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留下深深的伤痕。三十年（从1960年迄今）从历史角度看好似三十分钟，有人则在那短短的三十分钟内，在诸多关系重大问题上转了几个大大的急转弯。

在建国道路上，从“独立会灭亡、人家会派兵来、水喉会被割断”论，到不顾民意，推行所谓通过与马来西亚合并而独立，再到“被迫”宣布独立，李光耀急转几个大弯。诸如此类历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后果有时要五十年后才显现出来。本来，两国的统一由于有东姑与李光耀等人的私心，及英国人的从中作梗而显得困难重重，现在，可显得更困难了。

新加坡虽小，并不等于不能生存与独立，如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它别无选择，只好完全内部自治或甚至独立，然后自力更生搞好经济、解决民生、团结各民族，把这一切看作是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不仅仅是一党一派的事，它可建造有

利条件促使周边国家，特别是历史上与我们分不开者，更趋向我们，并在一定时期在有关国家人民同意下，以平等条件之形式，达成完全合作与民族团结；也许这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后才实现。基于这认识，当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时，我从牢里写信给社阵主席李绍祖，反对其指独立是假的，要求他承认独立，并指出这是行动党“合并”主张的破产，应该要求马上释放全体因反对行动党“合并”而被逮捕的人士。

1945年英国的分而治之宪制安排，注定新加坡在很长时期内不可能成为区域的政治领导中心，我们的建国运动在多方面受到联邦的牵制，社会基本结构不可能有革命性的变革，但这不等于它不能单独存在。积极地采取基于万隆亚非会议拟订之五项原则，新加坡不仅可生存，且可稳步地发展并对周围国家起积极影响。这一切只有在新加坡出现一个真正维护民族与人民利益的政府与领袖时才可能。若政治领导层一味为个人或一小撮人之利益与生存耍花样，不断消极提出与扩大本国及周围人民间之矛盾，抄袭英国佬那套制造分裂以便加以所谓“平衡”，使自己成为所谓不可或缺的平衡力量，瞧不起别人，处处以治理一个小城之骄傲，要套在别国身上，实会伤害到也正在起飞且取得一定成就之周围国家。

对独立后的新加坡，你有何感想？

像所有理智的人一样，我承认也高兴新加坡取得了一定成就。不过我常问：“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去取得这些？”我们应记得，中国的上海、印度的加尔各答各有一千两百万人口，一些跨国公司如波音，一年的预算就等于我国一年的预算案，我们不能自卑却千万别自大。

独立后的新加坡，在教育上过分尊崇英语，以英校与英文来塑造新加坡，忽略并带成见地歧视各民族教育。被定为官方语文的马来语用途只剩下唱一唱“Maju-lah Singapura!”；南大被封掉，以母语为主的民族学校全完了。单单说声：“若能从头再来，不会那样处理华校，”及赞赏一句“南大精神”就能算数吗？我们的下一代已经东不东，西不西，沉沦于消极与灰色文化地带。把责任推诿给家长，掩盖不了政府政策迫使家长别无他选的事实。

人口政策，是涉及几代之人的大事。抬出什么经济专家博士的谬论，强制执行“两个就够了”，加上自以为是推崇所谓优生学，终于碰了钉子，现在则巴不得年轻男女快马加鞭，家家生它三、五个孩子。

经济上袒护外资及与政府挂钩公司。造成全国公司投资额有70%属于外国跨国公司，20%政府法定公司或与政府挂钩的公

司，中小型私人企业只占10%。再加上限制法令如毛，本地怎能冒现诸如印尼的林绍良、马来西亚的郭鹤年、香港的李嘉诚、包玉刚之类的世界知名企业家。

在殖民时期，新加坡是个自由贸易中心，靠货物转口为生。不过，比起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新加坡建国起飞时，并没有面对战火摧毁后百孔千疮的局面，而是在各方面已具备相对稳定的基础。新加坡面积小，地理环境既具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在于它拥有个好海港，具战略与经济价值，可是，由于现代武器之发明和改进，以及区域国家自力更生，减少了对新加坡依赖，她传统上的战略优势日渐削弱。六七十年代冷战炽热，资本主义世界某些科技与资本转移，多数选择到政治上与他们站在一道的反共前哨站，增强了这些反共但自称民主的国家的势力，并使它成为成功的橱窗，这就是大家熟悉的几条小龙。李光耀自愿成为西方在东南亚的反共代言人，新加坡因而吸收了不少技术与转移资本。中年以上的人都记得，那当儿李光耀以反共、反中国出了名。

世界不断在变化，世界两大阵营终于认识到必须对话，通过和平发展经济，互相竞争，以说明哪种体系更能发挥生产力，更能让人民共享社会财富，建立与提高进步的文明，并做到给予人民，即先有生存权利，后又能发挥从事科学、艺术创造才华以及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与各国

技术与资本转移市场已空前扩大，新加坡靠反共吃饭也行不通了。

新加坡经济，传统上是个中介（broker）角色的经济，政治上我们可能也习惯性地当起broker来。但是，六七十年代当世界因思想意识激烈斗争，两大集团处于冷战、不相往来的状态，broker确实有点用场，可是broker之所以能生存，在于他不把所有赌注都放在同一边，可是当时，我们却把所有赌注压在西方身上，我们终于失掉大派用场的机会。而东亚甚至世界，尼克逊、基辛格拜会了中国领袖，发表《上海公报》后关系逐步解冻，趋向缓和。今天，世界逐渐趋向对话、和平发展的阶段，国与国都直来直往，不再需要broker了。我要说的是，新加坡过去与现在拥有的许多优点都是相对的，经济上新加坡已饱和。

我们的经济结构使我们必须维持强劲的币值，我们的币值在外汇市场上顶强，但若以最近国际货币基金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时，以较切实际的标准衡量货币的购买力，新加坡的经济力就显得外强中干。

新加坡国小，易控制，易镇压；但也因为小，又处于东、西要冲，当世界趋向开放，距离也越来越近，想要长期恐吓、蒙蔽人民已不可能，那种以为人民都像猪样，只要给予饱暖，

或让他们感到相对的饱暖，便不参与国事，可让一小撮“聪明人摆布”的想法，实为鸵鸟观念。世界历史说明，往往是那些较饱暖、又富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知识份子，最早发现社会问题，并形成要求改革的动力。

为什么要成立社会主义阵线？

成立社阵之背景：

社阵于1961年9月17日成立，发起人包括普都遮理、ST巴尼、兀哈尔、李绍祖医生、林史宾、陈清动、王清杉、黄信芳、陈新嵘、方韵琴、陈炎成、刘坡德、方水双、盛南君、林清祥等。

1959年取得政权后，行动党的“革命热情”开始消退，渐渐放弃建党宣言的革命立场，并决定与左翼决裂。它具体体现于几方面：

1. 1957年8月在羽球馆举行的中委改选，当TT拉惹所带领的一派挫败了王永元等人，李光耀便公开宣布与他们决裂，导致他们被捕。
2. 多方孤立与打击林清祥。
3. 1958年在英国举行之第二轮英新宪制谈判，接受了“禁止中知名颠覆份子参与大选”这一条文。

这项宪制措施的提出，一方面说明英殖民者在人民日益反抗下已不得不改变，已不能再援引战前的旧措施继续统治，它必须提出新措施来达到分化人民与打击民族独立运动的目的。

麦马高尔碰鼻了，各州苏丹有的犹豫，有的拒绝交出主权，他只好无耻地恐吓：“如果不签字，将被废黜。”威迫利诱下，九州苏丹只好签字，把全部主权交给殖民主义者。

1946年的宪制白皮书：

1946年1月24日，英殖民主义者正式公布了一份《马来亚新宪制白皮书》，对新马实行“分而治之”的手段，目的在于：

- (1) 阻止新加坡在宪制上进展，把它从马来亚分裂开来，使它永远成为英国在东南亚势力范围的政治中心。
- (2) 把它变成远东的军事堡垒，成为它的全球性军事基地。
- (3) 巩固、加强新加坡自由贸易港地位，使它成为英资本家的重要海外投资中心。
- (4) 分裂新马人民关系与民族独立运动；使新加坡不能对马来亚政治运动起作用。

英殖民者的手段，正如他们把印度化分为印度、巴基斯坦与孟加拉，以及把伊拉克与科威特分为两个国家同出一辙。

在这历史关头，马来民族主义势力大肆扩张。1946年3月，一群以拿督翁 (Dato Onn bin Jaafar) 为首的受英文教育马来知识份子、地方酋长以及政府高官召集了各类型马来族群团体，成立了巫统 (UMNO, 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sation)，拿督翁当选主席。这之前，马来国民党 (Malay Nationalist Party) 与波斯达曼的觉醒青年团已在马来民族中，配合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展开唤醒马来民族之运动。

马来亚民主同盟

1946年2月22日，马来亚民主同盟 (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召开全马左翼团体大会，成立“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 (Pan-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简称行委会 (PMCJA)”。马来亚民主同盟 (简称MDU) 于1945年12月21日成立，其建党宣言为：

- (1) 实现在英联邦内的马来亚完全自治；
- (2) 成立一个由民选代表组成的马来亚立法议会；
- (3) 有21岁以上的马来亚公民，无论种族、性别、宗教、

- (4) 给予绝对的人身、言论、出版与结社自由；
- (5) 给予人民免费教育，进行基本教育、中等教育、技术教育等改革；
- (6) 推行社会福利制度，以实现全马医药免费服务；
- (7) 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
- (8) 摒弃种族歧视，使各族人民有均等的就业机会。

■ 428 马来亚民主同盟主要发起人为：林凤美、林建才、郭彭珍、蒂古鲁斯（他自称是共产党员，1950年后期新加坡劳工阵线聘他为该党组织秘书）、约翰·伊峇、何阿廉律师。这批人都是受英文教育的高级知识份子，林凤美与林建才，约翰·伊峇都受教育于英国剑桥大学。余柱业、P V莎玛同时或稍后也成为该组织的重要负责人。约翰·伊峇于第二次大战被日本人把他与英国战俘一道监禁，在监禁期间受尽日本人甚至英战俘的欺凌。1950年又被英国人扣留，出监后往英国继续展开反殖、争取马来亚独立的运动。林凤美在剑桥大学据称组织援助中国的抗日活动，得罪了校方，结果返马在柔佛兴楼（Endau）当农夫，并参加了人民抗日运动，他与林建才都曾是新加坡莱佛士书院高材生，于1937年获得英女皇奖学金前往剑桥大学深造。

1950年林建才逃往北京，在北京电台工作。1956年星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访问北京，会见了逃亡在北京的林建才，会谈后马绍尔坚信林建才不是马共，且已停止了政治活动，终于允许他返新加坡，目前他在怡保当律师。

我详细叙述这些人，在于证明某些人的宣传，认为所谓的坚决反英者都来自华校，都是共产党，事实并非如此，那都是虚构或夸张的，是对历史的歪曲以掩盖他们歧视华校的本质。这些叙述也说明，早在李光耀为首的一批受英文教育者出现于政坛之前，已有不少受英文教育高级知识分子献身于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民族解放运动。

□ 429

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

让我回到“行委会”（PMCJA）。它的成员有马来国民党、泛马职工联合总会、马来亚民主同盟、马来亚印度国大党、马来亚抗日军退伍同志会、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团、马来农民联合会、觉醒青年团。大会的纲领如下：

- (1) 新加坡应该被包括在统一的马来亚之内；
- (2) 立法议会应该通过公众的选举而成立，才具有代表质；

- (3) 任何把马来亚当成真正家乡及效忠对象的人，都享有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 (4) 各州苏丹只能是该州宪法上的最高统治者；
- (5) 回教与马来风俗事务应由马来同胞自己处理；
- (6) 积极鼓励马来民族向前发展与进步。

宪制蓝皮书引起争论

大会要求英殖民大臣承认“行委会”为唯一代表性机构，但被英殖民政府拒绝。殖民政府自行组成一个所谓的“咨询委员会”，征求所谓民意，修改了一些小细节，便完成了“马来亚宪制报告书”，亦即“宪制蓝皮书”。

1947年1月8日，“行委会”在雪兰莪举行第二届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 (1) “宪制蓝皮书”在违反民主方式下拟订，缺乏民主内容与权利，不足以引导本邦朝民主路线发展；
- (2) 大会指出，蓝皮书中有关苏丹的内容，各州苏丹并不需接受钦差大臣的指命，它应有立宪君主的实际地位，各州苏丹只需接受各邦人民通过民主立法议会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 (3) 大会主张不得侵犯马来人民对回教与马来风俗所享有的特权；
- (4) 大会认为，蓝皮书只顾及马来民族某些特惠集团的权益，并非顾全整个马来民族的权益，而马来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教育更需要特别照顾。大会主张未来的马来亚宪法中，须附有照顾马来民族政治、经济、教育发展的特别条文。

1947年1月9日，马来亚各民族总工会发表声明，严厉抨击“宪制蓝皮书”“蓝皮书暴露了殖民政府的反动本质，中心特点就是由各州苏丹授权予英人集中统治、不论行政议会和立法议会都是殖民地官僚统治的装饰品，没有半点民主意味存在，这表现在最高行政专员有权操纵一切的无上权力；唯一可表现民意的立法议会，官方和半官方议员又占了大半数，非官方议员又非民选，而只是由行政官指定的，而且它全无半点权力。它通不过的法律，行政专员可使其成为有效，它通过的法律若不合专员的心意，他可使它成为无效，因此专员的意志就是法律，议会成为专员工具。”

1947年1月10日，马共也抨击“宪制蓝皮书”：“所谓恢复苏丹主权，是英政府的统治花样，以藉缓和这一年来马来民族对英政府不满情绪，实际上马来亚从中央到各州，政权是紧握

在钦差大臣及各州英籍顾问的手里。公民权解释为原有国籍的附加物，而不是国籍，其实这是暗示了英政府对马来亚自治前途的否定。英政府若真正有意让马来亚走上自治，首先就应该承认每个以马来亚为永久家乡及效忠对象的人的马来亚国籍。

表面上蓝皮书给马来民族在联邦立法议会的非官方议员中持有比其他民族更多的席位，以及苏丹的属民都享有当然公民的资格，但是这些所谓特殊地位，除了被利用为藉口，以制造华巫族的妒嫉与不和，引起民族分裂外，实际上对马来民族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马共拥护“行委会”的三项原则：

- (1) 建立团结的马来亚，包括星加坡在内；
- (2) 通过完全代表性的中央立法机构，成立全马来亚责任制自治政府；
- (3) 凡以马来亚为永久家乡及坚贞不渝的效忠对象者，一律享有平等公民权。

此时，各阶层人民纷纷响应“行委会”号召，反对“宪制蓝皮书”。1947年1月28日，“行委会”再度在吉隆坡举行大会，议决：

- (1) 促请各咨询委员会辞职，因为他们并非人民的代表，并且是无能力者，他们只是专制政府的附属物。

- (2) 以大会名义敦促全体人民，拥护为马来亚人民服务以争取民主制宪的“行委会”的宗旨。

1947年1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成立19人特别小组，研究“宪制蓝皮书”，并呈备忘录予殖民部，指出：

1. 蓝皮书并未咨询广大华人的意见，这种做法不公正。华人在马来亚生活已有几个世纪，他们的勤勉劳动与企业促进了马来亚的繁荣，他们在日侵时期用生命保卫本土，他们对马来亚的效忠，不亚于他族，因此任何马来亚宪制改变的提议，断不能忽视华人的利益。

2. 反对蓝皮书分裂星马，这个规定事先并未征得殖民地人民的同意。星加坡在经济与地理上不能与马来亚大陆分隔，政治上的分裂必将对海峡殖民地与马来各邦的经济发展与福利造成损失。星加坡本土太小，无法负担分开的治理，否则也将加重人民的负担，本会认为新加坡作为对国防事务的战略中心确实重要，但可通过特殊条件规定此项用途，无需分裂星马。

3. 联合邦公民权的规定：无条件给马来人公民权而对非马来人加以种种限制，非但非马来人不表赞同，有正当思想之马来人也不会同意。本会赞同保障马来亚各邦马来人的特殊地位，但认为适当保障这特殊地位，并不妨碍其他族人士之合法权益，本会建议下列公民权原则：

(甲) 所有马来亚出生人士，不分种族，均地位平等，自动获得公民权；

(乙) 分别规定目前马来亚居民与将来移民者获取公民权办法；

(丙) 居留期限应规定为5年，而无需15年。

(丁) 废除任何语言资格。

4. 反对立法议会中不公平的代表分配：官方语言可规定为英语，但议员可得议长允许说其他语言；钦差大臣保留权力只限于国防及安全事务。

同年2月19日，马来国民党，马来青年团以及马来妇女协会在大山脚召开全马性马来人反宪代表大会，议决：

(1) 时机成熟时，宣布成立马来亚共和国；

(2) 向英政府通牒，要求英政府在指定日期退出马来亚。

“马来人联合阵线”支持“行委会”

2月22日，在马来左翼政党发动下，一百多个马来团体在吉隆坡开会反对“宪制蓝皮书”，并成立了“马来人联合阵线”（简称“马联”），坚决支持“行委会”的六大纲领，同时增加四要求：

(1) 巫文为国家的官方语文；

(2) 外交事务应由马来亚与英政府共同处理；

(3) 马来亚公民应称“巫来由”；

(4) 马来亚国旗，应采用马来民族传统色彩，即印尼国旗所含浓厚历史意义的红白色。

“马联”与“行委会”紧密合作，高举反殖、反封建旗帜，为马来亚独立展开不妥协斗争，7月7日到7月9日，他们起草的“人民新宪章草案”交由全马各团体于吉隆坡召开的会议讨论。

“马来亚人民新宪章草案”主要包括：

(1) 统一的马来亚；

(2) 组织自治政府；

(3) 联合邦立法议会由18岁以上的人民以直接和秘密的投票方式选举；

(4) 英国最高专员握有国防外交权力，而内政完全由民选部长负责；

(5) 凡在马来亚出生者都可获得公民权，公民权也可以根据下列条件取得：

(甲) 年龄十八岁以上者；

(乙) 在未申请前的十年间，在马来亚居住八年者；

(丙) 品格良好，普通马来文口试及格者；

(丁) 忠诚宣誓效忠马来亚。

(6) 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及行动自由。公民的财产权利受到保障，非经过正式法律程序不得受外来侵害。

(7) 设立一个种族委员会，由马来人、华人、混种、锡兰、阿拉伯、犹太、印度人、欧洲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各派两名代表参加，委员会若认为某法律对任何种族或宗教有损害，有权将法律搁延三年，委员会并有权向立法议会呈法案。

(8) 马来人的宗教与风俗事务，由马来人的机构处理。

(9) 立法议会之官方语言为马来语，但议员可使用别种语言。

宪章建议修正书引起公愤

1947年7月24日，英殖民部公布由“咨询委员会”草拟、根据原来的“宪制蓝皮书”修订的“宪章建议修正书”（简称“修正书”），决于1948年生效。“修正书”特点为：

(1) 星加坡与联合邦分治，一面成立包括9个马来土邦及檳城、马六甲二殖民地的“马来亚联合邦”，一面将新加坡、圣诞岛、可可岛保留为英国直辖殖民地；

(2) 当然公民只限于苏丹子民，以及生长于两殖民地并在联合邦居住15年的英籍民。至于欲申请为公民者，出生于本地者需要在过去12年中在本地居住8年，非出生于本地者，需要居住15年；

(3) 立法议会的议员分为马来人与非马来人，马来人议员为31席，华人为14席，其他民族29席，在75席中，非官方议员有50席，但这50席须由钦差大臣委任；

(4) 公民的权利没明文规定，但明文规定公民并不等于国籍；

(5) 钦差大臣有超越立法议会的最高特权，有督促马来各邦或任何殖民地的行政权力。他有权不必经过立法会

议通过而独自颁布一般法令，也可以否决立法议会所表决的政策，又可以执行英皇在殖民地所有的特赦权，最后决定权完全集中于钦差大臣一身；

(6) 行政议会议员，全部须由钦差大臣委任。

“修正书”引起全马各阶层人民的愤怒与强烈反抗。8月18日“马联”与“行委会”在马六甲召开了包括68个社团，53个商团出席的代表大会，大会议决：

(1) 致电英首相及殖民部大臣提出抗议；

(2) 订于9月9日全甲各行业一律停市一日，表示坚决抗议“修正书”。

9月9日，马六甲、麻坡、万挠、瓜劳雪兰莪、雪州、北海区、北马各主要城市，发动了总罢业。在人民激烈反抗下，英殖变本加厉，为制造“修正书”为即成事实，加紧在星洲及马来亚部署选举。

9月10日，星洲抗日军退伍同志会发表声明指出：“对于星洲立法议会之选举，我们认为这绝非善意举动，英政府企图建立星洲立法议会，使星马分割成为事实，以助“修正书”的实施。立法议会的选举法和组织法是非常狭隘和不民主的。例如：立法议会22个议员中，形式上规定官方议员13名，实际上

真正民选产生的只有6名，况且选民严格限制（只限于21岁以上的英籍民，外籍要归化英籍，须居住30年且要申请）。这样一来，将有80%以上居民无公民权资格，即使6名议员被选出来了，也只能代表极少数人的意见，况且总督有着最高特权。”

9月19日，马共代表张明今也以《为什么要抵制星洲选举》为题，发表声明：“今天人民和政府之间关于马来亚改制问题的争执，是统一与分治、民主与包办的争执，星洲立法议会选举的被抵制，就是这种争执尖锐化的表现。马来亚人民绝大多数要求星马立刻合并，以便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代表全马人民利益的中央政府。可是英政府反对人民的要求，只根据自身利益，实行星马分治……以保留星洲为其永远独占下专利之殖民地。”

星马强行被分裂，“修正书”强行实行引起公愤。1947年7月6日，“马联”与“行委会”议决全力支持全马商联合会号召的全马总罢业一天（10月20日），抗议“修正书”的施行。

全马总罢市、罢业，抗议修正书

在五百万人民团结下，10月20日伟大的总罢业斗争展开了，从北马到南马，从城市到村庄，工人到学生，小贩到商业行，全马各族人民一致团结起来，成功地以罢业、罢工、罢

学、罢市的实际行动坚决表示了他们欲争取一个独立、统一、和平、民主的马来亚的决心。这一次的行动深具历史意义，它表明了：

- (1) 五百万马来亚人民要求星马统一、反分裂、捍卫民主、自由的坚强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 (2) 马来亚人民是热爱和平的，讲道理的，愿意通过也善于通过和平宪制斗争的途径去争取独立，争取统一、民主与和平；
- (3) 尽管英殖民政府尽量挑拨离间，各民族的基本切身利益是一致的，能在互相尊重与求同存异的民主基础上取得一致；
- (4) 这些斗争给英殖民主义者教训，导致后来(1954至1955年)英殖民政府在星马宪制改革中不得不出让步。

紧急法令的颁布

面对一个蓬勃发展的反殖、爱国民主运动，英殖民政府终于在1948年6月18日，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实行了紧急法令，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被捕，被驱逐或被迫转入地下。马来亚民主同盟(MDU)自动解散，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重新进入森林展开武装斗争。马共若在二战日本投降后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会

否对他们更有利？紧急法令宣布后，再度展开武装斗争是被迫或主动？时机是否正确？这些问题人们常挂嘴边，这是马共内部自己的历史问题。不过，客观地说，马共的坚持斗争直接或间接加速了英殖民政府在过后的宪制谈判中，对新马人民做出了让步。

民主同盟催生了人民行动党

有人说，由于马来亚民主同盟(MDU)杯葛1948年新加坡的选举，使自己置身于宪制斗争之外，最后只好自动解散。这是片面看问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的领导人都是不肯屈从于英殖民政府的人，一个个被捕入狱，整个组织遭摧毁。尽管它的历史短暂，马来亚民主同盟在新马建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不能被抹杀：

- (1) 它唤醒了出身中产阶级的受英文教育阶层，促使他们积极参与马来亚民族与建国运动；
- (2) 它提出与散播马来亚民族主义以代替狭隘的种族主义；
- (3) 它通过“马来亚人民宪章”提出了国籍与公民权；
- (4) 它的建党宣言成了后来(包括人民行动党)建党之蓝图；
- (5) 它在当年就提出马来语为国语，且接受“马来由”为国籍。

马绍尔在《建国斗争1945—1959》一文中说过，“1945年12月，一个由讲英语者组成、称为马来亚民主同盟的政党在新加坡成立，它虽与马共合作并成为盟友，尽管如此，基本上它是民主的，真诚努力要为马来亚取得独立，尽管之后有一些过激行动，但它在争取逐步独立的计划中表现温和、有理与具责任感。该党一些主要领导人——约翰·伊峇、林建才、何阿廉及林凤美，他们的功绩几被抹杀，是他们身负重担来唤醒我们的。”

可以说，“没有马来亚民主同盟，就没有后来的人民行动党”。可是李光耀于1959年取得政权后，却彻底放弃建党宣言，脱离马来亚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主流，转而联合英殖民统治者及马来亚联合邦的右翼分子，扑灭所有曾经为他打江山的同僚，以及所有真正反帝、反殖民政府的爱国人士。

我的黑白青春
[WO DE HEI BAI QING CHUN]

作者 林清如
设计 何美娇 张伶 郑钧如
封面题字 林书香

出版 脊顶图书出版社
LIBRARY @ THE GARRET
111 North Bridge Road #21-01
Peninsula Plaza Singapore 179098
Email: librarygarret@gmail.com

发行 长河书局
Great River Book Co.
Tel: +65 6339 3609

印刷 Winson Press Pte Ltd

初版 2014年7月

定价 S\$28

国际书号 978-981-09-0989-5

版权所有 林清如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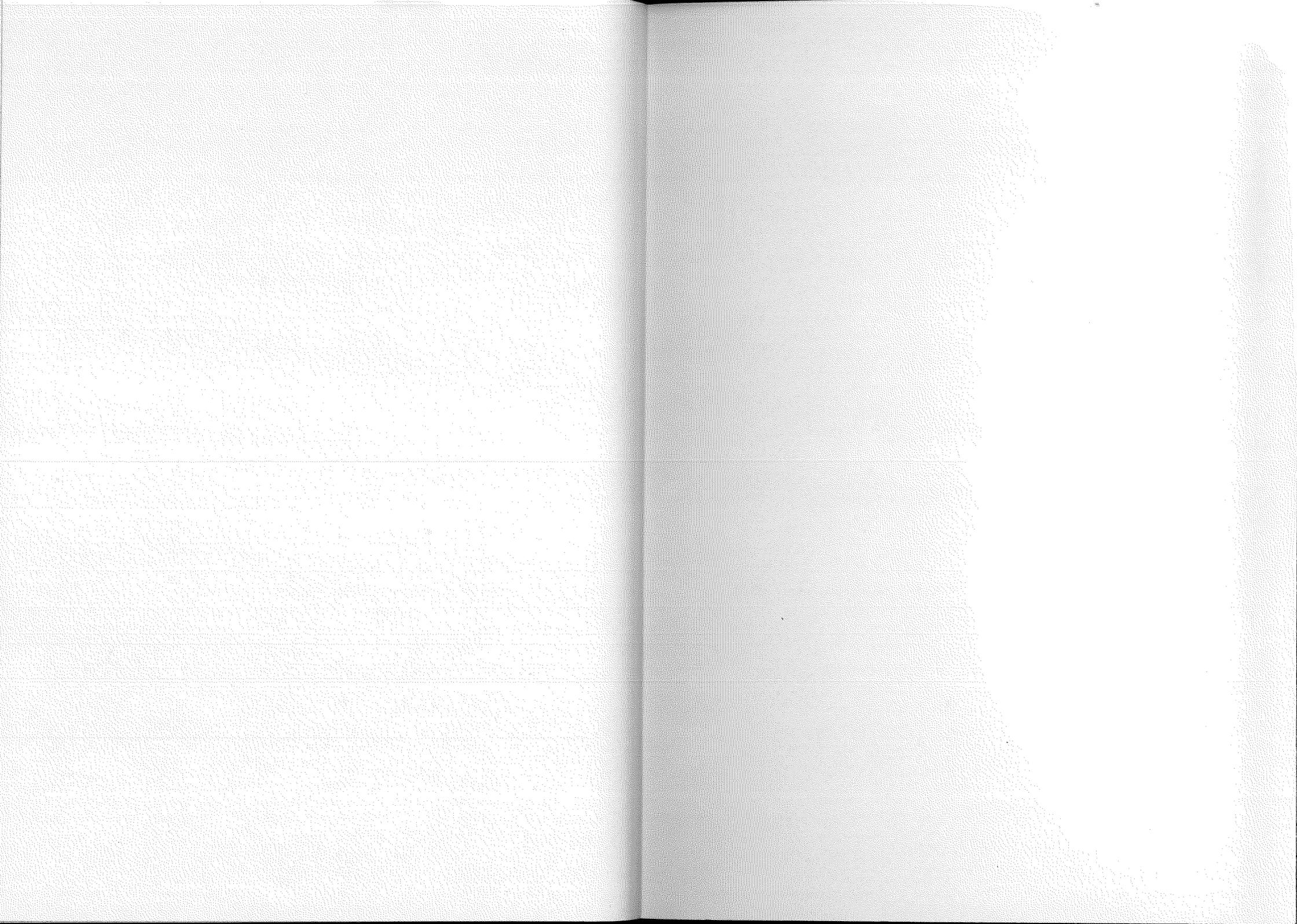


青
春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林清文

978-981-09-0989-5



9 789810 909895